

云南宗教系列专史 主编 杨学政

# 云南 道教史

YUNNAN  
DAOJIAOSHI

萧霁虹 董允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元晖  
封面设计 丁群亚

# 道 教

ISBN 978-7-81112-478-1



9 787811 124781 >

定价：30.00元




云南宗教系列专史

主编 杨学政

# 云南道教史

YUNNAN  
DAOJIAOSHI

萧霁虹 董 允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道教史/萧霁虹, 董允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云南宗教系列专史/杨学政主编)

ISBN 978 - 7 - 81112 - 478 - 1

I. 云… II. ①萧…②董… III. 道教史—  
云南省 IV.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7159 号

云南道教史 萧霁虹 董 允 著

---

组稿编辑 林 艺  
责任编辑 周元晖  
封面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304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478 - 1  
定 价 30.00 元

---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前 言]

“云南宗教系列专史”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重大基础研究课题。本套系列专史分为《云南佛教史》、《云南道教史》、《云南伊斯兰教史》、《云南基督教史》、《云南天主教史》、《云南原始宗教史》。《云南道教史》即其中之一。

“云南宗教系列专史”属于中国地域宗教史，是中国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中国地域宗教史，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宗教史，并为建立中国地域宗教学和民族宗教学奠定基石。在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目前尚无系统的地域宗教系列专史，“云南宗教系列专史”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地域宗教系列专史。本套系列专史对推动中国宗教史、世界宗教史的深入研究，促进东西方宗教历史文化的交流有重要意义。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境内聚居着26个民族，其中有16个少数民族跨国境居住，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与境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宗教活动交往最频繁的省。同时，云南也是我国宗教种类最多的省。境内除了各民族固有的形态丰富多样的原始宗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有传播和发展。历史上，各种宗教与云南多种民族、多种社会、多种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宗教与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紧密结合的特点，也构成了云南宗教形态的多样性和云南宗教文化的丰富性。

在云南，宗教的长期性、国际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的表现及特点十分突出，宗教问题与政治、

国际、民族以及社会经济文化问题相互交织的现象十分明显，并对云南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正确认识和系统了解云南各宗教的历史、现状及特点，不仅有助于对云南人文科学的深入研究，而且有益于云南党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做好各项工作。现在，学术界已取得共识：不研究宗教，就写不好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编写出版“云南宗教系列专史”的目的，不仅是为学术界提供研究云南宗教的基础性成果，推动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而且是为云南党政领导及宗教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提供正确认识和系统了解云南宗教历史及现状的成果，以利于做好云南宗教工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于1984年建所之际，就开始了云南宗教史的资料搜集和调查研究。之后，陆续出版了《云南宗教概况》、《云南省志·宗教志》、“云南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共15本，其中包括《云南宗教史》。印行内刊《云南宗教研究》、《云南宗教资料集》等大量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

“云南宗教系列专史”就是在上列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扩展、丰富和深化而成的。《云南道教史》也是在《云南方志·宗教志》、《云南宗教史》的道教专章上扩展、丰富、深化而成的。本书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云南道教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新成果，坚持客观纪实的原则，记述了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历程及其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关于道教传入云南的年代，前述论著虽有“东汉入滇说”和“三国入滇说”，但目前文献资料尚不充分，只是分析推论。唐代以后，特别是明代，道教在云南广泛传播和发展，并与云南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云南道教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道教是我国本土产生形成的宗教，也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摇篮和载体，孕育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许多灿烂文明成果。因此，《云南道教史》的出版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云南道教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并有益于深刻理解中国道教的丰富内涵，从而继承和发扬道教文化的优秀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和云南省道教协会、云南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海平居士（陆明）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帮助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杨学政

2007年8月

#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言 .....	(1)
第一章 唐以前云南道教的初传 .....	(9)
第一节 道教传入云南的时间、线路和最早教派 .....	(10)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南道教史迹 .....	(16)
第三节 初传时期的道教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	(25)
第二章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道教 .....	(30)
第一节 道教在云南的多渠道传入 .....	(31)
第二节 南诏、大理国王权与道教 .....	(39)
一、唐宋王权与道教 .....	(39)
二、南诏、大理国王权与道教 .....	(41)
第三节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民众道教 .....	(49)
一、南诏杜光庭传说和信仰 .....	(50)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道士 .....	(52)
第四节 道教经云南向东南亚的传播 .....	(57)
第三章 元代、明初的云南道教 .....	(60)
第一节 元代的云南道教 .....	(61)

一、元代云南道教信仰和宫观兴建 .....	(61)
二、元代道教仙人和中原高道传道入滇的历史传说 .....	(67)
第二节 明初全真道人云南 .....	(72)
一、元明内地移民与全真派入滇 .....	(73)
二、明初全真道在云南的传播及影响 .....	(78)
第三节 明初各派高道进入云南 .....	(82)
一、明代高道刘渊然入滇传道 .....	(83)
二、云南邵以正入京修《道藏》 .....	(88)
第四章 明清云南道教的兴盛 .....	(91)
第一节 明清云南道教官方和民间信仰的兴盛 .....	(92)
一、云南道教官职的设置和地方官署 .....	(92)
二、云南真武信仰与武当山金殿的捐制 .....	(96)
第二节 明清时期道教各派在云南的传播发展 .....	(101)
第三节 明清道教与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融合 .....	(109)
一、云南彝族与道教 .....	(110)
二、云南白族与道教 .....	(111)
三、云南瑶族与道教 .....	(114)
四、纳西族木氏土司与道教 .....	(116)
五、傣族土司与道教 .....	(124)
第四节 明清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 .....	(128)

(081)	一、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	
(091)	二、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128)
(101)	三、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131)
(111)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云南道教	(135)
(121)	第一节 民国政府的“神祠废存令”对	
(131)	云南道教的影响	(136)
(141)	一、“神祠废存令”的颁行	(136)
(151)	二、云南历史上一次军警破除迷信的	
(161)	活动	(138)
(171)	三、昆明实施“神祠废存令”与“庙	
(181)	产兴学”的经过	(140)
(191)	四、昆明道教自办学校	(159)
(201)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南道教组织及规章	
(211)	制度	(161)
(221)	第六章 当代云南道教的恢复发展	(166)
(231)	第一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道教的	
(241)	新生	(166)
(251)	一、古老道教的新生命	(166)
(261)	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道教的	
(271)	变化	(168)
(281)	三、一份成为历史的《昆明道教史撰	
(291)	写规划书》	(175)
(301)	四、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民间道教	
(311)	活动	(183)
(321)	第二节 “文革”时期云南道教的曲折	
(331)		(184)
(341)	第三节 20 世纪 80 年代后云南道教的	
(351)	恢复	(185)



一、云南道教活动的恢复 .....	(186)
二、云南道教的平稳发展 .....	(190)
第四节 云南省道教团体及活动 .....	(192)
一、云南省道教协会 .....	(192)
二、云南各地的道教协会 .....	(197)
第七章 云南道教文化 .....	(200)
第一节 云南道教宫观 .....	(200)
一、滇东北地区的道教宫观 .....	(206)
二、滇中地区的道教宫观 .....	(212)
三、滇南地区的道教宫观 .....	(230)
四、滇西地区的道教宫观 .....	(235)
第二节 云南著名高道 .....	(241)
第三节 云南道教典籍 .....	(249)
一、《道藏》传入云南 .....	(249)
二、云南少数民族道教经籍 .....	(254)
三、云南道士、文人与道教文献 .....	(258)
第四节 云南道教音乐 .....	(260)
附录:	
一、云南省各级道教团体 .....	(266)
二、云南道士名录 .....	(272)
三、云南道观一览表 .....	(322)
四、云南道教大事记 .....	(354)
参考文献 .....	(366)
后 记 .....	(379)



# 导 言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宗教，已有一千八百年以上或更长的历史。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都认为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6—144年），但若追溯到战国时传播神仙方术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那么道教信仰在我国流传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道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间信仰和大众文化有着血肉般的密切联系，能体现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思想信仰、民众性格和生活习俗的特质。道教主张尊道贵德、道法自然，以清静无为为法则治国修身。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宇宙生生不息的总生机，又是宇宙深层本质和社会人生的最高真理，具有无限性、超越性和普世性，<sup>①</sup>相信人通过修炼可

<sup>①</sup> 牟宗鉴：《道教》，见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以“成仙得道”。道教是重生的宗教，养生文化最为发达。道教信仰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修道成仙、长生不死，其次是治病健身、驱邪除祟、祈福消灾。道教的源头很广，是在方仙道和黄老道的理论上吸收了神仙方术、民间巫术、自然崇拜、阴阳五行等而形成的宗教。

道教的名称来源，一则起于古代之神道；二则起于《老子》的道论，首见于《老子想尔注》。道家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学术界一般认为，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完成于东汉，因此将东汉时期视作道教的初创时期。道教正式有实体活动是在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而《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

2 汉末，张角在河北成立“太平道”，率黄巾军起事失败后，太平道衰败；与此先后出现的张道陵在四川所创“五斗米道”却发展起来，东晋末更名为天师道。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有重大发展，东晋时葛洪主张外儒内道，奉《洞玄灵宝经》为道经，以元始天尊为教主，太上老君为尊神，是为“灵宝派”。南朝道教经陆修静、陶弘景的改造，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其中，以陶弘景为代表的“上清派”是这一时期的著名道派，陆修静把天师道与金丹道结合起来是为“南天师道”。北朝道教经寇谦之的改造称为“北天师道”，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支持，在北魏盛行。隋唐时期，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诸多派别，修炼方式由修炼外丹向修炼内丹转化。道教主要宗派繁衍，始自宋、金。

道教史上因“道法承受”来源不同而分衍宗派，最大的派别有：

## 1. 正一道

唐宋以后，天师道与灵宝派、上清派等日渐融合，形成正一道。张道陵后裔到元初已传至三十六代张宗演，元世祖命其主领江南道教。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授张宗演次子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从此“天师道”又名正一教、正一道。自从道教分衍宗派之后，阁皂山主要传葛玄灵宝法箓，称灵宝派；龙虎山传张天师法箓，称正一派；江西一带流传许逊法箓，称净明派。《明史·方伎传》载：正一派道士大都是“专恃符箓，祈雨驱鬼”。一般说，正一道主要从事符箓斋醮。道教传授经箓科仪的，旧分三宗，又名三山，即江西贵溪之龙虎山、樟树之阁皂山、江苏句容之茅山，这三山经箓总归为正一派。此后凡是道教的符箓各派统称正一道。

## 2. 全真道

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至山东宁海立全真庵传道，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即全性返真为宗旨，入道者称“全真道士”，全真之名由此而起。王重阳主张三教合一，他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教其门徒讽诵《孝经》、《心经》、《道德经》。不尚符箓丹鼎，也不侈谈成仙，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内丹修炼，以清心寡欲、炼气全神，识心见性为主。其弟子丘处机等仿佛教建立道教丛林制度，全真道士住丛林、重清修。王重阳有七大弟子，号为“北七真”，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王重阳去世后，七人弘扬师教，各立宗派：马丹阳建遇山派，谭处端立南无派，刘处玄立随山派，丘处机立龙门派，王处一立嵒山派，郝大通立华山派，孙不二立清静派，



其中唯龙门派最盛。

### 3. 真大道

亦称大道教。创始人为沧州刘德仁，其教在金初创立，旨以“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虚心实腹，守气养神”为主，不尚炼丹飞升之事，主张“苦节危行”，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诏居京城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元代加封为“无忧开微洞明真君”，赐其教名为“真大道”，自此遂称真大道教。此派在元代颇盛行，后来逐渐衰微，分化入全真、正一派。

### 4. 太一道

创始人为卫州萧抱珍，在金初创立。因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故名太一。教旨以老子之学修身，又以巫祝之术济人，其教传嗣有秘箓法物，继法嗣者皆改姓萧。全真道和真大道教不讲符箓法术，而太一道独以此出名，颇与天师道相接近。元以后失考。

据北京白云观藏有《诸真宗派》记载：道教有大小86个道派。后各派之间逐渐融合，发展至明清时，正一道成为符箓派的代表，全真道成为丹鼎派的代表。现在道教主要是正一、全真两大派，其他一切支派皆归纳于这两派之中。

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是在中国敬天祭祖的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以道家为主要思想渊源，吸收阴阳家、墨家、儒家（包括谶纬学）、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沿着方仙道、黄老道的基本思想和修持途径而逐渐形成的。长期以来已成为中国民间习惯的宗教观念，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纵观道教历史及其教义信仰、修持方术、制度仪式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点，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

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sup>①</sup>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篆方术，其教义就是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天，既指现实的宇宙，又指神仙所居之所。天界号称有三十六天，天堂有天门，内有琼楼玉宇，居有天神、天尊、天帝，骑有天马，饮有天河，侍奉有天兵、天将、天女，其奉行者为“天道”。地，既指现实的地球和万物，又指鬼魂受难之地狱，其运行受之于“地道”。人，既指总称之人类，也指局限之个人，人之一言一行当奉行人道、人德。鬼，指人之所归，人能修善德，即可阴中超脱，脱离苦海，姓氏不录于鬼关，是名鬼仙。神仙，也是道教教义思想的偶像体现。道教是一种多神教，沿袭了中国古代对于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以及祖先亡灵都奉祖的信仰习惯，形成了一个包括天神、地祇和人鬼的复杂的神灵系统。道教一反“一神教”的模式，尊神众多，道教的神主要有天神、地祇和祖先三个来源，并将中国民间神、民俗神包揽进自己的神仙体系。

道术是道教徒实践天道的重要宗教行为，斋醮、占卜、符篆、内外丹等均为修炼道术。《云笈七签》卷四十五《秘要诀法·序事》：“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伎也。道无形一，因术以济人；人有灵，因修而会道。”一般认为它有外丹、内丹、服食和房中等内容。外丹，指用丹炉或鼎烧炼铅汞等矿石，制

<sup>①</sup> 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页。

作人服后能“长生不死”的丹药。源于秦汉方士炼黄金白银，故又称“黄白术”，唐以后渐被内丹术所代替，为中国古代药物学、化学作出一定贡献。有关外丹的重要著作有《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等。内丹，为行气、导引、吐纳之类的总称，指用人体作炉鼎，经过修炼使精、气、神在体内凝结成丹，而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内丹之术自金元以后逐渐盛行，其渊源上溯至战国时代，对于中国的气功、医学和养生学有过很大的影响。有关内丹的著作甚多，重要的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兼言外丹）、张伯端《悟真篇》及《钟吕传道集》等。

道教所奉的经书，包罗甚广，《道藏》不仅包括有道教经戒、科仪、符图、炼养等类的经书，也包括有道家哲学及有关的儒、墨、名、法、阴阳、兵、医、杂等诸家书籍，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数量庞大。不过，经书虽多，一般道士都只念诵《玉皇经》、《清静经》、《三官经》等，文化高一点的道士才奉习《道德经》、《南华经》、《黄庭经》，以及《悟真篇》、《坐忘论》、《参同契》等。

道教的清规戒律甚为烦琐，总的可分为戒律、斋戒、清规、禁忌四种。道教祀神的祠庙叫道宫、道观，也是道士修道、祀神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全真道宫观的规模主要部分为：三清、玉皇、灵官等殿和山门。正一道因无从林制度，大多数教徒与非教徒混居，或有一些较小的神庙，其最大宫观为江西龙虎山天师府、茅山元符万宁宫、苏州穹窿山上真观。全真道著名宫观很多，如北京白云观、成都青羊宫、沈阳太清宫等等。两派的建筑形式与神殿的层次，虽有广狭多少之别，但大致相同。

教徒有两种：一种是教职人员，即“道士”。据《太霄琅书经》：“人行大道，号曰道士。”“身心顺理，

为道是从，故称道士。”他们按地域可分为茅山道士、罗浮道士等。从师承可分为正一道士、全真道士等。按宫观中教务可分为“当家”、“殿主”、“知客”等。另一种是一般教徒，人称“道众”、“居士”。道教另有一些经济组织（如素食部等）、教育组织（道学班、道教经学班等）、慈善组织（安老院、施诊给药部）等。

道教仪式，除了日常的早晚功课，还有大型的功德法事，统称为“斋醮”。“斋”就是齐，祭祀之前，整洁身心，即外者不染尘垢，内则五脏清虚；“醮”就是设坛修建祈禳法事，书表章以祷神灵。道教斋醮又可区分三类：黄箓、金箓、玉箓。黄箓，专用于超度亡灵；金箓，除了超度外，还包含延寿受生的内容；玉箓，专用于消灾祈福，祈求国泰民安。

道教自形成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更和文化潮流的演进而不断发展，与儒、释一样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风俗民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云南地处西南一隅，是一个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各少数民族与从内地迁来的汉族人民一同创造出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云南文化，而云南又与“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四川毗邻，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发展，形成了独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色。道教在云南历史悠久，除汉族外，在白族、彝族、瑶族、纳西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亦有道教信仰。民国学者认为“滇之有道教，约在元室统一以后。明清之际，固尝盛极一时，各地道观，如琳宫贝阙，彼此相望，金碧辉映。”<sup>①</sup>但从目前习见志乘及考古文献，我们不难发现

<sup>①</sup> 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至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抄本。



唐以前，乃至汉魏之时已有道教在云南流传的遗迹，而且，明洪武初年沐英在昆明建五灵庙时碑刻亦载：“云南地极边，民杂诸夷，其事神也虔。自元以前，声教未被，典籍无闻，庙既建于声教未被之先。”<sup>①</sup> 昆明的关帝庙之建“当在段正严遣使朝贡后，则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也。吾滇关庙，此为最古”<sup>②</sup>，也属此例。这说明元朝之前中央皇权的声威与教化尚未遍及云南，但在“声教未被之先”，边远的云南已有庙宇建立，只是文献记录难寻罢了。宗教信仰从传播到为大众所接受，并有宫观建筑，直至进入文献记载会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搜寻零星史料和考古资料，把“唐朝以前”作为《云南道教史》的开篇。

①（明）柯暹：《重修五灵庙记》，见（明）郑顺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8月，第519页。

②（清）戴纲孙：道光《昆明县志·祠祀志第八上》，见张维桢主持标点《昆明历史资料》第13卷，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87页。

## 1

唐以前云南  
道教的初传

据《南诏野史》和《滇云历年传》记载：“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南诏废道教。”<sup>①</sup> 从而可知，道教传入云南历史悠久，但道教何时传入云南？早期传入为何派别？在唐以前几乎没有明确可信材料，几近史料阙如。以往学者根据明清地方志的零星资料，依托对云南历史的分析，研究道教传入的条件，推断出了道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教派。由于至今尚无新的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发现，因此，我们暂沿袭这些陈述，以资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①（明）杨慎：《南诏野史》，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云南书局刻本，第22页；（清）倪蜕：《滇云历年传》，李埏校点，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34页。太和，亦作“大和”。

## 第一节 道教传入云南的时间、线路和最早教派

相关著述多认为道教在东汉末年就传入云南<sup>①</sup>。

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一作鹄鸣山，在今成都市大邑县北）修道，自称太上老君降命为天师，授以正一盟威之道，造作道书二十四篇，以教百姓，创立“五斗米道”。据《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因五斗米道受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影响，巫术色彩浓厚，又称为“米巫”、“米贼”、“米道”。亦称“正一道”、“正一盟威之道”，又因教徒尊张陵为天师，也称“天师道”，是道教最早的派别之一。据《华阳国志》载：张陵自称“太清玄元”。除崇奉老子为教主外，他还造了许多神灵，主要奉持《道德经》、《正一经》为经典，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孙张鲁继续在川西北和陕南一带传道，标志着早期道教逐渐形成。

张陵为了统率教民，创教时便建立了“二十四治”，这是五斗米道祭祀神明的地方，也是管理教民的核心机构，同时也就是24个传教点，每一“治”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而且，每一“治”还设有“祭酒”等教职人员主持教务。“二十四治”的分布是蜀

<sup>①</sup> 颜思久主编：《云南省志》卷66《宗教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上三书均持此见。

郡设阳平治、鹿堂治、鹤鸣治、漓沅山治、葛贵山治，广汉郡设更除治、秦中治、真多治、昌利治、隶上治，遂宁郡设涌泉治，犍为郡设稠梗治、北平治、本竹治、平盖治、平刚治，越嵩郡设蒙秦治，巴郡设云台治，汉中郡设涪口治、后城治、公募治，成都南门左设主簿治、玉局治，东汉都城洛阳设北邙治。<sup>①</sup>以阳平治（今四川彭县）、鹿堂治（今四川绵竹县）、鹤鸣治（今成都市大邑）为传教中心，阳平治最大。

“二十四治”大多分布于今四川省境内和陕南一带，但其中也有两“治”的管辖范围已延伸到了今云南省的地域内，由此看来，其所辖教民中会有部分云南人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四治”载：“稠梗治，在犍为郡新津县，去成都百一十里，汶山江水经焉，山高去平一千七百丈，昔轩辕学道之处也；蒙秦治，山在越嵩郡台登县，西去城二十里，去成都一千四百二十里，治与越嵩郡隔河水，前有小山，后有大山，高一千丈，昔伊尹于此山学道。”<sup>②</sup>

“二十四治”所处郡县多是西汉时设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朝廷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喻令南越归附汉朝。唐蒙在南越见到蜀地出产的“蒟酱”，了解到从巴蜀地区经夜郎的牂牁江有一条商道可通南越番禺（今广州）。当时，牂牁江附近主要居住的是夜郎等部落，于是，唐蒙建议汉武帝控制夜郎，开通此道。汉武帝派他率军到夜郎，厚赠财物，夜郎及其周围部落均表示归附。西汉便在此建立犍为郡，并在秦朝“五尺道”的基础

①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35页。

② 转引自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57页。

上，开通了从犍道县（今四川宜宾）通往牂牁江和滇中地区的道路，称“南夷道”。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设立犍为、牂牁、越嶲、益州四郡。其中，犍为郡、越嶲郡便是“二十四治”中设置区域中涉及云南的两个郡。犍为郡共辖 12 县，大体包括今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今天云南的昭通、东川、宣威、会泽、巧家、大关均在其辖区内。越嶲郡共辖 15 县，大体相当于今四川西昌及云南西北部，即云南的大姚、丽江、永胜在其辖区内。<sup>①</sup> 西汉统治者设立犍为郡，目的是为了便于开通四川经夜郎地区到达南粤的道路，为以后进攻南越国做准备。而其他几郡设立的动机，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武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sup>②</sup> 两汉在西南地区的郡县设置，扩大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地域范围，也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今天的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东汉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在今云南西部增设永昌郡，多置都尉及属国都尉，“治民比郡。”实际上把西汉在边疆设置的属国升级为郡级行政机构。安帝在边疆地区设六处属国都尉，益州刺史部辖广汉、蜀郡、犍为等三处属国，其中犍为属国辖朱提（治在今云南昭通）、汉阳（治在今贵州威宁以东）二县，西汉的堂琅县（治在今云南巧家）并入朱提县，存郛县（治在今四川宜宾）并入汉阳县。<sup>③</sup> 对西汉所置犍为郡，

①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第 55～56 页。

②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3 月，第 140 页。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点校本。

东汉保留并增置犍为属国，其辖境南面达今云南东川，已入今昆明市辖境。犍为属国与益州郡辖地相连，使由犍道南下益州的使臣或商旅，路途中一直处于官府的有效保护之下。两汉时期，由官方组织来自蜀地的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尤以滇东北、滇中地区最为密集。移民带来先进的经济文化因素，有利于云南地区的开发。五尺道与南夷道成为云南联系外地的要道，促进了四川与云南的经济文化交流。<sup>①</sup>加之云南与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四川毗邻这一特殊的地缘关系，所以，有学者认为，汉末五斗米道的势力进入云南东北、西北地区“应是无疑的”<sup>②</sup>。由此推测，道教传入云南的线路是两汉时期的五尺道和南夷道，最早传入云南的道教教派是五斗米道。

另外，相传东汉时，就有人称“神明大士”的道士杨波远在云南传教。明代诸葛元声《滇史》和万历《云南通志》，清代雍正《云南通志》、高爵映撰《鸡足山志》均载：传说杨波远常骑三角青牛游滇国、苍洱间，传教布道，替人禳灾祈福。在鸡足山，“遇神僧供一石案，长一丈六尺，阔六尺，遂以一手持之而去。后不知所终。今石存焉”。这“石案”现在鸡足山是否还有存，有待考证。但是，“地近易核，时近迹真”，这些史志记载毕竟是时隔千余年后人写下的文献，若记载可信，那么，杨波远可谓目前有史料记载在云南活动年代最早的道士。

有学者考证，道教之所以在东汉末年传入云南，是因为已具备了以下两方面的条件：<sup>③</sup>

① 方铁：《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收入暨南大学《中国历史地理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

②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58页。

③ 以下内容参见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34~58页。

1. 秦汉经营西南开启蜀滇交通线，蜀滇人民的交往是道教传入云南的渠道

早在殷商时期，包括今四川和云南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地区活动着羌、濮、越三个大族群，血缘上的相近及地理上的毗邻给川滇两地的人民相互交往带来了很大便利，两地人民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相互交往的传统。

战国以后，随着中原地区封建统治者对西南边疆的垦殖，较多的汉族人民也逐渐移徙进入云南，秦时“焚道”和“五尺道”的开通，特别是两汉经营西南，设置郡县，开通南夷道，从四川到云南已“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旅往来，络绎不绝”<sup>①</sup>，说明早在秦代汉初，巴蜀商人经常在滇、邛都（今西昌为中心的川西南地区）开展贸易，因“巴蜀殷富”，滇向巴蜀地区输出的主要是“焚僮”（奴隶），邛都则提供笮马和牦牛，滇与巴蜀以外的中原地区也有经常性的商贸往来，为巴蜀文化乃至中原文化进入云南提供交通的便利。

东汉章帝时（公元76—88年），有蜀郡人王阜任益州（以滇国为中心）太守，并在当地“治化尤异，神马四疋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鸟见，始兴文学，渐迁其俗”<sup>②</sup>，这是西南夷地区官府办学迄今所知最早的记载。除益州郡以外，其他边郡的治地也陆续开办学校。东汉《孟孝琚碑》记载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名士孟孝琚“十二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后汉书·西南夷传》载：东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牂柯郡（今云南东部、贵州西南等地）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

①（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269页。

② 同①，第252页。

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另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sup>①</sup> 图纬是指图讖和纬书，图讖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关于帝王受命征验一类的书，多为隐语、预言；纬书是汉代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由此可见汉代的云南，已与内地有着较多的交往，并多受内地文化的影响。

云南与内地交往和影响的范围应当是很广泛的，五斗米道于东汉末年创立，张陵在蜀中创立五斗米道的活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汉天师世家》所言，张陵弃官入蜀是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而打出太上老君的旗号“奉行布化”是在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往登青城、“诛鬼伏魔”则在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他的“教化”作为一种在当时影响不弱的宗教思想，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势必会被来往于川滇两地的人们携入云南。

## 2. 滇与巴蜀相近的民俗为道教传入创造了文化基础

《汉书·地理志》曾载：“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民俗略与巴蜀同。”这种“略同”体现在五斗米道与古代云南文化之间，大致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五斗米道的一些方术与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巫教的巫术行为有极相似的地方，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言：南中之民“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而

<sup>①</sup>（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56页。



五斗米道《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所记录的方术也多与此相似。二是古代云南人民多有类似于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的思想，如后世道教极为推崇的古蜀王杜宇，《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言其出生于朱提，《华阳国志·蜀志》又言其“以汝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sup>①</sup>曾为了修炼长生而将王位禅让给了鳖灵。《道教三字经》有“古蜀君，去归隐，禅鳖灵”的说法，《抱朴子内篇·释滞》等也曾提及此事。杜宇的这种行为必然会对其属下的南中臣民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又据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的文物，可知古代云南人民有关于所谓“羽人”的传说，而“羽人”乃是中国古代神仙家们对不死神仙的一种想象，后来道教亦宣扬不死神仙，即“身生羽翼，变化飞行”的仙人，羽人、羽士、羽衣、羽化均为道士、飞仙、仙人、仙化的别称，取其羽衣飞升成仙得道之意。这种“略同”，使得五斗米道的说教流入云南后很容易在云南的部分人民中传播开来。此外，五斗米道中保留了较多的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内容，五斗米道的祀神驱鬼等行为，与云南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先民（濮、僰、叟）的原始宗教中的撵鬼除秽等行为也极相似，这使五斗米道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较容易得到认同，从而易于得到流传。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云南道教史迹

五斗米道在创立后不久，钜鹿（今河北宁晋）人

<sup>①</sup>（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64页。

张角，奉《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为经典，在北方创立太平道，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率太平道徒起义，因起义军头着黄巾，史称“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五斗米道受到了中原封建统治者的挟制而陷入了暂时的沉寂。《三国志·魏书·和常杨杜赵裴传》载：曹操征服了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政权后“竟徙民弃汉中”。“由于曹魏政权对道教采取限制的政策，因此道教受到很大打击而势力大大削弱。史书不复有太平道的记载，或这一道派已瓦解。五斗米道，就张鲁个人及其家族虽说仍受曹魏优待，但汉中地区的道教似乎也没有什么活动，史书上对曹魏时期五斗米道的活动也很少记载，那么汉中地区的道教势力到何处去了？很可能向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转移了。……云南地区的文化或颇受道教影响。”<sup>①</sup>自三国之后，云南地区的道教活动屡有显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洪景等人努力和改革，道教成为与佛教并列的中国正统宗教之一，并在社会各个阶层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下层人民中间，道教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很多上层士族都成为道教信徒，有的甚至代代相传，成为所谓天师道世家。这些上层士族进入道教，给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影响。<sup>②</sup>而且，道教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东晋以来，先是对已经涣散和不固定的道教组织进行整顿，同时，为弥补其缺乏系统的宗教教义和理论系统的不足，作为天师道世家的葛洪在《抱朴子》中创造了道教教义的理论体系，为巩固道教教会组织制定了教规

① 汤一介：《早期道教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29页。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07页。

教仪，并为阐发其宗教教义构造了大批经典，最后为把道教建成完备的宗教团体还编造了超现实的神仙谱系和现实的传授历史。<sup>①</sup> 为上层化的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道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天师道世家的出现，标志着道教已经逐渐摆脱原先的那种下层反叛色彩，而进入国家社会生活的中、上层，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这一时期云南道教的史迹也大多伴随着云南上层贵族南中大姓的历史而留存。

从三国时期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原“西南夷”的益州、永昌、牂牁、朱提等郡，史籍记载上统称“南中”，主要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地区。东汉时，这一地区各郡隶属益州刺史管辖，刺史和郡县长官虽由王朝中央直接任免，但郡县僚佐则由郡县长官辟用本地汉人充当。东汉末年，南中地区这些戍边的内地汉人，出现了不少“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的南中大姓，他们拥有按部、曲、屯组织起来的军士，还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私人武装，一些被称为“夷帅”、“叟帅”的昆明族、叟族的贵族。如建宁的雍闿、孟获、爨习，朱提的朱褒、孟琰，永昌的吕凯，俞元（今澄江）的李恢等，都是西汉进入云南屯戍的汉族移民中发展起来的，经过世代定居已多少“夷化”了的豪强大姓，<sup>③</sup> 他们逐渐形成地方当权势力，并与内地政权冲突抗衡，所以，正史、地方史对于南中大姓的相关记载甚多。从其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披览到些许与云南道教有关的史料。

① 汤一介：《早期道教史》，第155页。

② 何光沪主编：《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19页。

③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48页。

东晋史学家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比较完整的地方志专书，全书共十二卷，大约十一万字，内容涉及巴、蜀、汉中、南中地区的地理、历史资料，是公认的研究古代西南夷最具权威性的重要著作，也是最初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著作。由于《华阳国志》将道教五斗米道创立的全过程记载得最翔实，其《巴志》、《汉中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中，用极大的篇幅记载了当时居住在四川、湖南等地少数民族賁人的祖居和迁徙发展的历史，以及賁人的鬼巫崇拜，张陵入蜀向賁人学习鬼巫，创立道教，賁人因信奉五斗米道而迁徙追随张鲁建立五斗米道政教合一政权等等内容，所以，有学者由此认为，《华阳国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道教史<sup>①</sup>。其中也有涉及云南的道教史料。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言南中之民“俗征巫鬼，好诅盟”，又言其“俗妖巫，或禁忌，多神祠”。<sup>②</sup>这是滇中等地濮（僂）人信奉巫鬼教（一种原始宗教）的记载。

《南中志》还有蜀汉末年南中大姓雍闿、孟获假借“鬼教”召集百姓叛蜀的记载，“先主薨后，越雋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张裔为太守。闿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于是执送裔于吴。……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曰：‘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螭脑三斗，斫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为然，皆从闿。”<sup>③</sup>巫鬼教长期流行于云贵地区和川西南一带，信

① 蔡运生：《〈华阳国志〉中国最早的道教史》，《中国道教》，2000年5期。

②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54页。

③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53页。

教众人奉大、小鬼主为宗教领袖。雍闿能假鬼教令益州郡蛮夷缚送张裔至吴，表明他熟悉巫鬼教的规矩，在教众中可能还具有类似于鬼主的地位。在《晋书·载记》第二十《李特》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责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这说明“鬼教”即是“鬼道”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即使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也会有极密切的关系。

《南中志》中涉及南中大姓与道教有关的另一则史料的是：公元3世纪末年，晋王朝派到南中的官吏“懦弱无治，政以贿成”<sup>①</sup>，与南中的大姓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如建宁太守杜俊夺了大姓毛诜和李叡的部曲，又治了毛诜弟弟的罪。朱提太守雍约因受贿而推荐都尉雷逢的儿子雷炤为官吏候选人，却拒退了颇有才干的大姓李猛的弟弟，导致李猛等人产生怨恨。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毛诜、李叡“逐（杜）俊以叛”，李猛也“逐（雍）约应之作乱”。<sup>②</sup>晋王朝派南夷校尉李毅征讨叛乱，杀了毛诜，并迫使李叡逃依“夷帅”于承陵，李猛见势，向李毅递交降笺曰：“生长遐荒，不达礼教，徒与李雄和光合势。虽不能营师五丈，略地渭滨，冀北断褒斜，退考灵符，晋德长久，诚非狂夫所能干。辄表革面，归罪有司。”晋代神仙道教兴起，研究术数之学的道士遂形成占验派。李猛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其知道以“考灵符”来颂扬“晋德长久”，从而试图逃脱晋王朝治罪，表明他所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不浅，所以，如果当时云南没有一定的道教文化氛围，李猛是无从学到这类语言的。<sup>③</sup>

①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05页。

②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55页。

③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69页。

《华阳国志·大同志》载：西晋初年，犍为郡有陈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以鬼道惑民”，<sup>①</sup>设有道治及天师、祭酒等职，咸宁三年（公元277年）益州刺史王濬以“不孝”之罪杀陈瑞和祭酒袁旌，焚其教舍。该道派的传播范围广达益州、犍为、巴郡等地，影响很大。又载信奉五斗米道的资人后裔李特、李雄等曾从略阳、天水一带流入蜀中起事，在隐居青城山“求道养志”，“蜀人奉之如神”的道教领袖范长生的帮助下，建立了成汉政权。成汉政权曾拜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相当于巫相职位，而且“雄信巫覡”，“范氏天师道实际就是成汉政权的国教”<sup>②</sup>。成汉政权又于东晋咸和七年（公元332年）开始征战南中，次年“南中尽为雄所有”。在成汉政权统治南中的十余年时间内，南中人民很可能受到成汉政权所奉道教的影响。

从滇东北和滇池地区的考古资料看，一些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南墓葬中有不少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绘雕作品，如呈贡小松山的东汉墓、昭通后海子东晋墓的墓壁上，以及《孟孝琚碑》的碑上均有这类绘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合为四方之神，虽非道教专奉的神灵，但汉晋以后被神格化，成为道教守护神，是道教极为宣扬和崇奉的四位重要神灵，《道门定制》曾将其特列为道教的“四方之神”。云南古代墓葬和碑碣中出现的这些神灵，当与道教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又从立于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中“回抱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等语句中，可以发现道教的性命难保、灵魂不死思想对当时的云

①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271页。

②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56页。

南人民已有着较深的影响。立于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则体现了道教的宇宙观、人生观等对云南文化的影响，如碑有文：“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sup>①</sup>其中“阳九运否”乃道教描述宇宙运动的用语，所谓“阳九”，《灵宝天地运度经》释为：“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蝉蜕”一词，乃道教描述人得道成仙的用语，而“逍遥”则是道教对得道成仙者自由自在、悠然自得之状态的形容。还有昭通发现的一座东晋墓中，有“夷汉部曲”壁画，壁画中有一个咒符一类的符号可以证明以上说法。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内地一些上层道士从理论上改革民间原始道教，使之改造成为贵族道教。道教形成了“上清”、“灵宝”和南北“天师道”各派，并产生了以葛玄、葛洪、许逊、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的一批著名道士。他们编制图籍、造作经典、制定科仪、弘扬道教。道教同统治阶级的意志结合后，在教理、教义、仪式、组织等方面都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而这一时期内地战乱频仍，云南相对安定，不少内地汉族人口为逃避战祸纷纷进入云南，奉道之民携带经典图像而来，也会携道教文化而来。东晋时，道教在江南一带兴盛，出现了很多世奉道教的家族，如“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王羲之家族等。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崇拜王羲之，南诏“立晋右军王羲之为圣人”，云南地区尊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不知尊孔、孟”，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白蛮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江南迁来的人民有很大关系。总之，道教在这一时期大量地进入了云南，并对云南的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① 《爨龙颜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36页。



《洞仙传》有晋时郭志生得道成仙的记载。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今云南昭通）人，于晋元帝时（公元317—322年）年自称有四百岁，人见之如五十许，“有短卷书满两筐中，常负之，多止乌场张绩家。每叹曰：兵荒方至，毒流生民……”<sup>①</sup>后尸解成仙而去。郭志生的事迹被载入道教的神仙传记中，这说明晋代时昭通一带有道教的传播和道士的活动，而且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夔古通纪浅述校注》言诸葛亮南征“至白崖，铸铁柱，上列天地日月星辰雷电云雨中界神明之像，号曰‘天尊柱’”，郭松年《大理行记》亦有类似记载，诸葛亮为夔人铸“天尊柱”，并传授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sup>②</sup>

汉至晋代的史籍记载中，还有一则道教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传》说：“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王褒于路途曾作《移金马碧鸡文》，明代杨慎曾将之书于西山南崖：“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sup>③</sup>据《汉书·地理志》：金马碧鸡在越嵩郡蜻蛉县（今云南姚安、大姚一带）禺同山。晋代金马碧鸡被奉为山神，人们立祠祀之，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言：蜻蛉县，“山有碧鸡金马，光彩倏忽，民多见之，有山神。”唐代金马碧鸡的神话传播到滇池地区，民称其二山为金马山和碧鸡山，山上

① 《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洞仙传》，《道藏》本。

② 参见杨学政、郭武《道教在云南》，《宗教学研究》（季刊）1993年1-2期。

③ （清）戴纲孙：道光《昆明县志·祠祀志第八上》，见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历史资料》第13卷，第233页。



建有神祠。有学者认为金马碧鸡的传说可能与当地出产金银有关。<sup>①</sup> 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金马碧鸡“实际就是赤铁矿石和绿铜矿石”，是炼丹采药的方士渴求的奇异矿物，汉宣帝遣谏议大夫王褒求金马碧鸡就是为了搜寻奇异矿物，从而获得能“与天相毕，与日月同光”的长生不死丹药，“这个千年不断复述的故事，最先记载的是仙道崇拜”。<sup>②</sup> 无论怎么说，王褒是因方士之言来滇，与道教是有直接关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云南道教的史料，最具传奇色彩而又传播较广的是孟优的记载。清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仙释》卷五载曰：“孟优，世居巍宝山，与土帅孟获兄弟也。素怀道念，常往来于澜沧、泸水间，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多，随处济人。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丞相亮南征，误饮哑泉者，辄手足四禁而不语，或言优有良药，使人往，优进仙草，立验。武侯惊异之，与语人天运会，深有契焉。后入峨眉山，不知所终，子孙于元时，赐姓猛”。《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四》亦有相似记载，但正史《三国志》中则无诸葛亮与孟优交往的内容，亦无孟优相关内容。众所周知，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十九回“武乡侯四番用计，南蛮王五次遭擒”中曾描述过与此相似的故事，只是《三国演义》中的孟优是与孟获一道对抗蜀兵，多次被诸葛亮生擒的孟获弟弟，而为诸葛亮解困的人，则是孟获的哥哥孟节。诸葛亮在山神指引下带领误饮哑泉的士兵，到深山万安溪边寻找高士“万安隐者”孟节，他让蜀兵喝安乐泉解除病患，人含一叶“薤叶芸香”不染瘴气。令诸葛亮感激不尽，欲赠功名金帛，孟节坚辞不受，依然是：

①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223页。

② 昂自鸣：《金马碧鸡的传说及其影响》，见夏本戎主编《五华文史资料》第17辑，2005年12月，第207页。

“高士幽栖独闭关”，继续修行在深山。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明代写就，不知是两部志书的作者因小说而演绎，还是在明清之前确实有孟获兄长修道的文字记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现考证。这一历史传说向我们传递着两点史实：魏晋时期，巍宝山一带有道士修道并行医济世；另一点是诸葛亮南征时，其军卒得到过在澜沧江、泸水间以“巫医并用”修道者的救治。

由上述零散而片断的史料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澜沧江、泸水区域或说今天滇东北、滇西地区，甚至更广的地方已有了道教方士的活动，这些四处活动的道士的一些思想观念，对云南的“南中大姓”和少数民族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时期道教逐渐在云南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一是表现在奉道修炼之人在云南活动范围的增大，这势必使道教的影响增大；二是表现在道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了云南文化之中。<sup>①</sup>

### 第三节 初传时期的道教与云南 少数民族文化

东汉末年以来，道教随着外地移民不断地进入云南，云南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内地的交往密切，增强了云南的道教势力，并对云南的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云南地区自古就有很多少数民族居住，其中有许多是氏、羌后裔，彝族、白族和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并多与蜀地氏、羌族群有关系，族属上是同源

① 郭武：《道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的，即“民俗略与巴蜀同”，其宗教信仰和习俗也应与蜀人大体相同。五斗米道创立时，在“四川鹤鸣山一带，正是少数民族聚居与活动的地区，有氐、羌、叟、邛焮、摩沙、昆明等古代少数民族”<sup>①</sup>。张陵所创的早期道教，特重占星祭天、祀神驱鬼，俗称“鬼道”，似彝族、白族、纳西族的原始宗教，融入他们的信仰是很自然的。另外，东汉末年，张陵之孙张鲁在巴蜀和汉中传道，拥有信众数十万，朝廷为了从行政上拉拢并羁縻张鲁，曾拜张鲁为“镇夷中郎将”<sup>②</sup>，这可看做是张鲁所代表和领导的五斗米道同王权有了合作关系，可理解为汉室从统治需要的角度承认五斗米道为合法宗教，王权从统治少数民族的需要出发，借张鲁的实力帮助统治少数民族，“镇夷”这个封号就是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sup>③</sup> 这更加强了五斗米道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道教初创时，道教徒中的少数民族占一定比例，五斗米道亦受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影响，所以，蒙文通先生认为“余疑其（五斗米道）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而非汉族之宗教”。<sup>④</sup> 彝族研究学者刘尧汉也认为道教乃至先秦道家的学说皆出自古代彝族（氐羌族系）的虎图腾观，并利用音韵学考证认为老子之“老”与彝族的“虎”（彝语音腊、拉、勒或老、佬、罗等）“都是一声之转的汉译彝音”，“老聃”当为纳西族所言“喇他”，“李耳”系土家族“母虎”之音。“这虽不能判定老子族属古羌戎，但他以虎及羌戎虎图腾为名号，至少说明其思想深受彝、纳西、

① 李养正：《道教手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第57页。

② 同①，第17页。

③ 游建西：《道家道教史略论稿》，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8月，第21页。

④ 蒙文通：《道教史琐谈》，《中国哲学》第4期，1980年10月。

土家先民古羌戎的影响”<sup>①</sup> 并认为道教所崇奉的西王母当是原始时代甘肃、青海古羌戎的虎氏部落首领之一。西王母又称“西膜”，如《穆天子传》卷四载：“（穆王）至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稌米千车”，而“西膜”则是彝族所谓“圣母”（音“西摩”），今云南省楚雄、禄丰等地彝族家中或庙中仍供奉“西灵圣母”神像。刘先生还认为道教崇拜的天、地、水“三官”当“渊源于云南、凉山彝族过年所祭‘恩替古子’（天神）和‘古尔、木色’（山神、水神）”，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教与古代少数民族的联系。<sup>②</sup>

道教的创立和传播也是文化影响的过程，上一节提到，晋时南中大姓和“夷帅”联合蜀中成汉政权反晋，因为，成汉政权的氐叟、青叟与南中的昆明、叟人族源上有亲密的关系，史载李雄曾“诱建宁夷”讨伐晋王朝的南夷校尉李毅，并于公元333年攻占宁州（当时辖建宁、云南、永昌、兴古、牂牁、越嶲、朱提等郡），在南中确立了统治权。成汉政权是賡人五斗米道信徒所建立的，其“原本是汉末信奉张氏五斗米道的少数民族之一”，李雄还曾因青城山道士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君而臣之”，但范长生坚决不应。李雄称帝，便拜他为丞相，并封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所以，当成汉统治南中十余年间，道教也会随之大量地进入云南。

在《爨龙颜碑》中说：“其先世本高阳颡项之玄胄，才序祝融之眇胤也。”“子文谥德于春秋，斑朗绍

①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②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48页。

纵于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sup>①</sup> 爨龙颜是乌蛮之渠帅，“南中大姓”之一，是当时滇东和滇西地区的世袭统治者，建宁郡同乐县（今云南陆良）人，曾任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等职，《爨龙颜碑》记载了他的事。由于碑文言辞古雅，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被康有为称为“神品第一”。此碑与《爨宝子碑》一样反映了东晋南朝时期宁州大姓醉心于汉文化，并奉内地习尚为圭臬的情形，如《爨龙颜碑》称爨龙颜“缙绅踵门，扬名四外，束帛戔戔，礼聘交会”，还说爨氏“绸缪七经”。从其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爨氏大姓所具有的封建观念和意识。<sup>②</sup> 碑中的“阳九”是道教描述宇宙运行的一个时间概念，“阳九运否”于此是借以比喻爨氏祖先丧失性命；“蝉蜕”是道教描述得道成仙的用语，“逍遥”也是道教对得道成仙之人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状态的形容，这些道教观念，已在爨文化中打下深刻烙印。白族、彝族先民盛行的虎崇拜、星崇拜，与早期道教的青龙白虎、五斗星君、二十八宿星辰崇拜相同。撒梅和白彝支系的彝族毕摩认为他们的祖师曾是太上老君的牧童。可知当时道教的信仰观念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已产生一定影响。

诸葛亮南征时，亦发现当地民众的宗教习俗，“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赐诸夷图谱，于图谱上“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还给夷“瑞锦、铁券”，教其“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

①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36页。依碑文拓本校。

②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220页。

动亦如之”。<sup>①</sup>。诸葛亮用直观形象的图谱一类的物品，教给诸夷应敬畏官府宛若天地、日月、君长，官吏巡行至时，夷须牵牛负酒、赍金宝前往拜见，实际上是告诉诸夷对官府要承担封建义务并服从其统治。诸葛亮此举不仅是对南中地区的安抚、统治，而且，图谱也是当时云南宗教状况的真实记录。

还有诸葛亮用云南“素怀道念”之士孟优医治军卒的记载。孟优常往来于澜沧、泸水间，得遇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也反映了道教创教的活动之一是“巫医并用”的。张陵、张鲁创教、传教时正值天灾和人为战争不断，瘟疫肆虐，曹植《说疫气》曰：“建安二十二年，厉病洊，农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家而殪，或复族而丧。”张陵、张鲁传教治病并行，这与世界上多数高级宗教的创教活动相类似，就是治病救人，解救疾苦。陈寅恪在他的《天师道与深渊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谈到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与天师道有关”。<sup>②</sup>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道教虽是汉族所言的宗教，但也并不完全是汉族文化所孕育的，它与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道教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体。

①（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第247页。

② 游建西：《道家道教史略论稿》，第17页。

## 2

##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道教

30

南诏和大理国统治云南的时间是公元 754 年至 1253 年，在这 500 年间中原地区正是中国封建统治极为兴盛的唐宋时代，而唐宋时期的道教深得王朝统治者的扶植，在全国影响甚大。南诏和大理国是云南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宗教文化得以发展，佛教在南诏时传入洱海地区并迅速发展，熊德基先生在《南诏宗教考》一文中最先提出南诏信奉道教。他说：“其敬奉三官，显受太平道之影响。”而南诏时期信奉天师道的观点，则首先见于向达先生所撰《南诏史略论》一文。<sup>①</sup> 道教继魏晋南北朝之后，于南诏、大理国时期又入云南，进一步加深了对云南文化的影响，而且云南道教在这一时期颇显活跃。

① 转引自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 5 月，第 298 页。

## 第一节 道教在云南的多渠道传入

唐代是中原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朝廷尊崇道教，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诏令天下兴建老君庙。内地出现了成玄英、孙思邈、杜光庭、吕洞宾等一批著名道士。南诏统治时期，道教的影响便通过唐朝和南诏的密切交往，在云南不断扩大。唐代，道教在云南已具一定规模，成为当时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巍山盛传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的故事，清康熙《大理府志》曾载杜光庭来滇，“以文章教蒙氏，尝书《蒙诏德化碑》”<sup>①</sup>。《邓川州志·风俗》也载：“道士驱雷逐疫，皆有天功。”“六月朔日至六日礼南斗……九月朔至九日拜北斗，皆自唐来。”<sup>②</sup> 公元766年立于苍山脚下的《南诏德化碑》说：“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我王气受中和，德含复育，才出人右，辩称世雄。”“座南面以称孤，统东遍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辟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衍，赏罚明而奸邪屏迹。”“春云布而万物普润，霜风下而四海飒秋。”<sup>③</sup> 这些文句显然从《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冲气以为和”之中深化而来，可见道教已深入影响云南文化的痕迹。

①（清）傅天祥等修，黄元治等纂：康熙《大理府志》，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刻本，1940年铅字重印。

②（清）钮方图修，杨柄铎、侯允钦纂：咸丰《邓川州志》，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刻本。

③《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第377、381页。



南诏、大理国时期，洱海、滇池等地区的社会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云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以白蛮发展的速度最快。另一方面，以白蛮和乌蛮（主要指居住坝区的部分）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和大理政权，实现了云南统一，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战争冲突与外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为吸收其他文化的成分以及文化的交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白蛮、乌蛮文化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南诏、大理国的主流文化。但这一文化不是简单的某一两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以白蛮、乌蛮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汉族、吐蕃乃至印度和中南半岛等地文化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就所达到的水平和影响之广泛而言，南诏、大理国的主流文化远远超过了这一地区前代出现的文化。<sup>①</sup>

南诏、大理国政权与唐、宋王朝的密切联系，为这一时期的道教从中原流入云南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大致说来，此时道教流入云南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sup>②</sup>

一是南诏、大理国政权派遣至内地的官员或学子带回道教。

在南诏、大理国的文化中，可以明显看出内地封建文化的影响。内地文化的影响不但表现在官制、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许多方面，对白蛮等本地民族的思想意识乃至社会习尚等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南诏政权曾多次派遣大臣子弟入蜀从事“外交”或求学，使南诏的一些统治者和贵族子弟，获得直接学习唐朝封建文化的机会。在细奴逻至阁罗凤统治前期的数十年间，有大批南诏贵族子弟至内地学习封建

①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448页。

② 见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95页。

文化。时人云：“天子缘其勤，合六诏为一，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异牟寻在给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信中回忆这一段历史亦说：“曾祖有宠先帝，后用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sup>①</sup>由于受内地文化的影响，南诏、大理国上层对汉文化的倾慕，以及与内地文化的认同感表现得十分清楚。异牟寻嗣继以后，“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南诏王室一直沿用父子连名制，父王之名作为其子之姓。异牟寻以后的南诏王劝丰祐，则“慕中国，不肯连父名”。

《新唐书·南蛮传》载：异牟寻归唐后，曾向剑南节度使韦皋请求遣南诏大臣子弟入蜀纳质，以表忠心，“皋辞，（异牟寻）固请，（韦皋）乃尽舍（南诏子弟）成都，咸遣就学”。韦皋在成都修建馆舍，“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尉悦羁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始以千数”。范摅《云溪友议》卷三又载：“韦皋镇蜀近二纪，云南诸蛮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礼乐。”《孙樵集》卷三《书田将军边事》亦载：

自南康公（韦皋）凿清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今成都），使习书算，就业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sup>②</sup>

众所周知，蜀地乃道教发源地之一，在唐王朝极力推崇道教的时代，蜀的道教活动亦非常兴盛。众多的云南学子不断入蜀求学长达50年，接受了蜀文化的

① 《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传》。

②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00页。

熏陶，也有了接触、学习道教文化的机会。其典型者如张志诚。《南诏野史》载：“张志诚，唐太和人，入蜀学羲之书，归教滇人。”<sup>①</sup>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又载：“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诚）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sup>②</sup> 王羲之不仅是晋代著名的大书法家，而且是世奉五斗米道的天师道徒，《晋书·王羲之传》曾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王羲之子）弥笃。”从《云南志略》将王羲之与孔、孟并提来看，王羲之得云南人民的尊奉，已不仅是因为他的书法写得好，而是因为他有着某种与孔、孟学说不同的道教信仰和思想观念。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南诏王盛逻皮曾“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sup>③</sup>，正式承认了王羲之在云南民间的地位，溯其源，当与张志诚等入蜀求学的学子有关。虽然由“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推断南诏王盛逻皮是在崇奉道教，未免欠史料佐证，但由此说明云南人在崇拜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的同时，王羲之信奉的道教文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崇拜、祭祀他的云南人，这也是可能的。

大理国时期，大理国统治者对内地封建文化十分钦慕，大理国王曾不时遣使到宋廷进贡，如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宋哲宗时，大理国王段正淳遣使高泰运奉表诣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贡马三

①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3~374页。

②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第128页。

③ 同①，第49页。

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sup>①</sup>。在两宋时期，大理政权多次遣使至宋求赐典籍。南宋宁宗时，大理政权又遣使至宋求赐大藏经，计得1465本，归大理后置于五华楼。<sup>②</sup>

宋时中原道风日炽，朝廷对道教推崇备至，入宋的大理国官吏对此必会有所闻见；为了讨好宋朝君主，这些入朝官吏理应表示对道教的尊崇，也有可能携之回滇。道光《昆明县志》载：昆明的关帝庙之建“当在段正严遣使朝贡后，则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也。吾滇关庙，此为最古”<sup>③</sup>。三国著名武将关羽因为是集忠、孝、礼、义于一身的典型代表，自宋代起即受历朝帝王青睐，宋哲宗封为“显灵王”，宋徽宗封“义勇武安王”，被称为“关圣帝君”、“关帝”、“荡魔真君”等，与华光大帝、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护法四元帅”，是道教奉祀的重要护法天神之一。由此可知大理国人宋朝进贡的官吏确实曾携带道教回云南，并在昆明建立了关帝庙。

二是由内地入滇的云游道士传入。

奉道之士多喜游历山水、寻师访友以求参悟道法，其行踪飘忽如天上之云，故名“云游”。唐朝李益《李尚书诗集·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言：“风驾升天行，云游恣霞宿。”描述了云游之士的飘忽不定。唐宋时期，道教在中原地区兴盛一时，游方道士也随之增多。云南山灵水秀、民风淳朴，自然就成了道士们常往驻足的地方。其中著名者如“广成先生”杜光庭，他是唐末五代颇负盛名的道士，字宾圣，道号东

① 《宋史·大理国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清）倪格集：《南诏野史》，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第786页。

③ （清）戴纲孙：道光《昆明县志·祠祀志第八上》，见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历史资料》第13卷，第87页。

瀛子，处州缙云（今属浙江省）人，少习儒学，博通经、子，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入蜀，见唐祚衰微而留蜀不返。王建建立前蜀政权时，杜氏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封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撰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塘城集仙录》等二十余种著作。康熙《大理府志》亦载：唐代有青城山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寓滇，“以文章教蒙氏”，死后葬于大理玉局峰麓并得当地百姓立庙祠之。《南诏通记》则曰：“太城蒙国大诏碑乃光庭书，书有法度。”今人王家祐先生考证，此“广成先生”实为唐道士刘玄靖而非杜光庭，“因刘玄靖号‘广成先生’与杜光庭道号全同而误”。<sup>①</sup> 云南史志有关记载甚多，但这些记载中的杜光庭是否来过云南，或说云南杜光庭与唐末五代蜀中道教领袖杜光庭是否是同一个人，目前学界有争议，<sup>②</sup> 这里仅作录存备考。

另外，根据明代张志淳为巍山东山数里外的玄珠观而作的碑文《玄珠观记》载：唐中叶时，“蒙氏强盛，蜀人有以黄白之术售于蒙诏者，蒙人俾即其地设蒙化观，以为修炼之所”<sup>③</sup>。玄珠观是蒙舍宗祠，是南诏最早建盖的祖先崇拜和道教并存的一座殿宇，为南诏王的宗祠，内祀细奴逻的母亲茉莉羌，以后改为道观。<sup>④</sup> 由此可知唐时入滇活动的道士不止有“广成先

① 王家祐著：《道教论稿》，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35页。

② 侯冲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第305~308页辑录了史志中有关杜光庭的十余史料，得出结论是“没有任何一条记载称他在云南传过道教”；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一文，对云南杜光庭与四川杜光庭进行史料比较分析，认为“杜光庭并未流寓南诏”而是在云南形成“杜光庭信仰”；王家祐著《道教论稿》，第35页持“广成先生实为唐道士刘玄靖而非杜光庭”的观点。

③ （清）蒋旭纂修：康熙《蒙化府志》，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本，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重刻，卷六。

④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860页。

生”一人，在今巍山东山数里外另有蜀人行黄白术，当地人还“俾即其地设蒙化观，以为修炼之所”。这些外地云游道士进入云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道教的发展。

三是南诏、大理国政权从内地掳回的大批文人、工匠等携入了道教信仰。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政权对中原朝廷时和时反，双方曾发生过较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唐懿宗以后，南诏与唐朝的冲突几乎不间年岁，南诏曾多次攻打嵩州、邛州、成都等地，掳掠子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归，致使“自成都以南，越嵩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皆空”<sup>①</sup>。这些通过掠夺战争获取的唐地人口，是落籍云南的内地人口的一个重要来源。云南地方政权与中原朝廷发生冲突时从蜀中掳回的大批文人、工匠中，有不少人深通道教义理，如《册府元龟》卷四百二十九载：“李德裕为成都尹，使节度事西川，承蛮寇剽掠之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遣人入南诏求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余人复归成都。”这些知晓道教义理的文人、工匠对扩大道教在云南的影响也曾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其最典型者如郑回，《南诏野史》载：“唐西泸令郑回被掠，王命子弟师事之。”<sup>②</sup>《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记载更详：

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嵩州西泸县令，嵩州陷，为（南诏）所掳。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

① 《孙樵集》卷三《书田将军边事》，《四部丛刊》本，转引自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03页。

②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第85页。

回得箠，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蚩谓相为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余清平官五人，事回卑谨，或有过，回辄箠之。

郑回是儒学之士，但也深通道教的义理学说，他为南诏王阁罗凤所撰《南诏德化碑》有言：“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又言：“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潜，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sup>①</sup>由此可见，其中颇具道教观念，这表明郑回对道教学说有着深厚的修养。郑回权重一时，他在教授南诏王室子弟时，势必会把儒、道思想一同传授，南诏王室子弟对道教的了解得到加深后，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

在两宋与大理国关系淡漠的二百余年间，云南仍奉行内地的习尚，正如郭松年《大理行纪》所说：元初大理等地“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sup>②</sup>唐宋时云南由于汉族人口大量进入，传播内地封建文化，云南本地民族的素质明显提高，力量也大为增强，这是南诏大理政权崛起西南能兴盛数百年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大量补充了来自汉

① 《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第377、378页。

② 郭松年撰：《大理行纪》，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第136页。



族的新鲜血液，云南本地民族对内地文化的认同感明显加强，这也为道教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

总之，自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后，道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又源源不断地传入了云南地区。这种传入，进一步加强了道教在云南地区的势力，促进了道教对云南文化的影响。

## 第二节 南诏、大理国王权与道教

### 一、唐宋王权与道教

道教在唐朝成了皇室家族宗教，进而演为国教。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下诏：“朕之本系，出于柱史，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功；天下大定，实赖无为之德。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以后，应斋供行立于称赞，其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庶厚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告报天下主者施行。”<sup>①</sup>这对道教而言，是一件莫大的事，可看做是东汉末年汉室承认道教以来，道教从一个民间宗教组织，经过王权承认，发展为唐朝国教的成功。这个诏书申明了两点：一是申明皇室李姓出自老子；二是申明道佛儒座次，将道排在佛儒之前。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唐朝施行的扬道抑佛的政策。

如果说唐朝的太宗、高宗时期是道教发展为国教的奠基时期，那么唐玄宗时期就是唐朝崇道的高峰时期。唐玄宗的崇道政策基本上较完整地代表了唐朝的

① 《犹龙传》卷五，转引自游建西《道家道教史略论稿》，第23页。



治国思想和宗教政策，其做法主要有：一是在全国掀起崇拜老子的高潮，在高宗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封号的基础上，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又追封为“圣祖大道玄天皇大帝”；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再尊封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以来一再下诏，令全国各地建造祭祀老子的“玄元庙”。不断将崇拜老子的活动掀至高潮。二是老君庙成为学习研究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的“学府”。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玄元庙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号老子为太上老君，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他们所著之书，自此时始称经。此为道教学术思想向宗教经典的转化，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即老庄道家思想既可以是世俗学术学问，也可以是道教宗教思想。三是唐玄宗自己拜著名高道司马承祯为师，据《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载：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曾遣使迎司马承祯入京，自己亲自接受道教法箓，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道士。并敕京都太清宫主崇玄等四十余人编纂《开元道藏》，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完成，时称《三洞琼纲》。这是道教史上的大事，道教在唐代与佛教在隋代一样，开始有了自己的经典，道教的发展亦因此进入全盛时期。<sup>①</sup>

宋代仿唐崇信道教，特别是北宋历代帝王都崇信，有167年的时间。最典型的是宋太祖、太宗、真宗、徽宗和南宋高宗、理宗时期，至理宗时传播《太上感应篇》又将崇信道教的思潮掀起高潮，此后直至宋室王朝结束均在崇信道教的文化氛围中。而且《宋史·

① 参见游建西《道家道教史略论稿》，第28页。

艺文志》载：宋代“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由此可略为窥见唐宋王权对道教的重视。唐宋王权与道教的关系，不论是合作也罢，借用也罢，道教在唐宋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二、南诏、大理国王权与道教

唐宋中央王朝在中原与道教合作，掀起崇道高潮时，地处西南的南诏、大理国统治者与道教亦有合作。

南诏统治者与唐王朝的关系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曾一度恶化，南诏王阁罗凤不得已投靠吐蕃，起兵反唐，两次击败前来征讨的唐军。天宝战争后，南诏进占嵩州，吐蕃屡攻陇右和黎、雅诸州，对西川形成严重威胁。唐历经安史之乱，走向衰弱。唐德宗采纳李泌建议，实行南通云南，断吐蕃右臂的策略，委任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使其观察形势，争取南诏归唐。同时南诏受制于吐蕃，苛派赋役不堪重负，也有摆脱吐蕃羁绊之意。南诏王阁罗凤深知唐王朝对南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给日后重新“归唐”留下退路，他曾命清平官（宰相）郑回撰成《南诏德化碑》，一方面将南诏不得已叛唐的罪过归于唐吏的过分欺压，一方面表白愿意归顺唐朝的心迹，声明：“我上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拔吾罪也。”<sup>①</sup>为了讨好唐王朝，《南诏德化碑》的碑文中糅入了大量的深受李唐统治者喜爱的道教言辞，如碑文言：

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

① 《新唐书·南蛮传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子君臣。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辟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衍，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恩沾草木。<sup>①</sup>

文中的“清浊”、“阴阳”、“道治”、“合道”、“三才”、“六府”等辞藻均为道教所常用。这一方面表明南诏王室对道教学说了解甚深，另一方面则表明南诏王室很懂唐王朝的崇道心理，企望用道教来作为沟通双方的媒介，以此来取得唐王朝的欢心和信任。

阁罗凤死后，其孙异牟寻承凤迦异继位。异牟寻在郑回的建议下，开始谋求归附唐朝。《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载：郑回劝异牟寻言：“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吐）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异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积极地争取南诏归唐做了许多工作，曾三次致书异牟寻，“且招怀之”。异牟寻也决意归唐，并遣使至唐，献一金缕盒子，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其使曰：“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sup>②</sup>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与唐朝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在大理苍山盟誓，南诏与唐重归于好。樊绰《蛮书》载异牟寻《与中国誓文》：

① 《南诏德化碑》，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第377～378页。

② 樊绰：《蛮书》，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第90页。

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谨请西洱河、玷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唐）朝，山河两利。<sup>①</sup>

并说，这次会盟的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戒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sup>②</sup>”。从中可以看出道教在南诏与唐的盟誓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盟誓时所请天、地、水“三官”本为五斗米道崇奉的三位主宰人间福祸的大神，如前述《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载：张角行太平道，张鲁行五斗米道，都有为病者祈祷的法术，即“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向达先生据此认为：

异牟寻誓文开始就提出“上请天地水三官”，文末“一本藏于神室”就是《典略》的“其一上之天，著山上”，“一本投西洱河”就是《典略》的“其一沉之水”，“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戒子孙”就是《典略》的“其一埋之地”。誓文很明显的用三官手书方式，故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是毫无可疑的。<sup>③</sup>

① 《蛮书》，见《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第89页。

② 同①，第90页。

③ 向达：《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向达先生对“誓文很明显的用三官手书方式”的看法，数十年来，得到研究南诏史学者的一致赞同，甚至不少研究云南道教的学者，也对这一看法持赞同的态度。<sup>①</sup>但其“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的说法及由此而推出的“南诏信佛教，当始于公元第九世纪以后”的结论则未免有失偏颇。据研究云南佛教的学者考证：细奴逻、逻盛炎时代已有不少被称为“梵僧”的游方高僧在云南各部落间游化；大理崇圣寺三塔的东塔门木质过梁的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  $603 \pm 80$  年立，则“汉地佛教至少在唐初就已传人云南”<sup>②</sup>。如此，则异牟寻时代的南诏不仅有道教的流行，而且有佛教的传播。那么，南诏与唐朝盟誓为何不求证佛陀，而只上达“三官”呢？其原因只可能三个：一是为崇信道教的唐王朝所强加，二是南诏本身很崇敬“三官”，三是南诏出于某种需要而偏取。<sup>③</sup>

唐王朝是否会将自己所崇奉的道教强加于盟誓的对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唐朝与吐蕃的两次盟誓活动。唐玄宗时，蕃汉结盟，《全唐文》卷九八八载此次盟誓有《盟吐蕃题柱文》言：“蕃汉君臣，并稽告立誓，周细为文。二君之合，终以雍合。登坛之臣，亲署姓名于柱。如斯誓文，藏于王府属。”显然，其中并未“上请天地水三官”，也无盟誓后采用“三官手书”的仪式，仅“亲署姓名于柱”并“藏于王府属”。唐德宗时，唐与吐蕃数度交

① 近年侯冲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和论证：认为异牟寻《与中国誓文》中的相关文字，既没有“很明显的用三官手书方式”，也不表示“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详见其《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第299页。

② 侯冲：《关于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及其路线》，《云南社科情报资料》，1993年第2期。

③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07页。

战后又再次结盟，引《旧唐书·吐蕃传下》载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德宗诏张镒与吐蕃结赞盟于清水，双方于盟坛之北杀牲（“初约汉以牛，蕃以马”）歃盟。唐方盟文曰：

古有结盟，今请用之。……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斋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无得愆坠。其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

吐蕃方面“亦出盟文，不挑于坎，但埋牲而已。”盟毕，“结赞请（张）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礼，各用其物，以将厚意而归”。很明显，这次盟誓也并未请“三官”降临作证，仅“约汉以牛，蕃以马”歃盟。唐是泛泛地“告天地山川之神”，系原始宗教中的自然神，非有着独特功能的道教天、地、水“三官”神，其盟文也只藏于宗庙，吐蕃则是“但埋牲而已”，并请张镒到“佛幄”中焚香为誓。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誓与南诏异牟寻归唐时的盟誓同在唐德宗年间，前后仅相距十一年。唐与吐蕃盟誓未请“三官”，且尊重吐蕃习俗“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表明唐德宗时中原人在对外盟誓活动中并未将自己所崇奉的道教强加于人。南诏与唐盟誓时在唐德宗年间，也应不会受唐强制而“上请天地水三官”。

南诏与唐盟誓“上请天地水三官”既非唐王朝所强加，那么是不是南诏本身很崇敬“三官”呢？这也不是。曩有道教与古代西北氐羌民族有关的说法<sup>①</sup>，向达先生认为南诏系出氐羌，故“南诏之所以信奉天

<sup>①</sup> 闻一多：《神仙考》，见《闻一多全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转引自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09页。

史  
师道，因为这原来是氏族和羌族的本来信仰”。<sup>①</sup> 因为道教的形成曾与中国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关系，南诏时道教在云南的影响也很大，南诏崇敬“三官”的条件是存在的。但是，在诸多的史料中，有关南诏崇敬“三官”的记载仅此一条，不足以说明南诏本身很崇敬“三官”；况南诏初期佛教已传入云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南诏曾宣布废除道教，也就是在这一年，“（劝）丰祐母出家为尼，改名惠海。是年，用银五千铸佛”。仍是同年“（劝）丰祐遣使入朝”。<sup>②</sup> 表明南诏王族对佛教信仰的推崇，而对道教的崇信是有限度的。但南诏在与唐盟誓时不求证佛陀，只上达“三官”的做法并不是纯粹出于其本身的信仰，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其目的是企图以道教来取悦于崇道的唐王朝，最终获得唐王朝的信任而归附之。这种做法，其实早在阁罗凤时就已有之。阁罗凤为了迎合唐王朝，曾在《南诏德化碑》中加入了很多的道教言辞。异牟寻也是这样，为了取得唐王朝的欢心和信任，在盟誓活动中有意地抬高了道教“三官”的地位。由此可以说，道教成了南诏王室用以沟通、加强与中原朝廷政治关系的重要媒介。这一方面表明南诏王室很懂唐王朝的崇道心理，另一方面表明他们深谙道教学说。

南诏王室深谙道教学说，与道教在云南有着较悠久的历史有关，也与南诏时道教继续大量流入云南有关；与南诏的政治需要有关，也与道教本身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关。道教对南诏王室的吸引力，可从以下几件事中得到证明：

一是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南诏王

① 向达：《南诏史略论》，转引自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09页。

② （清）倪蜕：《滇西历年传》，第133、134页。

世隆曾“于白崖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铸天尊柱”<sup>①</sup>。“天尊”乃道教对最高天神的尊称，铸“天尊柱”的行为显示了南诏统治者对道教的崇信。二是南诏王劝丰祐天启年间，南诏统治者在颁定苍山十八溪涧、十九峰峦之名时，曾以“第九（名）应乐峰、隐仙溪”<sup>②</sup>；“隐仙”乃道教所宣扬的一种超凡出世的人，以之为苍山溪名，也显示出南诏统治者对道教的兴趣。三是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南诏王隆舜命杨奇肱迎唐公主还，“唐公主以八字奉上，命术者推算，曰：‘此大龙之命也。’上乃设七昼夜大斋”<sup>③</sup>。推“八字”和设“斋（醮）”均属道教方士擅行的方术，南诏王对其迷信同样表现了他对道教的崇信。四是郑回之七世孙郑买嗣篡夺南诏蒙氏王权，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国”，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四年（公元926年），郑买嗣“服丹药躁怒杀人，八月薨”<sup>④</sup>。“丹药”乃是道教徒为追求成仙而常服食的，多具有毒性，唐朝的宪宗、武帝等几个皇帝多因服丹中毒而暴亡，郑买嗣服“丹药”而致狂暴杀人，表明南诏统治者受道教长生成仙学说影响的程度不浅。南诏统治者对道教的这种兴趣，是他们能深谙道教学说，进而以此博取唐王朝欢心和信任的条件之一。

大理国统治者与道教的关系也很密切。据康熙《大理府志》言，大理国政权的建立即与一位名叫董迦罗的道教方士有关，该书卷十六《仙释》载：

（董迦罗）有禳赤雪、致风雨之术。晋

①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第149页。

② 尤中：《梵古通纪浅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页。

③ 同②。

④ （清）倪格集：《南诏野史·郑买嗣篡蒙始末》，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第782页。



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兴师讨杨干贞，思平驻军关上，夜感三梦，以为不祥，疑惧不敢进。迦罗解之，皆吉。思平乃决入关，逐杨氏而有其位，改号大理。

道光《赵州志》卷三《仙释》更详细地记载了董迦罗为段思平解梦的内容：

天福二年，段思平讨杨干贞，驻军龙尾关外，夜梦人斩其首、玉瓶去耳、镜破。召迦罗解之，曰：“公为丈夫，丈夫去头为天；玉去耳为王；镜中有影，如人有敌，镜破无影则无敌矣。”思平乃决，果灭杨氏而代之。

段思平因董迦罗的鼓励“逐杨氏而有其位”，所以，段氏建立大理政权后，曾“以董伽（迦）罗为国师”<sup>①</sup>，表达对道教的尊崇。大理国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还表现在以下几件事中：一是对佛、道教徒实行开科取士，予道教以崇高的社会地位，如倪蜕《滇云历年传》载，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大理国王）段素英敕：述《传灯录》，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二是崇奉“三元节”，如《滇云历年传》载，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中元节，大理各方贡（段）正严金银、罗绮、犀象、珍宝以亿万计，贡马遍苍山”。“中元节”乃道教节日，大理各方于此日来供奉段正严，表明段氏很看重这个日子。三是改年号为道教名词，如《南诏野史·后理国》载：“段智兴，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立，改元利贞，又改元亨时、元嘉、元亨、安安等号。”“元亨”、“利贞”本为《易经》名词，后则多为道教运用，从段氏改元为元亨、利贞等，不

① 尤中：《樊古通纪浅述校注》，第96页。

难看出其对道教的尊崇。又据《南诏野史·大理总管》言，大理国总管段光率军击退蒙古梁王入侵大理之后，其侍臣杨天甫曾作《长寿仙曲》来颂扬这次胜利，使段光“大喜”；杨天甫以仙味十足的《长寿仙曲》来迎合段光，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理国政权统治者所受道教影响的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在南诏、大理国政权中的地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的地位与佛教相比要低，如南诏国曾于唐文宗年间（公元826—840年）宣布废除道教。即使是曾因道士董迦罗相助而取得统治权的大理国诸王，虽“以董伽（迦）罗为国师”<sup>①</sup>，但也并未将道教抬至“国教”的地位；相反，却“年年建寺”，并多有“禅位为僧”<sup>②</sup>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对道教的兴趣并不如唐宋统治者那么狂热和真切，故可以说其对道教的抬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中原朝廷的崇道心理，企望以此来求得中原统治者的荫护。<sup>③</sup>

### 第三节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 云南民众道教

唐宋时期，在中原地区道教活动非常兴盛的背景下，因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对道教较为尊崇，道教在云南民间的活动也显得颇为活跃。其表现是此时有一些比较著名的道士频频活动于大理、楚雄、昆明等地

① 尤中：《楚古通纪浅述校注》，第96页。

② 同①。

③ 见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08~112页。

区，或说这些道士的传说在云南广为流传，云南一些地区的民俗也逐渐染上了较为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

此时在云南民间活动的道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内地云游至滇的游方道士，一类则是云南本地的好道求仙者。

### 一、南诏杜光庭传说和信仰

内地云游至滇的道士，在明清史志中记载最多的是杜光庭，《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大理府·祠庙》载：“杜光庭祠，在玉局寺。光庭，唐御史也。”<sup>①</sup>《明一统志·云南布政使司·大理府·寺观》说：“玉局寺，在点苍山六峰之半。相传蒙氏建，中有唐御史杜光庭祠。”<sup>②</sup>明代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说：“玉局寺，在府治西南四里，玉局峰麓。寺左有唐杜公祠。公名光庭，青城人，以文章教邦人，故祠之。”<sup>③</sup>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四《流寓》载：“杜光庭，青城人，寓滇，以文章教蒙氏。”<sup>④</sup>该志卷二十三《古迹》又记大理太和县有“唐杜光庭墓”，并言：“（杜光庭），唐人，以文章教蒙氏之民，蒙学土爨泰葬之于玉局峰下，依浮屠立庙。”在云南地方志中有关杜光庭的类似记载还很多。

南诏时期，点苍山玉局寺是受蜀中道教影响而兴建的宫观。玉局寺的得名与成都的玉局化有关。唐代

①（明）彭时等纂修：《寰宇通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第141页。

② 李贤等：《明一统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第182页。

③（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刻本，1934年龙氏灵源别墅重印。

④（清）傅天祥等修，黄元治等纂：康熙《大理府志》，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刻本，1940年铅字重印。

成都的玉局化是道教著名宫观，为东汉张陵早期传道的二十四治之一。唐代因避唐高宗李治讳，二十四治改称二十四化，玉局治亦改称玉局化。<sup>①</sup>玉局寺是具有道教色彩的寺院，所以，古代文人游览玉局寺后，有感而发的诗句也多是寻访仙人的。如元代李伯强《九日登大理玉局寺》诗曰：

海风吹晓上层台，玉局仙人安在哉？

一带山河无限好，百年怀抱此时开。

菊从雨后都开遍，雁到秋深不肯来。

一曲浩歌归兴晚，夕阳人影共徘徊。<sup>②</sup>

明朝童轩《点苍山》诗，亦有“黄鹤仙人手可招，目断蓬莱五云境”<sup>③</sup>之句。天启《滇志·艺文志》还收录明代滇滇状元杨慎《玉局寺》诗曰：

仙是青城客，山留玉局名。

浑如故乡地，偏动故乡情。<sup>④</sup>

此诗凝练地表达出青城、玉局与杜光庭的关系。

杜光庭作为白族本主崇拜的神祇，其本主神帖封号为“玉局持邦灵昭文帝”。<sup>⑤</sup>点苍山的玉局寺旁有灵昭祠是南诏供奉杜光庭的神坛。灵昭祠又称昭文祠、御史祠。正德《云南志》卷三载：“灵昭祠，玉局寺后，蒙氏建。唐御史杜光庭歿于此，蒙学士爨泰立庙祀之。”<sup>⑥</sup>元代郭松年、明代杨慎游点苍山，曾慕名参

① 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0期，第180页。

② （明）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三《文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第304页。

③ 同②，第309页。

④ （明）刘文徵撰：天启《滇志》卷二十九《艺文志》。

⑤ 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第184页。

⑥ （明）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卷三《大理府·祠庙》，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第141页。

访昭文祠。郭松年《大理行记》说：“中峰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sup>①</sup> 杨慎《游点苍山记》说：“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内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sup>②</sup>

##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道士

在明清史志资料中，对杜光庭的记载最为详尽的是高翥映《鸡足山志》卷六《名贤》：

杜光庭，青城人，以学士谪蜀，非唐御史也。光庭得因安南经略使王式愿请赎使滇，许之。迨光庭至滇，因事未果，光庭遂决志南中，曰：“得以文学变化蛮俗，俾知王教，吾愿足矣！”遂闻于南诏王。广集生徒，爨泰等均其高弟，于蒙诏之建极八年，即唐咸通七年丁亥入青檀山，课善阐、邓赅、施浪、浪穹、勃弄诸生徒于鸡足山之僧寺，盖欲远僭称之西京，不欲向蛮王抗礼开罪，思以全其节耳！卒青檀山，即今鸡足山。所谓西京者，即今太和县。其年八十有六。爨泰等扶其柩归葬玉局峰麓。后人思之，祠于玉局寺，旌曰“昭文”。高氏之墓与其祠相近。……昔光庭曾为《蒙诏德化碑》，今无碑并无其文矣！……按：咸通中与郑云叟赋万言，落第遁入天台，常隐蜀青城山称东瀛子者，亦

①（明）正德《云南志》卷二十八《文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第378页。

② 杨慎《游点苍山记》，见（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二。

杜光庭也。有入滇之迹。徐弘祖《鸡山旧志》入东瀛子于流寓，兹系之。<sup>①</sup>

南诏时期，不仅大理府有祭祀杜光庭的昭文祠，腾越州也有祭祀杜光庭的神祠。如“来凤山，在城南四里。每曙时，岚气锁之。上有祠，祀唐杜光庭”<sup>②</sup>。腾越州也有祭祀杜光庭的神祠，说明杜光庭在云南影响广泛。

作为杜光庭在云南的遗迹和记载很多，此不一一赘述，可详见侯冲、张泽洪论述<sup>③</sup>。张泽洪还把在史籍道经中所见的杜光庭在蜀中活动的史料作梳理研究，通过对唐五代滇蜀两地杜光庭进行辨析，得出了“杜光庭并未流寓南诏”的结论。但南诏杜光庭传说及遗迹的出现，却又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它从一侧面折射反映出南诏道教的发展。其实云南杜光庭传说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移植、嫁接的塑造过程，从而建构起南诏的杜光庭信仰，并赋予蜀中道士杜光庭的特质。唐代蜀中是道教发展兴盛之地。蜀中道教对南诏影响源远流长，云南杜光庭信仰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蜀中道教传入南诏的民间基础。基于这一时代背景的杜光庭信仰，可以说既是道教传播的一个符号，也是南诏道教文化的象征。<sup>④</sup>

另据康熙《蒙化府志》卷六《玄珠观记》载：“相传唐之中叶，蒙氏盛强，蜀人有以黄白之术售于蒙诏者，蒙人俾即其地设蒙化观，以为修炼之所。今

①（清）高爵映：《鸡足山志》，侯冲、段晓林点校，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240页。

②（清）鄂尔泰修：雍正《云南通志》卷三，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刻本。

③ 侯冲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第八章第七节《道教》；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

④ 见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第184页。

之观井，其遗墟也。”可知云游至滇的高道不止杜光庭一人。云南本地的好道求仙者则有“冲举仙”，此人于南诏时“栖（大理）鹤云峰四十余年，常坐一石，或时与人弈。一日，辞众曰：‘当以明日行矣。’次午，果登仙而去”<sup>①</sup>。

还有释道兼修的董迦罗、王左梨，以及在鸡足山修道成仙的大理人周溢、张建成等。据道光《赵州志》卷三《仙释》载：

王左梨，州人，有功行，能动鬼神。南诏时，高将军建遍知寺，塑佛，三令张子辰书释迦咒，董迦罗书迦叶咒，王左梨书阿难咒。左梨却书天神咒，众嗤其误。梨云：“既云错，我自领去。”遂手挽阿难像行三步。众大惊，恳留之，乃止。

董迦罗，州人，素有戒行，能前知，有攘赤雪、掩日月、致风雨之术。<sup>②</sup>

高翥映《鸡足山志》卷七还载有两位唐代活动于鸡足山的“神仙”，即周溢和张建成的事迹<sup>③</sup>。周溢号寿海，曾遇异人告知青檀山（即鸡足山）有仙草，食之寿可五百岁，遂“往鸡足觅草”，“采药鸡山，不知所终”。张建成成为大理喜洲人，初奉佛教，后“思百年有尽，如何得寿命延长，俾得久修佛法”，遂入鸡山觅仙草，得而服之，“醉死其家”，其家人具棺殓之，却见他三日后“启棺自出，携手中珠至其门，挂之遂去”。采药求仙是道教方士的行为，此二人孜孜于仙草，属道教中人无疑。张建成死后又“启棺自

①（清）傅天祥等修，黄元治等纂：康熙《大理府志·仙释》。

②（清）陈钊镗修，李其馨等纂：道光《赵州志》，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刻本，1914年补刊，1937年石印。

③（清）高翥映撰：《鸡足山志》，侯冲、段晓林点校，第291页。

出”，更与道教“尸解”成仙之说相类。从南诏时云南道教的活动范围及影响颇广来看，高志所采说法当属实。

另外，光绪《镇南州志》及《焚古通纪浅述》等记载，南诏时楚雄有王载元、张明亨两位求仙者得道之事：

王载元，南诏时人也，与张明亨栖止州东五楼山，志在求仙，日载酒峰头，长啸狂吟，莫之识也。一夕，饮酣，见一道人乘风而来，飘飘然丰采迥异。载元与明亨迎之间曰：“先生或者能剧饮乎？”道人莞尔而笑。问姓名，（道人）答曰：“无心昌。”道人遂促膝倾觞，酣漓醉卧。道人忽言别，二子恋恋不舍。道人曰：“来年秋风起塞上，吾当再至。”及期……道人至矣，执一瓢，盛米汁于中，命二子饮之。载元饮，明亨不饮。道人覆之，遂布席而坐。三人语甚欢……道人曰：“时当行矣。”腾空而起，载元亦随起，明亨踊跃无措，伏地大呼。道人回顾曰：“子仙骨已成，迟一劫耳！”明亨遂化乡人……（后人以“无心昌”为“吕”字而言道人乃吕洞宾所化）。<sup>①</sup>

上述关于冲举仙、王左梨、董迦罗及王载元、张明亨等人的传说中，显然附有浓厚的想象色彩，剥去这种想象出来的神秘色彩，我们便不难窥知当时这些地方曾有过道士的活动。

大理国时期云南民间的道士活动情况，除明代徐

<sup>①</sup>（清）李毓兰修，甘孟贤等纂修：光绪《镇南州志略·仙释》，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刻本。



霞客《鸡山旧志》和清代高翥映撰《鸡足山志》有关宋代得仙者杨青榜讲经时“天必雨花”<sup>①</sup>的记载外，很少见于记载，但从大理国开科取士“以僧、道读书者应举”这一举措中可知，大理国的民间也有不少道士在活动。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民间的道士活动颇为活跃，势必会加深道教对此时云南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云南民间逐渐兴起了一股不小的崇道热潮，这些崇道活动逐渐演变成了后世人们的风俗习惯，如咸丰《邓川州志·风俗》载：“密僧叱龙救旱，道士驻雷逐疫，皆有天功。若二月八日迎佛，四月八日浴佛，九月朔至九日拜斗，皆自唐以来。”明清时期在今天云南的楚雄、普洱、临沧、红河等地区的地方志中多载当地百姓有“六月朔日至六日拜礼南斗”及“九月朔日至九日拜北斗”<sup>②</sup>的风俗，当亦多始于唐代。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所载“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之风也始于唐代张志诚人蜀求学归滇之时。为了适应此风，南诏王阁罗凤还曾“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sup>③</sup>。此外，明清时期云南各地尊崇关圣帝君之风也可溯到大理国时期，据戴纲孙撰道光《昆明县志·祠祀上》言：昆明的关帝庙之建“当在段正严遣使朝贡后，则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也。吾滇关庙，此为最古”。“关圣帝君”本为三国时期的武将关羽，宋代时始流传其降魔伏怪的显灵故事；宋徽宗为嘉其护国佑民之功而封其为“忠惠公”、“义勇武安王”等，道教也奉其为降神助威的武圣人。云南人民为了祈求他降魔伏怪、护国佑民而立

①（清）高翥映撰：《鸡足山志》，侯冲、段晓林点校，第291页。

② 雍正《阿迷州志·风俗》。雍正《续修建水州志》、道光《普洱府志》、光绪《续修顺宁府志》、宣统《楚雄县志》等亦有此记载。

③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页。

庙祀之，从中可见道教文化在云南民间的影响之一斑。

#### 第四节 道教经云南向东南亚的传播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道教颇显活跃，曾促使道教经过云南传播到了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之中。

道教之所以能流入东南亚，与南诏、大理国政权的统治疆域曾覆盖今东南亚部分国家有关。据《新唐书·南蛮传上》载，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南诏的统治区域为：

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在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在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西南骠（在今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地区一带），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东北连接地带）。<sup>①</sup>

《元史·地理志》则载元世祖征服大理国时，大理国政权的疆域范围为：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上述“普安路”在今贵州省镇宁县一带，“江头城”即今缅甸实阶区东北部的杰沙，“鹿沧江”为南部与交趾（今越南北方）接壤的河流，它穿过大理国

<sup>①</sup> 古今地名对照参见尤中编著《云南地方沿革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所属的七十城门旬而入交趾，“大渡河”则是大理国与宋朝的交界。<sup>①</sup>由上可知南诏、大理国政权的统治疆域曾覆盖了今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地区。

南诏、大理国政权的统治疆域覆盖了今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地区，则其人民必与今东南亚国家的人民有所交往，令云南在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西南门户和桥梁的作用。据樊绰《蛮书》卷十载，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政权曾先后与骠国（今缅甸）、弥臣国（今缅甸西部）、弥诺国（今缅甸西北）、夜半国（今缅甸北部）、大秦（今印度南部）、婆罗门国（今印度）、小婆罗门国（今孟加拉国）、女王国（今泰国北部）、水真腊国（今泰国南部）、陆真腊国（今柬埔寨）、昆仑国（今马来半岛）、阁婆（今爪哇）、勃泥（今加里曼丹）等国都有着密切的往来关系。如南诏的银生城（在今景谷或西双版纳附近）曾成为新兴的对外贸易城镇，与东南亚诸国进行着药材、珍宝、麝香、琉璃、水晶、黄金等贸易，而骠国人也将江猪、白氎（木棉布）、琉璃器皿等携至洱海地区进行贸易，以致南诏境内的货币（贝）多来自东南亚国家。这种经济交流必然带来云南人民与东南亚诸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如骠国乐、弥臣国乐曾传入过南诏，成为南诏宫廷音乐之一<sup>②</sup>，而中国的道教、佛教等也借云南与东南亚诸国人民的交流而传入了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之中。

有关唐宋时期道教传入今东南亚国家的记载不是很多，目前仅发现两条。

一是《旧唐书·真腊国》载：“真腊国（今柬埔寨），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属国……国尚佛、道及

<sup>①</sup> 参见尤中编著《云南地方沿革史》。

<sup>②</sup> 参见马曜主编《云南简史》。

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二是《蛮书》载：“骠国（今缅甸），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sup>①</sup>真腊国中，“道”的地位虽不如“佛”及“天神”高，但毕竟已有道教的活动。骠国中“多推步天文”之人，当也已有道教的活动。道教自魏晋以来有所谓“占验”一派，其术士善行推算、占验之事。从真腊国与骠国有道教活动，可知此时其他一些与云南政权有来往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也应受到过道教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境内出现与道教文化有关的活动，与唐宋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有一定关系，但更与南诏、大理国境内的道教活动有着较直接的关系。这种传播的推动者除了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外，更多的则是此时活动于云南民间的道士或崇道百姓。云南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内有道教的活动，也映衬出了这一时期道教在云南的活动是比较兴盛的。<sup>②</sup>

① 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13页。

② 见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16~118页。

## 3

元代、明初的  
云南道教

60

云南是蒙元开发经营较早的地区，早在元统一全国前的1254年，大理国国王段兴智就归降了蒙军。云南是攻宋的重要基地，又是经略东南亚地区的前沿，因此为蒙元所重视。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衣钵而称国号为“元”，1274年，元王朝派遣赛典赤为云南平章政事，在云南建立了行省。蒙元时期道教在中原地区的活动显得非常兴盛，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新兴道派盛极一时，云南地区的道教活动增多，也出现了宫观建造的记载，明初有全真道派入滇。元明时期，大批的汉族移居云南，同时也将他们所奉的道教神祇携到了云南各地，从而扩大了道教在云南的传播范围及影响，道教的派别大多形成于元明，并在元明时先后传入云南。

## 第一节 元代的云南道教

元代是云南道教史上的重要时期。元代在云南行中书省的设立，使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转移到了滇池地区。虽然有学者认为元代云南道教是“相对沉寂”，但是，云南道教自元代起便有可信的文献记载，有了元代宫观的记载史料和碑刻资料。因为元代是目前已知云南历史上最早有志乘文献之始，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便是元明以来云南地方志之最早，而且是中央王朝“声教”泽被之时。明洪武初年沐英在昆明建五灵庙（后改为昭灵观，旧址在今景星街）时，有碑刻载：“云南地极边，民杂诸夷，其事神也虔。自元以前，声教未被，典籍无闻，庙既建于声教未被之先，”<sup>①</sup> 民国学者也认为“滇之有道教，约在元室统一以后。明清之际，固尝盛极一时，各地道观，如琳宫贝阙，彼此相望，金碧辉映。”<sup>②</sup> 这说明元朝之前中央皇权的声威与教化尚未遍及云南，但在“声教未被之先”，边远的云南已有庙宇建立，只是无文献记录罢了，而元代有关具体的道教宫观设置的记载增多，说明元代云南道教已有一定的规模及影响。

### 一、元代云南道教信仰和宫观兴建

元代是云南由地方政权走向与中原接轨的全国大

①（明）柯暹：《重修五灵庙记》，见（明）郑顺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8月，第519页。

② 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抄本。

统一的重要阶段。元朝统治者重视对云南的开发，不仅在云南设置行省，在一些要害地区，还遣宗王率兵镇守，有十余位蒙古宗王出镇过云南，并有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及汉人以军人、官吏或商人的身份来到西南，其中不少人落籍不归。外地移民的大量进入，使云南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云南与内地的关系更趋密切。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前后，为笼络人心，缓和民族矛盾，文化上即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在京师设国子学，地方设立路学、府学、州学和县学。宗教上，蒙古族人本信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曾受过萨迦派高僧八思巴灌顶，但为了达到其政治利用的目的，对各宗教大都大力提倡，忽必烈在正式建立元朝之前，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就开始奉祀玄武神<sup>①</sup>。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注重对云南的经济、文化的开发，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在中庆（治今昆明）、大理两路设儒学提举，以后又在中庆路建孔子庙：“购经史，授学田”，“虽爨、僰人亦遣子入学”。十九年（公元1282年），朝廷命云南诸路皆建学校。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官吏郝天挺于大理路、张立道于建水路创立庙学。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朝廷重申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赛典赤之子忽辛任云南行省右丞，“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见于记载设立学校的地区，还有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和威楚等路。<sup>②</sup>实行与中原王朝相统一的文化教育。宗教上也与中原一样各宗教并行，主要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元世祖忽必烈在灭大理、征服吐蕃以后，由于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封其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其教徒分

①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年9月，第112页。

②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752页。

布各省，在云南者称为“梁王师”，地位至尊。蒙古统治者占领云南后，伊斯兰教随之传播入滇，明代又有一些回族人口迁入云南，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元朝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在昆明等地首建清真寺。道教在此时也同样被推广，道教宫观在云南各地都有兴建。

近人夏光南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一书，其中有《元代滇宗教之盛》一节认为：“微以明初道徒史籍，元代滇之道教，固亦极有势力者也。”<sup>①</sup>我们不知夏光南先生所言“明初道徒史籍”为何书，但从明清云南地方志中可知元代在云南各地兴建如下宫观：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体例尚无庙宇留存，真正把寺观、祠祀列入志书卷次，还是从明朝郑颺修纂的景泰《云南图经志》开始。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载：明人王景常撰《龙泉山道院记》中说：“逾昆明二十里，有山曰龙泉，山之下有穴焉，广二寻，深称之，涌泉漫出，鲛鱼数百状其澳。每岁旱，则云气勃勃而上，或以为有蛟龙焉。自蒙、段时，水旱必祷，祷则雨暘时若，其泉断面东南流，溉田数百顷，民赖其利。元初尝构祠縈之，中遭兵难，祠毁。”<sup>②</sup>明洪武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公元1394—1395年）黔宁王沐英在此建龙泉道院。

又载：元代行省参知政事李源道：《创建文昌祠碑记》：“廷祐三年（公元1316年）青龙丙辰三月丁亥……源道奉天子命，持宪云南行省郎中，河南秦君俨适创文昌祠于长春观西偏，像帝君其中。”<sup>③</sup>“长春

① 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12月，第140页。

② （明）郑颺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刻本。

③ 同②，卷一《云南府·祠庙》。



观，元梁王故宫也，建于至大初。明兴，即其地改岷王宫。”<sup>①</sup>由此有学者认为元武宗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道教长春观在昆明建成。

“铁峰庵居陞山之顶，建于元，后圯。”<sup>②</sup>

今安宁东北八里许有月林庵，“元时建，相传白鹤仙人飞升处”。<sup>③</sup>晋宁西黄洞山“山巅旧有神祠，创于元，倾圯于明”<sup>④</sup>。新兴州（今玉溪）永丰寺“在州西十里白塔山，祀先农八蜡之神，元时建，俗名虫蝗寺”<sup>⑤</sup>。澄江有玉皇阁，“在州治东南，唐时建，元至正年修，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知州邓骏重修”<sup>⑥</sup>。在大理府治西南有关王庙，“元时建，洪武间指挥使郑祥易而新之，构东西两庑，设兵卫于左右。取侯之生平功绩，到图于壁，俾观者知侯之威勇始终，于义云国初锦衣金润甫画史以流戍至绘壁，笔法精到”<sup>⑦</sup>。品甸庙，在城东北十五里品甸（属今祥云）湾海峰。阮元声《南诏野史》载：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梁王抵洱海卫，立其子保和奴为品甸王，后王被高祥所弑，土人立祠祀之。<sup>⑧</sup>

楚雄“府城西门外，元至正间建”<sup>⑨</sup>东岳庙。丽

①（清）戴纲孙：道光《昆明县志·祠祀志第八下》，见张维桢主持标点《昆明历史资料》第13卷，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92页。

②同①，第91页。

③（清）杨若椿修，段昕纂：雍正《安宁州志》卷一，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刻本。

④（清）朱庆椿纂修：道光《晋宁州志》卷十二《艺文志》，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8年）刻本，1926年铅字重印。

⑤（清）任中宜等纂修：康熙《新兴州志》卷四，梁耀武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

⑥（清）李熙龄等纂修：道光《澄江府志》卷五《寺观》，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刻本。

⑦（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二，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刻本，1934年龙氏灵源别墅重印。

⑧（清）李世保修，张圣功等纂：乾隆《云南县志》，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刻本。

⑨（清）李毓兰修，甘孟贤等纂修：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五。

江北岳庙，在府治北雪山麓。“相传昔有人见一异石，负归至此少憩，重不可举，乡人神之，立祠记焉。后蒙氏异牟寻封雪山为北岳，亦祀之。元世祖封为大圣北岳定国安邦景帝，至今祀无虚日。”<sup>①</sup>今南华县有玉皇阁，“在城正中，一名三层楼。旧志谓州城如船，中建层楼，高耸如桅，以镇之，即此。旧为广福寺，后殿建自元时，明季沙定洲之乱被毁。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知州岑鹤重建。嘉庆间灾，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州人公建。”“栖仙寺：在城东二十五里五栖山麓，南诏时羽士王载元、张明亨栖止于此。载元他去，明亨随亦羽化，寺因此得名。建自元时。”<sup>②</sup>

还有明朝都御史蒋宗鲁撰《鼎建记》<sup>③</sup>，天启《滇志》卷二十一《艺文志四》又称此碑为《玄武观记》，其载曰：马龙“高真山发自宜良，蜿蜒起伏至此，结为二中峰，前后突兀，左右层峦，环列若旗鼓状，后枕寻甸群山大海，而小山曲水绕于前，俨然龟蛇盘辟也。又有仙人洞、五龙潭，上下平田千顷，云南前卫屯兵数百家居之”。“元以前尚有寺曰公安观”，而明朝嘉靖庚戌（公元1550年）之冬又在此创建中和山玄武祠，成为滇东地区著名的道教宫观。这块碑铭不仅记录了马龙元代宫观设置，而且是明代屯田移民道教信仰的重要资料，明代内容留待下章再详述。

由上述史料可知，元代所建宫观已遍布了今天云南的昆明、玉溪、曲靖、楚雄等州市，在明清云南志乘中还有道士活动的零星史料：

①（清）乾隆《云南县志》。（清）陈宗海修，李福宝等纂光绪《丽江府志》卷四记载略同。

②（清）李毓兰修，甘孟贤等纂修：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五。

③（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苏忠先，安宁人。事母极孝，性喜饮，放达不羁，家贫力学，诸子百家，无所不究。负母入岱晟山中，结庐耕食自娱，得异人授役龙术。松林村田苦无水，即凿龙泉，清冽异常，灌溉山田凡数十顷。一日，元使者斋金帛往召，苏应诺，款使者于山中，至夜半，屋宇四围俱金龙绕现，有吞噬状，使者骇而逃焉。里人称为“真隐先生”云。<sup>①</sup>

畔富，新兴（云南玉溪）人，姓李，性不嗜荤，受戒天常寺。游于通海，见洪水横流，乃登秀山巅，相其水道，往东北石笋丛立处以锡杖穿之，水随尾间下泄，至今民莫厥居。后隐居秀山，尸解去，留像于石，接班人立塔龕之，登瀛桥泉眼即其洗钵处。<sup>②</sup>

周哲，始晒日华首门北岫侧，冬夏均不衣。人乃异之，遂如其志助缘，哲方移入洞修炼。岁获白金，广购经、史、诸子兼道书，凡万卷，贮之洞。谓之曰：“后来人偷去则何如？”周曰：“我遣青女甲神守之。”嗣是果无敢盗之者。今洞孔日闭，仅容拳入矣。<sup>③</sup>

这些传记表明，元代道士能为民做役龙祷雨法事，会尸解道术，还能以“玉液炼心”这种高级内丹功法来进行修炼，且已购置经史子书及道书万卷，表明当时云南道士的水平已经不低。

“《元史》亦以滇之僧道并列，省垣城砖除所述藏

①（清）鄂尔泰修：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五，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刻本。

②（清）阙慎兆等纂修：康熙《通海县志·仙释》，李孝友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

③（清）高翥映：《鸡足山志》，侯冲、段晓林点校，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294页。

文之砖外，并杂以‘符砖’，则此两教者，当日必势同鲁卫，未见轩輊于其间也。”<sup>①</sup> 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言：“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固守……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表明元初云南地区的建筑、风俗等皆保持了大理国时期的特色，而其中又有不少汉文化的成分，道教作为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且又曾于南诏、大理国时期在云南传播过，蒙元时期继续在云南境内流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大理行记》又记品甸（今祥云境内）“湖西宫道中有石焉，纹如古篆，号曰地符，行人谨避，莫敢践之”。“符”乃是道教所宣扬的一种表示天神旨意的符号，或为图，或为篆文，《云笈七签》卷四十五言：“符者，三光之灵文，天真之信也。”认为是驱役鬼神、禳妖驱邪以达到人神合一的秘文，元时云南人对“地符”毕恭毕敬，这都与元代云南信奉道教有关。

## 二、元代道教仙人和中原高道 传道入滇的历史传说

云南有关全真道人滇的问题，总会涉及两个一直有争议的传说。

### （一）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传教入云南的传说

据《巍宝山志》载：“唐代，相传吕纯阳曾到巍山传教，以栖鹤楼作为道场，带徒授教，弘扬全真道。

<sup>①</sup> 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第141页。

现今巍山民间还流传着很多关于纯阳祖师在巍山传教的神话故事，保存着借吕纯阳之笔撰写的两块碑文，一块题名为《栖鹤楼记》，一块题名为《金阙选仙吕大真人降笔》。”<sup>①</sup> 后来出版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对上述说法作了详细描绘：

唐代，相传八仙之一的吕纯阳也曾到巍山传布道教，他到巍山后，以东山栖鹤楼作道场，带徒授教，传布天仙派全真道，很受巍山民间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修炼成仙后，被巍山民间洞经会和圣谕坛奉为真官，一直享受着巍山教徒和信教群众的香火。从唐代以后，在巍山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纯阳祖师在巍山传道的神话传说故事，如《吕祖度仙姑》、《吕祖度梁医生》等；记载有关吕纯阳在巍山传道传说的经书有《暗室灯注解》、《指迷金图》、《吕祖度仙姑》、《吕祖因果说》等；现今栖鹤楼还保存着借吕纯阳之笔撰写的两块碑文，一块题名为《栖鹤楼记》，一块题名为《金阙选仙吕大真人降笔》。<sup>②</sup>

吕洞宾是道教“八仙”之一，名岳（岩），字洞宾，号纯阳子，相传为唐末道士，传说曾得遇钟离权授以金丹秘法，是唐末五代兴起的“钟吕金丹派”创始人之一，其理论对全真道产生过较大影响，曾被后世全真道徒尊为“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自北宋以来，有关吕洞宾的传说故事相继出现，至元代，

<sup>①</sup>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巍宝山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sup>②</sup> 薛琳编纂：《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282页。

吕洞宾被封为“纯阳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宋史·陈抟传》记吕岩“为关西逸人，有剑术，年百余岁。步履轻捷，顷刻数百里，数来拷斋中”，是位高道。《全唐诗》收有其诗作二百多首，以“剑仙”、“诗仙”、“酒仙”闻名于世，常有后人托其名而撰文的，《栖鹤楼记》、《金阙选仙吕大真人降笔》便是托名之作，前碑成文于清康熙年间，后者立碑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记录吕洞宾在游览巍山栖鹤楼的情景：

乙卯中秋夜，纯阳子登栖鹤楼，点缀山川，权衡风月，羽衣鹤氅之客，鸾舆凤辇之属，无不毕集。……歌紫虚太空之洞章，咏玉灵羽融之仙曲，螺杯三饮，万竹屯阴；铁笛一声，空山答响。始疑置身清虚之上，而不知在楼也。<sup>①</sup>

碑文用草书写成，字笔遒道有力，行如流水，颇具书法欣赏价值。

有学者认为全真道是创立于宋金之际的一个新兴道派，其形成虽受过“钟吕金丹派”的巨大影响，但其正式创立却是在吕洞宾去世之后。况在元王朝统一中国南北之前，全真道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北方，是故绝不可能有吕洞宾在唐代就将全真传入云南之事。再查吕洞宾本传，也未见有其来云南之说。由此提出“吕洞宾传全真道入滇之说显然不实”<sup>②</sup>。

① 薛琳辑注：《巍山风景名胜碑刻匾联辑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78页。

②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41页。

## （二）宋德方传全真道入滇的传说

这一传说，目前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昆明市志长编》载“特约撰稿员谢理安口述”：

元代被忽必烈尊为国师之丘处机的弟子宋披云入滇东演教，其弟子传之入昆，是为道教龙门派在昆传播之始。此派之主要祠观为真庆观、龙泉观。真庆观原名真武祠，相传为诸葛亮进军滇池时建。<sup>①</sup>

谢理安，民国时在金殿出家为道，因聪明好学，被杨智聪收为弟子，成为全真龙门派道士，对经书较熟悉，20世纪80年代去世。

有学者对此传说提出质论，认为“宋德方传全真道入滇之说，初看似有可能，然经认真考证以后也可否定”。宋德方字广道，号披云，莱州掖城（今山东省掖县）人，生于金大定癸卯（公元1183年），幼从“全真七子”之刘处玄为道士，继而师事丘处机，曾得为道教“教门提点”，卒于蒙古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被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查《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之《披云真人》，可知宋德方一生的经历大致如下：幼年在家乡从刘处玄学道，及刘处玄仙逝后，又“事长春宗师于栖霞”，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正月随丘处机远赴西域谒见蒙古成吉思汗，“往复三载，还燕住长春宫”。甲午（公元1234年）游山西太原西山，“得古吴天观故址”并修葺之，“三年，殿阁峥嵘，金碧丹雘”。丁酉（公元1237年）“复主子阳醮事”，并住持玄都观，“与门下

<sup>①</sup>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长编》第2卷，1984年3月编印，第280页。

讲师通真子秦志安等谋为侵木流布（《道藏》）之计”，在编刊《道藏》的同时“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秦几四十余区”；甲辰（公元1244年）来陕西终南山“祖庭”应皇子阔端大王醮事，得赐“玄都至道真人”号，然后便闲居此地“日与耆年宿德相会谈道”，至丁未（公元1247年）冬十月“微疾而逝于所居之待鹤亭”，享年六十五岁。由上可知，宋德方一生忙碌于北方，并未到过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sup>①</sup>

众所周知，道教所称的“八仙”大致产生于元代，元人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的八仙都是男性，有余仙翁而无何仙姑，直至明人吴元泰著《八仙出处东游记》，我们今天所知的“八仙”姓名才得以确定，有关“八仙过海”、“八仙庆寿”等著名传说在中国民间传诵甚广，家喻户晓。关于宋德方入滇的说法，我们调查了滇东北的昭通，当地道士和民间没有关于宋德方的有关传说。还有滇东和滇东南的曲靖、文山、红河有待调查。而在昆明的本土道士中，以及民间都盛传着“宋广道传入全真龙门派”的说法，并更为详尽：

元初，丘祖处机之徒宋广道率六弟子入滇传道时，曾入住真武祠（今昆明真庆观），数年后，宋广道率徒从大理返回时，真武祠已圯近半，于是宋广道不惜残年，亲自率徒募化，得众士绅支持，重新鼎建了真武祠，略增旧制为一殿两庑。宋广道因年老思归北方后，留下二徒于此住持，从而传下龙门一脉，此二徒后来事业均有发展，徒人盛多，

① 见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42页。



又增建了不少寺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与赛典赤墓相对的太乙宫（今昆明五里多小学的一部分）、大树营的祖师殿（今由村民集资修复），使全真道在本地出现了兴盛的局面。<sup>①</sup>

对于这两则历史传说的真实与否，我们不作辨析。我们觉得这两则传说反映了云南人对道教神仙信仰的仰慕，对元代盛极一时的全真道的推崇，也表现了云南人思仙慕虚的旨趣。我们之所以记录这两则有争议的传说，是考虑到任何的传说都不会无缘无故，空穴来风，目的是为了探讨其产生的原因、时代和背景，最关键的是传说背后与云南道教历史的相关联性，为何“八仙”中有关吕洞宾这一仙在云南传说最盛？明清以后云南许多地方建造了供奉吕祖的孚佑宫，布行、牙行等行会与孚佑宫、吕祖信仰在云南的情况如何？宋披云与传入云南各地的全真龙门等派别有何历史渊源？等等有关云南道教的历史需究其原委。为探析云南道教历史脉络，故存之以备考。

## 第二节 明初全真道入云南

从元朝开始，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增多。特别是明代有军事留戍和行政安置，包括官方移民、仕宦任职、谪迁流放等，更是大量移民入滇，为全真道传入云南奠定了群众基础。

<sup>①</sup> 笔者于2007年4月采访昆明本地的全真道长春派第19代道士岳国华（62岁）提供。

## 一、元明内地移民与全真派入滇

元代移民主要是军事镇戍和官商进入云南。据《元史》卷九十九《兵二》、卷十三《世祖本纪》载：元代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与色目人，以军人、官吏、谪迁或商旅的身份来到云南，其中不少人落籍不归。元朝不仅设置云南行省，在一些要害地区，还遣宗王率兵镇守，有十余位蒙古宗王出镇过云南。征发及镇守云南的将吏，在《元史》中有传者达 100 人，其中蒙古人 31 人，色目人 32 人，汉人及其他民族 37 人。仕宦云南的官吏在《元史》中共有 79 传，约占列传的七分之一。元朝调兵镇戍云南的记载如：至元二十一年（公元 1284 年），元朝增兵镇守金齿（今保山、德宏），在原有汉军、新附军 3 000 人戍守的基础上，再调探马赤军、蒙古军 2 000 人；二十二年（公元 1285 年），遣雪雪的斤领畏吾儿军 1 000 人戍守合刺章（今大理）；至大四年（公元 1311 年），又调四川省蒙古、汉军 4 000 人赴云南镇守。<sup>①</sup> 可见元朝在云南驻军和屯田的规模都很大。

明王朝建立伊始，云南仍处在元朝梁王巴匝剌瓦尔密的控制之下。大理段氏、麓川思氏以及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昭通）、东川、芒部（今镇雄）等地区统治者则各保境土、据地称雄。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朱元璋调集 30 万军队，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帅，开始对云南的进讨，并很快攻占了昆明和滇南临安（驻今建水县）、滇西威楚（今楚雄），又取大理、鹤庆、丽江、金齿（驻今保山市隆阳区）等地，威迫车里（驻今景洪市）、平缅

<sup>①</sup>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 740 页。

(今德宏一带)等边地先后投降。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初,明王朝在云南设立了都指挥司(管军事)和布政使司(管政务)等行政机构,然后又在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府、州、县相继建立了行政机构,令云南地区进一步处于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明朝定制,“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sup>①</sup>,即军士留戍。洪武十五年三月,朱元璋“谕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是年九月又“命天下卫所:凡逃军既获者,谪戍云南”<sup>②</sup>。这些留居云南的军士被称作“军户”,而且“军士应起解者皆釜妻”,军士远行戍守,妻子必须同行。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下令将驻守大理等地军士的家属送往云南;二十年和二十四年亦有类似的诏令。被编入卫所派镇各地的军士,事实上就是强制遣发的移民,所不同者,是遇有战事这些丁壮必须接受调遣,事毕方返回驻地。以每位军户有3口人计,驻守云南的军人及其家属约有近100万人。驻军的正军有定额,大体保持稳定的数量,而辅助正军供给及预备服役的舍丁(军官子弟)和军余(军士子弟),人数则不断增多。万历年间,云南都司领有三分马步旗军和七分屯军,据统计正军有62 429名;另有舍丁18 386名、军余254 610名,<sup>③</sup>方国瑜先生据《明会典》、万历《云南通志》等统计为“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六人”<sup>④</sup>。此外,还有因商贾、工艺、游宦、谪迁而落籍云南的“民户”,其数目也有十余万。方国瑜先生经统计

① 《明史》卷九十《兵志二》。

② 《明太祖实录》,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校印《明实录》本,卷一百四十三,卷二百四十八。

③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742页。

④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35页。

而言：

万历初年云南军、民户之总数为四十七万一千零四十八，其中军户占百分之七十强，民户占百分之三十弱。凡此未必为实际之数，军有逃籍，民有漏籍，惟比例当大致如此，《滇略》谓云南人户“土著者少，寄籍者多”，当日之实况如此也。<sup>①</sup>

明朝的行政安置与自发流徙移民，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据《滇史》：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明朝将内地的一些富家大室迁移至云南。《明实录》载：二十年十月，太祖又诏湖广常德、辰州两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大理、武定、临安（今建水）等地为安置移民较多的地区。有关记载如：明初迁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浙江等地人口遂迁至大理府；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明朝在洱海地区设兵备道并移民实边，“阅百年而生齿日繁，流寓日众”<sup>②</sup>。武定府原主要是白族和彝族居住，“明初役江南北富户实武定、永昌，汉人稍来”<sup>③</sup>。临安顺的汉族多来自明代，以后其地“风会日开，人材辈出”。<sup>④</sup>

明代还有不少外地客商进入云南。外地客商以江西、浙江、湖广与闽粤等地的人为主，尤以江西人最多，时有“滇云地广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

①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35页。

② （民国）张培爵等修，周宗麟等纂：民国《大理县志稿》，卷六《社会》，卷三《户籍》，1917年铅印本。

③ （清）郭怀礼修，孙泽春纂：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三《户口》，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刻本。

④ （清）江浚源纂修：嘉庆《临安府志》卷二《图说》，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刻本。

成其地”，而抚州（即临川）人在云南各地“居十之五六”之说。<sup>①</sup>云南各地乃至偏远及边疆地区，均可见到省外商人活动的踪迹，一些商人还落籍当地。

明中叶以后，卫所制度废弛，“军户”逐渐转为“民户”。这些从内地迁来的大批汉族人口，与原居云南的各民族一道，成为了开发和建设云南的主体，大大地改变了云南居民的族属成分，使得汉族人口大大地超过了原住云南的各民族人口数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所以，万历末年谢肇淛所撰《滇略》卷四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间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今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sup>②</sup>

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云南，进一步加强了云南地区的汉文化色彩。道教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大量地携入云南，汉族移民也是道教信仰、传播的群众基础。随着张三丰、刘渊然等著名高道的入滇，全真道传入云南。

大量有道教信仰的内地移民落籍云南后，多在云南各地兴建神祠，以供奉其原来崇奉的道教神灵，如四川客民在昆明等地兴建了“川主宫”，湖广商人在永昌等地修建了“吕祖楼”，江西移民在鲁甸、东川等地修建了“许祖庙”或“真君殿”等<sup>③</sup>。

从一些地方志书的记载来看，明代云南各地确实已有大量的道教宫观神祠存在，又有大批道教方士活动。比如从附录三《云南道观一览表》可以看到：云

①（明）王世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

②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1133页。

③ 道光《昆明县志·祠祀下》，光绪《永昌府志·俗祀》，乾隆《东川府志·寺观》。

南府、大理府、永昌府、昭通府、楚雄府、临安府、东川府、蒙化府、姚安府、丽江府、澄江府、曲靖府等下属各县均有宫观建造。还可看出云南各地人民所崇奉的道教神灵主要有三清、三官、玉皇、真武、文昌、吕祖、关圣、天后（斗姆）、城隍、东岳、酆都、灵官、武穆、财神、龙神和风、雷、云、雨、山、川诸自然神，以及鲁班、药王等行业神。

不仅如此，这些由外地来滇的汉族移民，原籍多为江西、浙江、湖广、河南、江苏等地，而这些地方在元明时期又多属全真道活动较为兴盛的地区，移民中的部分人不仅有道教信仰，成为道教信仰的群众基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地来滇的汉民中，有著名高道张三丰、刘渊然等，有著名道士江宁世家蒋日和，秦淮大渔户沈万三、沈线阳父女，张三丰的弟子余飞霞，江西杨用广和刘士宽、浙江王旻、四川邓豁渠、河南黄冠周东华、陕西黄冠杨海玄、山东黄冠云和，还有寓居曲靖府江西道士傅秉忠等道士入滇之时，便将全真道带入云南，并广泛传播。

明代云南各地道士的活动也很活跃，在明清地方志中多有本地的道士被载入史籍，如今天昆明地区有邵以正、徐道广、朱应先、李道真，大理有芮道材、季常在、杨崧、贾国瓚、张道裕、陈洞天，玉溪有王褒华、王盘，丽江有荀羽士、周月泉，红河有姚成、赵紫霞，保山有黄雨、薛继茂，楚雄有刘可成、董云、张景儒，普洱有袁仙、者干道人、王高、彭本源，曲靖有赵汝隆等等，皆是名噪一时的云南道教方士。<sup>①</sup>

由此可知，明代初年道教在云南已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全真道能传入云南并得到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高道的入滇，宫观的兴建，云南本地

① 详见附录二《云南道士名录》。

道士的活跃，为明清云南道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 二、明初全真道在云南的传播及影响

元末明初大量的汉民徙滇为全真道入滇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并曾直接将全真道携入云南境内。如前所叙，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最早传全真道入滇的人物乃是一些著名的游方道士。这些来滇云游、传教的高道，不仅首开了云南全真道活动被载于史书之风，而且还为推动云南全真道走向全面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明代入滇弘道的高道为数不少，有张三丰、刘渊然、刘士宽、邓豁渠等，其中最早入滇者当推张三丰，影响最大者又当推刘渊然，下面我们主要以张三丰和刘渊然为例来考察入滇高道对云南全真道传播、发展和影响。

78

张三丰是元末明初的著名高道，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道教人物。他不仅行踪飘忽、时隐时现，而且关于他的名字、籍贯、生活时代的说法也曾众说纷纭。比如关于他的名字，有名通、名金、名全一（或铉一）、名君宝（或君实）、名山峰（或三峰）、名玄玄等说法，又有号昆阳、号玄玄子、号保和容忍三丰子的说法，其余化名颇多，如思廉、玄素、玄化、昆阳等。《明史·方伎传》认为他“名全一，一名君实，三丰其号也”，清代研究张三丰的专家李西月经考证后则认为他名全一、字三丰。《明史·张三丰传》称其人丰颀魁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一衲一蓑，因其不修边幅，人称张邋遢。关于他的籍贯，《山西通志》说是平阳人或猗氏人，《陕西通志》说是宝鸡人，《四川通志》则说是天目人，甚至还有说是冀州人、义州人、易州人、闽人者，《明史·方伎传》说他是“辽东懿州人”，李西月则以张

三丰父母的坟墓在辽阳积翠山而认为他是“辽阳”人。关于他的生活时代，有说是宋朝者，有说是元朝者，但多数人以为他生活在元末明初。《明史·方伎传》曾载张三丰在明代影响很大，他读书过目成诵，事能前知，游处无定，湖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皆有其遗迹。明皇室曾多次派人四处寻访他，但都未能如愿。

张三丰是道教武当派的开创者。他吸收了宋金以来的道教金丹派南、北宗（全真道）丹法的长处，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创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道教修炼功法，这些功法具体表现于他所撰《玄机直讲》、《玄要篇》等丹经之中。张三丰将这些功法传给了居于武当山的全真道士邱元靖及“太和四仙”卢秋云、周真得、刘古泉、杨善登等人，为武当道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武当派大致可划归于道教两大阵营中的全真道，故张三丰亦可被视为全真道中的一代高道。

《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一》载：天顺二年，英宗赐诏赠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张三丰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秋从武当山来到云南，开始在滇中的弘道活动，他云游民间，屡显神异，该志载：“三丰好游戏，常为人绘炭悬壁，严冬满室皆温。”又载他曾“令幼童闭目乘草龙，顷刻游京师而返”。深得云南百姓的崇敬。还载：

（昆明）四牌坊有酒肆，三丰日饮其中。适担物者跌，当街死，酒佣畏祸。三丰曰：“勿恐，当为送之，但我寐勿呼。”乃出神入死者窆<sup>①</sup>，荷担出城北。未及其家，佣呼，

① 窆，原文作“窆”。



三丰觉，担者复毙于路。后即酒肆建三丰祠。<sup>①</sup>

上述记载，显然多附有神秘的色彩，但从中却可见云南人对张三丰的崇敬之情。

道光《昆明县志》载：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县人窦峻、戚笃忠拓建三丰祠，为“祀明张全一”而“为祠庙九，皆在城中”<sup>②</sup>。《新纂云南通志》又载：“昆明礼诰迎神，祷雨辄应，始于三丰。”<sup>③</sup>另外，在楚雄有张三丰“寓姚安文昌宫年余去之，平越以双履留挂壁间，长二尺，题曰：三丰鞋。今平越有三丰脱影崖、浴仙池、回生树遗迹”<sup>④</sup>的记载，由此可见张三丰在云南民间的影响。作为全真道的一代宗师、武当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学识精深、德行高逸，他的入滇活动首开了云南道教向高层次发展的风气。

张三丰的入滇，是文献记载中全真道传入云南之始。因为张三丰入滇之事，不仅见于云南方志记载，也见于张三丰弟子汪锡龄所撰《三丰先生本传》<sup>⑤</sup>中，较为可信。云南方志多成于明清时期，距张三丰生活的时代很近，故事所采张三丰入滇传道之事，除屡显神异外应较少有世人的杜撰成分。明末徐霞客游滇之时，曾于昆明太华山罗汉壁亲见“张仙祠”<sup>⑥</sup>，由此也可知张三丰在明末确已深得云南人民的尊崇了。

① 龙云、周钟岳等纂修：《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释道传一》，1948年铅印本。

② （清）戴纲孙：道光《昆明县志·祠祀志第八上》，见张维桢主持标点《昆明历史资料》第13卷，第88页。

③ 《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释道传一》。

④ 由云龙等纂：民国《姚安县志》卷五十五，1949年铅印本，1951年校正。

⑤ 李西月辑：《张三丰先生全集》，《道藏辑要》本，转引自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54页。

⑥ （明）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735页。

张三丰入滇弘道，并不仅限于混迹民间以神异感化百姓，而是还很注意招收门徒以传道。根据云南地方志书的记载，他在云南的门徒有沈万三、沈线阳、余飞霞等人。

沈万三又作沈万山，号三山道士，本是秦淮地区的大渔户，“读书知吟咏，乐善好施；三丰传以黄白术，汞走资罄，百折不回，卒致富甲天下，广济贫乏，世谓其得聚宝盆”<sup>①</sup>。明太祖朱元璋因沈万三年命与自己相同而大富，“召谓曰：‘尔家有聚宝盆，亦能聚土筑门乎？’万三不敢辩，承命起筑，立基而倾者三，因暗投丹金数片，始获成功。即今江南聚宝门。太祖欲犒军，召万三贷金百万，万三慨然输之。太祖益忌，欲除之”，后因马后苦谏，“乃议流岭南，株连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后命徙两家于云南”<sup>②</sup>。由上可知，沈万三在来云南前即已入道，属于前面所述直接将全真道携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之类。沈氏移居云南后，仍然接受着张三丰的传授，如史载他曾“与三丰炼人元于昆明池上”<sup>③</sup>。而且张三丰有《会沈子三山兼赠令倩余十舍》诗：“一家眷属小游仙，翁婿同居滇海间。玉润郎君余十舍，冰清老丈沈三山。都因象齿能为祸，未触龙鳞早犯颜。今日我来齐度脱，大舟还胜大刀环。”遂与三山炼人元服食大药，明年始成。又有“服我天元药，飞身昆明池”之句。<sup>④</sup>不仅如此，他的家人中也多有为张三丰弟子，如其长女沈线阳：

三岁失去，后三十余年，万三至滇，女忽来曰：“少遇祖师薛真阳，即中条元母，

① 《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释道传一》。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

呼儿为玉霞，号线阳，为掌玉匣诸秘法，得授灵通大道，命来就服成药。”万三乃出药，全家共服，皆能冲举。线阳声洪体硕，无女子相，慨然有普救生灵之志。叹曰：“能忍有裨于道，好杀必丧其元。”三丰尝为之作传。<sup>①</sup>

很明显，沈线阳是来云南之后才开始接受张三丰之传道。此外，沈万三的女婿余十舍之女余飞霞也是张三丰的弟子，颇有神功，《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一》载：

余飞霞，名惠刚，字建阳，十舍之女，三丰之弟子，西平侯沐春之夫人也。（沈、余）两家至滇，沐春深慰抚之，见飞霞风致端闲，宛然仙格，因请赘于十舍。及入西平府，薄其奁资，不以为礼。飞霞曰：“公所利者，财耳！措之易易。”请备铅汞，熔之，脱金环投于其内，有声如蝉鸣，真汞已干而环如故。以汞开铜铁，成金宝无算。

余飞霞既为西平侯夫人，则必会多得云南统治者的礼让，其师张三丰及其外祖父沈万三在滇传道也应会因此而得便利，道教在云南也深得沐氏统治者的推崇，并广修道教宫观，进而推动云南道教的发展。

### 第三节 明初各派高道进入云南

元明时期，随着江西、浙江、湖广、河南、江苏

<sup>①</sup> 《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释道传一》。

等道教活动较为兴盛地区的汉族移民先后入滇，他们中有云游至滇传道的道士，也有谪置云南的。除著名高道张三丰外，还有刘渊然等。他们陆续入滇，将道教的不同派别带到云南各地广泛传播。

## 一、明代高道刘渊然入滇传道

张三丰将全真派传入云南之后，明代在云南传播、发展道教，影响最大的道士则是刘渊然。他“以一代高道的学识风范，扩大了道教在云南的影响”<sup>①</sup>

据《长春刘真人祠堂记》载：刘渊然（1351—1432），号体玄子，其先人为徐州萧县人，祖父伯成仕元，为赣州路总管，因此后世居江西赣县。传说刘渊然出生前夕，祖母谢夫人梦紫衣道者入次子元寿室，既觉，家人报其降生，祖父因梦祥祈祐于元妙观，因此自幼被道士陈方外收为徒。十六岁师从元明间江西雩都紫阳观著名道士赵原阳受符法，赵见之喜曰：“此子形全神清真良器也，吾法嗣无过此。”授诸阶元秘，携归金精山，又授以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宸、黄箓、玉篆等书，以及金火返还大丹之法诀，栖神炼炁、呼召风雷、驱役鬼神等法术。传能呼召风雨，効治鬼物。<sup>②</sup>他学得“五雷法”，道术高明，一时传为神人。二十来岁时，专程到龙虎山，拜谒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时张正常已由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钦赐“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刘渊然与之交

① 张泽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明代云南道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74页。

②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五，见（清）纪昀等总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7页。与（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记载相似，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61页。

谈三日后别归，自谓得天师正学。刘渊然曾在赣州紫极宫修道受法，玉虚观炼丹<sup>①</sup>。他不仅独精其道教事，因他是由儒入道，“凡其所行必依于忠孝，惓惓为国祝釐以济民利物，凡可以布德施惠，使人得乐”之事，他皆为之，他还旁通医术为人治病。<sup>②</sup>刘渊然得全真、清微二派之传，《净明家教录》说他“每与同辈处，语及修行，辄举忠孝为立本”，又被净明道尊为第六代嗣师。

相传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sup>③</sup>，刘渊然在昆明弘扬道教，创建昆明长春观（今昆明市文庙所在地），并被敬为道教长春派始祖。

《明史·方伎传》<sup>④</sup>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闻其名，召至京师，试以道术，赫然灵验，赐号“高道”。《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载：明太祖命之在南京朝天宫建西山道院居住，尝出入禁中，与论道要，礼遇甚优，并受命乘传为名山洞府寻真之游，上匡庐，过鄂渚，至武当山，召还，擢为道录司右正一。尔后，刘渊然又在京都相继鼎建了灵济、神岳二宫，传授了一大批弟子。

永乐初年，从明成祖朱棣至北京，升迁左正一，“建金箓大斋，致有醴泉、甘露、鸾鹤之瑞，大见信宠。”赐“真人”号。他性情耿直，不久因触怒权贵而被谪置江西龙虎山，后又谪至昆明黑龙潭龙泉道院传道。刘渊然精通道经典籍，道行高妙，在云南有着

① 周建华：《刘渊然与赣南客家道教》，《中国道教》，2006年第1期，第18页。

② 见（明）王直《长春刘真人祠堂记》，（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

③ 昆明市道教会：《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3年11月，20-1-102。

④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月。

很大的影响，“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龙泉观）求济，无不得所愿欲”<sup>①</sup>。

刘渊然到云南后，传道收徒，兴建宫观，对云南道教影响很大。正如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太子少保兼翰林学士萧铤《重建长春观记》所言：“滇南自永乐中刘公渊然以道法显。”<sup>②</sup>收邵以正、芮道材、蒋日和等为徒，在滇势力渐盛。据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所立的《真庆观兴造记》记载：

云南郡城之巽维，旧有真武祠，不知其创始，而殿宇凋蔽，神物故暗。永乐初，郡人发心同募，众作兴之，亦既屹然于林木之表矣……乃迎致道士蒋日和莅之。当是时，长春刘真人在云南，日和得法于座下。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洪熙改元，真人还朝受封，兼领天下道教，以是祠为真庆观。<sup>③</sup>

这是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之后，当时统治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下令对真武祠进行了再度改扩建。沐晟改造扩建真武祠的初衷，是为了使“朝使节钺之往来，藩阃方岳之出入”的地方“新而大之”，并请蒋日和主持和重修真武祠，为时七年，到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方告结束。这年正是刘渊然钦承仁宗诏书回京，得赐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诰加“庄静普济”四字，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赐二品印诰，与龙虎山张真人同等，成为显赫一时的全国道教领袖人物。刘渊然奏请仁宗皇帝始更

①（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61页。

②（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第九》。

③（明）金问：《真庆观兴造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57页。

名真武祠为“真庆观”，“旧所龙泉道院为龙泉观”<sup>①</sup>。并复加蒋日和“明真显道弘教法师”之号。

刘渊然不但精于道术，而且清静自守，生性超脱喜静，又十分看重道德修养，所以《明史·方伎传》载：“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平生所有貂裘鹤氅，法衣宝剑，一切道具、舆帐、供奉给事之人之类，无一不出朝廷所赐，崇奖之荣，玄教罕比。”<sup>②</sup>

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对刘渊然更是“宠眷弥厚”，晋其“大真人”号，赐法衣宝剑。刘渊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sup>③</sup>，更使云南道教声望大振，促进了云南道教的发展。

在云南地方史志中有关刘渊然传道的史迹不少：

（楚雄）玄真观：在府治之东，长春真人刘渊然为书其匾。今为道纪司，凡遇庆贺则于此习仪。<sup>④</sup>

刘渊然，封长春真人。洪武间祷雨救荒，自以偷泄天河水，请远戍。及抵金齿，神术屡显，凡水旱有祈必应。卒葬于（永昌府）城西北象头山，郡人立庙祀之。<sup>⑤</sup>

《明史·方伎传》和明人陈循撰《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均载刘渊然于洪熙元年奉诏返京七年后羽化。不过永昌（今保山）道教的传入是与刘渊然有

①（明）周叙：《重建真庆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53页。

②（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③ 同②，第1261页。

④ 郑顺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万历《云南通志》也有记载。

⑤（清）刘毓珂等纂修：光绪《永昌府志》卷四十八《人物志·仙释》，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刻本。

关，因为永昌道士潘烂头“从长春真人学法，盖永昌道教始于此也”<sup>①</sup>。

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刘渊然自请返南京朝天宫，宣宗皇帝亲作《山水图歌赐长春真人刘渊然归南京》相送，宣宗皇帝在歌前还作有序：“长春真人刘渊然，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以至于朕，凡历四朝，阐玄元之妙，著盛通之功，摠恭秉诚，老而逾笃。今已耄年，志存闲佚，辞归南京。朕重其去也。因取孔智寿乐之旨，援笔作《山水图》赐之，题诗其端，以寓所以眷厚于老成之意云。”<sup>②</sup>由此可见，无论是歌还是序都显露了宋宣宗对刘渊然眷注甚笃。

刘渊然回到南京不久病逝于朝天宫，享年82岁。逝后7天才入殓，端坐如生。<sup>③</sup>其高徒邵以正命时任道录司的弟子李希祖，在南京新修“长春刘真人祠堂”，云南人还在昆明龙泉观内筑有刘渊然的祠堂（今黑龙潭碑林）和衣冠冢，以示对他的怀念。

刘渊然对云南道教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声望、地位对云南道教的兴盛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更在于他为云南培养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道教人才。《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载其在云南传道，门徒“逾百余人”，其中以邵以正、芮道材、蒋日和最为著名，成就最大。

刘渊然的门徒多是明代有影响的道士。芮道材，是大理太和县人，少业儒学，后从长春真人刘渊然受

① 方国瑜主编，沙必璐点校主编：《保山县志稿》卷十四，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第307页。

② （清）张豫章等奉敕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见（清）纪昀等总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2册第142页。

③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



栖神炼气之术。万历《云南通志》<sup>①</sup>载：其曾殄峨嵋孽龙，除蒙化妖怪，深得百姓敬崇。宣德初年，奉诏入覲，得赐道纪司都纪职，给驿以还。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秋，在巍山创建栖霞观并授徒三十余人，为大理地区道教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蒋日和是江宁世家，号节斋，自幼受学于南京朝天宫提点谢无为，后云游到云南，曾住持昆明长春观。后以刘渊然为师。并主持对真庆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凡门庑殿藏之制，一时俱举”<sup>②</sup>，历时6年而毕其功。《真庆观兴造记》载：其住持真庆观后，“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sup>③</sup>。洪熙改元后，得赐封“明真显道宏教法师”号，对昆明地区道教的发展兴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了上述高道之外，明代云南地区还活跃着很多影响不小的道士，他们或以德行感人，或以异迹惊人，对云南道教走向兴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总之，在一代全真高道的积极推动之下，明代云南的道教逐渐走向了兴盛，对云南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在全国道教界中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 二、云南邵以正入京修《道藏》

邵以正（？—1462），号承康子，别号止止道人，祖籍姑苏。洪武年间，其父母移徙云南落籍昆明，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记载是晋宁人。后“感梦玉桃之异而生（邵）真人”。师从刘渊然学道，即所谓

①（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康熙《大理府志·仙释》记载略同。

②（明）周叙：《重建真庆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53页。

③（明）金问：《真庆观兴造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57页。

“滇南龙泉山龙泉观乃真人遇刘长春授道之所”<sup>①</sup>。据现仍立于昆明龙泉观的《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碑载：

（邵以正）自幼丰神秀颖，警悟过人。比长，志向卓越，超然物表，遂白二亲，去从高道王云松。云松一见，惊曰：“是子不凡，岂可使处弟子列？”因逊避之。时长春刘渊然倡道于滇，真人更往从之。其居距长春所凡三涉水，日以为常。长春嘉其勤恳，悉以道秘授之。真人研几极微，一一领解。长春喜曰：“吾道有所属矣！”

后来，刘渊然回京“领天下道教事”，特向朝廷推荐了高徒邵以正。邵以正入京后，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英宗正统（公元1436—1449年）中，升迁为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得赐“守玄冲静高士”封号。邵以正也关注昆明真庆观的修造，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他请时任翰林修撰、侍读学士周叙撰写并书丹了《重建真庆观记》，由提刑按察司佥事，景泰年间当过云南巡抚的郑顥篆额，立于观内。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邵以正又请太常寺少卿金问撰写了《真庆观兴造记》和《真庆观记》。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49年）赐号“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禳祈，必命真人（邵以正）主之。真人感激知遇，每斋洁尽诚，以故胖蚤潜孚，动获灵验”<sup>②</sup>。深得朝廷重用。邵以正著有《长春刘真人语录》。《明史》称其“廉静谦谨，礼度雍容，缙绅咸重之”。

①（明）谢宇：《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6页。

②《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66页。

邵以正入京后做了一件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有着巨大意义的事，就是主持编修道经丛书《道藏》。明王朝对邵以正予以了极大的宠信和重用，曾诏令他主持编修《道藏》。邵以正感恩知遇，亲率弟子喻道纯等人广搜道经、详加订正，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最终刊成了《正统道藏》这一部道教的鸿篇巨制。《正统道藏》共收道经5305卷，是唯一完整地流传至今的由官方组织编刊的道经丛书，其刊成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此书由云南道士主持编修，表明云南道教的发展水平在当时的全国道教界中处于前列，显示了云南道教在当时的全国道教界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① 《明史·邵以正传》：“邵以正，字以正，号以正，云南人。正统十年，召以正入京，命其修《道藏》。”

② 《明史·邵以正传》：“邵以正，字以正，号以正，云南人。正统十年，召以正入京，命其修《道藏》。”

## 4

明清云南  
道教的兴盛

明清两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道教的态度颇不相同。明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管理上的措施也较为完善。特别是到了明中叶，明朝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道教发展到极为兴盛的状况，不少道教徒被委以重要官职，参与朝政，声势极为显赫，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为历代所罕见，这主要以正一派为代表。<sup>①</sup>如明世宗朱厚熜醉心长生术，日事斋醮，宠信正一道士陶仲文、邵元节等。明思宗朱由检还曾一度崇道排佛。清朝统治者崇信佛教，主要尊崇藏传佛教，道教被视为汉人之宗教，其地位日渐下降，被统治者看做名山胜景的点缀品，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乾隆以后，政府对道教的管理逐渐松弛，在清代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清朝政府对道教总是处于戒备状态，采取抑制

<sup>①</sup>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283页。

政策，道教活动主要在民间。

云南道教自元末明初张三丰将全真派传入之后，各教派也纷纷传入云南，在有明一代的云南，也为地方上层人士所推崇，沐氏家族接受道教，在云南各地兴造宫观，当时的著名文人李元阳、高翥映等也受道教影响，均有诗文问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注重地方史志的修纂，云南自从元代李京纂修《大德云南志略》以后，明代官修通志8次，清代官修通志6次，至于府、州、厅、县志纂修次数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地方志至今在云南省图书馆度藏的有三百多种。还有（明）谢肇淛撰《滇略》、（明）诸葛元声编《滇史》、（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等等私家史志，都记载了宫观的兴建、道士的活动等不同时期道教的发展过程，保存了大量的道教史料，记载着明清时期云南的道教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广泛信仰，而且发展步入了兴盛繁荣时期，并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过较重地位。

## 第一节 明清云南道教官方和民间信仰的兴盛

### 一、云南道教官职的设置和地方官署宫观兴造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虽是崇道取天下，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梁武帝等帝王沉溺于佛教，并没有

“务释氏而能保其国”<sup>①</sup>。佛教、道教与儒家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佛教对于帝王的意义与道家一样，在于教化愚顽，阴翊王度，暗助王纲，并有相当的功用。对于道教、佛教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作用，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

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虽孔子之教明国家之法，严旌有德而责不善，则尚有不听者；纵有听者，行不合理又多少？其释、道两家绝无绳愆纠缪之为，世人从而不异者甚广。官民之家若有丧事，非僧非道难以殓送。若不用此二家殓送，则父母为子孙者是为不慈，子为父母是为不孝，耻见邻里。此所以孔子云“西方有大圣人，不教而治”，即此是也。<sup>②</sup>

在朱元璋看来，佛教和道教不论是在修行还是官民之家丧事殓送等方面，都有淳化风俗之功用。正因为这样，他对佛、道进行了规范，以期通过树立佛、道二教的良好形象，达到利用佛教来教化民众的目的。<sup>③</sup>

《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诏令天下，设置佛、道教官署：

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第908页。

② 朱元璋：《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见《道藏》第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③ 侯冲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5月，第58页。

人。州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僧会司，僧会一人。府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道正司，道正一人。县道会司，道会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设官不给禄。

明代道教官署的具体设置是：中央设置道录司，总领天下道教<sup>①</sup>。道录司是明代设立的中央级道教官署机构，它是由“道箓”一词衍变而来，设置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掌管天下道教事。道录司下设道纪司，是明清时期府一级的道教官署，官名都纪，副都纪，掌管本府道教事务。州设道官官署道正司，设正副都纪一人。道会司是县一级的地方道教官署，设道会一人。

明清时期的云南道教因为地方统治者的重视，内地道士的入滇传教，确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此时的云南道教已经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对道教的管理，在云南设立了专门管理道教的机构。

前一章曾详细谈到的刘渊然，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闻其名，召至京师，赐号“高道”，擢为道录司右正一。永乐初年，从明成祖朱棣至北京，升迁左正一，后因触怒权贵而被谪置至昆明黑龙潭龙泉道院，他在云南传播道教，广收徒弟。“滇南自永乐中刘公渊然以道法显”<sup>②</sup>。在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刘渊然钦承仁宗诏书回京，得赐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诰加“庄静普济”四字，给二品印诰，并主“领天下道教事”，成为显赫一时的全国道教领袖人物。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

② （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第九》。

宣德年间，刘渊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sup>①</sup>，在云南设置了“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三级道教管理机构。

刘渊然回京“领天下道教事”，还特向朝廷推荐了高徒邵以正。邵以正入京后，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英宗正统（公元1436—1449年）中，升迁为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

刘渊然在云南的另一位著名弟子芮道材，便是云南大理太和县（今大理市）人，他师从长春真人刘渊然受栖神炼气之术。在宣德初年，入京觐见，得赐道纪司都纪职，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秋，在巍山创建栖霞观，以道法授徒三十余人。

云南府道纪司设在昆明的长春观。萧铤《重建长春观记》说长春观“则左为道纪司，右为斋堂……仍命道纪司都纪凌道崇典祠事”。而道士凌道崇曾任道纪司都纪，按明代制度道纪司设都纪一人，副都纪一人，道正司设道正一人，道会司设道会一人。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五《建设志》载，当时云南府道纪司有都纪、提点各一人，大理府道纪司也有都纪、提点各一人，永昌府道纪司则有都记、副都纪各一人，其下腾越州道正司有道正一人，楚雄府道纪司只有都记一人。刘渊然所请立的“金齿道纪司”实即永昌府道纪司；明代云南有金齿驿而无金齿府，金齿驿在永昌府城拱北门外，属在城驿，可能是永昌府道纪司的所在地。同时在云南各地建立官署宫观：

云南府：习仪道纪司长春观，在云南府

① 《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见《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治南。景泰三年<sup>①</sup>，右金都御史郑颺、总兵官沐璘合议创建殿宇，翼以两庑，仪以重门，每遇庆贺，习仪即焉。

大理府：道纪司栖霞观，在府治西北，宣德七年，刘渊然之徒芮道材创建，有印。

永昌军民府：道纪司三清观，在法明寺右。

楚雄府：习仪道纪司玄真观，在府治东，都督袁义建，长春真人刘渊然书额，内有泉，凡病疫者饮之即愈。<sup>②</sup>

清朝康熙年间金殿太和宫一门出过四个道纪司：马合相、王合敏、肖合众、郭合宣，道光年间又出李元龙道纪司，同治年间又出李明清道纪司。清末民初金殿杨心圆会长创办六合林桑蚕传习所，从事国计民生的事业。嘉庆年间黑龙潭出过宋合义、赵合沛两位道纪司。<sup>③</sup>

由这些史料可知，明清时期，在云南设立了各级道教管理机构，任命道官，说明当时云南道教在全国道教界上占有过较重地位，云南道教的发展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繁荣时期。

## 二、云南真武信仰与武当山金殿的捐制

明朝诸帝崇奉真武神是在洪武之世，朱元璋开始奉祀真武神。到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出于巩固皇位

① 三年，原作“二年”，上图本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皆作“三年”，下文载萧镃《重建长春观记》亦云“景泰壬申三年”。作“三年”是，今据改。

② （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③ 昆明市道教会：《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3年11月，20-1-102。

的需要，又进一步抬高了真武神的地位，并将之钦定为皇室的主要保护神。此后，明朝诸帝就像遵守“家规”一样，奉祀“玄天上帝真武神”，终明一世，未曾间断。<sup>①</sup> 真武信仰便是随着大一统王朝的重新确立，政治、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以及中央王朝对原始宗教有目的的引导与控制的背景下进入云南的，并被云南人奉为“南滇福神”。

首任云南镇守的明初大将沐英，是朱元璋的养子，他于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与蓝玉、傅友德平定云南后，便留滇镇守，从他到第17代沐天波一直是云南的最高统治者，世袭云南总兵官，沐氏家族可谓世镇云南。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大明王朝保持一致，捐造宫观无数。

从《云南道观一览表》可看出，明洪武中，黔国公沐英建富源古城寨下三元宫；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统治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兄弟捐修真武祠，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刘渊然奏请改名为“真庆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总兵官沐璘、金都御史郑顥合议创建昆明长春观；明万历年间，黔国公沐昌祚建姚安城西南六十里飞来寺等等。内地著名道士入滇者多，洪武、永乐时，武当道派创始人张三丰一度至滇，吸收江南滇富户沈万三翁婿及其外孙女西平侯沐春夫人余飞霞等为弟子。永乐时，全真派长春真人刘渊然谪居昆明龙泉观，滇人慕名“咸往求济”。明代云南著名道士活跃，各地多建道观，这与官府的倡导以及大量内地移民的涌入是分不开的。

真武信仰之所以能在云南迅速兴盛，也是与官府的倡导分不开的。云南各地真武庙多源于地方官的倡

<sup>①</sup> 王光德、杨立志著：《武当道教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年9月，第159页。

史  
议或兴建。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当时的云南巡抚陈用宾命人在昆明东北郊的鸣凤山仿照湖北武当山太和宫内金殿式样铸成真武殿，亦称“金殿”，用以供奉真武大帝。金殿外面同样仿武当山太和宫筑砖墙、城楼、宫门环护，亦称太和宫，俗称铜瓦寺。铜瓦寺建成之后，很快成为云南真武信仰的中心，每年三月三真武圣诞之日吸引了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朝拜真武帝。民国《昆明县志·岁时民俗》记载：三月“三日，谒真武庙，西则于罗汉壁，东则于鸣凤山”。在此风气影响之下，对道教颇为热心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也派人“赍持香资，前赴武山太和宫，迎请真武圣像”，把真武圣像迎回丽江，其目的是表示对王室之“忠”，也通过对神的祭祀“申祈祷之情”，保土安民。

再从《云南道观一览表》中也可看出，明代在云南各地兴建的供奉真武帝君的真武殿、玄武观有数十处之多。而且，有学者<sup>①</sup>对云南真武信仰和三月三祭拜真武的习俗进行研究，发现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六十四《祠祭志》所云“真武观各州县俱有”，“北极宫各州县皆有”。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曾游历过今天云南的昆明、大理、腾冲、保山、临沧、红河等地区的近二十个县市，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了这些地区的道教宫观神祠近百处，其中的真武庙、真武祠载有多处，如西山的玄帝殿、真武宫，嵩明县城西北的玄帝殿，晋宁县金沙山中的真武殿，鸡足山的玄武庙、真武阁及洱海的玄武阁。

另外，这位学者还把《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和《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

① 以下内容见梅莉《明代云南的真武信仰——以武当山金殿铜栏杆铭文为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卷》所收集云南地方志中涉及云南三月三真武诞节的史料进行汇集、梳理，发现清朝、民国云南各地有真武崇拜的记载 19 条（见下表）。

清朝、民国云南各地真武崇拜一览表

序 号	地 点	年 代	记 事
1	云南省	乾隆	三月三谒真武庙
2	云南省	清	三月三谒真武庙
3	云南府	康熙	三月三谒真武庙
4	云南府	清初	三月三谒真武庙
5	云南府昆明县	民国	三月三聚会西山真武庙
6	云南府昆明县	民国	三月三谒真武庙
7	昭通府	民国	三月三元宝山玄天会
8	曲靖府南宁县	(不详)	三月三谒真武于各山
9	曲靖府宣威州	(不详)	三月三谒真武于东山
10	曲靖府宣威县	民国	三月三谒真武于东山
11	曲靖府平彝县	康熙	三月三谒真武庙
12	云南府嵩明州	(不详)	三月三灵云山庆真武诞
13	澄江府新兴州	乾隆	三月三城乡迎真武
14	澄江府玉溪县	(不详)	三月三城乡迎真武大帝
15	澄江府江川县	民国	三月三千碧云寺斋祀上帝
16	腾越州	光绪	三月三祭赛真武庙
17	腾越厅	光绪	三月三祭赛真武庙
18	广西府弥勒州	乾隆	三月三谒真武庙
19	临安府阿迷州	康熙	三月三冰泉山元天阁庆会

由此可见，云南地方统治者对真武祀奉的推崇，云南民间对真武的信仰极为普遍。据雍正《云南通志·岁时民俗》记载：明清时昆明人三月“三日，谒真武庙，或于西山罗汉寺，或东之鸣凤山金殿，或先

期赴易隆中和山，行两日程，或负香之襄阳谒武当山，往返数月”。可见昆明人为庆真武诞，不仅拜谒本地真武庙，而且不远千里，远赴湖北武当山进香。

云南由于盛行武当山进香的习俗，今天的武当山金殿四周围绕的 148 根青铜栏杆，大多是明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19 年）由云南昆明等地的“奉道信士”捐资铸造，专程运至武当山组装而成。从留存至今的铜柱上的铭文可以知道，其中也有江西、陕西等省信士以家为单位捐造的，但尤以云南省城官绅士庶居多，每根铜栏杆上的铭文记载了捐献者籍贯姓名及祈求愿望等。如：

1. 大明国云南省城永清门内居住信官李铠、室人马氏敬造，祈保夫妇寿命延常，吉祥如意。辛卯年吉旦。

2. 云南巨津州吏目今升萍乡县主簿陈嘉禄（共 8 人姓名，不具录）诚心铸造一柱玄帝老爷金殿栅栏，勒之永久，伏祈庇护。

3. 云南府学生员吴宗文、父亲吴世宗、母刘氏、妻黄氏、花男冬徇，上同募舍银二两造铜柱，祈保父母安康，夫妻和乐，买卖亨通，功名显远，吉祥如意。

4. 云南信士张玉，妻张氏，原籍陕西商州人。敬造铜柱一根，奉上祖师圣前，祈保在堂恩主及父母，增福延寿；过去父母，早得超升；自、妻、女、婿，百事顺美，吉祥如意。

5. 云南省城信士邢魅，妻陈氏。原系浙江钱塘县人，发心敬造栏杆壹柱，奉上祖师圣前，愿在堂恩主，增福延寿；祈过去父母邢明钟、□氏，早得超升；保□□□

6. 云南布政司承差李承荣，同妻李氏、

张氏，在堂母施氏，共秉虔诚，求子嗣福寿，于辛卯岁造。山西尚平县信士张进道脚力。

巍然屹立于天柱峰巅的金殿是武当山建筑的精华，也是武当山在明皇室扶持下走向鼎盛的标志。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室及民间均有进供物品于寺庙宫观的传统，这些青铜栏杆非官方铸造，而是来自于民间士庶的捐献，是明代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末至十九年由专人组织化缘，由云南昆明等地的士庶官商，其中包括云南当地人和寓居云南的移民中的“奉道信士”捐资后，在云南统一铸造，雇请陕西、山西等地的农夫专程运至武当山组装而成。这反映了云南真武信仰在民间强大的生命力。

## 第二节 明清时期道教各派在云南的传播发展

101

明清时期，云南各地多有地方志书的编纂，在这些志书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有关道教活动的记载。这些地方是明清时的云南府、大理府、永昌府、昭通府、楚雄府、临安府、东川府、蒙化府、姚安府、丽江府、澄江府、曲靖府等下属各州和县，因州、县名太多，故不具列。由此可知，明清时期道教在云南的传播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载：徐霞客所至云南各地多有道教宫观或神祠的存在，至宾川鸡足山真武

阁时见“参叩男女满其中”<sup>①</sup>。查明清云南各府、州、县志，可见道教宫观或神祠的千余处。这些宫观、神祠中所奉道教神灵是多种多样的，如有三清、玉皇、三宫、真武、文昌、吕祖、关帝、天后（斗姆）、城隍、东岳、酆都、灵官、武穆、财神、龙神及风、雷、云、雨、山、川诸神。各地道士的活动也较频繁，如云南府有张三丰、刘渊然、刘可成、徐道广、邵以正等近三十人，大理府有芮道材、陶浚、季常在、豁渠、杨洲鹤等十余人，临安府有姚成、郑颠仙、赵紫霞、李舍阶、玉遴宾等，澄江府有王静明、杨拜飏、段泰利等，曲靖府有郑白齐、李清溪、陈大仙等，丽江府有苏羽士、赵廷猷、张道裕等，东川府有李道真、舒仙等等，皆是名噪一时的道士。此时的云南百姓凡遇事则多到道教宫观、神祠求祷。如昆明龙泉观“前有龙潭，深不可揣拟。世传有龙穴其中，骄不可制；泉水泛滥，民苦垫溺”<sup>②</sup>，故每当昆明地区发生水旱之灾时，龙泉观便成了人们的“祈祷之所”<sup>③</sup>。由此可见滇民信仰道教程度之一斑。

随着道教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云南境内的道教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派别。这些派别或是从省外直接传入，或是在云南本地衍生而来，众多的派别使云南道教的发展呈现出了繁盛的景象。

道教派别本来就异常庞杂，其划分标准也不尽一致，如北京白云观藏手抄本《诸真宗派总簿》收录有88个传承各不相同的道派名称及其派谱，原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易心莹则主张以修炼方术为标准，将道派

①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885页。

② （明）沐天波：《新建龙泉观玉皇殿碑记》，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305页。

③ （明）刘彭年：《重修龙泉观记》，见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77页。

划分为金液宗、调神宗、科醮宗等十家<sup>①</sup>。

云南道教的派别既有与《诸真宗派总簿》上所录道派之名称、派谱完全相同者，也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者，但大体上仍可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派别。

在云南的全真派影响很大，分系颇多，具体有如下一些支派：

### 1. 天仙派

自称祖师为吕洞宾，主要流传于大理巍山一带。传说吕洞宾曾到巍山传道布教，开立此派并留下 40 字派谱：“妙玄合道法，阴阳载乾坤；志心皈命礼，万古永长春。清静无为宗，临通大洞金；暂状师得位，辉腾谒太空。”<sup>②</sup> 巍山天仙派道谱与《诸真宗派总簿》<sup>③</sup>所记“吕祖天仙派”道谱相似（除第 8 字“载”为“在”外），且巍山尚存“皈”字辈道士。天仙派在巍山的道场有青霞观、长春洞、望鹤楼、栖鹤楼、眠鹤楼等。

### 2. 龙门派

元代丘处机开创，自元代以来，全真道“七真”门下各自开派，以龙门派势力最大、最为盛行。在昆明、保山、巍山等地发展兴盛。此派有 100 字道谱：“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惟懋，希微衍自宁。住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虚空乾坤秀，金木姓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实新。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先生。万古续仙号，

① 郭武：《易心莹的道教宗派学说》，《上海道教》，1992 年第 1 期。

② 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见《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10 月。

③ 《诸真宗派总簿》是清末各地道士来北京白云观挂单时所用的登记簿，手抄本。转引自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658 页。



三教都是亲。”<sup>①</sup>与《诸真宗派总簿》所记“龙门派”道谱相同。昆明龙门派道观有：真庆观、龙泉观、太和宫等，清末太和宫住持李元龙便是云南都纪司、龙门正派第十九世师。巍宝山龙门派有：文昌宫、玉皇阁、朝阳洞、培鹤楼等。

### 3. 长春派

以明代来滇传教的刘渊然为祖师。刘渊然曾得封“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号，并“领天下道教事”成为全国道教领袖，故其派以“长春”为名。《诸真守派总簿》未录此派。属全真道派，明清时人数甚多，知名者有邵以正、徐道广、蒋日和等，与龙门派并行，该派主要流传于昆明一带。其特点是：注重符篆，尚劾治鬼邪，精于医术为人治病。民国时即已衰微。有20字道谱“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传正教，绍述仙踪。”道谱排用到“教”字辈后，又从“日”字传起，未用后四字。昆明黑龙潭五老山定风塔北数十米处，有长春派第十二世都纪赵和沛墓，立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赵和沛，江川人，生平不详，善书，定风塔有其书《玉皇心印妙经》。

### 4. 灵宝派

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灵宝派不同，据说是清康熙年间从西河派衍化而来，以萨守坚为祖师，主要流传于巍山一带，有60字道谱：“守道明远德，神真应太和；志诚宣玉典，中正演玄科。会一崇元化，丹阳含妙果；素心宗法蕴，阐教学仙多。道明元弘教，灵虚启洞微，纯一通玄静，守性妙家传。”与《诸真宗派总簿》所记“萨真君西河派”道谱不尽相同，《总簿》道谱有

① 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见《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40字：“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和；志诚宣玉典，中正演金科。冲汉通圆满，高宗居大罗；武当兴法派，福海起洪波。”巍山灵宝派1986年已传至“纯”字辈。民国《大理县志稿·宗教》所言火居“先天派”亦宗萨守坚，疑其与灵宝派实为一派。

### 5. 随山派

尊“全真七子”之刘处玄为祖师，约清末传入云南，在腾冲、临沧等地传播。该派有40字派谱：“思道明仁德，全真性复常。景高合礼仪，嗣信守忠良。裕俗贤旅泰，宗支茂惟祥。惑益希诚朴，玄元世永昌。”《诸真宗派总簿》所录随山派为100字，前40字与上述派谱略异（第5字为“往”，第27字为“友”，第31字为“盛”）。云南随山派在临沧县传到“良”，活动场所为三元宫。<sup>①</sup>

### 6. 西竺心宗

清初云南龙门派的一支，与内地道派不同。该派创始人月支（氏）国人野恒婆阁，此人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赴京师谒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受戒，并得王常月赠“黄守中”名，黄守中来云南后，居鸡足山传法于管太清、王太原等人，遂在云南开创了龙门派“西竺心家”支系，其门徒多为行迹诡异、身挟绝技的江湖奇人，以诵咒为行、炫耀神通为特点，<sup>②</sup>在云南民间有着一定影响，而且对内地全真道的朝北斗科仪也产生过影响，据任宗权道长考证：道教全真派斗法由清代龙门高道闵小艮学自云南西竺心宗，其创派人月支为鸡足道者，《金盖心灯》称：“鸡足道者，来自月支。（鸡足，滇南山名，月支，西

①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193页。

②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656页。

方国名，即古之氏国）懒云子谓：滇南土人，相传元初已有此道者，不知其来自何代也……士所精惟斗法……泣拜而转顾余（即闵）曰：西竺至宝，汝已易得，善护正宗。”<sup>①</sup> 2003 年任道长在云南参加昆明道教协会举办的“道教经韵知识学习班”授课时，曾游历云南大理巍宝山，遇江永德道长传与《太上静斗垂宪宝科》一部，因科仪杂乱无章，他整理为《太上玄门全真旋斗照耀科》，内秘详尽，不可思议。<sup>②</sup>

清末民初，大理地区道教有清虚、火居二种，“清虚道云游方外，居处坛观，脱离家庭社会之关系。火居道乃与常人无异，惟金铙法鼓、讽诵经文，为人忏悔、祈祷，获贳家而已”。由此看来，似乎清虚道属全真派，火居道属正一派。但云南大理“火居道分先天、龙门二派，先天派家萨氏行于城内及南乡，龙门派宗邱氏，行于东乡、北乡”<sup>③</sup>。“萨氏”即萨守坚，西河人，曾学神霄雷法于北宋张继先、王文卿、林灵素等人，开创有“西河派”（属神霄支派），大理先天派当属西河派。

在云南民间活动范围最广的道教派别当推正一派。正一派道士散居云南各地，为信众超度亡灵、撵鬼驱邪、禳灾祈福为主要活动。道士不住宫观，可以娶妻生子，多为祖孙世代相传，形成了许多道士世家。各地少数民族的正一派道士作法事时所用的经文、服饰及科仪等不尽相同，一些地方还建有正一派宫观并有道士护持香火，如 1949 年前户撒金凤山上建有“皇阁寺”，鲁甸文屏山脚也有“老君庙”等。还有清微派，

① 《藏外道书》第 31 册，第 277、278 页。

② 任宗权著：《道教科仪概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36 页。

③ （民国）张培爵等修，周宗麟等纂：民国《大理县志稿·宗教》，1917 年铅印本。

清康熙年间，从巍山龙门派中衍化出了清微派，道谱相同，今尚有“教”字辈道士；此派后来向民间发展，形成了火居龙门派组织，亦即巍山地区的“洞经会”。火居龙门派组织的特点是：道士道姑不必出家住观，可以生育儿女；定期举行洞经会，开坛讲经，并弹奏洞经音乐，以吸引群众来接受道教思想。

另外，清时昆明三清阁、金殿等地曾有过张三丰祠及其塑像，疑曾有《诸真宗派总簿》所言“三丰派”（即武当派）流传过；鲁甸县在清朝也曾有江西人兴建“江西庙”，内供许逊真君，疑曾有过《总簿》所记的“许真君净明派”。但现在已找不到这两派的传人了。

除了上述道派外，明清时期云南道教还多与儒家、佛教相融合并向民间发展，从而形成了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民间宗教组织，如圣谕坛、洞经会、青莲教、同善社、普缘社、常斋教等。

圣谕坛，自称以代天传旨、教化人民为务，其经典既有道教的《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等，又有佛教的《观音菩萨化身法忏全部》等，也有儒家的《儒教大乘正宗正性除疑真经》等，还有托名清顺治帝作的《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及康熙帝作的《圣祖仁皇帝十六条》等。圣谕坛内设宣化、督讲、监讲、宣讲、设讲、助讲等职务，负责斋课、诵经、做会等宗教事务；它在各地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诚善坛、齐善坛、赞经坛、劝化坛、辅治坛、辅德坛等等，仅巍山坝区就有45个名称不同的圣谕坛。

洞经会，“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夹杂佛道，间

以儒经附会，入坛者皆男子而无女流者也”<sup>①</sup>。其在云南的分布地区很广，遍及滇东、滇中、滇西和滇南各地，尤以昆明、曲靖、大理、丽江和玉溪通海为最盛。民国年间，昆明地区尚存“元会经坛”、“崇仁学”、“宏文学”等洞经会组织，曲靖则有“广化堂”、“忠心堂”等，通海也有“五经会”、“鹤云会”等等洞经会组织。这种组织现多已演化为在节日期间举办文娱活动的民间团体，其组织形式也较为松散。

青莲教以“吃斋、诵经为主，间为人祈祷”。同善社则“未尝诵经，而专于礼拜。其遵守者，释道俱有，而专以做功为事，近于参禅”。普缘社的内容“多与同善社相类，亦男妇俱多，但诵经请乩略不相同耳”。<sup>②</sup>常斋教传自湖北一带，“兼有释道二义，以不茹荤饮酒、礼佛念经、坐功、戒杀、放生为宗旨，其教徒率皆孀妇，间有老翁幼女人其教者”<sup>③</sup>。这类宗教组织在云南民间有着较大的影响，如李象贤《闻见后录》载清初大理府太和县有张保太、龚永昌、杨鹏翼传所谓“大乘教”，“所奉者儒与老、释并列……数十年间遍天下”。《清史稿》卷十一也称：“云南张保太传邪教，蔓延数省。”又据《徐霞客游记》言，徐霞客曾于保山城中遇一邱姓民间道士，邱氏本为新添人，却多云游于腾冲、保山一带“以箕仙行术”<sup>④</sup>。由此可见，民间道士在当时的云南境内活动很广。

①（民国）李文林等修，杨履乾纂：民国《昭通县志稿·宗教》，1937年铅印本。

② 民国《昭通县志稿·宗教》。

③（民国）张培爵等修，周宗麟等纂：民国《大理县志稿·宗教》。

④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084页、1099页。

### 第三节 明清道教与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融合

云南的道教明清时较为兴盛，与这一时期内地人口大量入滇有关，与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有关。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内地居民移迁云南各地。在外来移民移居云南的过程中，居住山区的和边疆地区的世居民族，在元朝受到外来移民浪潮的影响较小。明清以后，特别是清朝在云南实行募民垦荒的政策。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清廷批准云南招民垦种无主荒田，以后外地移民纷至沓来。清廷进行改土归流后，大量招徕外地移民来云南垦种，有的外来人口的数量已超过当地居民总量的半数。随着外来人口大量进入云南的山区和边疆地区，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一般情况下，迁入山区的和边疆地区的外来移民单独立寨，与周围地区的其他民族相安而居。但时间既久，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逐渐普遍，既有迁入的汉族等外来人口被世居民族所融合，也有世居民族人口被外来移民融合的情形，同时，也产生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融合。

明清道教对云南彝族、瑶族、白族、纳西族、傣族、阿昌族、壮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民族的部分群众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信奉着道教的神灵，这种影响源于明清时期，甚至更早的时代。

## 一、云南彝族与道教

彝族撒尼支撒梅人的西波教即是受道教影响较深的一种宗教。撒梅人生活在昆明地区，其所信奉的西波教已有了一套较完整的神灵系统和一些粗糙的经文和教义<sup>①</sup>；从这个神灵系统及一些经文和教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波教中的道教色彩。

西波教奉太上老君为最高主神。其下有通天教主，秉承太上老君之命而主持天庭的日常事务。通天教主之下有两个部门：一部是由雷部总管统率的雷部诸神，主管自然的变化如打雷、下雨、冷暖等，并兼有惩罚恶人之职；一部以元始天尊为首，主管人间的生死疾苦和作祟人间的鬼怪。从中不难发现有许多道教的神灵。

西波教的一些经文也染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如其《请神经》言：“三清道号观岁殃，一句念消万千恙，七宝林中朝上帝，五明功能礼性隍，长辰白鹤游上帝，每将请客遍世安，长跪至心归命里，鸾公凤母将绕堂。”《阿好莫》五行诀又言：“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阿好莫，阿好莫，五行相生，五行相克。”其创世说中也有不少道教神灵和人物，如划分天地界线的是盘古，安排昼夜的是三皇，李淳风定了大月和小月，张子房分出了四季节令，女娲使天变为三十六层，等等。

西波教的巫师称“西波”。“西波”可以传授弟子，弟子入学时皆须向太上老君的牌位磕头，承认自

<sup>①</sup> 以下所谈西波教的神灵、经文和教义均参阅邓立木《撒梅人的西波教》，《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已是太上老君的凡间弟子。“西波”举行宗教活动时须于桌上正供太上老君的牌位，由此可见其与道教关系之密切。

## 二、云南白族与道教

白族的宗教信仰种类丰富，既包括佛教、道教等有系统经典的中国古代传统宗教，也包括本主崇拜等白族民间俗信，还包括圣谕坛、同善社等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民间宗教。<sup>①</sup>明清时期，云南各地的白族群众也在一定程度上信奉道教，崇拜各种道教的神灵，举行一些染有浓厚道教色彩的活动。这在大理地区的明清地方志中均有记载。

据咸丰《邓川州志·风俗》记载：“道士驱雷逐疫，皆有天功。”“六月朔日至六日礼南斗……九月朔至九日拜北斗，皆自唐来。”<sup>②</sup>白族道教信仰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在民间道教信仰尤为普遍。

特别是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对刘渊然更是“宠眷弥厚”，晋其“大真人”号，赐法衣宝剑。刘渊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sup>③</sup>。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康熙《大理府志》载：刘渊然在云南的一位著名弟子芮道材，便是云南大理太和县（今大理市）人，是明代著名道士。他少业儒学，后从长春真人刘渊然受栖神炼气之术。曾殄峨嵋孽龙，除蒙化妖

① 侯冲：《大理白族地区的民间宗教》，《宗教哲学》（中国台湾），2007年第6期。

② （清）钮方图修，杨柄铨、侯允钦纂：咸丰《邓川州志》，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刻本。

③ （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怪。宣德初年，入京觐见，得赐道纪司都纪职，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秋，在巍山创建栖霞观，以道法授徒三十余人。

明代的另一位道士是张道裕，剑川北乡永榜村的白族。雍正《云南通志》、康熙《剑川州志》载：（张道裕）自幼好道潜修，其遇异人授以符篆术，心悟明通，能致风雨。俗传能使役鬼神，号称“张天师”。“某年，大理旱，众遣使邀道裕祷雨。裕语来使曰：‘尔先往，吾次日来。’使者抵大理时，道裕已先一日至矣。祷雨辄应。太史李元阳与之友。”2004年笔者在剑川调查时，见到其七十多岁的第12代孙张鹤，他说：张道裕到天师府学了八年，带回经典、器具，把道教带回剑川，其墓地在永榜村，墓碑上写着“天仙真人鸿儒仙客享阳七十一寿”。

明清时在大理地区活动的道士，见于史乘的有季常在、邓豁渠、赵波庆、余常清等十余人<sup>①</sup>，可见道教信仰在大理地区的普遍传播。

白族信奉道教，也表现在其所奉“本主”中有道教神灵的信奉。各地白族所奉“本主”中有一些道教人物和神仙：“点苍昭明镇国灵帝”（即杜光庭，大理市西门外七村奉）、“玉局持邦灵昭文帝”（即杜光庭，大理市黄瓜营、满江奉）、“文教开滇、唐御史直奉大夫杜老夫子合堂之神”（即杜光庭，大理市新村奉）、“二郎圣帝”（洱源县沙桥、大围奉）、“关云长”及“文昌”（湖南省桑植县白族奉）等等<sup>②</sup>。此外，“大圣东海灵元玉辟天帝”（洱源县团山奉）、“仙天正黑护国新颜佑明皇帝”（洱源县海口村奉）、“西岳巡江帝主八部元帅”（鹤庆县双龙村、北水潮、双水潮奉）

① 见本书附录《云南道士名录》。

② 田怀清调查整理：《大理州白族本主信仰调查之二》附表，见《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及“东岳主宰仁封景帝”（鹤庆县金锁、下庄、太邑、潘屯奉）等“本主”也似是从道教神团中演化而来的神灵。

云南白族除了“本主”中杂有不少道教神灵外，还崇拜另外一些道教的神灵并专门为之建立了神祠。如昆明市西山区的白族“除去崇奉已村社化的土主外，道佛两教也是他们的主要信仰对象”，其所奉道教神祇有：天地人三界十方万灵主者、玉皇大帝、上元天官、火君、灶君、土地、山神、雷神、财神、龙王、鲁班、太上老君、关圣帝君、众天星等。又建有玉皇阁、关帝庙、财神庙、太平寺（供马君及龙王）等道教神祠，还念诵《玉皇经》、《太平经》、《龙王经》、《水官经》、《山神经》、《财神经》、《五经》、《出门经》等道教经典或染有浓厚道教色彩的经文。不仅如此，该区白族中还有不少火居道士，被称为“念经先生”，能写字、念经并主持多种“道场”仪式。念经先生所用经文多属道教类，如该区河尾村念经先生保存有一册《各圣诰》手抄本，内有“玉皇宝诰”（颂玉皇大天尊）、“关圣帝君宝诰”（用于祭关公）、“准提诰”（用于朝南北斗）、“四帅诰”（颂马、赵、温、岳四大元帅）及“龙王宝诰”、“五谷太子诰”、“土地诰”、“财神诰”等，道教色彩十分浓厚。另在大理、剑川、鹤庆、宾川、邓川、洱源、巍山等白族地区有火居道士遍及城乡，斋醮活动极为频繁；其诵经时供奉三清、玉皇、三元、五斗、二十八宿、灵官、老君、吕祖、八仙的牌位和神像，做法事时身穿红色、黑色道袍，持朝笏，戴朝天冠，使用刀剑、法铃、令牌、法镜、法篆、锣鼓、铙钹等法器道具，家中有祖传数代的家谱、牒册，属世袭火居道士。

云南白族不仅信奉道教的神灵和经典，建有大批道教神祠并拥有一些火居道士（念经先生），而且还

常常举行一些道教色彩极浓的活动，利用道教来满足自己的某些宗教性愿望。如昆明西山区的白族群众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都要在关帝庙内举行“大刀会”祈雨，又于农历六月初一至六日礼拜北斗祈延年命。洱源县凤羽区凤翔镇也有“供财神”、“三元胜会”、“送灶神”等染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宗教活动。<sup>①</sup>

### 三、云南瑶族与道教

云南境内的瑶族并不是云南原住民，而是从广东、广西等地游耕、迁徙而来的。唐代、元代已有瑶族在云南活动<sup>②</sup>，学术界一般认为，瑶族从广东和广西等地大量迁入云南、越南，并进入老挝、泰国，是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叶。最早对瑶族有明确记载的大致是乾隆《开化府志》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刻本，由此观之，可以确证的瑶族迁来云南的时间应当是16~17世纪前后。由于云南瑶族是瑶族历史上迁徙最为频繁的部分，其宗教信仰的状况与现居于两广、湖南等地的瑶族之间存在着一些地区性差别<sup>③</sup>。

瑶族中信仰道教者有蓝靛瑶（在广西称山子瑶）、过山瑶和茶山瑶三个支系，前两个支系的道教分为师公和道公两个系统，而过山瑶中则只有师公一脉。蓝靛瑶和茶山瑶师公所信道教与梅山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道公一派来源于汉族道教的正一派，与梅山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云南瑶族中所见的瑶

①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248页。

② 黄惠焜：《关于金平、屏边瑶族社会历史的综合调查》，见《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③ 徐祖祥：《瑶传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3月，第11页。

传道教，即只是蓝靛瑶和过山瑶的宗教信仰。与两广及湖南等地的情况大致相似，云南的蓝靛瑶和过山瑶所信仰者均属符箓派道教，但又因来源于汉族道教的不同教派，从而其所信仰的道教客观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教派。据其来源、神灵系统、道法、教理教义等各方面的差异，云南瑶族所信的瑶传道教大致可分为梅山派、完满派、间梅派三派。<sup>①</sup>

瑶传道教无疑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瑶族原所拥有的宗教信仰结合成了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在其内部又形成了若干个支派。这集中地表现在瑶族道公和师公为瑶族子弟成年而举行的“度戒”之中。

云南瑶族的男子通常在 15 岁左右都要举行一次“度戒”，取得了法名，接受了戒律，才能被正式承认为成年人的成员，编入瑶族的族籍，列入族谱的名册，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是瑶家的人而没有社会地位。这种仪式的意义与道教对入道者传授“法箓”的意义大致相同，其来历很可能即是源于道教的“法箓”传授中。

道教正一派对初入道的童子（通常指七八岁至十六岁的男生、女生）须授予“太上童子一将军箓”，童子受箓后方可以称为“正一策生弟子”，正式成为正一道的门徒。瑶族在南北朝末年或唐朝初年即已受道教影响，其“度戒”受道教传箓作法的影响是不难理解的。

云南瑶族举行“度戒”仪式时，须设立神台并在神台前装设两扇花坛，象征阴阳二府的宫门；花坛下部设五道拱门，每道拱门上挂一个黄色的橘子，称之为“仙桃果”；拱门后挂着三清、盘王、玉皇、三元、

① 徐祖祥：《瑶传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第 14 页。

雷王、龙王和赵、邓、马、关四帅的画像，拱门两边有与度戒内容相应的对联，其文曰：“功曹执状三天清，土地含秀府内传；三元保见戒童子，祖师哉教过阴司；社皇保见还前愿，坛主证盟合谢恩；拜答酬恩消愿烟，花插瓶中贵子添。”从中不难看出道教影响的痕迹。

“度戒”仪式结束后，道公和师公要为度戒男子取法名、授戒律、开荤。其所授戒律也多与道教的戒律相同，明显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如其“十戒”为：1. 不得误杀生灵等畜类；2. 不得呼天叫天毁骂日月；3. 不得污骂父母六亲九眷；4. 不得将直为曲贪财爱色；5. 不得贪生畏死；6. 不得邪淫生意；7. 不得欺贫爱富；8. 不得轻慢朋友父母兄弟；9. 不得怕虎怕蛇风顺雨行；10. 不得骂师骂圣。这与道教的“十戒”大致相同。当然，戒律作为一种含有伦理道德意义的规范，在不同民族的宗教戒条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共同之处，瑶族也有可能自创以上戒律。

#### 四、纳西族木氏土司与道教

纳西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始于宋末元初。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蒙古军经丽江征大理，次年，蒙古军封巨津州纳西族首领和牒之子阿乾为茶罕章管民官。宋景定四年亦即蒙古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将茶罕章管民官之职改封于丽江坝纳西族首领阿良。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南征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军征云南，“克大理，遂下鹤庆、丽江诸路”，阿良五世孙阿得向之归顺，明太祖赐阿得姓木，封其为丽江世袭土知府，木氏土司世袭统治县域及周

边部分地区。<sup>①</sup>清代，沿明制仍封木氏为世袭土知府。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王朝对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委派流官任知府，降木氏世袭土知府为世袭土通判，解除了木氏土司的统治权。从元代到清雍正元年改土归流，木氏统治丽江达470年之久。

纳西族有自己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东巴教的信仰，木氏土司在对待宗教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内地佛教、道教悉心接受，且世代弘扬，对从青藏高原传来的藏传佛教也不拒之境外，使纳西族聚居的丽江地区形成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在东汉张道陵创五斗米道时，建立了“二十四治”为管理教民的核心机构，其中的蒙秦治就设在越嶲郡，丽江、永胜大多在其辖区内，这些地区也一直被认为是五斗米道较早传入的地区。而明朝帝王崇信道教之风直接影响民间，道教知识在民间传播，道教斋醮等活动民俗化，道释儒三教融合等情况，使明朝形成有宗教氛围的文化环境。在此风气影响之下，木氏土司对道教颇为热心，对道释儒思想无不浸润。

木氏土司中对道教较为尊崇的是第19世土司阿宅阿寺（公元1569—1597年在位），官名木增，号生白，他壮年辞去丽江知府，隐居在芝山，自号“滇西华马水月道人”、“丽水解脱道人”，沉醉于“志欲乘黄鹤，身伴白云闲”的超脱的境界中。在他青年时，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云邁淡墨》六卷，本书既有天文、地理、生物等方面的摘抄，也有作者对儒、释、道三教的嘉言摘录。如道家的“因经悟道，因悟成真”，“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孝养父母，竭忠于君，我敕十万方神悉令覆

<sup>①</sup>（美）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刘宗岳等译，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4月，第62页。

护”，“一切善心皆得真道”，“人能刻意为善，静与道合，动与福会”，“无所诱慕，精神内固”等等。木增在博览群书时，“独爱玄同契老庄”，信奉神仙，对道家清静无为，服食摄生这一套理论身体力行。一次，他看到一幅吕仙翁的卷轴画，用诗形象地把当时的感情描写了下来，其诗为《次题吕仙轴韵》：

幽亭夏雨洒潇潇，图画看来兴欲脩。

黄服蓝巾光淡雅，仙风道骨自飘飘。

风箫口吹鸣人籁，龙剑随身蹑海潮。

另有一首《迎仙楼登眺有感》：

眼空六合外，身在九霄边。

侧问帝君诀，吾心自有天。<sup>①</sup>

诗作反映了这位纳西族头领对中原来的仙家道士的倾心，而且木增“恭揽玄微，藏儒书，甚为敬重。延请杨园庭训，饬侄重丽赍持香资，前赴武当山太和宫，迎请真武圣像，至丽安放于崖脚大院。时杨园、生白二人亦院内礼诵《皇经》，恭传道妙，日夜不敢懈怠，（杨）自号光道真人”<sup>②</sup>。

由此看来，杨园是明朝万历年间在丽江传道修行的道士。

明中叶，木氏土司与道士交往而见诸史乘的，有云游至丽江全真派道士蓟羽士，不传其名。“正德年间至丽江，爱玉龙山景，遂栖焉。日写《黄庭经》数章，混忘身世事，所居室常有紫气缭绕，野鹤成群，鸣食阶前。”木公赠其诗云：“山阴雨雪归来夜，玉杖霞裾引凤凰”，后飘然他往。还有明嘉靖年间丽江的

① 二诗俱载木增著《芝山云璫集》，明末刻本。转引自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第151页。

② 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第150页。



道士周月泉，“携一鹤入芝山，称来自终南，丰肌美髯，黄冠羽衣，料事多奇中。纵口谈丹术，笔墨间喜为幻渺之说。……居数载，辞去。木公送以诗”<sup>①</sup>。木公（1499—1553）是第14世阿秋阿公，官名木公，号雪山，任丽江知府。木公赠周月泉的诗为《炼师周月泉来访醉饮速归以诗相送之》：

艺客遥将访我楼，岭云湖鹤共悠悠。  
醉余说尽延生诀，袖拂苍髯不肯留。<sup>②</sup>

木公晚年还在玉龙雪山下玉湖边建造“迎仙楼”，他对道教传说中的人物极为熟稔，对王母娘娘驾鸾飞仙、吕洞宾骑鹤远游，来去无踪影之潇洒极为羡慕。并赋诗道：

海上闻有长生药，人间因构迎仙楼。  
王母驾鸾迥可降，吕翁骑鹤遥能游。  
飘渺日边玉盖拥，蹁跹云外天衣浮。  
有时携我出尘去，羽翰一举乘苍虬。<sup>③</sup>

木公另有一首学仙诗：

餐霞饮洁学仙流，岂念人间万户侯？  
出入烟尘随所欲，翱翔海岛任于游。  
笑擎云液千年酒，宴赴蟠桃七月秋。<sup>④</sup>

木公常常有餐霞凌云之意，想象中自己已飘飘欲仙，能乘此出尘与王母娘娘、吕洞宾等仙人相会。他

①（清）管学宣修、万学燕纂：乾隆《丽江府志略·人物略》，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刻本。光绪《丽江府志》亦载。

②（明）木公撰，杨慎批点：《仙楼琼华》，明嘉靖刻本。转引自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第150页。

③（明）木公撰，张含批点：《雪山庚子稿》，明嘉靖间刻本。转引自余海波、余嘉华《木氏土司与丽江》，第151页。

④（明）木公撰：《雪山庚子稿》，转引自余海波《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与道教、佛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56页。



的一位叔叔笃信道教并出家，木公有《舍叔石松隐居玉龙山题道斋》一诗，“道斋延术客，雪涧引仙桥”，记载其叔叔修道的生活情形。<sup>①</sup>

明代活动于纳西族地区又见于史乘记载的道士还有陶浚，澜沧卫（辖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人，少习普庵法，性廉勤，精道术，祈祷辄应，不取货财。其一日忽语人云：“上帝命我为三天门置簿御史。”遂端坐而逝。卒后数年，礼部移檄于澜沧卫云：张天师于三天门见浚，为置簿都史，令修建真人府，“乃克其子孙差役，至今崇其法者尚著灵验”。“永胜城北习仪真庆观曾塑其像。”<sup>②</sup>在木氏土司的提倡扶持下，还有正一派张姓道士从江浙来到丽江，定居于白沙及大研镇，仅张正康一家便传了18代。今居丽江大研镇道士后裔张之蛟家谱记载，其祖先由浙江嘉兴府桐乡迁到丽江，家谱中载有历代祖先姓名及道号。“张姓道士念汉文道经，用天师印和道经师宝印，民国以前，每年都为城乡纳西族做各种斋事，诵经驱鬼除秽时也用纳西语。”<sup>③</sup>

纳西族地区受道教的影响，以丽江、华坪、永胜为主。据光绪《丽江府志》载：南诏封玉龙雪山为“北岳大帝”，元朝亦封之为“北岳定国安邦景帝”。木氏土司喜好汉文化，接受道教的传入，从明清史乘中有关纳西族地区道教宫观的兴建以及木氏土司主持修建的宫观，亦可知其对道教的推崇。如丽江玄天阁“在府城西北，白沙街石岩脚村，明土司木氏建”，玉皇阁“旧名光碧楼，在木土司通判署右。明万历年间

① 余海波：《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与道教、佛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56页。

② （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刻本，1934年龙氏灵源别墅重印。乾隆《永北府志》亦有传。

③ 颜思久主编：《云南省志·宗教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22页。

土司木氏建，乾隆年间郡民改建，”咸丰年间兵燹，“光绪戊子年（公元 1888 年）郡民募化重修”。还有清朝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民众在丽江府城南门外建财神殿；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在丽江武营重建玄天阁；光绪八年（公元 1882 年）在府西八十里石鼓里百姓重建真武祠；在城西东河里有三圣宫<sup>①</sup>，在今天丽江所辖各县均有道教宫观建筑的记载。明朝时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习仪真庆观在州治北，三真观在州治南城外；永宁府（今云南宁蒗）习仪真庆观在州治北。<sup>②</sup>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 1770 年）原永北府改永北直隶厅，所领辖区为今丽江市的永胜县、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清朝时期在这一地区所建宫观有：真庆观在府城北街，内有石桥一座；灵官庙有五座，一在府署内，一在分府署西，一在北门内三司街，一在城内北街巷内，一在城内西街巷内；雷尊阁在府城北门外；玉皇阁在府城北门外五里；斗姆阁有二，一在府城西门外，一在中洲；老君殿在梁官；三官寺有三，一在中洲街，一在梁官，一在远顿满官；三清寺在中洲街北；三皇阁在金官街；真武阁在清水驿。<sup>③</sup>

纳西族从土司到民众对汉文化一直倾慕，其文化、建筑、宗教等方面均受汉文化影响，并形成自己独具风韵的纳西族文化。公元 1639 年徐霞客记载丽江是“其宫室之丽拟于王者”，“民房群落，瓦屋栉比”<sup>④</sup>，其门楼、照壁、门窗、梁枋等均融古代中原和白族的建筑之长，形成装饰典雅古朴的特点，这一特点也运

① 上述史料见（清）陈宗海修，李福宝等纂光绪《丽江府志》卷四，传抄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稿本。

② （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③ （清）陈奇典修，刘慥纂：乾隆《永北府志》卷十五，清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 年）刻本。

④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 958 页。

用到了丽江城池附近的宗教寺观建筑上。

最具这一特点的是史志记载最为详尽的鹤庆府治东边的太玄宫，明代著名云南文人、御史李元阳（1497—1580）称之“为南中宫观之最”。这是由木氏土司第15世木高（1534—1579）与鹤庆知府周赞于明朝隆庆丁卯（公元1567年）建成，规制宏敞，康熙辛巳年（公元1701年）总兵刘廷杰重修，新添亭台、树木藻绘可观。<sup>①</sup>李元阳为之作《太玄宫记》：

鹤庆太玄宫在府治东一里许，郡守潼川万峰周侯成其始，邻邦端峰木侯成其终，故其规制宏巨，藻阔丽密，为南中宫观之最云。初，鹤庆畏雷，民之死于雷者，岁常十许人，少亦五六人。郡人欲作庙以压之，积岁弗举。比周侯至，父老以告。侯曰：“此山川沴气也，压胜宜莫如庙矣。且习仪之典，自国都而下，皆依寺观，此祖宗朝盖有深意于其间。鹤庆为郡，不可谓不久矣。而习仪亡所，非阙典欤？”乃驿闻台院监司金谓一举两得，特可其请。侯遂度地于城中，计己之俸入岁若干，尽以施之。郡人感其德，趋者子来，邻邦募其风，施者踵至。百工操其伎自献者，四面而集矣。于是宫广若干亩，制屋为正殿者，后祠天帝，前祠三清。依于前殿而祠者，曰统天元圣、曰朱陵度命、曰太乙、曰玉枢，翼于殿而祠者，曰文昌、曰真武。殿庭左右二堂，一祠三官，一祠东岳，两庑祠三十六雷，仪门祠四灵：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是也。凡天神之位置皆据道典，阶差而各列

<sup>①</sup>（清）杨金和等纂修：光绪《鹤庆府志》卷十三，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刻本。

之。其肖像等威，或铸或塑，务极精到。而天帝之像高丈许，涂金为室，庄严殊特，此则木侯之所作也。宫垂成而侯去位，因以所未具者囑累木侯。木侯曰：“此宇内胜事也，吾何敢后？”明日，复捐金帛米粟，鸠工召匠，严地以墁，易土以石，坚其垣墉，豁其牕户，厨湢庠庾，秩然备具。复于宫后作庵，以居修真者。置腴田若干亩，以为芻膏养贍之资。宫墙内外，杂艺卉木，盖苍乎其幽，苑乎其深之势，已在人心目中矣。凡周侯之所欲为而不及为者，木侯皆足成之。斯役也，经始于隆庆改元（公元1567年），落成于明年戊辰（公元1568年），首尾垂二载，雷不为厉，乡之缙绅父老，咸谓天人感应，捷于桴鼓。乃命士人杨经纬、董儒持张郡博东山时宜书来征阳为记。

阳闻之，鹤庆在太始为水泽，有尊者卓锡穹其尾闾以泄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盖与大理开于观音其事本同。大都开物成务，必有其时，固有天意默运于其中，假人力以助之。今太玄宫之作，工鉅而劳稀，事难而成易，人力不至于此，冥漠之中，当有握其机者，得非斯郡吉祥之一会乎？周侯名赞，木侯名高。董役施费者，列名于碑阴。铭曰：

鹤山四回元气结，晞光洞开氛祲截。太素神僧入其嘏，飞锡一卓洪滔竭。至今后土留灵穴，竭来遗甃顽愚牒。膏芻弗修祈飧绝，電雷岁有为民□。谁其吁天声哽咽，周侯欲

滴心头血。构官妥<sup>①</sup>圣天<sup>②</sup>神列，楼阁苍然冠  
嵒岬。胜事难成势中辍，仁哉邻伯，完其  
缺<sup>③</sup>。参赞江山赖贤哲，两侯相继成玄<sup>④</sup>烈，  
灵祇垂鉴应无警<sup>⑤</sup>，时有卿云含藻悦，气候  
调和暘雨节。疆场人民无夭折，黍稷年年奉  
欢悦，金堂玉室常芳洁。<sup>⑥</sup>

明清时期的宫观建筑因兵燹和自然毁损，遗址多  
已无存，今天已无法考其规模，所幸的是木氏土司在  
鹤庆所建的规模可观的太玄宫被李元阳为我们记录了  
下来。李元阳与木高是同时代的人，是当时人记当时  
事，对太玄宫作了周详、细致的描绘，由此也可看到  
道教对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影响。

## 五、傣族土司与道教

傣族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普洱、红河、  
玉溪等地，源于古代百越族系，为云南古老居民。秦  
汉时称滇越、掸，魏晋称僚、鸠僚，唐宋称金齿、白  
衣，元明称白夷、傣夷，清称摆夷。元代推行土司制  
度，在德宏设金齿宣抚司，在西双版纳设车里军民总  
管府；明代沿袭土司制度，并在傣族居住的其他地区  
任命了一些傣族首领为大小土司、土官；清代傣族土  
司被改土归流。傣族的整个封建社会都随着土司制度  
的出现、发展、衰亡而起着微妙的变化。许多地区的

① 妥，《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九《祠祀考十一》作“安”。

② 天，原作“矢”，据康熙《鹤庆府志》卷二十六《艺文志》载李元阳《太玄宫铭》，《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九改。

③ 缺，读如“缺”，《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九正作“缺”。

④ 玄，康熙《鹤庆府志》避康熙玄烨讳改作“峻”。

⑤ 警，原阙如，据上图本及《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一十九补。

⑥ 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志第九》。

傣族从土司到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并兼信原始宗教。道教对傣族地区的影响，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史料主要是一些傣族土司对道教的信奉，以及傣族地区的内地汉族移民对道教信仰的记载。

道教进入傣族地区与大量内地移民入籍本地有关。《太祖洪武实录》卷十四载，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六月，遣宝寺卿杨颢阅试云南左、右、前、临安、曲靖、金齿、大理、洱海、楚雄9卫军马，官兵共88405人。《英宗正统实录》九载，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右副都御史丁璇言：“金齿西南极边，洪武时屯守汉军不下二万余，僰人土军不下千余。”<sup>①</sup>特别是正统间王骥三征麓川，先后从内地调集大军数十万赴滇参战，事后不少士兵即落籍于滇西一带。这些移民不仅把中原文化传播到傣族地区，而且也是道教信仰的重要群体。

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长春真人刘渊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sup>②</sup>，金齿宣抚司辖今临沧、德宏、保山和缅甸部分地区，金齿道纪司的设立使道教声望传到傣族地区。金齿宣抚司的治所在今盈江县，道教全真龙门派、正一道自明朝传入德宏陇川、梁河、盈江、潞西。

明正统年间设户撒长官司（今陇川县户撒乡）。据户撒一带传说，明洪武年间，沐英率军征边，瘴事频繁，士卒减员严重，使沐军进退维谷。越高黎贡山后的一个深夜，沐英伏在地图上打盹，醒时见到一头白鹿在野外徘徊。既令士卒围猎，白鹿却无影无踪。待士卒回到驻地时，它又神奇地出现有路口。如此反

① 转引自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61页。

复数次，白鹿竟成为沐军的向导，带领沐军沿高黎贡山西下，渡龙川江，过风吹坡，抵陇川户撒时，白鹿一声长鸣，化为一朵白云，飘遁于凤凰山的密林中。沐英顿悟：这是玉皇大帝派地母化身为鹿。他急忙顶礼膜拜。户撒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塞，不仅气候凉爽，而且是个富庶的粮仓，沐军在此屯兵驻防。为感激玉皇大帝派地母引路，便筹资在白鹿隐身之地建皇阁寺和报恩寺。户撒皇阁寺现存石碑三块，碑文记载此寺建于明洪武年间，曾于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三次进行大修缮。直至民国时期，德宏州的道教官观除陇川户撒皇阁寺，还“有三教寺、关庙，年代虽久，规模甚狭，类多倒塌。”<sup>①</sup>盈江有油松岭青云寺、卡场道观、新城老君殿、城隍庙、关帝庙。<sup>②</sup>

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在今临沧设勐缅长官司，其境内著名的子孙庙就属全真龙门派道观，位于临沧西大街章嘎村，始建于清朝雍正中叶，“乃长官司俸廷征之母罗安人香火院，为土司创修道院之始。劫火频经，巍然独存。”<sup>③</sup>光绪年间，该庙住持阮一诚与弟子杨阳悟先后募修子孙殿、观音阁，建上中两院，观音阁的对面是观稼楼，据《观稼楼记》碑刻记载：观稼楼“高百尺，以两河为襟带，枕汀城之凤蝶，群峰环峙，气象万千，登楼远眺，烟霞吞吐，隐现明灭，更上一层楼，飘然如凌虚御风。且也秧田万顷，映叶左右，春夏之交，平畴绿满，农歌四起，清越可听，远

① 段文遹辑：《云南勐卯行政区地志资料》，民国十二年（1923年）铃猛防行政委员关防抄本。

② 《德宏州道教基本情况简介》，德宏州民宗局宗教科提供，2007年。

③ 《观稼楼记》碑，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仲秩庄道人丘区和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初邓映杨育才德彰书，住持阮来庆立。现存子孙庙。

瞻俯瞰，水鱼山光，稻香花韵”<sup>①</sup>，一派赏心悦目之景尽可收入眼底。景致优美的子孙庙创建于缅宁城（今临沧市临翔区）傣族傣氏土司的封地上，傣姓至今仍是当地傣族的大姓。由此可见，雍正时傣族土司府里已经有人信仰道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并不是那时傣族的唯一信仰，所以才会有“土司修创道院之始”的记载。

今景谷县也是傣族聚居区。在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威远土知州，允许土司世袭土知州职，洪武十七年升为威远府，直隶承宣布政使司。道教传入景谷准确时间待考，明清时有少数职业道士，当地的汉族、彝族在天旱时做庙会，要请道士念经，祈求玉皇大帝降雨；二月初做地母会，请道士念《地母经》；二月十四献祭太上老君；老人死后要请道士念“开路经”。<sup>②</sup>除当地的汉族、彝族信仰道教外，傣族亦受影响。在威远大街尾建有道教宫观都天阁，供奉都天太子，这是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威远土千总刀嗣祺倡修，募捐修建，是清代威远厅的最高层建筑。<sup>③</sup>傣族土司在景谷倡修道教宫观的历史记载。另外在东那乡建有灵官庙，直至民国时傣族土司和百姓都会至此烧香祈福。<sup>④</sup>保存至今的道教官观是大石寺，在景谷县北五十多公里的景谷乡文山海孜文笔山顶悬岩之上，建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建筑包括玉皇阁、三皇宫、天生寺、祖孙殿、杨四将军庙等五个宫庙殿阁，还有古朴奇特的青龙、白虎、麒麟、凤凰浮雕和石刻楹联，三皇宫石门上有楹联：

① 《观稼楼记》碑。

② 《景谷县傣族彝族自治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676、686页。

③ 同②，第608页。

④ 据傣族学者刀永明先生回忆。



“千山都朝太阳殿，万岭拱贺太阴居。”这是研究道教传入傣族地区、云南历史上的移民问题的重要史迹。

#### 第四节 明清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

##### 一、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道教对云南人民的生活风俗等产生过较深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尚可觅见，现在云南彝族、瑶族等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中仍带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下面，我们根据史书记载及一些调查材料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清戴纲孙撰道光《昆明县志·风俗志》载：昆明人旧时举行丧礼只求奢华，“至崇信释道，建斋诵经，其风固大概相同也”。由此可知清时昆明人举行丧礼时多请和尚、道士来参与。今鲁甸县汉族人家死人时，也要请道士先生来为死者念“指路经”并制作灵牌位、引魂幡等，葬期也要由道士先生根据死者生卒年月日时推定；下葬时要请道士先生帮助选择墓地，葬完后又要请道士先生推测死者灵魂“回壁”的时间，以便家人届时恭候。<sup>①</sup>从中可见道教对云南人丧葬习俗影响之深。

道教的“三元节”在云南巍山彝族，洱源白族，耿马傣族及蒙自、开远、昆明等地的汉族中也颇盛行，

<sup>①</sup> 鲁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鲁甸县志·民族民俗志·汉族》，1991年3月。

只不过各地举办“三元会”的时间和内容稍有差异。如上元节：昆明地区汉族在农历正月十五庆祝天宫诞辰；蒙自县汉族在正月十五举办龙华会祭瑶池王母；耿马县汉族和部分傣族在正月十五举办地母会，拜地母娘娘；洱源县白族则在正月十五至二十二日举办上元会。又如中元节：昆明地区汉族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庆祝地宫诞辰；巍山县彝族在七月十五举办中元普度会；纳西族则在七月十一至十四日祭天、祭祖等等。<sup>①</sup>

除了“三元节”外，云南人民还在某些特定的日子举行崇道活动，形成了一些道教文化色彩很浓的岁时风俗。戴纲孙《昆明县志·风俗志》载：昆明人有元月九日谒城南之玉皇祠、二月三日谒宝成门外文昌宫及真武庙、二月十八日谒城东之东岳庙的习俗，“每岁以六月始朔日至六日礼南斗祈年，九月始朔日至九日礼北斗祈年”。王建《道教与云南民族岁时风俗》又记：丽江县大研镇纳西族每年二月初三庆文昌圣诞、六月二十四日庆关帝诞辰；大理白族则在五月十三日庆关帝诞辰、冬月十一日庆太乙诞辰；巍山彝族在正月十九日庆丘祖诞辰、二月初三庆文昌帝君诞辰、三月初三庆真武大帝诞辰、四月十四日庆吕祖诞辰，等等。

云南人民在举行崇道活动的同时，往往还举办大型的“庙会”，如巍山彝族的松花会（玉皇会）、文昌会、财神会、火圣会、灶君会，永仁彝族的火神会、魁星会，蒙自汉族的文昌会、巡天会、温天君会、举刀会（祭关羽）、松抄会（万仙团圆会），马关县的土地会、清醮会、都天会、南斗会、北斗会等等。举办“庙会”时，场面异常热闹，如马关县的“清醮会”：“每三年一举办，于二三月择吉行之，益为祈福消灾、

① 王建：《道教与云南民族岁时风俗》，《云南宗教研究》，1991年第1期。

祷雨祈年也。挨户捐资，无敢不出。请道士设法坛，本地经生设经坛讽经。醮期七日，以第四日行香为最热闹；行香抬瘟神像、灵官像出游，道士往各庙上香焚表以达建醮烦恼也。官绅士众，一体加入，衣冠整肃，各执信香；仪仗鼓乐导于前，道士神像殿于后，并有高台高跷、妆男扮女，百戏并陈。夜间，道士高步踏罡斗、破地狱，放烟火架，放孔明灯，以故城乡哄动、万人空巷……”<sup>①</sup>

此外，昆明、丽江、金平等地的彝、白、瑶、纳西、普米、傈僳等少数民族还有崇拜灶神、门神、财神等神灵的风俗，其中也明显有道教影响的痕迹，如金平瑶族《灶王歌》中唱道：“有人犯着灶中鬼，变成苍界上娘身。你若不信灶王鬼，两手把妥大腿根。鬼谷先生会点卦，占出五龙灶命神。有人杀猪去祭鬼，一时病患脱病身。”<sup>②</sup> 安宁彝族的门神多为秦叔宝、尉迟恭、赵子龙等；昆明西山区彝族祭财神时，须在其家门上挂一块正中画有“八卦”图形的红布，等等。

道教还对明清时期的云南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明清滇人著述书目》记载，这一时期云南有《道德经赞颂》及《庄子注》等书的出现，又有《洞天秘典注》问世，“多前贤未发之旨”，<sup>③</sup> 还有《大易集解》、《太极图衍义》、《河洛解》、《太极明辨》及《皇极经民心易发微》等易学著述四十余部。以上著述表明，此时云南学术界关于道家、道教的研究和认识已有较大的进步；关于道家、道教的研究乃是中国学术之一项重要内容，故可以说此时云南在这方面的

①（民国）张自明：民国《马关县志》卷四《风俗志·庙会琐记》，1933年石印本。

② 王建：《道教与云南民族岁时风俗》。

③ 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子部》，昆明：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本，1944年，第38页。

进步推动了云南学术的发展。

道教对明清时期云南儒释二教的影响实质上是宋代以来儒释道三教全面合流的一种反映。儒释道三教自汉魏以来就一直在斗争中相互吸取对方的长处以充实自己，至宋代就已形成了相互兼融的局势，明清时期的云南形势也是如此。此时的云南不仅出现了一些兼融三教义理的民间宗教组织，还出现了一些同奉儒释道三教圣人的宗教场所，如腾冲乌鸦山玉皇阁即如此。<sup>①</sup>

## 二、道教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道教对云南儒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些儒家人士接受了许多道教的思想，其典型者如李元阳。李元阳系大理人，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中进士，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主持校刻过《十三经注疏》，40岁后辞官归故里，属滇西名声显赫的“大儒”。他曾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响，如其《天地世界图序》在阐述宇宙之结构时曾说：“大约世界以须弥山为主山，形为世之杖鼓，上下阔而中细。小顶七宝所成为忉利天，上帝玉京在焉。三十二帝宫阙围绕之，道家所谓大罗天是已。山顶处为欲界十天；依实而往，欲界之上为色界十八天，又上为无色界四天，皆依空而住……”<sup>②</sup>这完全是套用了道教关于天地结构的说法。不仅如此，他还乐与道流交往，如四川道士邓豁渠人滇后曾得“李元阳馆之于三塔寺”<sup>③</sup>；又曾尽捐家资而修建了大理瑞鹤观，该观宏丽壮观，“不独为南中佳处，即寰

①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1048页。

② （明）李元阳：《李中溪先生全集》卷六，“云南丛书”重印民国三年（1914年）刻本。

③ 《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二》。

字名胜盖鲜其匹矣”<sup>①</sup>。到了晚年，李元阳还曾专心地修道求仙，颇有所得，如他在《答默泉吴尚书》中说：“仆今八十二岁，不自度德，以为神仙可觉而至，闭关内视，颇觉进益。”<sup>②</sup>隆庆年间，曾将售田所得五百金，全部捐出资助建造升真观，与道士往还频繁，时有诗文酬答，如《送道士》：“四海随双足，单身似片云。累功长合药，同俗未除荤。岁暮期重会，丹成约半分。已知心不挂，犹自惜离群。”<sup>③</sup>惟妙惟肖地刻画了飘飘欲仙的道家风骨。

另一典型人物是清代学者高翥映，姚州土府知府，幼嗜读书，过目成诵，平生著书八十一种，多属阐扬儒学者；其弟子成进士者二十八人，登乡荐者四十七人。《姚安县志》曾载他晚年结庐结璘山，号结璘山叟，日事道教丹铅之术，又言其于儒释性命、老庄哲理以及医占杂艺“皆能扫前人支离，自辟精义”，并著有《增订来氏易注》、《太极明辨》等与道教义理有关的书。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与佛教相互融合的现象也很普遍。从《徐霞客游记》所记云南各地的佛寺、道观的分布状况中可以得知：当时云南各地的寺观多交错分布而难分彼此的属地。如昆明太华山“梵宇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官）次第连缀”，宾川鸡足山佛教圣峰寺后有祀玉皇大帝的“玉皇阁”。不仅如此，寺观的住持者也往往难分僧道，如鸡足山碧云寺众僧之师所住之处竟为真武阁；漾濞县金牛屯玉皇阁初创于朱、史二道人，后则有“僧三贤扩而大之”。一些出家人所研习的义理也是释道相混，如鸡足山悉檀寺僧人的著作既有《禅宗赞

① 杨慎：《瑞鹤观记》，见《新纂云南通志·寺观三》。

② （明）李元阳：《李中溪先生全集》卷十。

③ （明）李元阳：《李中溪先生全集》卷一。

颂》，又有《老子元览》。<sup>①</sup> 又据《滇海虞衡志》载，平彝县（今富源县）有清溪洞，“洞口广延袤丈，有僧住持”，后此僧久不出洞，外人传说其已得道成仙了。<sup>②</sup> 从这个传说中可以得知当时的云南群众也往往是佛道不分的，由此可窥当时云南佛道融合程度之深。

此时的云南儒释道三教虽然融合程度较深，但它们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三者皆未放弃各自所奉的义理。相比而言，道教的势力虽不微弱，但却远不如儒释二家的势力强大。儒家深得封建统治者扶持，道教自然难与其匹敌；《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所录之书多为儒家作品而极少道家、道教门徒作品，表明道教势力确实远不如儒家强大。佛教曾得南诏、大理国及元朝统治者的极力扶持，其在明清时的势力也强于道教，如徐霞客所记云南各地的佛寺数目远比道观多得多，且其沿途的食宿也多是由僧人接待。道教宫观的数目不仅较少，且许多地方“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圯，令人怅然”，甚至一些宫观还被僧人占据，如剑川金华镇“宫中焚修者，非黄冠，乃瞿昙也”。在徐霞客所到各地中，唯有腾冲宝峰山的道教势力稍比佛教强大，徐还为此叹道：“他处皆释盛于道，而此独反之。”<sup>③</sup> 但总而言之，道教对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比较广泛和深远的。<sup>④</sup>

明清云南道教有两个特点：一是道人活动范围较广，道教影响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明代云南道教主要有武当道派、全真道天仙派、龙门派和长春派。在云南腹地 20 府和 1 个直隶州，除丽江、顺宁、永宁、

①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 716、892、885、1002、910 页。

② 宋文熙、李东平：《滇海虞衡志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2 月，第 26 页。

③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 993、953、1039 页。

④ 上述内容参见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第 311 页。

镇沅4府外，其他地区均建有道教宫观，在云南、大理、永昌和楚雄4府，设有管理道教事务的道纪司。<sup>①</sup>一些地方的习俗与道教影响有关。如昆明地区，人们习惯于春天出游踏青，二月二日谒龙泉观；三月三日朝南岳庙，并谒真武于西山罗汉寺或东郊鸣凤山金殿。在彝、白、纳西等民族聚集的地区，还有民间道士与信徒组成洞经会，在道教节日设坛做会。特点之二是著名道士活跃，各地多建道观。明洪武、永乐时，武当道派创始人张三丰一度至滇，吸收江南谪滇富户沈万三翁婿及其外孙女西平侯沐春夫人余飞霞等为弟子。<sup>②</sup>永乐时，全真派长春真人刘渊然谪居昆明龙泉观，滇人慕名“咸往求济”；刘后来受召回京“领天下道教事”，于宣德时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道教随之声望大振。<sup>③</sup>据记载，云南所建道教宫观，明代有103所，清代有142所，加上前代所建及年代无考的200余所，至清末云南共有道观465所。<sup>④</sup>云南道教的发展在明清时进入兴盛时期，并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较重地位。

① 天启《滇志》卷十七《寺观志》，卷五《建设志》，卷十六《祠祀志》，卷三《地理志》。

②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五十九《释道传》。

③ 《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④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第72页。

## 5

民国时期的  
云南道教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皇权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民国政府主张破除封建迷信，曾下令废止道教的部分神祠，道教遭到了打击，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及道教自身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中国道教急剧地走向了衰微。云南道教虽然也受到影响，但由于道教在云南近千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了自己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所以，民国时期道教在云南境内依然有各种活动。



## 第一节 民国政府的“神祠废存令” 对云南道教的影响

### 一、“神祠废存令”的颁行

中国近代史上，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上清帝书》的众多变法主张中，真正卓有成效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五月所上的《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他提出：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每乡必有数庙，每庙必有公产。他建议光绪皇帝改庙宇为学堂，以庙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欧洲，责令儿童六岁以上者都必须入学读书。并向清帝提出了“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的建议。光绪接纳了他的废庙办学主张，在1898年7月10日的诏书中提出“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这是“废庙办学”的开始。

民国政府成立后，主张破除封建迷信，江西都督府因此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取消了龙虎山上一道首领张天师正一真人封号。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道教天师曾为其大造舆论，袁世凯称帝后，曾封第62代天师张晓初为“正一嗣教大真人”号，重颁“正一真人”之印，赐其三等嘉禾章及“道契崆峒”匾额，发还天师府的田产，又使道教势力有所回复。随着袁世凯的迅速垮台，道教也因此受影响，当国民政府兴

师北伐时，张天师已无法呆在江西龙虎山而去上海藏身。从1924年起，中国各地的废除庙宇活动已十分活跃。宁波、海盐等地的庙宇均被一毁而尽。参与废除庙宇活动的主体是军人、学生以及普通青少年。

1927年，国民党总部曾三次派官员前往龙虎山上清宫清整天师道，中共党员邵式平会同贵溪县党部选派的江宗德等人，揭发了天师道的迷信活动，烧毁了万法家坛的神像，收缴了天师府的田租册簿、历代皇封银印及天师世传的玉印、宝剑等；当地群众还捉拿了天师张恩溥，并将其押送南昌，监禁于江西省农民协会<sup>①</sup>。

内务部于1928年12月向各地方政府发出了《神祠存废标准令》。19日，浙江省主席张人洁发布一则公告，其主要内容是该省得到内务部颁发的《神祠存废标准令》，要求贯彻执行。“标准令”指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愚民之政策，所有“为害最烈的淫邪神祠”，都必须彻底铲除。只有两类神祠可以保存：（1）先哲类，凡有功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等；（2）宗教类，凡神道设教，宗旨纯正，能受一般民众之信仰者，如释迦牟尼、地藏王、弥勒、观世音等。必须废除的庙宇也有两类：（1）古神类，即古代之科学未明，在历史上相沿崇奉之神，至今觉其毫无意义者，如日月星辰、火神、魁星、旗纛庙等；山川土地之神，如五岳四渎、东岳大帝、中岳、海神、龙王、城隍、土地、八蜡灶神、风雨云雷之神；（2）淫祠类，附会宗教，藉神敛钱，或依附木偶或沿袭《齐东野语》者，如张仙、送子娘

<sup>①</sup> 郭树森主编：《天师道》，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2月，第160页。

娘、财神、二郎、齐天大圣、瘟神、痘神、玄坛、时迁庙、宋江庙、狐仙庙，均应从严取缔禁绝。

《神祠存废标准令》下达时，政府也感到方案还不很周全，要求地方及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在这样一股波澜壮阔的废庙浪潮下，在那个时期，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并没有一定之数。一方面，还有众多神明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没有被列入“标准令”，不知该毁还是该存；另一方面，许多庙宇往往供奉几位甚至几十位神明，如果将一个庙的部分、甚至是主体废除，剩余的部分又如何处理？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许多历史悠久的神庙也随“淫祠”变成了废墟。<sup>①</sup>

云南省政府接到“神祠废存令”后，逐级下达，转发各县办理，也开展了废除淫祠，破除迷信的活动。另一方面，道教一大批神祠宫观及画符念咒活动被废止，民国时期的云南道教也因此进一步削弱。

## 二、云南历史上一次军警破除迷信的活动

云南第一次破除迷信的活动是军警先后拆毁神像。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共和政府建立后，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等开明思想在一些官员中传布开来。与此同时，不少官员认为寺观中的求神拜佛即迷信活动的反映，和尚和道士属于不劳而食的寄生虫，首先必须予以清除。于是，民国初，昆明负责城区治安的巡警局长吴焱，决定对管内一些香火旺盛，涉及迷信活动、妨害治安的寺观加以取缔、改良。从1912年的《滇南公报》可以看出，准备加以取缔或改良的“对

<sup>①</sup> 以上内容参见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西观藏书楼网站。

象”共有四处：城隍庙、东岳庙、土主庙和翠湖的莲华寺。道教的三座庙宇拟取缔，以佛家为主的莲华寺拟改良，即把寺中的佛道偶像移走，寺宇改成公园，使之和整个“海心亭”融为一体。

1912年3月初，吴垚派出警士，拆毁了东岳庙、土主庙和城隍庙部分神像，城隍庙准备改建“于公祠”。城隍庙中的铜质神像、城隍驾前的大铜香炉，送往钱局街龙圆厂销毁，改铸铜币。警方继之派出拘役人员多名，前往东岳等三庙，把拆毁的泥偶打碎，脱成土坯“以备建筑房屋之用”。由于是第一次破除迷信、拆毁神像，吴垚还有些保留，三级城隍神像没有毁坏，殿内多数泥像也保留着，拆毁的仅是两庑“七十二司”的形形色色的神鬼泥像。3月14日，都督府军务部次长沈汪度视察了城隍庙，认为破除得还不彻底。于是，派出兵士多名，把府，县城隍庙殿内全部神鬼泥像，一律打碎，都城隍的木雕像，则移送圆通寺保存，后又送往图书博物馆展览。

在雷厉风行地拆毁偶像之际，盛传城隍等三庙将被取消，另作他用，1913年9月。城隍庙两廊筹建成劝业场，东岳庙则改为织布工厂。民政司对破除迷信、拆毁神像没有意见，但接到心内恐慌的土主庙道人请求保留该庙的申请后，从保护古迹的角度着眼，他们建议保存元代遗存的土主庙。

警方取缔土主庙，也有充分理由。他们说，光复以前，每年六七月间，土主庙例有隆重的庙会，“男女混杂一处，日夜不休。神殿变为待合之所，斗姆翻作引线之人，败俗伤风，莫此为甚”。“后来经过严禁，这种情况才消除。唯以庙宇宽敞，闲房甚多，彩轿行、杉板行、同善堂、官痘局都设在庙内。自从艺徒学堂迁入后，土主庙更是有名无实了。”

民政司经过调查研究，最后通知地方行政主管云

南府：土主庙为古迹所有，应予保存，商业性质的彩桥行和杉板行，应当迁出；公益事业同善堂和官司痘局，照旧办公。至于庙中的道人，“可拨后殿左侧厨房三间，作该道人栖息之所。飭另行开门，免与学堂相混。”<sup>①</sup>

### 三、昆明实施“神祠废存令”与“庙产兴学”的经过

1928年，国民党政府发布了“神祠废存标准”，道教的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狐仙等神祠及画符念咒等宗教活动均在废除之列，仅有伏羲、神农、黄帝、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关帝、土地、吕祖、风雨雷神等神祠得到保留，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道教的发展。

昆明市也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令，于1930年下发了《昆明市应废寺庙僧道处理办法》，具体内容是：

一、凡核定废除各寺庙之僧尼道众悉依本办法处理之。

二、各寺庙之僧尼道众分别据住下列各地。

(1) 男僧集中西山华亭寺、太华寺、圆通寺、净业社、波若庵、地德寺等处住在。

(2) 女尼集中静定庵、延庆庵、普慧寺、佛应庵、圆照庵、涌莲庵、四官阁、法心庵等处住在。

(3) 道众集中三清阁、黑龙潭、虚凝庵

<sup>①</sup> 万揆一：《昆明掌故》，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3月，第153页。

等处住在。

三、以上地点某处应拨住若干人，由市政府酌量统筹分配以足敷住在为原则，僧道不得任意请求或拒绝。

四、僧道迁移时只准带其原有之家具什物，公物不能迁动。

五、凡废除寺庙清理所得田产房屋准提十分之三为该寺庙僧道之迁移费及生活费，均以一寺庙为单位，并一次拨给为限。

六、凡废除各寺庙其住持应交一切房产田产契据悉数报交市政府，如有隐匿推诿等情得扣发其生活费。

七、关于僧道管理由市政府另案统筹之。

八、本办法自核准之日实行。<sup>①</sup>

1936年3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令昆明市市长翟翬：“查本市各已废寺庙之屋宇产业，除曾经先后拨交如机关管业应用不再置议外，所属庙产向未清理，应由市政府即日加以清理呈报后即一并拨交该府管业，作扩充市教育经费之用。”<sup>②</sup>这便是云南佛道教都经历了的“神祠废存令”及“庙产兴学”运动。

10月云南省政府《关于修建、清理庙产的指令及市立小学呈报庙产调查情况和寺庙产业调查表》：“查清理本市庙产一案。业经由府制订调查表式，分令市立各校遵照详查填报……现已汇毕，将各寺庙约分为十方丛林、子孙丛林、为行公有、地方公有四项，计僧尼道众三百七十九人，产业共约值新币捌拾陆万贰千伍佰叁拾元。并将已收归公有者，及卖给私人者，

<sup>①</sup> 《昆明市应废寺庙僧道处理办法》，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教育局档案，32-18-24。

<sup>②</sup> 《云南省政府训令》，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教育局档案，32-18-24。

并拟订庙产处理办法七条，签请钩核！查监督寺庙条例对于宗教寺庙有保护之责，僧侣于寺庙产业亦有继承之权与淫祠邪祀有别，似应分别办理不能一概没收。”<sup>①</sup>由此可看出，当时清理寺庙的人数、财产数量和寺庙状况。

随即颁布了《昆明市区以内各项寺庙祠宇庵观遵照部令暨省令将应行废除者》<sup>②</sup>，其中说明了即将废除的 61 所寺观的当时概况和废除理由：

### 第一区：

#### 1. 财神宫

（概况）该寺在南城高山铺财神宫前巷内，住有男僧四人，有殿宇十间，房产十四间，均租予人住内供财神及送子观音，该寺其东门外昙华寺系属一家。

（应废理由）该寺所供神佛均在部令所指废除之范围内，自应依淫祠例废除。

#### 2. 老郎官

（概况）该官在南昌街有殿宇三间系由伶界雇人看守，有房产十四间现租予人，内供老郎神像。

（应废理由）该官所供老郎原属伶人所附会，自属邪祀之一，拟作建筑威远小学之用遵照部令及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房产照案清理。

#### 3. 星君殿

（概况）该殿在南城脚，内住尼僧三人，有殿宇十四间，出租与人，内供星君神像，门外所悬匾额已匿置。

① 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教育局档案，32-18-24。

② 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教育局档案，32-18-307。

(应废理由) 该殿所供星君莫可稽改, 意属道教, 所附会性质与部令所载风云雷雨诸神相属, 崇祀理由毫无意义, 应遵省令第三项办法绝对废除之。

#### 4. 吉祥庵

(概况) 该庵在南门万钟街吉祥庵巷, 内有女尼十人, 有殿宇十八间, 除自住外, 余作为吉祥小学校址, 又有房屋五间、田三十亩, 均出租。

(应废理由) 该庵已作学校校址, 为市教育必需地点, 况僧俗混处, 亦属管理不便, 应照第四项办法依已废例正式废除, 永作该校校址, 田产照案清理。

#### 5. 白衣庵

(概况) 该庵在登仕街, 内住女尼四人, 有殿宇七间, 除自住外余皆作为威远小学, 有田三亩六, 均出租, 内供观音等像。

(应废理由) 该庵所供观音, 虽属宗教, 然以地势需要已为威远小学校址, 拟照已废例, 予以废除, 田产照案清理。

#### 6. 福国庵

(概况) 该庵在登仕街, 内住女尼四人, 有殿宇八间, 除自住外, 均作为威远小学, 有房产二间、田二亩, 均出租, 内供观音。

(应废理由) 该庵与白衣庵比邻, 自作为学校后香火已断, 且该校学生拥护添班则无教室, 正应并同收用以利教育, 亦照第四项办法已废例, 收用之所有产业。

#### 7. 远镇庵

(概况) 该庵在景星街文化巷, 内住女尼十一人, 有殿宇十间, 并有房产一间、田



十五亩，均出租，内供文昌等神像。

（应废理由）该庵所供文昌古神已在部令（一）项（甲）类内明载废除之列，且该尼等已将庙产抵押与解姓，自应即予废除，将所有田产照案清理。

## 8. 天宁寺

（概况）该寺在南城脚天宁寺巷，内住女尼六人，有殿宇十间，外有房产三间，出租予人，内供送子观音像。

（应废理由）该寺所供送子观音，利用一般侧重宗嗣心理，以送子之魔力相号召，实属迷信麻醉社会，殊非佛学正宗，适与省令第二项之规定相符，应予废除，房产照案清理。

## 第二区：

## 9. 土主庙

（概况）该庙在武成路土主庙巷，内住道士七人，有庙宇十间，前部系借与慈善会，中部自住，后部系仓房，又有房产八间、田七亩，俱出租予人，前殿供明天大帝，后殿供土主。

（应废理由）该庙所供明天大帝暨土主神像，其性质与部令废除神祠标准古神类乙项山川土地相属，亦为邪祀，又该庙早经办理华山小学多年，自应参照部令及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产业照案清理，且使原办学校得以永存。

## 10. 永国庵

（概况）该庵在武成路永国庵巷，内住男僧五人，有殿宇两院，除自住外，半作慈善会地点，半为防空情报处，内供佛教佛像，

有田七亩出租。

（应废理由）该庵在前曾经呈准废用，一部分以作华山小学添班之用，照省令第五项办法应废除之。

#### 11. 紫衣庵

（概况）该庵在武成东路，内住女尼六人，有殿宇八间，除自住余租予二区公所，有田十三亩六应出租，内供观音。

（应废理由）该庵已改为民房形势，已非寺庙，而地居市街中心不宜于静修，所住之女尼亦不修持，应遵照省令第四项办法照案废除清理之。

#### 12. 太平庵

（概况）该庵在马市口下五华坊，内住女尼八人，有殿宇十间，除自住外余出租，内供释迦观音等佛像。

（应废理由）该庵所供佛像虽属应存，然以地居市区中心，系女尼住持所租，住户多系轿夫并寄存寿材，出入之人极其复杂，该尼等只图牟利，已悖修持之旨，拟依省令第四项办法废除之。

#### 13. 准提庵

（概况）该庵在大东门内迎恩街，与东升小学为毗邻，内住尼僧数人，有殿宇十一间，内供准提。

（应废理由）该庵与东升小学毗连，且该住持有借水井惑众之事实，依部令废除标准（一）乙项之规定拟收作幼稚园。

#### 第三区：

#### 14. 土主庙

（概况）该庙在莲华池，内住尼僧三人，

有殿宇十七间，除自住外，余作警察分驻所及莲华小学地址，有田三十亩出租与人，内供土主、伽蓝等神。

（应废理由）该庙性质与前条相同，自应一律废除，再以警所、学校均已在内，更宜正式收用，俾作正项用途，田产照案清理。

## 15. 大德寺

（概况）该寺原在双塔寺，嗣因收用办学，乃由僧人等迁住于青云街妙法庵，仍保其原名，内住男僧九人，殿宇二十一间，除自住外，连同田三十二亩均租与人，内供佛教佛像。

（应废理由）该寺在前既经收用自属已废，所有田产尚应照案清理，乃自迁入妙法庵后因建筑圆通小学呈送省府核准，并同祝国庵同时收用，乃竟一再抗不迁移，应照第四、五两项办法废除照案清理，仍遵前令迁出。

## 16. 三皇庙

（概况）该庙在钱局街白衣庵巷，内住女尼七人，有殿宇三十六间，除部分为承华小学校舍，一部分自住及余出租，有房产五间出典，田三十亩出租，内供三皇古神。

（应废理由）该庙内供古神，依省令第三项办法“因科学发明已无崇拜意义者仍应废除”之规定，则该庙正应废除，且已为学校住在地，若令保存殊碍教育，应即绝对废止，永作学校校址，且备将来扩充班次，所有房产照案清理。

## 17. 斗姆阁

（概况）该寺在北门外莲花池，内住女

尼四人，有殿宇十间，又有田七亩出租，内供斗姆神像。

（应废理由）该寺所供斗姆原为道家所附会，系属邪祀，应照省令第三项办法之规定一律废止，田产照案清理。

#### 18. 福德庵

（概况）该庵在文林街民强巷，有殿宇七间，除自住外余出租，内供土地等像。

（应废理由）该庵所供土地适与部令废除神祠标准古神类乙项之规定废除。

#### 第四区：

#### 19. 财神殿

（概况）该殿在裕丰街，有殿宇三间，现作大观小学分校，并有房产九间出租与人，内供文武财神。

（应废理由）该殿性质属于迷信，已载在部令淫祠类例应废止，且已办有小学，与省令第二、五两项原文相符，应即废除之。

#### 20. 药师院

（概况）该院在龙翔街，内住男僧四人，有殿宇十九间，除自住外，余租予警察分驻所，有房产四间亦出租，内供药师神像。

（应废理由）该院所供药师在迷信之列，且大西门无市立小学，以此地创设为宜，依部令说明“因科学发明无崇祀必要”之规定，已符省令第三项办法决予废止。

#### 21. 太乙庙

（概况）该庙在小西门外，殿宇九间已改建为大观小学，有房产十七间尚未清理，神像已毁。

（应废理由）该庙殿宇在前已经收用改

建大观小学校，惟产业尚未正式清理，应照第三项办法正式并同宣布废除，然后再行并案清理。

## 22. 三圣庵

（概况）该庵在小西门外瓦仓庄，内住女尼十一人，有殿宇十八间，又有田四十三亩出租予人，内供释迦佛。

（应废理由）该庵名为三圣而内只供释迦，名实显不相符，实系借名掩护，适与省令第二项原文所指相符，应予废除之，田产照案清理。

## 23. 三光庵

（概况）该庵在小西门外大观街，内住女尼四人，有殿宇十六间，除自住外，余作为大观小学分校校舍，有田六亩出租，内供观音。

（应废理由）该庵所供佛像虽应保留，然以专祠太多不宜到处供奉，况已作为学校校址，应依省令第五项之规定移归正用并予废除，正式收用以利教育。

## 24. 佛来庵

（概况）该庵在裕丰街，有房产九间出租。

（应废理由）该庵虽住持房产租金系地方收取，殿宇佛像及住持等均无，与已废性质相同，应依省令第四项办法收作正用。

## 第五区：

## 25. 羊神庙

（概况）该庙在书林街，内住男僧二人，计有殿宇十四间，又有房产十五间出租予人，内供羊神又名鬼宿祠，现办书林小学。

(应废理由) 该庙所供羊神全属邪祀, 依部令所指废除神祠标准淫祀类第(2)项内列狐仙齐天大圣等性质相同, 且已办小学多年, 遵照省令第二、五两项办法应废除。

#### 26. 西天台

(概况) 该庙在南门外三楼桥村, 内有女尼二人, 计殿宇七间, 除自住外余办吴溪小学分校, 内供天子神像。

(应废理由) 该庙所供天子全属无稽, 抑亦一般迷信之徒所附会, 毫无崇祀价值, 故本府在前曾拟提前收用, 后据吴溪小学呈报该尼等不守清规等情, 曾经函警至拿内有案, 嗣以学校需用不能一再姑容, 经令校查明内住租户, 押金数目由府如数垫发去讫, 现为租户虽已迁出, 而尼僧仍在, 值兹章令严拟清理, 该庙性质暨于省令第二项办法, 又经第四项所指条文自应绝对废止, 并勒令该尼等速迁, 以利教育而免妨碍。

#### 27. 西寺

(概况) 该寺在东寺街西寺巷, 内住有男僧三人, 有殿宇七间, 有田九十二亩出租予人, 内供天王。

(应废理由) 该寺所供天王全属邪祀, 与部令所指(1)项(乙)类为神性质相同, 虽有其他佛像不遍, 附祀于内借此掩护, 应遵照省令第二项办法废止之田产照案清理。

#### 28. 五岳庙

(概况) 该庙在南门外双龙桥, 内住男僧五人, 有殿宇十八间租与人堆货, 有田七亩亦租与人, 内供五岳大帝。

(应废理由) 该庙所供神像已在部令

(1) 项(乙)类内指定应废除之列,该庙住持将殿宇租予人堆货希图渔利,殊违清修之旨,应依省令第二、四两项办法绝对废除之,田产照案清理。

### 29. 香海庵

(概况)该庵在南门外石桥铺,内住男僧五人,有殿宇四十间,又有田二十亩出租予人,该庵前供猪神,现已无存,系猪肉业管理。

(应废理由)该庵虽属肉行会公有,然系空闲且崇奉之神,全属邪祀,依部令所指废除神祠标准淫祠类第(2)项性质相同,应在废除之列,即依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之,田产照案清理。

### 30. 北岳庙

(概况)该庙在南门外北岳庙村,有殿宇五间出租与人,内供北岳大帝。

(应废理由)该庙性质与南岳庙完全相同,应依部令暨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

### 31. 西岳庙

(概况)该庙在南门外西岳庙村,内住女尼二人,有殿宇十间、房产二间,田三亩均已出租,内供西岳大帝。

(应废理由)该庙性质与南岳、北岳两庙亦全相同,自应遵照部令暨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之,所有田产悉数清理。

### 32. 阿姑神庙

(概况)该庙在南门外柳坝村,内住女尼二人,有殿宇十八间,田二亩均出租予人,内供阿姑神像。

(应废理由)该庙所供阿姑全属邪淫之

祀，与五灵庙等性质相同且富有迷信色彩，自应遵照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之，田产照案清理。

### 33. 炉神官

（概况）该官在金碧西路，系由铜活业管理故亦名铜活会馆，现同业每人互争，内供炉神、矿神、财神等牌位。

（应废理由）该官所供神位一属邪祀，依部令所指（1）项（甲）类水火诸神正属性质相同，已在应废之列，并据报该官管理人私行拍卖，曾经出示禁止在案，刻拟为吴溪小学增加班之用，依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收归公有。

### 34. 财神官

（概况）该官在书林街，住有道士四人，有殿宇七十间、田四亩，均租予人，内供财神像，系由银钱业管理。

（应废理由）该官与其他财神殿、财神庙性质相同，均属部令所指应行废除之邪祀，自应遵令废除，且查该宫殿宇甚多，钱业管理用途不正，应移作教育机关田产，应并同清理。

### 35. 芙蓉会馆

（概况）该会馆在鱼课司街，有殿宇十七间，租与均益公司，有房产二十五间亦均租予人，内供财神，现由前营特货业人管理。

（应废理由）该会馆所供财神与其他财神庙性质相同，已在部令所指应废之列，况自烟禁严厉须行，该项营业已绝对禁止，自无成立公会之必要，是宜悉数清理收归公有，用济教育正用。



## 36. 灶君庙

(概况) 该庙在南门外黄瓜营, 内住男僧四人, 有殿宇二十六间, 又有田产五亩出租予人, 内供灶君神像。

(应废理由) 该庙所供灶君神像与部令废除神祠标准古神类制止在案, 似此情形更已合于第四项办法, 决予废除, 作速清理, 永为该校校址。

## 37. 玉皇阁

(概况) 该寺在凤翥村, 内住道士四人, 有殿宇三十六间, 除自住外余租给纺纱厂, 有田十亩出租, 内供玉皇神像。

(应废理由) 该寺所供玉皇亦为无稽, 迄今时代演进已无奉祀必要, 应遵省令第三项办法废除之, 田产照案清理。

## 38. 真庆观 (系六区)

(概况) 该寺在三元街, 内住道士三人, 有殿宇七十二间, 大部均出租给丽日火柴公司, 并有房产四间、田多亩, 均出租, 内供紫微大帝、吕祖等像。

(应废理由) 该寺所供紫微大帝全属道家附会, 无史籍可考, 绝无崇祀价值, 应照省令第三项办法绝对废除之, 且其殿宇广阔, 正应移作正用。

## 39. 小东寺

(概况) 该寺在书林街, 内住男僧三人, 有殿宇七间, 除自住外余出租, 又有房产十间、田四十亩均出租, 内供文殊、观音等佛像。

(应废理由) 该寺虽属宗教供奉, 然以观音等佛像少专祀, 且僧人只图渔利, 早经

管为民房，已失去宗教修行意义，依省令第四项办法，自应废除移作正用，产业照案清理。

#### 40. 千佛寺

（概况）该寺在书林街，内住道士六人，有殿宇九间，除自住外，余出租，有田五十亩亦出租，内供各种神佛像。

（应废理由）该寺情形与小东寺相同，若任该道士等随意处置，已失去宗教意义，实与信仰宗教之旨相背，依省令第四项办法应即一律废除，田产照案清理。

#### 41. 佛居庵

（概况）该庵在顺城街，内住女尼四人，有殿宇十二间，房产四间均出租，内供古庭祖师及观音佛像。

（应废理由）该庵虽供有观音佛像，但实则以前庭祖师为主，观音不过藉以掩护，实与省令所指第二项原文相符，正应一律废除，产业照案清理。

#### 42. 菩提庵

（概况）该庵在巡津下街，内住女尼八人，有殿宇十二间，除自住外余出租，有田三十亩亦出租，内供文殊、普贤大帝等佛像。

（应废理由）该庵虽供有大佛例应保存，然该尼等已将多数殿宇租作住户希图渔利，僧俗混处已失清修意义，适与省令第四项原文所指相符，应予废除，田产照案清理。

#### 43. 法心寺

（概况）该寺在前卫营，内住女尼三人，有殿宇十四间，除自住外余作为尚义小学分校校舍，有田二亩亦出租，内供文殊、普贤

等佛像。

(应废理由) 该寺所供文殊、普贤他祠不可专祀，况已作学校校址，应依第四项办法照已废例正式收用，永作该校校址，并清理此田产。

#### 44. 朝阳庵

(概况) 该庵在新桥村，内住女尼三人，有殿宇十二间，除自住外余作为新桥小学校舍，有房产五间、田三亩均出租，内供送子观音。

(应废理由) 该庵所供送子观音理由已详前文，原为附会迷信，应照省令第三项办法之规定废止，再已作为学校校址，更应正式收用，以备扩展班次，产业照案清理。

#### 45. 大梵宫

(概况) 该宫在南门外大梵宫村，有大殿五间租予居民、工厂，已无住持供奉香火。

(应废理由) 该宫既无住持供奉香火，正与已废性质相同，况已全部出租，失去庙宇本质，应依省令第四项办法收归公有以作正用。

#### 46. 三皇宫

(概况) 该宫在南城外石桥铺，内住道士六人，有殿宇七十五间，除自住外余已作为市立中学校舍，有田七亩出租，内供三皇神像。

(应废理由) 该宫已作市中校舍，已全部兴修，耗费巨款，且其他居僻静，正适宜于教育学子，应照省令第三项办法办理。

#### 47. 大东寺

(概况) 该寺在鱼课司街，内住男僧十

九人，有殿宇二十一间，除自住外余为崇仁小学校址并出租予人，又有房产一百间、田七十亩均出租，佛像已毁。

（应废理由）该寺属于佛教供奉，但佛像已毁，且为学校住在地已有多多年，事实上已久废除，应依省令第四项办法废除之，产业照案清理。

#### 48. 孚佑宫

（概况）该宫在南门外玉溪街，有道士一人，殿宇三十一间，作为忠爱小学校址，有房产二间已闻有议售情事，内供吕祖，属于布行会馆管理。

（应废理由）该宫所供吕祖原属古神，嗣为道教所附会，凡乩坛之地胥多供奉，依省令第三项办法正应绝对废除，再以近为忠爱（小学）扩充班次，正在商议扩用殿宇，突闻该布行有盗卖房产情事，当已一面。

#### 第六区：

#### 49. 灵光寺

（概况）该寺在小东门外灵光街，内有殿宇十五间，前殿系供马天君，为警察分驻所借住，后殿供送子娘娘，为桃源小学校舍，看寺人仍住寺内，并有房产六间出租与人。

（应废理由）该寺所供神像概属邪淫之祀，正在部令（2）项淫祠类所刊载，应即遵照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且为全寺舍宇已办学校，应即废除。

#### 50. 南岳庙

（概况）该庙在南门外南岳庙村，内住男僧八人，有殿宇二十一间、田七十亩均租予人，内供南岳大帝。

(应废理由) 该庙所供神像已在部令(1)项(乙)类内明定废除,亦属邪淫之祀,应遵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止之,田产照属清理。

## 51. 灶君殿

(概况) 该殿在凤翥村。

(应废理由) 该殿所供灶君与灶君庙性质相同,理由详前,应一律废除。

## 52. 三元宫

(概况) 该宫在三元街,有道士四人,殿宇三十九间,又有田四十亩均出租与人,内供杨泗将军。

(应废理由) 该宫所供杨泗将军性质与部令(2)项淫祠类所指为寺相同,应在废除之列,现已改为古幢小学,依省令第二、五两项办法绝对废除,田产照案清理。

## 53. 土地庙

(概况) 该庙在福德街,仅有殿宇一间,内供土地神像。

(应废理由) 该庙所供土地在部令(1)项(乙)类内已明载废除之列,虽仅殿宇一间,然在市街中心不宜有此,应即取缔,遵照省令第二项办法废止之。

## 54. 土地庙

(概况) 该庙在小东门外菜园,有殿宇七间出租与人,内供土地神像。

(应废理由) 该庙所供土地在部令(1)项(乙)类内,已明载废除,应遵照部令及省令第二项办法绝对废除。

## 55. 杨泗庙

(概况) 该庙在南门外吴井桥,内住男

僧二人，有殿宇二十二间，又有田十亩出租予人，内供杨泗将军，近有清油业暨立清油会馆，名称尚待查究。

（应废理由）该庙所供杨泗将军神像与三元宫相同，应遵部令及省令第二项办法废除之，又查吴井桥已将开拓新市场，尤应趁此收用，备作将来正项用途，田产并予照案清理。

#### 56. 斗姆阁

（概况）该寺在南门外聚奎街，内住道士二人，有殿宇七间，现作聚奎小学校舍，又有房产十间、田十五亩，均出租与人，内供斗姆。

（应废理由）该寺所供斗姆系属道教附会，自属邪祀，且久已成为学校住在地，应依省令第三项办法决定废除，永作学校校址，产业照案清理。

#### 57. 普照寺

（概况）该寺在三元街玉川巷，内住男僧三人，有殿宇三十四间，前院租与民生火柴公司，后院则作为古幢（小学）分校，有房产七间出典，田四十亩出租，内供关圣及文武财神等像。

（应废理由）该寺所供神像除关圣已有专奉祀外，其财神一项已属邪祀之列，已办有学校，应依部令及省令第二、五两项办法绝对废除之。

#### 58. 药王庙

（概况）该庙在南门外太和街，内住男僧十人，有殿宇十八间，除自住外余作第六区公所住地，有房产十二间、田七十亩均出

租，内供药王神像。

（应废理由）该庙所供药王已无崇祀必要，理由详前，应遵省第二项办法废除之，产业照案清理。

## 59. 青帝宫

（概况）该宫在桃源街，内住道士五人，有殿宇十一间，后殿为咸和小学分校校舍，前殿为道教集会会所，有房产十八间、田二十亩均出租，内供青帝，现托称老君。

（应废理由）该寺虽属托称老君，但其名称系青帝宫，实系道教附会，且既为学校校舍，应照省令第五项办法之规定全部废除，物产照案清理。

## 60. 青门寺

（概况）该寺在小东门外青门寺巷内有殿宇十八间，田六亩刻已收作桃源小学校址。

（应废理由）该寺建立已久，佛像多朽败已收为桃源小学校校址，乃一经访查该寺住持意有盗卖庙产情事，乃依省令第四项办法绝对废除之。

## 61 元吉庵

（概况）该庵在南门外白塔巷，内住女尼一人，有殿宇三间、房产十一间、田六亩，均出租。

（应废理由）该庵并非宗教专祠，所供佛像为庙均有，已无保存必要，应并同已废寺庙一律清理。

以上是昆明市政府根据“神祠废存令”列为废除的寺观共 61 处，从这份资料中也可看到民国时期这些寺庙中的常住人口、庙产和供奉神像。这也是一份研究民国昆明市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的重要史料。

#### 四、昆明道教自办学校

云南道教界自身也在积极参与“废产兴学”的运动，并主动要求废寺办学。他们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为立国之本，其盛衰消长关系于民族之隆替安危，社会之治乱文野者，至重且钜。有完备之教育斯能造就高尚之文化，养成健全之国民，有健全之国民始能跻国家于强盛，登人民于衽席”。而且，当时的“德法复兴以教育发达而称雄世界，日本维新以学校完备而独霸东瀛，欧美各国之以教育发达而强盛，文明者既已比比皆是”。认为“宗教为社会教育之一，道教宗旨首在提高民族文化，责无旁贷，分所当为”。他们看到了云南教育的落后，也看到当时昆明“一般家事贫寒之儿童，仍为环境所限无力就学，失学儿童所在多有”。于是昆明道教会于轩辕官成立育英小学，“收容市内家事贫寒无力就学之儿童及所属各寺庙道童入校攻读，书籍由校供给，学费一概不收”。

1938年2月，昆明市道教会常务委员郑教坤、杨正雄、陈忠安的《一件呈报属会成立小学一所祈监核备案》<sup>①</sup>记录了此事，其内容是：

为呈请监核俯准备案事，窃查教育为立国之本，其盛衰消长关系于民族之隆替安危，社会之治乱文野者，至重且钜。有完备之教育斯能造就高尚之文化，养成健全之国民，有健全之国民始能跻国家于强盛，登人民于衽席。德法复兴以教育发达而称雄世界，日本维新以学校完备而独霸东瀛，欧美各国之

① 昆明市档案馆藏，云南省民政厅档案，1938年，11-10-7。



以教育发达而强盛，文明者既已比比皆是，即在吾国史垂自秦汉以降历代之以文物进步盛极于时，声震中外者，亦皆斑斑可考。是故处于今日科学发达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竞争激烈之世，欲谋我国家民族之强盛独立，社会民生之乐利幸福者，实非努力于教育之普及不为功。云南僻处边隅，交通梗阻，思想蔽塞，百姓落后，文盲人数向较他省为多。十余年来以我政府当局之努力，本省教育之发达及学校数量之增加，虽已日进千里什倍从前，但一般家事贫寒之儿童，仍为环境所限无力就学，失学儿童所在多有。职会成立之初，有感于此，即拟筹设学校广为作育，努力于社会教育之推进，藉以少补官立学校之不足。盖以宗教为社会教育之一，而道教宗旨首在提高民族文化，责无旁贷，分所当为。方令训政建设百度维新，复值我政府施行新政，图治励精，普及教育当务之急，职会同入及所属各庙道众有鉴于教育救国之重要，公同节衣缩食，力事俭约，筹获的款作为永久基金。拟就省会南海子边轩辕宫内，创办育英小学一所。专以收容市内家事贫寒无力就学之儿童及所属各寺庙道童入校攻读，书籍由校供给，学费一概不收。一切校内章则、悉遵中央部颁条例办理，一俟稍有成效，即当继续推广扩充。俾本市贫寒人家子女，得有就学上进之机会，藉以少尽匹夫有责之义，现正积极筹备。不日即可正式成立，除分呈

教育厅市政府省市党部外，谨此报呈，  
伏乞

钧厅监核俯准备案，以便遵行，并祈  
指示只遵实为公便谨呈  
民政厅厅长丁。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南道教 组织及规章制度

民国年间，道教为适应社会的变化，也曾仿效西方教会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教会体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民国元年（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道教会，即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前者发起人和领导人清一色的是各地全真道的住持，所以，这只能是全真道的全国性组织；后者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本部，在上海总机关成立，参加成立大会者有数千人，并有外国传教士李佳白参与，希望重建具有权威性的正一道全国性组织。两大道派组织，都各自制订了一套复兴道教计划，但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权威领导，因而未能形成从上至下的组织系统，也未能开展有影响的活动。但是，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因此纷纷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道教组织，如沈阳太清宫的“中国道教会关东总分会”、西安太仙宫的“陕西道教会”以及“湖南道教会”、“湖北道教会”、“杭州道教会”等等。<sup>①</sup>

<sup>①</sup>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346页。

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也成立了各级道教组织，而且，在民国期间这些道教组织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内部，一直开展各种活动。

民国元年，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令巡警局将城隍庙正殿改名为忠肃庙，并将两廊神像销毁改为市场。云南省道教会在昆明市大东门外卖米巷青帝宫成立，会长为昆明金殿住持杨智聪。

1924年前后，中国道教总会云南支部在商埠一区二段三元上街三元宫成立，以阐扬道教为宗旨，附设道教研究所。当时昆明市有道士约数十人，所住宫观十余所，如近郊之三清阁、太和宫、龙泉观、虚凝庵、真庆观等为其最著者。<sup>①</sup>

云南省道教会于1931年改组为昆明市道教会，并于1932年8月由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召集全市道教会员大会，投票选出邓教坤、杨正雄、杨智聪、陆忠安、马坤为第一届执行委员，赵诚兴、廖绍熠、李桂荣为监察委员，陶明义、李增华为候补监察委员。9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正式成立，被选委员举行宣誓就职典礼，会址在大东门外桃源街卖米巷青帝宫。制定《昆明市道教会宣言》、《昆明市道教章程》。1933年9月1日昆明市道教会会址迁至拓东路都雷府内。1941~1943年之间，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本会会址设在本市土主庙街老子祠内。

1940年8月5日，昆明市道教会在土主庙街老子祠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改选大会，遵章改为理监事制，邓教坤任理事长，吕智贵、李权茂任常务理事，清修膺教会员共计107人。1943年11月16日，昆明市道教会在昆明拓东路都雷府内进行第四次改选，刘理正为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第四届职员理事长，常务理事

<sup>①</sup>（民国）张维翰、童振藻等纂辑：民国《昆明市志》，1924年铅印本。

张子乾、王嘉荣，理事杨坤、李松茂、杨正雄，监事吕智青、张性惠、宋锐。

1946年由“昆明市道教会”发起“五教提度大会”，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人士共同超度抗日英烈。1946年12月13日，在拓东路真庆观侧都雷府内，举行第五届理监事改选大会，张子乾当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邓教坤，理事杨合明、张性惠、刘理正、尹诚仙、陈性源、李松茂、李兴堂、杨坤，候补理事王嘉荣，监事杨正雄、吕智贵、宋德信，候补监事李锐。

民国时期在云南各地亦有道教会成立。1918年，宜良县道教会成立，会址在东岳庙，王缘仁为会长。民国《宜良县志》记载了当时情况：“昔有道会司，道会即诗礼之家，亦多延道设坛，作诸斋醮者。今则改设道教会，大都有名无实。合邑道徒，约共百余人。”<sup>①</sup> 1943年1月25日，宜良县道教会在东岳庙成立，李森任理事长，杨春华、张映川任常务理事，会员41人。其工作重点是团结教徒研究道义，协助政府从事抗战建设工作。1946年3月21日，宜良县道教会在县城内观音阁举行改选，理事长为吴朝铭，常务理事杨春华、王家骅，会员56人。本届重要工作是奉行三民主义，恢复固有道德，实行新生活节约建国，并随时研究本会教理，力谋本会福利。

1932年10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道教总会令饬保山组织成立道教会，刘永诚任会长，石至远任副会长，开辟城内太保山太清宫为会址。制定《保山县道教会宣言》、《保山县道教章程》。1944年11月保山道教会在太保山老君殿成立，理事长为魏廷熙，常务理事为

①（民国）王树槐修，许实纂：民国《宜良县志》卷九下《道观》，1921年铅印本。

李荫棠，主要工作是推进道教文化事业。1945年2月保山县道教会换届改选，李荫棠任理事长，魏廷熙为常务理事，参会会员61人。其工作重点为筹组旺八乡分会，并清理太清宫庙产，以作道教会基金。

1936年12月8日，个旧县道教会于个旧六合巷成立，理事长彭正清，常务理事蒋宗祥、杨至禹，会员43人。

1938年顺宁（今凤庆县）始成立道教会分部，会址设于顺城内廉贞观，统顺、云、缅三属。1944年，顺宁道教会分部改组为常务委员会，推选乾道四川人朱至安为会长。1947年8月31日，云南省道教会缅宁（今临沧市临翔区）道教分会举行成立大会，理事长阮来庆，常务理事欧教悟、游教缘，乾坤道会员共计132人。<sup>①</sup>

除上述各地道教的活动外，大理、丽江等地的火居道士也未停止过活动。民国年间红河县道士多属火居道士，较有名的有思陀的龙尤，迤萨的宋汝州、赵平昌、郭品、白水生等，一般法事是为人消灾做课、打醮、画符、还愿超度、行丧事。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瓦渣土司钱祯祥聘请建水“朝阳学会”经师1人、乐师2人到瓦渣，在甲寅文昌阁组织“建璋学会”，教授洞经音乐60调，有传统乐谱合乐配经，有老子的《道教经》、《三洞经书》、《太平经》等。<sup>②</sup>

民国时期，云南最活跃的当推各地的洞经会。这一时期，昆明地区有崇仁学、宏仁学、宏文学、同仁学、齐礼学、保庶学、上九会、元会经坛，大理地区有宏仁学、礼仁学、感应会、尊圣会、福像会，曲靖地区有安庆堂、广化堂、忠心堂、辅元堂、万花堂、

① 以上资料均来自云南省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收藏民国档案。

② 郭纯礼等编著：《红河土司七百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6月，第258页。

165

① 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第678页。

## 6

当代云南道教的  
恢复发展第一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云南道教的新生

## 一、古老道教的新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教作为五大宗教之一，享有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时代思想，新的国家体制与随之而来的经济、文化思想的变革与进展，必然会直接影响广大的道教徒和古老的道教。新中国的道教徒可以保持宗教信仰，可以沿袭教制而保持规范，但在建设新中国的社会活动中必须同全国人民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

主义道路。道教适应新社会的要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新的生命。

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的革命运动中，道教界基本与全国人民在步调上保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在各方面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政治态度上的根本转变。道教有“不食人间烟火，哪管朝代变迁”之说，以示超脱尘世，不问政治。其实在社会生活中，无一人能脱离现实的政治。以道教教义来说，所奉行的经典便有不少论及政治，如《道德真经》便有议论人君南面之术，《太平经》也谈治平之道，所以中国道协第二届会长陈撄宁说：道教主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以处世，道众关心国家时事，以追求、创建太平国土为理想。

其次是宫观经济的重大改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及继之而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经济方面对道教宫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有较多土地、房产收租的十方丛林，以及少数不事生产劳动的子孙庙，多余土地被政府没收，房产被统管，政府对常住宫观的职业道士也同农民一样分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以便他们组织生产，自食其力；再者，新社会兴起新风尚，进庙的信众、香客有所减少，道观的宗教收入相应减少，这使宫观不能不面临设法谋取生活经济之源。《太平经》强调“人人应劳作，自食其筋力”，其他经典也反复强调道士可食物以养生，但不可聚有而不济他人。事实上，在土改之后，许多道观也因地制宜，道众从事生产性劳动，务农、造林护林、医药、手工业、旅游服务业等各行各业，逐渐形成“劳动光荣”、“按劳取酬”的观念，开创了新的经济之源。

再次是宫观管理制度也发生了改变。新中国成立



后，全国实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雷厉风行，道教界也开展了宗教制度民主改革运动，宫观内凡与社会主义法令、政策相抵触的规戒与惩罚体例，亦皆自行废除，换上了《爱国公约》及《宫观常住规约》等。由全体常住宫观道士民主选举的“民主管理委员会”（或小组）取代了以前的那种等级森严、封建宗法性很强的监院执事制度。<sup>①</sup>

最后是成立了爱国的、统一的中国道教组织。1957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道教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选举岳宗岱为会长。中国道教协会的宗旨为：“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动和开展道教研究工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sup>②</sup>从此，道教界结束了“一盘散沙”似的涣散状态，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广大道教徒在中国道教协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

##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道教的变化

云南虽地处祖国边疆，但是与全国道教界一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道教宫观庙产被废除，监院执事制被民主管理委员会（或小组）所取代。1950年3月，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接管了圆通、大观、翠湖、古幢、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筇竹寺、龙泉公园、金殿、妙高寺、海源寺、正觉寺、永丰寺、涌泉寺、

① 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2月，第8~11页。

② 谢路军：《中国道教源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09页。

归化寺、虚凝庵、铁峰庵等十八个公园名胜及宗教寺观。5月12日，经省政府同意，在市文教局设公园管理科，编制3人。12月，军事接管后，各公园名胜及寺观第一批负责人员有龙泉公园邓教坤、三清阁董宗敬、金殿刘正理、虚凝庵陈宏文等。

从我们在昆明市档案馆查阅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昆明市道教会呈报总结书》、《昆明市道教会报告整理真庆观经过情形》两份珍贵的档案史料，便可看到云南道教在顺应社会变革中的细节变化。

### 昆明市道教会呈报总结书

(道字第89号)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于拓东路588号

我会自解放后就原“昆明市道教会”，改组为“昆明市道教联谊会”，并报请人民团体联合会核备在案，由宗教界合组“宗教联合会”为领导，至五一年减退工作开始，各教徒办理减退任务，会内无人负责，以致会务停顿。五二年二月经当地党政机关了解，指示团结教信徒，恢复会务，呈报《会章》及《系统表》。由全体会员大会选出主任委员陈理贵、副主委张纯斋，下设事务组，由谢理安、陈信源二同志负责；秘书组选出赵杜月负责，系由三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以后系暂由周仲书负秘书责任；学习组由三月二十三日起，选出伏明珠、杨惠庵二同志负责，至九月二十八日止，以后选刘义安同志领导学习；宣传组按照宗联指示临时选出刘义安、杨惠庵二同志撰拟黑板报；监察组选出吕志贵、王静安二同志负责。五一劳动节响应政府号召，全体会员参加游行；

六月十日响应人民政府植林号召，协同各宗教团体到铁峰庵附近，按照指示林场区域完成植林任务；八月二十七日西南区公安展览“镇反运动”开始，由各会员自动坦白交代，并检举反动“会道门”烟毒犯等，全体会员参观过公安展览大会，加强学习“镇反运动”，已作过汇报并交西南公安展览会；九月十九日“宗联”指示作卫生运动，我会选出会员三十人到拓东运动场听报告，并经常做好卫生工作；十月一日庆祝国庆节典礼及盛大游行，我会全体会员均前往参加；十一月七日由“宗联”领导，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就我会组织“中苏友好协会”，我会会员有八十人争取入会，已取得会员证及证章。我会会员建立劳动观点，各会员自觉、自愿争取到道教各名胜区参加生产，保持卫生清洁工作；申请到文教局，经局方了解同意，已有会员十四人到黑龙潭、虚凝庵、金殿、三清阁四个名胜区服务。至于我会经济毫无来源，会内负责各同志系义务职务，所有办公笔、墨、纸张，由各会员每月乐捐，经常费贰千元或一千元，各项运动、晚会，由各会员乐捐开支用费，我会因无固定经费，推进会务实感困难。十月十六日真庆观住持陈信源自觉自愿将真庆观、三元宫全部产业交与我会负责整理，因观内房客纠纷甚大，俟整理清楚完成房地产税任务后，再报请备查。

我会会员据有道信徒九十六人，多数因做迷信职业，解放以来，社会教育提高，造成失业现象，生活无来源，其中有六十多岁

以上，无劳动力者三十余人，幼年者二人。  
以上是五二年实际情况。一九五三年我会工  
作计划，俟全体会员讨论通过后再为呈报。

昆明市人民政府文教局  
主任委员陈理贵  
副主任委员张纯斋  
公元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sup>①</sup>

这份档案涉及昆明市道教联谊会人员安排，1953年昆明市道教会全年逐月工作情况总结，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昆明市道教会和当时道众的经济状况。由于保存史料详备，故作全文照录，以期存史。

另一份是1953年4月28日，昆明市道教会主任委员陈理贵、副主任委员张纯斋和杨正雄向市委统战部呈报《整理真庆观经过情形》的报告，从中我们也可从昆明市道教会的各种财产移交细节中，窥见道教会在适应社会变革中的变化。

据《整理真庆观经过情形》记录，1952年2月昆明市道教会奉上级指示，经当地党政机关了解，恢复会务，组织“道教联谊会”，暂借八行会馆筹备，作临时会址。同年9月道徒陈信源自愿将真庆观房屋交还道教会整理保管，昆明市道教会“彻底了解真庆观全部房屋情况，始知三元宫系军区及学校借用，三元宫侧面三间系复员军人住所”。当时，真庆观大部房屋已被陈信源租出有八十余户之多，“且租价甚低，每间几千元（旧币，下同），只余都雷府正殿三间、耳房三间，商得派出所同意迁还我会为会址。正殿三间现由状元楼居民委员会借用。我会于五二年十月迁

<sup>①</sup> 《昆明市道教会呈报总结书》，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53年2月25日，20-1-12。

人办公。深入了解才知道全部房屋的所有权状都被陈信源抵押在外；又将都雷府空地立约永佃与杜炳森、贺李民建盖住房，楼上下六间；又立约典与刘嘉寿建盖住房，楼上下两间；租与顾凤祥叁间，同陈信源有手续；又清洁员罗琳、金前卫，支会工友万学仙、军属普修贞，均不能收租。而都雷府内住户有些与陈信源有纠纷，有些系陈信源收租，房地产税由道教会缴纳，真庆观内有些住户不付租金。”当时，观内道徒4人，“由五二年九月经道教会整理日起，每月由我会支付伙食费叁拾万元，秘书一人每月薪给拾万元，由十月起至五三年二月，计五个月共才收得房租贰佰壹拾肆万陆千元，除额定经常开支外，又缴纳五二年秋冬季房地产税壹佰壹拾叁万陆千元（陈信源私人又向住户收取租金）。我会无固定基金及经费，因收与支不平衡，对于额定经常开支都是万分支绌，无法应付，又因房租难收，对任会道徒4人伙食无着，每每向会员借来支付，此项借款尚未赔还”。1953年2月20日昆明市第五区公所陈汝德“来会传达区公所反映文教局接受真庆观兴办学校，我会完全同意兴办学校，培育下一代人才，我们一致热烈拥护。”<sup>①</sup>

这两份史料反映了几个历史信息：  
一是昆明市道教组织和管理体制的改变。1952年2月，昆明市道教会重新恢复成立。10月，昆明市道教会会址由八行会馆迁至拓东路真庆观都雷府，陈理贵为主任，张纯斋和杨正雄为副主任，有会务人员16名，赵秋月为秘书，会员123人。1953年2月，昆明市道教会改组为“昆明市道教联谊会”，由全体会员大会选出陈理贵为主任委员，张纯斋为副主任委员。

<sup>①</sup> 《昆明市道教会报告整理真庆观经过情形》，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53年4月28日，20-1-12。

二是昆明市道教会和真庆观的经济状况。真庆观一直是昆明市区内最大的道观，陈信源 1946 年始任真庆观住持，管理着真庆观的房产。1953 年陈信源自愿将真庆观交昆明市道教会管理，但并不能解决昆明市道教会和真庆观的生活经济来源。而昆明市道教会会员已日渐建立劳动观点，“会员自觉、自愿争取到道教各名胜区参加生产，保持卫生清洁工作；申请到文教局，经局方了解同意，已有会员十四人到黑龙潭、虚拟庵、金殿、三清阁四个名胜区服务。”

三是道教界在思想面貌方面的变化。从《昆明市道教会呈报总结书》逐月的工作总结以及附录（1952 年《昆明市道教联谊会筹备委员会教纲草案》）中也可以看出，党和政府重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道众也关心国家时事，参与了铁峰庵植树、“镇反运动”和国庆节典礼游行，并组织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等等社会活动，新社会的文化思想，从社会多方面的渠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道教徒，他们也努力与社会主义相协调。

1957 年，“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成立，领导道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云南道教界积极响应。这一年，昆明市人委宗教事务处在《昆明市宗教情况》中，向外宾介绍昆明的道教情况是：道教“于汉时传入昆明，明时较发展，建立最早的道观有文庙、黑龙潭、金殿、三清阁等处。现有道人 15 人，教徒 110 人左右，较大的道观有黑龙潭、金殿、三清阁等地”。可供参观的道观有“黑龙潭，系道人较多的道观，是我市名胜地之一，风景幽雅，内有唐梅、宋柏等古代花木。金殿（地址东郊鸣凤山），系名胜地之一，以‘铜殿’著称。三清阁（西山）系西山最高建筑物，地势险要，石雕艺术很高”。参加接待的人物“陈理

史 贵(道士)昆明道教会立委,省政协委员”<sup>①</sup>。这表明宗教界上层人士在社会上、政治上地位都有提高,有的人参加了国家的管理工作。

昭通县道教庙宇在1950年以前有大龙洞、元宝山、三官庙、白龙庙、老君庙、遇仙洞、火神庙、玉皇阁、凤阁庙、西王庙、武庙、川主庙、元龙山庙等,约有20多处,主要分布在城内、北闸、洒渔等地。到20世纪50年代,昭通活动场所减少,只有凤凰阁、大龙洞、元宝山3处。<sup>②</sup>

1950年建水县人民政府民政科调查,全县有道士56人。1955年一、二、五区有道士8人,其中燕子洞3人、官厅潮音寺3人、狗街神仙洞2人。燕子洞第21代住持段至罡对洞中宫观道路颇多建树,1967年羽化,享年106岁。1985年有道士9人,学徒12人。<sup>③</sup>

据《昆明市道教情况》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夕,昆明共有大小道观6座,道人45人,教徒120多人。到1958年有道人13人,一般都是年老者,虔诚教徒50多人,宫观6座,即郊区3座,城区3座,较著名的有金殿,黑龙潭。宗教活动极少。“解放前夕曾被反动会道门利用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肃清了教会内部反革命,纯洁了宗教,但在群众中影响较深,很多人不敢信仰,自觉退出,现在已属于衰落的阶段”。<sup>④</sup>

1965年昆明市宗教事务处统计“昆明市宗教上层”:五华区1人、盘龙区2人、官渡区6人,均为乾

① 《昆明市宗教情况》,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57年8月22日,20-1-75。

② 《昭阳区道教的基本情况介绍》,昭通市昭阳区道教协会,2005年7月24日提供资料。

③ 建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建水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5月。

④ 《昆明市道教情况》,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58年1月5日,20-1-75。

道，官渡区还有宫观2所。<sup>①</sup>

### 三、一份成为历史的《昆明道教史撰写规划书》

1961年11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道教界代表99人，其中全真派85人（坤道12人）、正一派14人，陈撄宁当选为会长。<sup>②</sup>他认为中国道教有二千年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很丰富，道教界人士有责任、有义务整理和研究这一份祖国的文化遗产，并提出在道教界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建立道教院校、出版道教刊物、发展道教优良传统的全盘计划，得到了道教界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赞同和热情支持，道教的发展由此呈现出了繁荣兆头。

昆明市道教会主任陈理贵代表云南省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返昆后传达了会议精神，进一步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明确了本市道教今后的工作方向，以研究道教学术和培养道教知识分子为中心任务，因而调动了全市道教界人士的更大积极性。今后怎样做好整理和继承道教的文化遗产的工作，发扬道教学术思想中的优良传统，为全国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贡献道教的一份力量，已经成为道教界一个具有现实的历史意义的任务。在这一形势之下，昆明市道教会开始整理云南昆明地区道教文物历史和文化遗产资料，并拟定了《昆明市道教会整理历史资料规划书》一份：

<sup>①</sup> 《昆明市宗教上层登记表》，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5年9月30日，20-1-146。

<sup>②</sup> 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第59页。



我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伟大的成就，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继续鼓足干劲奋勇前进，自解放十三年以来宗教界与社会历史是分不开的，我会必须着重整理我市道教界的历史资料，现将准备进行整理工作规划如下：

一、整理我市道教的起源。

二、进行搜集我教名山圣境龙泉观、虚凝庵、三清阁、金殿等开山建观的来源。

四、我教在封建时代人物考（包括杰出人物）。

五、道教界在民间做斋打醮与群众的关系及祖师圣诞节日举行仪式。

六、保护我教经典古书著作及文物古迹。

七、以上六项历史资料一部仅今年内整理成套再行呈报。

一九六三年元月十二日 呈<sup>①</sup>

昆明市道教会据此规划，在当年底整理了一份八千字左右的《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sup>②</sup>，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 道教新兴时代的立场观点大事记

封建时代的道教徒专为封建王朝服务，用宗教的名目麻醉广大劳动人民，不从事劳

① 《昆明市道教会整理历史资料规划书》，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3年1月12日，20-1-102。

② 《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3年11月，20-1-102。

动事业，寄生于社会之上，不过问国家大事，统治时期的道教徒毫无政治立场，任凭统治阶级的歧视蹂躏，一点自由和保护都不有。如清王朝同治年间金殿上的长老及道众被狂徒杀了五个，无地伸冤，伪民国十八年又被匪抢劫数次，住持跳城墙逃走，还身带重伤。今天，新时代的道教徒的面貌大大的改变了，全体道教徒都参加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有的当工人，有的做农民，政治地位已得到了提高，和全体人民一样宗教信仰已有了自由保护，教徒已得到了参加国家大事和政治立场，过去的寄生名目已将完全洗尽，全体道徒已走上了新生光明的道路。

这一部分因为是当时人记录当时的社会变革状况和思想感受，所以全文收录。

历史研究中，史料搜集是披沙拣金的过程，特别是查阅近现代的档案资料更是大海捞针，查到有用资料尤为不易。《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虽然有的资料须待考证，但毕竟是一份较早理清昆明道教神话传说、历史脉络的资料，对今天研究昆明，乃至云南道教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略作摘录，以备今后研究考证。

### 昆明道教的起源

自汉时庄蹻入滇，即有道士入滇流传。民间以做斋祈禳为生，其龙沙一派最盛，随即有黄老之士来昆访道。初期有金陵仙鹤观罗乾熙来昆行医济世救民，住城东真武祠（明改真庆观）。两晋南北朝以后，昆明的道教最盛要算唐代的道教，地位提得最高，官

观遍及全省，到金宋大定八年丘处机的门人宋大师来昆开建丛林，龙门派随着流传入昆。元明时代重视道教，因丘处机元太祖封为领导大夫兼管三教事务，并兼理北京长春宫（后改白云观）。明洪武七年龙门岔派长春子刘渊然奉旨入滇，在昆宏扬道教，创建长春观（文庙所在地），后继续扩建北郊龙泉观（即黑龙潭），将真武祠改建真庆观，昆明设提点司各县设道纪司，管理云南全省的道教事务。相沿明末清初，龙门、长春二派门人甚多，不下百人，正乙教徒在民间的发展盛极一时。……

道教现保存的文物古典古迹法器参考<sup>①</sup>

道教祖师圣诞节日宗教仪式与民间做斋醮参考

昆明地区的道教与人民所崇奉神，大体与全国一样

三月初三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圣诞，为云南治世福神。

昆明道教主要清规戒律斋醮意义（略）

道教历史人物包括人材杰出事迹

封建时代道教徒当官服役情况考

市中心区五华山旧有诸葛武侯祠，内在玉柱一棵，每月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节后，

①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云南道教典籍”。

一般人民都要上山摸玉柱。逢着月蚀，由昆明县通知教徒就要身着法衣打鼓打锣；每遇大旱无雨，道士就要负责祈晴祷雨的责任，在比较大一点的寺庙里摆设先天八卦阵求雨；久雨之年又要摆后天八卦阵求晴。每年清明、寒食节，城隍出府时必须护送。

### 道教玄门晨钟暮鼓略举（略）

#### 道教市旧有宫观寺庙参考

本市除名胜名山圣境金殿黑龙潭、虚凝庵、三清阁，下面将作详细的介绍外，以下是本市原有的道教庙宇宫观。

真庆观：汉诸葛武侯平南时，彩云南现，乃建真武祠，供奉滇南福神真武祖师，神像毁于元，后又建于明宣德。现列为省的重点保护，现为市道教會的办公地点。

三元宫：建自明，清康熙年间扩建后被棉花业借作会馆。

天乙宫：建自明成化元年，咸丰丁巳已毁后，光绪年间改建迤西会馆。

青帝宫：明地学家汪湛海按昆地行东方青帝相生而建，为虚凝庵下院。

千佛寺：玄真观前身，清康熙年间建，乾隆年间改玄真观，为金殿下院。

云龙宫：清道光年间建，已毁。

白鹤观：清康熙年间建，咸丰丁巳年毁，现为市印刷局。

大梵宫：清康熙年间建，因前身是一茅庵，有一异人诵《皇经》，收蛤蟆精建斗楼。

三皇宫：清康熙年间建，乾隆二十六年

估衣借作会馆，后改八行会馆。

中和宫：明末时建斗楼，咸丰丁巳毁，于光绪年间重建小型庙宇。

斗姆阁：明末时建于沐氏宗祠侧，现已毁。

太乙宫：明时建于斗姆侧，咸丰年间已毁。

文昌宫：清乾隆年间建，咸丰丁巳毁。

玉皇阁：明时沐英建禹王庙，清康熙年间改建玉皇阁，有南北天门二道。

灶君庙：清乾隆年间建，道光年间改天厨宫，后厨馆业借作会馆。

紫云观：杨泗庙的前身，康熙三十一年建，同治年间添塑杨泗将军镇水。

霞倚宫：清康熙年间建，作人民到金殿朝山传茶之所。

城隍庙：清乾隆十四年由地台寺将总督城隍迁入，建寺供奉。

灶主庙：明时建，内有昙花胜境之称，后已毁，另建老子阁。

灵光寺：乾隆年间常有灵光四射，后乡人掘土得一铜钟，建寺故名灵光。

老君殿：建自南诏时，因妖僧摆恶阵，老君下降用风火蒲团破阵，收妖留有洒镏金桥遗迹，故此佛寺塑老君像，昆明只此一处。

长春观：刘渊然明时到滇建，元为珉王府，宣德年间改长春观。

轩辕宫：清道光年始建，光绪二年巾毛行借作会馆。

财神宫：清乾隆二十年建，同治年间被银铁业借作会馆。

## 道教名山圣境开山建考

黑龙潭原汉黑水祠，古为农民祭祀之所，旧址在上观唐梅宋柏之间。明初有刘渊然奉旨入滇，阐扬道教，将黑水祠移在龙潭之侧，今黑龙宫内，另建龙泉观，规模宏大，为滇南道教之冠。刘真人道德清高，素为朝廷信仰，所有貂裘鹤氅、法衣宝剑无一不出朝廷所赐，宠信之极，为玄教之罕比。一年天气极热，皇上召真人降雪解暑，真人遂带黑白二龙到京，面圣讨计，真人施法，顷刻瑞雪纷纷下降，盛满金盆。圣上大喜，封为“护国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并敕建朝天、灵济、神岳三宫为真人栖身扬教之所，敕封黑白二龙，黑龙封为总督龙王，白龙封在滇西总督龙王，示金洱海。次年奉命扩建昆明真庆观、长春观，又奏设大理、金齿三都纪司，于真庆设提点司，命在昆弟子蒋日和主持全滇道教事务。现黑龙潭上观的刘真人殿内有对联云，其上“教立京都朝天灵济共神岳”，其下“派分滇海长春真庆共龙泉”，是时祝国扬教，大阐玄风。

.....

### 昆明道教的龙门派来源

全国道教派别大小有八十多个，其中只以龙门、长春二大派为主。昆明只有龙门、长春二派……云南昆明地区宋大师来昆开建丛林，龙门派由此传来。龙门字派：“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元明，智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性

茂，希微衍自宁。”康熙皇帝御赐六十个字如下：“未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妙中黄癸，圣体全用功，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心，行满丹书诏，月本祥光生，万古侠心号，三教都是亲。”

### 昆明长春派来源

长春始祖刘渊然出家于江西宁州府彩寿宫，他本人原是龙门的子孙，因受北派金丹，故由龙门分出一派曰长春，传其徒邵日云，后因改北斗擢滇，传其徒蒋日和，蒋后又传徐道广、俞道纯、张道宏、黑道明四道。清因皇上召刘真人降雪解暑，复职加封“护国大真人”，连在滇人皆有封号。明洪武年间长春才入滇，字派有二十个字：“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传正教，绍述仙踪。”

### 昆明在家道士正乙天师派的来源

正乙派始祖道士张道陵，乃汉之张良八代孙，世居江西龙虎山属信州所管，其族有二百多家都是姓张，天师乃当时封建帝王封赐给他的封号，司掌天下祈晴祷雨、祝国祈年之事，受领国家俸禄，但外姓人有道者亦可奉道参加。当任法官专与人民祈禳消灾、解厄度祖、超宗荐拔、迷魂行成常规，奉行者都称为火居道士。其字派以龙门派为主，但外省有专门的天师一派，又有俗名又有法名，但奏过职的才能传法受业，弟子亦有按天师派取名，亦有按龙门春长派取名，能娶家室，可以子孙世传，昆明由蜀中东川张鲁

之后裔来昆传法，才有龙沙一派入滇后散在民间，至今还有。

.....

#### 四、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民间道教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正一派活动于民间，在农村、城郊依然有各种仪式活动存在。比如昆明北郊的莲花池的斗姆崇拜。

斗姆崇拜在莲花池农民信仰中占有特殊地位，先是与佛教融合，在商山寺里建有斗姆殿。民国时期，斗姆殿划归军火局作为军火仓库后，又在商山北麓建斗姆阁，并由商山寺和尚任住持。

斗姆又称斗姆元君，神像是三目四首，左右各四臂。传说斗姆在金莲花温玉池洗澡感受后怀孕，生莲花九苞，化为九子，于是成为现九皇道体，北斗众星之母，统领七元星君。获得“北斗九真圣德天后”尊称。

道教认为斗姆司星斗，南斗司延寿，由于北斗居天之中，所以自然界四时和节气划分。岁时丰歉皆系于星斗。在古代人们将自己的寿夭、富贵和爵禄也都同星斗联系在一起，所以莲花池的村民异常重视斗姆阁。该阁分上下两殿，上殿为斗姆殿；下殿为观音殿，供观音、文昌和真武祖师；两厢供马天君、赵天君、温天君和岳飞。可见名为斗姆阁，实集中道教乃至佛教的多种神祇。当然每年以朝斗活动为主，农历六月举办朝南斗，九月举办朝北斗。每次朝斗，村上还拨给庙会粮两斗，计 160 市斤。在朝斗活动中，以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为主。她们平常在每月初一和十五还要吃素食，有的吃常斋。



在斗姆阁所供奉的文昌是北斗第四宫，为星宿之一。道士另称文昌帝或梓潼帝君，其负责文昌府事和人间禄籍。崇拜的另一星宿神庙宇为太乙观，内供太乙真人。太乙又名太一，北极神之别名，主使十六龙，据说分掌风雨水旱、兵革、饥谨和疾疫。直到1950年仍住有女道士，专为死人家念超度经。

斗姆阁1951年土地改革时房屋分给贫民，因而最终被取消。<sup>①</sup>

## 第二节 “文革”时期云南 道教的曲折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破坏，道教界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不少宫观被破坏，经书被焚毁，中国道教协会也被迫停止工作。云南道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严重冲击，道士被遣返迫害，碑像经籍被砸碎焚毁，已是庙毁碑残，人神两空。

巍山巍宝山有道观一百多座，大部分在动乱中都有所损坏，有的全部倒塌。

腾冲的情况是1952年土地改革时，云峰山道观住持陈柏川因划为“宗教地主”成分被改造。香火田被改革，部分道士还俗归农，不愿还俗的道士聚下院万佛寺为一户，自食其力。不久，归入云峰山脚濮家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靠劳动分红过日子，自食其力。土地改革后，由陈寿渊（道号宗培，元谋县马

<sup>①</sup> 宋恩常：《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村社会历史调查稿》，见夏本戎主编《五华文史资料》第17辑，2005年12月，第162页。

街人)道长任云峰山道观住持,常住万佛寺,一面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活动,一面主持寺庙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峰山道观受严重冲击,吕祖殿、观音殿、玉皇阁部分殿宇被拆迁,陈宗培和几位上年纪的坤道住守万佛寺,游人绝迹,道观颓废。1975年3月,又因发生山火。吕祖殿再次被烧毁。<sup>①</sup>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斗争,也冲击到了道教界,主要涉及各级道教协会组织的部分中、上层道教界人士,有的受到批判,有的被打成“右派”,云南省道教开始走向衰落,“文化大革命”期间活动完全停止,道教活动场所被关闭,道教界人士被遣散,有的甚至被视为“牛鬼蛇神”,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后云南 道教的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重申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徒已逐渐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云南道教进入了恢复发展时期。有些名胜道观陆续在加以修缮、保护,恢复和开放了一批道教活动场所,道教界人士也恢复了名誉,成立了地方性的道教协会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重新恢复活动并受到了保护,道教得到了恢复和正常发展。

<sup>①</sup> 见腾冲云峰山住持李宗稳道长提供《腾冲道教史》资料。

## 一、云南道教活动的恢复<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理、丽江、昭通、临沧、腾冲、剑川等地的正一派道士应当地群众的请求，开始出来为群众举办斋醮道场；腾冲、凤庆、昭通等地的道协开始恢复成立或筹备恢复成立。在人民政府的认可下，一些地方的道众集资对道教宫观进行修缮和修建。云南道教信仰逐渐复苏。

昭通县道教管理委员会于1981年成立，主任张明远，副主任黄宗伦。有教徒六百多人。1983年昭通市政府从四川青城山邀请龙门派第20代弟子戴明春任大龙洞道观住持，他重修庙宇，恢复神像，六年间收三戒弟子数百人，并被选为昭通市政协委员，1992年当选为中国道协理事。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心支持下，1997年大龙洞道观产权问题得以逐渐落实，1999年整个大龙洞道观古建筑得以落实归还。八九十年代昭通还捐资修建了玉皇阁道观、海口桥道观、仙古庙、三清观、仁和道观、老君庙、富强观音庙、斗姆阁等多所道观，还有威信观斗山、鲁甸玄天观等地成立了道教管理委员会，重修道观，开展道教活动。2000年昭通市道教协会成立，有教职人员一百四十多人，道教徒两万五千多人，境内道教主要为全真龙门派。

昆明市正一派、全真派的法事活动也逐渐恢复。昆明市北郊蒜村庆丰庵在80年代恢复活动。庆丰庵原有殿堂二十余间、戏台一座，“文化大革命”时改建民宅。1990年恢复重建时，信众自发义工、自愿捐助

<sup>①</sup> 以下多为田野调查资料。我们实地调查、采访的地方有昆明、大理、巍山、剑川、漾濞、南涧、昭通、鲁甸、个旧、建水、蒙自、普洱、景谷等，足力未及之处，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由各地县民宗局和道观提供。

者众多，建成后，经众议更名“万寿宫”，占地七亩余，由廖诚明主持教务。2003年3月昆明市茨坝蒜村万寿宫正式开放为道教活动场所，成为昆明北郊香火日渐旺盛的道教宫观。2005年1月，万寿宫除土主庙之外的所有殿堂开始重新大规模改建。安宁市紫霞道观于1994年在连然镇神坪村后山兴建，1999年正式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东川区三元宫于2002年3月恢复，建于泥拉姑中村，占地面积3亩，东西向四合院。这3座道观是昆明改革开放后最早恢复并登记开放的活动场所。

临沧市是道教信仰较为广泛的地区。1978年12月，云县道教恢复活动，并于1985年9月12日成立云县道教小组，指定圣教寺为道教活动场所，重修观音殿，在殿内改塑太上老君等神像，新增匾额对联，开始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至1985年12月，云县参加道教组织的有坤道11人，居士86人，其中皈依“道、经、师”三宝，受老君戒13人。1989年12月成立云县道教协会。<sup>①</sup>凤庆东山宫于1984年落实宗教政策后，由凤山粮管所归还东山寺房屋产权，陆续修理道观、恢复宗教活动，1985年6月15日凤庆县道教协会在此成立。1983年临沧子孙庙归还道教，当时观稼楼倾斜严重，倒塌在即，子孙庙成立道教管理小组，并于恢复宗教活动后，道众出资竭力修缮，90年代再次筹资复修，中国道教协会也赞助3万元，以琉璃瓦、油漆彩绘装饰增色，修葺一新。另有观音阁、石洞寺道观、磐陀石道观、三清观、灵应寺、琼岳大寺等道观陆续修复。

建水县1985年有道士9人，学徒12人。<sup>②</sup>此后红

<sup>①</sup> 云南省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791页。

<sup>②</sup> 建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建水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5月。

河州无道教统计数据。

大理中和寺于1985年重修玉皇阁、老君殿以及山门外的南北灵官殿。80年代陆续修复的道观，还有洱源县凤羽道教清净寺，祥云县天峰山老君殿，南涧县碌摩山寺、龙凤山玉皇阁和无量灵宝山寺，弥渡县王显宫、佑圣宫和太清宫。巍山、鹤庆、云龙等县的道教活动恢复较早，在1977年道教活动场所便已开始修复，据巍山县民宗局提供的资料，1977年后巍山信众自发组织，捐资投劳，逐步修复“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的巍宝山宫观殿宇，恢复宗教活动。198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拨出一定资金进行抢救性修缮，修缮后的宫观由巍宝山景区管理委员会、道教协会、文物等部门管理。2000年，巍山县道教协会根据古乐发掘道教音乐，组建了正一派道教经乐团，基本统一了演奏的乐曲和服饰。道教活动正常开展，信教人数在三万人左右。1977年起，云龙县诺邓玉皇阁、石门镇老君殿、和平三崇庙、保禄阁等陆续修建，并开始各种修斋设醮的仪式。1984年，剑川道教重修金华古寺，恢复法事活动，1997年登记为正式开放的道教活动场所，由金华镇道教管委会负责管理。剑川道教为正一道，注重对神仙的礼拜和道经的课诵，相信念咒画符和请神降坛可以捉鬼驱邪，禳灾祈福。道士不居宫观修持，有家室，称“火居道士”。正一道符篆派道士承师改名不改姓，以“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和教永流传”作辈分排行谱系。笔者2004年调查时传至第15代“本”字辈，张本泽、刘本续、张本源是当时活跃在剑川县城、乡村的主要道士。另外在剑川县弥沙乡弥新三圣宫也有道士，他们平时替人进行禳灾、祈子、祈求福禄、追荐亡灵等法事，宗教节庆主持各种斋醮仪式，当地称“做会”。若逢“朝斗”等

大的法会就在金华古寺、三圣宫举办。剑川道教斋醮仪程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念咒、上章、诵经、赞颂，并配有独特的灯烛、音乐、禹步程式。音乐时而激越，时而悠扬，内容丰富，自成一家。上章修辞雅丽，富有文采，颇具地方特点。<sup>①</sup>

保山从1980年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被毁宫观重新修复，如玉皇阁、三清殿、金鸡寺、关圣宫、新桥文昌宫、水莲寺、白塔观音寺、太平宫等，道场法事日益兴盛。腾冲道教的恢复是以云峰山道观的修复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在云峰山护寺的陈宗培道长积极筹划恢复建设道观，在腾冲县有关部门的帮助和全观道众的共同努力下，民众积极捐资，于1982年重新在原址按原样建盖了老君殿和吕祖殿。新塑佛像，整修道路，增加设施，云峰山道观再度燃起香火。1983年，云峰山道观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8月14日腾冲县道教协会在仙乐观成立，周理厚任会长，陈宗培任副会长。云峰山道观正式开放为道教活动场所。1985年陈宗培道长羽化，李成坤任住持，李宗稳任副住持，她们潜心于道观建设和道教修炼，筹资3.5万元，于1986年将三层木结构的斗姆阁立于“云梯”顶端的悬岩上，飞檐凌空，雄伟壮观，加之名师雕梁画栋，更显“仙山琼阁”风采。1988年腾冲县道教协会会址迁至云峰山道观。1989年秋，李成坤列席参加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会议，同年，她与李宗稳在北京白云观受戒。由于她们的努力和对外宣传，90年代初云峰山已成为香火旺盛、游人如织的著名道观。腾冲以宫观为载体的道教基本是属于全真教派，奉王重阳为祖师，民间俗称为“清静道”，

① 2004年笔者调查资料。

2004年腾冲地区共有50多个道观分布于县内的16个镇,<sup>①</sup>成为云南省道观修建最多的县。

## 二、云南道教的平稳发展

随着云南道教的恢复发展,与省外道教界交流加强。1992年3月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云南道教界选派李宗稳、戴明春和李慧春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云南代表李宗稳被推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会的常务理事,戴明春和李慧春也被推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会的理事,参与中国道协管理全国的道教事务,表明云南道教仍在全国道教界中占有的较重要地位。

1993年6月,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首届“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这次表彰会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张声作等到会并接见了与会代表;会议从全国各名山宫观中评选出了先进集体53个、先进个人159名,其中有云南省的鲁甸县玄天观、凤庆县道教协会、腾冲县道教协会,以及李宗稳、赵宗顺、徐元令、赵本良、高山道人、唐明慈、丁朝猷、袁志顺、李诚昆等道士。这表明云南道教界在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活动中是作出了较大贡献的。

从文献和实地调查结果看,云南的宫观在历史上大多建在汉族聚居区,或是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云南道教文化具有分散与集中并存的特点,汉族地区道教信众分布较广,而白族、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信众相对集中。

<sup>①</sup> 见腾冲云峰山住持李宗稳道长提供《腾冲道教史》资料。

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尤其是近年来,云南道教不断发展,道教宫观修复兴建非常多,分布也广泛。据1995年统计,有宫观60座(不计未批准开放宫观27座),有道士道姑352人,一般信众45 000人。<sup>①</sup>据2004年云南省宗教局提供道观正式登记并年检合格的宫观和活动场所有127所,主要分布于昆明(3)、昭通(8)、曲靖(2)、大理(39)、保山(63)、德宏(1)、临沧(11)等全省多个州市。全省道教信教人数分布情况为:昆明300人、昭通56 343人、曲靖1 837人、大理119 533人,保山30 000人、德宏365人、丽江11 800人、临沧19 527人,合计239 705人,与2003年的165 608人相比较,增长率为30.91%,<sup>②</sup>其中还未包括昆明、楚雄等地彝族的信仰道教人数和红河、文山、西双版纳的瑶族信教人数。

在《2004—2005年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中,我们分析当时人数增长快的原因是昭通、大理两个地州是历史上汉族文化传入较早的地区,其增加人数中有相当部分是“随习从俗”的香客,表现出来的大多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宗教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将会随着道教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开发而日益突出,因为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中国人不是道教信众,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又跟道教关系非常紧密,且不说“随习从俗”的烧香拜神的问题,关键是道教文化的深层内涵在中国人心灵中的文化认同感,让人们参与活动。<sup>③</sup>

①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编:《近代以来云南宗教的变迁及其走向研究》,1999年12月结项课题报告。

② 萧霁虹:《2004年云南宗教动态分析》,见熊胜祥、杨学政主编《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6页。

③ 同②。



## 第四节 云南省道教团体及活动

### 一、云南省道教协会

#### (一) 云南省道教协会筹备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云南省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占用的房产逐步得到归还,宗教活动场所以得以恢复开放,保证了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满足了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过好宗教生活的需要,保持了宗教领域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昆明市道教房产落实政策工作滞后,到2000年为止,昆明市还没有恢复一所道教活动场所,历史上昆明比较著名的道教宫观如真庆观、金殿、黑龙潭、西山龙门三清阁等,目前,都被园林、工厂等单位或居民占用。由于没有宗教活动场所,在全省五大宗教中,道教协会迟迟不能成立,致使全省的道教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与党和政府提出的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很不相称。为此,道教界人士多次在人代会、政协会上提出建议和提案,要求尽快成立云南省道教协会。

对此,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2000年12月,云南省宗教事务局根据李汉柏副省长的指示,向省人民政府上报了请求成立云南省道教协会筹备组的报告。2001年,省政府在征求省委统战部、省财政

厅、省编办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批复正式成立“云南省道教协会筹备组”，由郭滇明任组长，董允、李文兴、李宗稳、林圆伟任成员。

云南省道协筹备组成立后，由省宗教局负责领导，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及国家的法律、法规，结合全省道教工作实际，充分发挥道教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在维护道教界的合法权益、加强教务管理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一是积极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省道协筹备组成立后一直在积极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挥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宣传、落实宗教政策，维护道教界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重点深入到昭通、大理等地调查了解情况，听取广大道众的意见，并与当地政府宗教部门交换意见，发现并协调解决问题，为昭通大龙洞妥善解决具体困难，维护了当地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是抓宫观管理。中国道教协会《关于道教宫观管理办法》、《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暂行办法》（简称“两个办法”）于1998年8月在全国道教第六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云南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宫观的管理规章制度，贯彻、实施中国道协的“两个办法”，严格道风、庄严道场。使全省绝大部分开放宫观的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实行了民主管理，宫观建设得到加强。

三是注重提高道教界人士的宗教素养。2003年8月，辽宁省千山五龙宫举行传戒法会。云南省推荐李明兴等三名道教界人士参加法会，他们在五龙宫受戒，学习道门科仪，增强了管理道观和弘扬道教事业的信心。

四是重视对道教人才的培养。2001年12月,由云南省宗教局拨款十多万元,云南省道教协会筹备组在昆明金星宾馆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首次规模最大的道教界人士政策法规培训班。培训了来自昆明、大理、保山、临沧、昭通、曲靖、德宏等7个州市的道教界人士106人。主要学习新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举办了“宗教反渗透形势”、“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宗教界人士”等专题讲座。

五是推荐道教界人士参加道教组织负责人“三个建设”研讨班。中国道协拟于2003年举办道教组织负责人“三个建设”培训班,筹备组推荐云南省一人参加。

六是参与道教文化研究,弘扬道教文化。2003年3月,中国道协在北京白云观举办老子诞辰纪念活动,内容包括道教文化书画展、老子思想文化研讨会、宗教科仪道场、道教音乐会等,省道协筹备组积极组织道士参加,弘扬道教文化。

## (二) 云南省道教协会的成立及代表会议

“云南省道教协会筹备组”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为云南省道教协会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于2003年2月向省委上报《关于召开云南省道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及成立云南省道教协会等有关问题的请示》。云南省委批复同意省宗教局工作方案,并明确省道教协会的编制问题由省编办落实。2003年4月经云南省宗教局申请,省编办批复同意,核定省道教协会事业编制4名。

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以及省委统战部、省宗教事务局的直接领导下,云南省道教第一次代表会议于2003年10月13日至14日在昆明举行。本次

会议代表共 120 人，来自昆明、昭通、大理、保山、德宏、临沧等六个州市，其中男性 53 人，占代表总数的 44.2%，女性 67 人，占代表总数的 55.8%；60 岁以上 34 人，占代表总数的 28%，40 岁以下 41 人，占代表总数的 34%；最大年龄 82 岁，最小年龄 21 岁，平均年龄 50 岁。代表中道教教职人员 78 人，占代表总数的 65%；道教协会、道观管委会成员 18 人，占代表总数的 15%；科教文卫、工商界代表 8 人，占代表总数的 6.7%；群众代表 16 人，占代表总数的 13.3%。会议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云南省道教协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云南省道教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25 人、常务理事 11 人、会长 1 人、副会长 2 人、秘书长 1 人，标志着云南省道教协会正式成立。

2003 年 10 月 14 日，云南省道教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会长李明兴，副会长李宗稳、袁至兑，秘书长董允，常务理事李明兴、李宗稳、袁至兑、肖家吉、郑春林、唐信宽、周霞、肖遥、汪合耀、丁圆馨、董允 11 人，理事李明兴、李宗稳、袁至兑、肖家吉、郑春林、唐信宽、周霞、肖遥、汪合耀、丁圆馨、董允、夏诚德、程云燕、唐嘉文、蒋仕光、袁家万、金信常、赵诚芳、周宗权、唐岳诚、李怀仁、苏福安、刘园荣、杨合勤、龚菊芬 25 人。

云南省委、省政府对于云南省道教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召开高度重视，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马开贤、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功祥、省宗教局局长熊胜祥以及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唐诚青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话。省委副秘书长李森、省政府副秘书长李维俊、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功祥、省宗教事务局局长熊胜祥与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座谈并作重要讲话，并与全

体代表合影留念，给全体代表以很大的鞭策和鼓舞。本次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云南省道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云南道教工作的高度重视。

会议作出了《云南省道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号召全省道教界人士和信徒，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同全省各族人民一道，团结一心，奋发图强，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云南省道教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云南省道教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落实云南省道教协会办公用房及活动场所的工作。在罗正富等省委领导和省委统战部、省宗教局的关心支持下，经省市统战、宗教、园林等部门反复协商，落实云南省道教协会办公用房及活动场所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由省政府拨款 300 万元给黑龙潭公园另建办公地点，将黑龙潭公园龙泉观及附属房屋移交云南省道教协会管理使用。2006 年 2 月云南省道教协会李明兴会长进驻黑龙潭文昌阁，省道教协会机关充实工作人员，配备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8 月云南省道教协会与昆明市园林局签订了黑龙潭龙泉观移交协议，计划于 2007 年 6 月正式交还云南省道教协会使用。

二是做好人才培养工作。2005 年，省道教协会组织学员参加中国道教学院乾道、坤道宫观管理大专班的考试，争取了中国道教学院在昆明设立考点，对云南省学员进行单独考试，有 7 位学员分别被北京白云观道教学院和湖南南岳大庙道教学院坤道院录取。

三是组织云南省代表参加中国道教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2005年，中国道教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省道教协会推荐了8名代表参加会议，李明兴、李宗稳二人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袁至兑等四人当选为理事。

四是组织云南省道教协会一届二次理事会议于公元2007年2月在昆明召开。到会常务理事7人，理事14人，会议有四项内容：李明兴会长作工作报告，省宗教局熊胜祥局长讲话，省宗教局一处付志上副处长讲授《宗教事务条例》，举行常务理事会议并研究布置2007年省道教协会工作。

## 二、云南各地的道教协会

在宗教政策落实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云南各地道教恢复活动，建造道观。过去道观虽多，却缺乏组织，亦无联系，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为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道教界合法权益，兴办道教事业，弘扬道教教义，传承道教文化，云南省及各地州市县的道教界群众团体道教协会和宫观管理组织陆续成立。

最早成立的是腾冲县道教协会。1984年召开腾冲县道教协会第一次会议，8月14县道教协会成立，周理厚任会长，陈宗培任副会长。在同一年，腾冲云峰山道观正式开放道教活动场所。腾冲县道教协会委派李成坤道长先后前往四川的峨眉山、青羊宫、青城山，浙江的普陀山，湖北的武当山，陕西的华山，河南的中岳庙及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道教圣地参观考察，并在北京白云观拜会中国道教协会的陈兆康，建立了腾冲道教和中国道教协会之间的联系。1992年任腾冲县道教协会副会长的李宗稳等三人在北京召开的中国

道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上被推选为理事会常务理事、理事。2003年后李宗稳任县道教协会会长。

临沧市是各级道教协会成立相对完备的地区。临沧县道教协会于1984年5月成立。凤庆县道教协会于1985年6月15日在东山宫成立，后来陆续修理恢复宗教活动，现任会长是汪合耀，副会长为纪合雁、杨永平，秘书长是施灿莲。云县道教协会于1989年12月成立，现任会长杨合勤，副会长杨玉衡、段玉兰，秘书长孙泽。临沧市临翔区道教协会1993年11月成立，现任会长赵本良，副会长欧永慈、丁圆馨，秘书长丁晓燕。

昭通县道教管理委员会于1981年成立，主任张明远，副主任戴明春、黄宗能。1983年昭通市政府从四川青城山邀请龙门派第20代弟子戴明春住持大龙洞道观，并选为昭通市政协委员，1992年戴明春当选为中国道协理事。2000年10月昭通市昭阳区道教协会成立，李明兴任会长，肖至旻、蒋至乙、陈宗富任副会长。

巍山县道教协会于2001年7月成立，现任副会长廖子元，秘书长芮泽隆。

昆明市道教协会于2004年7月22日成立，会长袁至兑，副会长程云燕、廖诚明，秘书长和永。次年9月8日昆明市道教协会在拓东路真庆观都雷府正式挂牌，并举行开放仪式及祈福法会，省市相关领导、五大宗教代表及居士信众三百多人出席开放仪式。昆明市道教协会注重对外交流和道教文化的传扬活动，2005年昆明市道教协会理事蒋理全应邀随中国道教协会赴马来西亚沙巴州莲花山三清观，举行乙酉全真传授初真法会。6月袁至兑会长倡导在真庆观开办“居士经韵学习班”，由夏诚德、蒋理全等道长主讲，首批有居士信众三十余人参加，每月初一、十五开课。

还举办太极拳培训班，创办《紫云》简刊，介绍云南道教文化。

此外还有 1987 年昌宁县成立道教管理组，剑川、鲁甸等地成立了道教管理委员会，均在宗教上帮助道教信众实现宗教信仰上的各种要求，代表道教信众的合法权益，培养道教教职人员，组织道教的对外交流和宣传。1993 年 6 月在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的“首届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上，昭通鲁甸县玄天观，临沧凤庆、保山腾冲道教协会以及李宗稳、赵宗顺等 9 人受到表彰。





## 云南道教文化

道教文化分为道教物质景观和道教礼仪两大部分，主要包括道教建筑、道教科仪和道教哲学、医学、音乐、文学、艺术等等，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云南地处边远，道教文化独具特点，由于资料和篇幅所限，于此我们仅涉及云南道教的宫观、高道、文献典籍和音乐。

### 第一节 云南道教宫观

道教的活动场所称“道宫”、“道观”或统称“宫观”，是道士进行修行、供奉神灵、斋醮祈禳等宗教活动的场所。宫的最初含义是房屋或居室。《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由此可知，“宫”是穴居场所的一种变革产物，

上古时，贵族平民所居的房屋都可以叫“宫”。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兴建咸阳宫、阿房宫，“宫”便成了帝王居所的专称。“观”，原来表示“看”的意思，即台上有楼可以观远者，谓之观。如《论语·为政》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相传关令尹喜得知老子欲过函谷关，便在陕西周至县“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此楼称“楼观”，后许多道士集聚此处修炼，形成楼观道派。

早期道教宫观称“治”、“靖”或“馆”。“治”即五斗米道设置的“二十四治”，为五斗米道的传教和祭祀神明、修道的地方，大多设在山中，“置以土坛，戴以草屋”，“治馆之兴，始乎此也”。<sup>①</sup>“靖”与静相通，表示入室修养而宁静。“馆”也是“客馆”，多指仙人所居的屋宇，即称“仙馆”。作为道教修炼的一种场所，“治馆”起于汉末。北周武帝改“馆”为“观”。自唐朝起，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道教大兴。唐在终南山下建造“宗圣宫”，以祭祀老子，各地也依照朝廷的敕命建造许多宫殿，自此以后，规模较大的道教活动场所称“观”，凡是经帝王敕封的称“宫”。但由于神明信仰的多元，各地道教宫观的形式则各具特色。<sup>②</sup>

道教宫观主要建于名山大川，旧谚说：“天下名山佛道半”，或说是“居住境者，半多黄冠缙流；咏名山者，全属高人逸士”<sup>③</sup>。云南也如此。云南虽地处偏远，但山灵水秀，胜色可餐，对道教修士们有着巨

① 道宣：《广弘明集》卷一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转引自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66页。

②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1页。

③ （清）沈宗彝纂修：宣统《楚雄县志》卷五《祠祀述辑·寺观》，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楚雄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078页。

大的吸引力。

隋唐时期，随着统治者提倡道教、敕封祀奉老子，中国的道观兴建形成高峰。云南有内地道士来此间云游修道，本地道士也纷纷筑庐辟观，据《新纂云南通志》载，云南的新兴（今玉溪市）玉皇阁、蒙化（今巍山县）玄珠观便始建于这一时期。宋元时期，建有昆明长春观和雷祖殿、安宁月林庵、镇南州（今南华县）栖仙寺和玉皇阁、元江万寿宫、黑盐井玉皇阁、新兴永丰寺等。

明代云南道教极为兴盛，道观兴建增长很快。这与四川和内地不同，因为明朝“非赐敕不得建寺观”，四川与中原宫观的兴建受到中央王朝的控制，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以万历《云南通志》和《新纂云南通志》所载可知，云南建于明代的道观约有103所，分布于全省的52个州县（参见附录《云南道观一览表》）。与元代道观兴建最高数额不及6所（不完全统计）相比，其增长数额近20倍，明朝云南地区道观兴建之盛一目了然，而且，多是道教建筑群。昆明三清阁原为元梁王避暑行宫，到明洪熙、宣德年间（公元1425—1435年），在世袭镇守云南的沐氏的支持下，山上大兴道观，形成一组气势非凡的组群建筑。明末，徐霞客游太华山，称山上寺观“如蜂房燕窝，累累欲堕”。寺有南北二庵：北庵有灵官殿、纯阳殿、玄帝殿、玉皇阁、抱一宫，“皆东向临海，嵌悬崖间”，极为险峭；南庵有雷神庙、三佛殿、寿福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等，“崖更崇列，中止濠坪一缕若腰带，下悉隄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间梵宇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次第连缀”，“更南则庵尽而崖不尽，穹壁覆云，重崖

拓而更合”<sup>①</sup>。明时西南地区形成的道教建筑组群，以巍宝山影响最大。其山位于巍山县东南，南诏时期已有道观兴建。明朝建准提阁、甘露亭、报恩殿、文昌宫、主君阁、玉皇阁、斗姆阁、三皇殿、观音殿、财神殿、太子阁、朝阳洞、元极宫、培鹤楼、含真楼、道源宫、云鹤宫、长春洞、望鹤轩等大小宫观二十余所，成为西南地区影响仅次于青城山的一处道教名山。<sup>②</sup>

云南地区偏离中原最远，清朝时期，中原道教各派次第衰落，对云南的影响并不大，云南道观的兴建基本上保持了前代的兴建势头。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清末云南地区共有道观465所，除去204所兴建年代待考而外，在其余261所道观之中，可以确定是清代的约有142所，占1/2强，足见清时云南地区的道观兴建仍然很盛。<sup>③</sup>这与中原的急剧衰落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在465所道观中，多数均为嘉庆年间，特别是同治年间以后重修与新修，由于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政局不稳定，加之咸同兵燹，而使云南地区的道观出现修复兴建的趋势。

据昆明金殿《皇清敕授登仕佐郎云南都纪司龙门正派第十九世师李元龙碑》载：清代咸丰年间杜文秀起义时，“兵火日炽，梵宇琳宫，遍遭洗劫”，全省道观烧毁无数，“太和宫罹祸惨巨，劫火烛天，道众罹难者以十数，庙中什物，悉遭窃掠”。变乱平息之后，李元龙又“藉会城绅士力，重修真武像”，“起宫楼、后殿若干间，营造七星旗以应北极之象”。从附录《云南道观一览表》和大量的地方史志也可证明这一

①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735页。

②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66页。

③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第77页。

点。云南许多地方的道观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新建或重建的，有数十处之多。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主张破除封建迷信，于1928年开展“庙产兴学”运动，并颁布“神祠废存标准”，道教的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狐仙等神祠及画符念咒等宗教活动均在废除之列，仅有伏羲、神农、黄帝、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宫、天师、关帝、土地、吕祖、风雨雷神等神祠得到保留，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道教殿阁的增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通志馆采访调查当时云南宫观状况是“明清之际，固尝盛极一时，各地道观，如琳宫贝阙，彼此相望，金碧辉映。曾几何时，顿现衰颓之象，竟随晚清国运以终，亦可慨矣！”全省信仰道教人数为4 080多人。<sup>①</sup>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云南地区所有道观由数百余所锐减至数十余所。至1955年，云南全省仅有道观46所，其衰落之剧由此可见。

经历“文革”浩劫后，随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落实，道教活动逐步恢复。1996年统计，全省开放道观有60所，即将开放的道观27所。随着云南道教不断恢复发展，道教宫观修复兴建非常多，分布也很广泛。据2004年省宗教局提供道观正式登记并年检合格的宫观和活动场所有127所，主要分布于昆明（3）、昭通（8）、曲靖（2）、大理（39）、保山（63）、德宏（1）、临沧（11）等全省多个州市。昆明真庆观因昆明市道教协会入住其中的都雷府，开展宗教活动，多方协调后，于2005年9月8日正式批准为道教活动场

<sup>①</sup> 《云南各县道教概况表》，见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抄本。

所的。同年12月，东川三元宫也正式开放为道教活动场所，昆明开放宫观增至5所。这统计仅限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已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由园林等其他部门管理的属于风景名胜地的道观，有的并不在统计之列，比如昆明3所道教活动场所是指盘龙区蒜村的万寿宫、安宁紫霞观、晋宁玉皇阁，而不包括历史上著名的金殿，黑龙潭，西山三清阁、龙门石窟等道观。<sup>①</sup>

从文献和实地调查结果看，云南的宫观在历史上大多建在汉族聚居区，或是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云南历史上道观甚多，明清两朝建立了许多宫观，主要有昆明黑龙潭、金殿、真庆观、三清阁、龙门石窟、虚凝庵、铁峰庵、关圣殿、兴国寺，宜良岩泉寺，通海秀山，石林万仙阁，会泽白衣阁，昭通大龙洞，鲁甸玄天观，威信观斗山，个旧宝华山寺，蒙自缘狮洞、玉皇阁，建水真武宫、天君庙，泸西桃笑山玄天阁，文山大兴寺，大理中和寺，剑川金华山、三圣宫，祥云普溯老君殿，云龙玉皇阁、虎头山，保山太皇阁，腾冲云峰山，临沧子孙庙、三清宫、三元宫，凤庆东山寺，景谷大石寺等，这些宫、观、亭、台、楼、阁多是与绮丽的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或以林掩其幽，或以山壮其势，或以水秀其姿，形成了自然山水与建筑结构相融洽的独特风格。为云南的风景名胜增添了一座座人文景致，也给人们留下了一段段优美的传说，给云南的许多风景名胜增添了道教文化的色彩。

<sup>①</sup> 萧霁虹：《云南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见杨学政主编《2006—2007云南宗教情势报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6页。

## 一、滇东北地区的道教宫观

滇东北地区主要指今昭通市和曲靖市，这一地区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道教传入亦早的地区。

早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从内地传入的观念意识和生活习俗的表现，在这一地区就随处可见。1901年在昭通发现东汉时的《孟孝琚碑》，这是现存云南地区时代最早较完整的碑刻。碑文说：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人孟孝琚12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三卷”，未婚先聘，死于内地而由族人归葬祖茔。可知孟氏自幼研习汉文，对儒家典籍相当熟悉，其家族在婚、丧方面亦遵循内地习俗。《孟孝琚碑》由朱提郡人士撰写，文笔典雅流畅，并称孔子为“大圣”，这些都表明内地文化在昭通一带的深刻影响。朱提郡是五尺道必经之地，这一带也是移民大姓集中的地区，孟孝琚就出自朱提大姓家族。与之相类似熟习儒学并遵循汉族习俗的情形，在滇东北地区的移民中是比较普遍的，正如晋人常璩所说：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犍为郡“士多仁孝，女性贞专”。<sup>①</sup>在第一章我们也曾叙述，五斗米道设置的“二十四治”之一的稠梗治在犍为郡，范围涉及今昭通和曲靖的部分地区，所以昭通、曲靖史志和道教界一般都以此为据，认为东汉末年道教首次传入滇东北。

云南著名的《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是晋南北朝时期与宁州大姓有关的碑刻。《爨龙颜碑》于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立于云南省陆良，《爨宝子碑》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扬旗田，立于东晋义熙元年

①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219页。

(405年)。这两块碑都出土于曲靖地区，并叙述爨氏大姓的事迹，因此合称“两爨碑”，其中《爨龙颜碑》因面积较大字数较多被称为“大爨碑”，《爨宝子碑》则称“小爨碑”。“两爨碑”所言之爨宝子和爨龙颜未见于史籍记载。从碑文得知他们都是建宁郡同乐县（治今陆良）人，为爨氏大姓的上层人物。爨宝子官至建宁郡太守，于23岁时病死。爨龙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宁州地区的显贵，他本人据称官至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两爨碑”同样反映了东晋南朝时期宁州大姓醉心于汉文化，并奉内地习尚为圭臬的情形，如宗法观念，《爨龙颜碑》说爨龙颜是“颛顼之玄胄，才序祝融之眇胤也”，系其家世于黄帝之孙颛顼，又说：“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寓有出身非凡后裔必当显贵之意，还说爨龙颜“乡望标于四姓，邈冠显于上京”，这些均为受秦汉以来封建宗法思想和魏晋门阀观念影响的反映。特别是符谶观念，汉代以来谶纬神学在内地十分流行，“两爨碑”也有反映符谶观念的内容，如《爨龙颜碑》的碑额上部有青龙、白虎和朱雀，其左右刻日和月，日中有三足金乌，月中有蟾蜍，象征着“日月同辉”。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在汉代称为“四灵”，也有象征祥瑞的含义。月中蟾蜍源于后羿的故事，以汉代道家的阴阳观来解释，月为阴蟾蜍为阳，月中蟾蜍为阴系于阳。<sup>①</sup>“四灵”和“日月同辉”可谓是道家、道教思想在曲靖、昭通广为传播的史证。而且，《华阳国志》记载：“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床降都督治南昌县。”魏晋时期昭通为蜀国南中朱提郡，修通犍道，加强了昭通、曲靖与四川和内地的交往，这时期认为是道教

① 《西南通史》，第220页。



再次大规模传入滇东北。

明清时期，随着外地移民的大量迁入，道教全真派传入昭通、曲靖，并且募化银两，修建、扩建了许多道观。据明朝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清代李恩光纂光绪《平彝县志》卷七、缪果章纂民国《宣威县志稿》卷三记载，曲靖在明朝兴建道教宫观有：平彝（今富源县）古城寨下的三元宫，明洪武中（公元1368—1398年）黔国公沐英建；马龙中和山上的玄武观，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冬创建；马龙的习仪上真观、宣威内城西北隅的三清宫都是明代所建。清朝、民国创建重修十余所。

从《昭通旧志汇编》<sup>①</sup>收录的15种清朝、民国的昭通地方志中，可发现目前有文献记载的昭通道观创建最早的时间是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龙门派第七代法师陆常崇为元宝山庙宇住持，“发宏誓愿扩修庙宇，遂往各厂募化得数千金……回山大兴工作另建正殿、两廊，崇高山门，庙貌岿然矣。”<sup>②</sup>建成元宝山道观，之前庙宇始建于何时还有待考证。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昭通城北郊大龙洞建龙王庙，有道人周永清（大关人）住庙。光绪年间扩建，龙王大殿塑龙王神一尊，左右为文武魁星，观音殿塑有观音像。农历二月初八赶庙会，城乡居民参会二三千人。到1930年，昭通道教庙宇甚多，有“庙靠庙，庙连庙”之说，庙宇有昭通县大龙洞、元宝山、葡萄井、白龙庙、三官庙、老君庙、元龙山庙、遇仙洞、

① 编辑委员会编：《昭通旧志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收录《恩安县志稿》、《昭通志稿》、民国《昭通县志》、《昭通等八县图说》、《昭鲁水利工程志》、《巧家县志》、《永善县志略》、《绥江县志》、乾隆《镇雄州志》、光绪《镇雄州志》、《大关县志稿》、《大关县志》、《盐津县志》、《乌蒙纪年》、《鲁甸县民国地志资料》等15种清朝、民国昭通地方志。

② （民国）符廷铨等修，杨履乾纂：民国《昭通志稿》卷六，见《昭通旧志汇编》第1册，第222页。

王公庙、吕祖阁、凤阁庙、玉皇阁、西王庙、武庙、川主庙、火神庙等二十多处，主要分布在城内、北闸、洒渔等地，民国期间昭通境内信教徒上万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滇东北地区道教信仰人数约 1 570 多人。<sup>①</sup> 20 世纪 50 年代，活动场所减少，只有凤凰阁、大龙洞、元宝山 3 处。<sup>②</sup>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实，1983 年昭通市政府从四川青城山邀请龙门派第二十代弟子戴明春住持大龙洞道观。据 2004 年云南省宗教局年检统计，昭通有教职人员 26 人，信教人数 5.6 万多人，有 8 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官观活动场所；曲靖有教职人员 2 人，信教人数 1 837 人，有 2 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官观活动场所。<sup>③</sup>

### （一）大龙洞道观

位于昭通市城北 10 公里外的九龙山上。山脚林荫深处有一个天然溶洞，一泓碧水经洞中流出，泉水的出口处像一个巨大的龙头，故被称为“大龙洞”。泉水甘甜清冽，是昭通城的主要水源，传说西汉犍为属国都尉文齐，率民“开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引龙洞水灌溉田地。之后当地民众饮水思源，在此祭祀文齐。东汉时期建龙神祠。

清乾隆五年（公元 1740 年）扩建，大龙洞正式建为道教宫观。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 年）有道人周永清住庙，咸丰年间有龙门派道士旷永曜来居住。大龙洞深入崖壁 2 米余，中高约 8 米，宽 30 来米，外口呈半月形，其上崖壁斜生灌木绿树，石乳倒悬，洞

① 《云南各县道教概况表》，见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1931 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抄本。

② 见《昭通地区志·宗教篇》第五章《道教》第 235 页以及笔者调查资料。

③ 萧霁虹：《2004 年云南宗教动态分析》，熊胜祥、杨学政主编：《2004—2005 云南宗教情势报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6 页。

壁多凹凸不平。正面立有高达四米的彩塑三座，中为张道陵天师像，左、右分别是真武祖师和吕祖纯阳，三像须髯飘飘，或红衣、盔甲，或蓝衣纶巾，皆剑不离身，仪容肃然。塑像后壁及左右另有小型观世音、福禄寿星和龙虎造像，像前香火氤氲，洞壁有清恩安知县汪人瑞题“云霞蒸蔚，水远流长”摩崖石刻，还有石碑上触目玄言道语，俨然一派道门气象。

现存木构建筑属清光绪时扩建，宫观占地面积约100亩，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倚山临水，景色绮丽。主建筑前的水滨坪地上，立着一座气派雍容、古色古香的戏亭，此亭初建于1765年，遭损后1983年重建。戏亭台前呈正方形，边长约六米，亭顶盖琉璃瓦，其檐四方八角，檐下画栋绘梁，上有“西厢”等人物，风景彩绘数幅。戏台栏杆相围，高两三尺而无攀援之梯，但上之不难，台下中空，连柱设有坐槛。距亭两三米围有石栏。以三清殿为中心的中轴线布局，依次有大山门、中山门、内山门（俗称“三重天”）、戏台、三清殿、吕祖殿；在中轴线上，另有观音殿、三霄殿、财神殿、五祖殿、魁星楼，为一进二院，配殿、二庑组成。有三清、观音、吕祖、三官、天师、五祖等道教造像五十多尊。每年有二月八庙会、观音会、丘祖会、玄天会、九皇会等道教节庆，按时在宫观内举行，自建观以来一直是滇东北道教的活动中心。

## （二）元宝山

位于昭通市昭阳区东南，为清代“昭阳八景”之一，有“宝山环翠”之说。元宝山曾为道教龙门派数代传人静修之地，并建有道观，塑有灵官祖师等神像。民国《昭通志稿》卷七《释道》载：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龙门派七代传人陆常崇扩修，“另建正殿，两廊崇高，山门庙貌岿然”。乾隆四十八年

(公元 1783 年) 龙门派八代师陈守元“体师志培修……开宝山观音堂，辟灶君殿，庙宇依然一新矣”。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庙遭回禄(即火焚)”，龙门道派传人龙清池“募化七千余金，兴工复修，庙貌依然，更筑以石墙，树以石坊，建戏台，栽林木，置产业，时称盛，是后五属(昭通、镇雄、大关、永善、巧家、鲁甸的统称)之人每年上巳日，咸来瞻礼”，所以，每年“三月上巳，庙中香市，士女杂遝，三日之内，络绎不绝”。昭通历史上曾有三月三“元宝朝拜”的盛况，元宝山曾被昭通人视为灵山福地，消灾祈福之所。

### (三) 威信观斗山

在威信县高田乡新华村境内，距县城扎西镇 44 公里，东南与四川叙永、兴文县地毗邻，主峰香山顶海拔 1 880 米。传说明朝末年观斗山上就建有庙宇，以吴三桂朝山观星斗而扬名。民国十九年(1930 年)，有道首石化宣、石沛宣兄弟，以“扶乩”问神为宣传手段，劝募滇川毗邻地区的士绅庶民捐资出力，大兴土木，历时 20 年，在观斗山修建了号称“九殿仙境”的庞大寺庙建筑群。曾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9 年修复。各殿供奉神祇雕像 63 尊，多为石雕造像，石兽 24 对，浮雕 80 多组 300 多件，碑刻 12 块，石柱、石础也尽是雕刻精致的石刻作品，整个石雕造型特别，凿刀圆熟，工艺精湛。据碑文记：观斗名山“起鼎于昆仑，源流陕西，缠扶艮龙之元气，飘转于中国，二龙盘绕所结。正干左转右旋，而出镇雄摆罗，高耸金星结鼎，凝就观斗山”。

### (四) 飞来寺

位于师宗县南部龙庆乡豆温村正乙山的悬崖峭壁

之上，距县城约 50 公里。相传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 1614 年），建寺时曾选址于两公里外，破土前梁柱材料自行飞至现址并构架成型，人们认为这是神意，便称为“飞来寺”。清嘉庆二年（1797 年）兵燹被毁，仅留大殿石崖后壁。6 年之后重建，占地约 1 500 平方米，殿阁依山势拾级而建。由山门、子孙殿、关圣殿、海潮堂大殿以及两厢、两耳、四配殿组成。寺前有一潭清泉，相传常饮此泉水能驻颜长寿，寺内住持因常饮而高寿，故游人争相饮用。子孙殿内供观音塑像，面容慈祥端庄。子孙殿后九级石阶之上为关圣殿，内塑关圣塑像。出关圣殿经十八级台阶可到海潮堂大殿，这是飞来寺的主体建筑，整个大殿依悬崖峭壁插梁而建，气势雄险壮观。殿前有两棵高大梧桐，枝叶繁茂，肃穆庄严。大殿为单檐悬山顶，七檩抬梁式结构，面阔三间约 13.5 米，进深两间 7.7 米，殿高 8 米，向檐出廊，长 13.2 米，整座大殿梁架规整。在建筑装饰上，檐、柱、门、窗皆有雕刻彩绘，精巧柔丽，清幽别致。最为奇特的是殿内正壁是将山崖凿成平面，以崖为壁，匠人在山石上刻绘出“海潮龙王嫁女图”，崖画左边为十八罗汉，右边为西游记故事人物，形象逼真，工艺精美。

## 二、滇中地区的道教宫观

滇中地区指今昆明市、玉溪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相当于近年考古成果表明的滇文化分布区，即在东北至曲靖，西到禄丰，东达陆良，南抵元江的云南中部偏东地区，与秦汉时期滇国的地域范围大体相当。西汉时，滇的中心在今云南晋宁县境。特别是元至元十一年（公元 1274 年）赛典赤·赡思丁受命在云南建立行省，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赛典赤把军事

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并把行政中心从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sup>①</sup>，自元代以后，滇池地区再度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道教宫观在元、明、清时也随之不断兴建。

在史志文献中，记录了滇中地区的元代道教宫观。元武宗至大元年至四年（公元1308—1311年），道教长春观在昆明建成，元代建成的还有昆明真武祠和龙翔街的雷祖殿<sup>②</sup>、镇南州（今南华）玉皇阁和栖仙寺。<sup>③</sup>、新兴州（今玉溪）东北白塔山上的永丰寺<sup>④</sup>。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五载：“镇南为濮蛮旧地，承南诏遗风，崇信释道，故广福栖仙，诸寺皆建自元时，历年久远，是亦考古者所不废也。”“玉皇阁在城正中，一名三层楼，旧志谓‘州城如船，中建层楼，高耸如桅以镇之’即此。旧为广福寺，后殿建自元时，明季沙定洲之乱被毁。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知州岑鹤重建。嘉庆间灾。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州人公建。”“栖仙寺：在城东二十五里五栖山麓。南诏时羽士王载元、张明亨栖止于此。载元仙去，明亨随亦羽化，寺因此得名。建自元时。”明代在云南（今昆明）、大理、永昌、楚雄4府设管理道教事务的道纪司，明、清、民国道教宫观兴建尤盛（详见附录《云南道教宫观一览表》）。民国初期昆明市道士约112人，所住宫观25所，如近郊之三清阁、太和宫、龙泉观、虚凝庵、真庆观等其最著者。<sup>⑤</sup> 20

①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第104页。

② 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32-18。

③ （清）李毓兰修，甘孟贤等纂修：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五，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刻本。

④ （清）任中宜纂修：乾隆《新兴州志》卷四。

⑤ 《昆明县地志资料表解》，民国十年（1921年）抄本，第11页；张维翰、童振藻等纂辑：《昆明市志》，1924年铅印本。

世纪三四十年代，滇中地区道教信仰人数约 1 560 多人。<sup>①</sup> 据 2004 年云南省宗教局年检统计，昆明有信教人数 300 多人，3 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官观活动场所；三个地区教职人员无统计，玉溪、楚雄无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官观活动场所和信教人数统计。<sup>②</sup>

### （一）真庆观

真庆观是位于昆明市区内拓东路与白塔路相交处的道教古建筑群。由于此地自古就是云南府（今昆明）城东通京大道的一侧，而且“地平衍丰沃，清洒窅深。渠通龙泉松坝之源，山接金马碧鸡之胜”，又是颁布朝廷诏命、奉迎朝臣使节的地方。<sup>③</sup> 宋、元时建有“真武祠”，明初时真武祠已是“殿宇凋敝，神物故闕”。“永乐初，郡人发心同募众作新之”，由“前卫镇抚刘志与郡中耆士鸠赏僱才”，新修真武阁，规制宏远，迎请著名道士蒋日和祝釐讲道。当时，长春真人刘渊然谪置云南，“日和尝得法于座下，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sup>④</sup>

永乐十六年（公元 1418 年）统治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兄弟为了使“朝使节钺之往来，藩阃方岳之出入”的地方“廓而大之”，“遂遴选长春观炼丹师蒋日和”“以主其事”<sup>⑤</sup>，蒋日和由此开始对真武祠进行重建。他花了大约六年的时间“与诸徒营工募匠，辇材木，陶瓴甃。……建佑圣殿于其中，崇上皇阁于其后。

① 《云南各县道教概况表》，见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1931 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抄本。

② 萧霁虹：《2004 年云南宗教动态分析》，见熊胜祥、杨学政主编《2004—2005 云南宗教情势报告》，第 6 页。

③ （明）应履平：《重修真庆观记》，见庄毓纹主编《昆明诗词楹联碑刻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 月，第 152 页。

④ （明）金问：《真庆观兴造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 1257 页。

⑤ （明）应履平：《重修真庆观记》，见庄毓纹主编：《昆明诗词楹联碑刻集粹》，第 152 页。



左翼以星垣宝藏，右辅以雷殿天神，以及廊庑山门，方丈斋庖，像彩幢盖，与夫香火之供奉，莫不井然，各发仪度”<sup>①</sup>。工程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落成。这年正值刘渊然被召还京，他请仁宗皇帝将真武祠改名为真庆观，复加蒋日和为“明真显道弘教法师”之号，便为此上请皇帝赐名“真庆观”，于是真庆观就有了“真则真武所居，万人瞻仰。庆则一人有庆，兆民赖之”<sup>②</sup>的赞誉。而得到皇帝赐予法师名号的蒋日和，“既承奖异，益思有以自效”，自然更想有所作为。于是，由沐晟兄弟出资，再次对真庆观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建，“攻石累土，大其前殿，夹以两庑，障以重门，像设尊严，器用周备，而四帅轮藏各实其所……复然先圣之清都也。”<sup>③</sup>在蒋日和苦心营造下，真庆观一度成为昆明地区香火最旺的道教官观，在道教界的地位大为提高。保存至今的紫微殿（真武殿）即为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建造完工。紫微殿其建筑样式与北京智化寺如来殿、万佛阁类似，体现了中原文化对云南边疆文化长期的浸润，是我国古建筑的瑰宝。

在蒋日和修建真庆观的过程中，刘渊然另一位高徒邵以正也十分关注真庆观的修造，他是刘渊然向皇帝引荐入京的云南道士，历任道录司右至灵、右演法、左正一等职，主管京师道教，并主持编修《正统道藏》。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他请时任翰林修撰、侍读学士周叙撰写并书丹《重建真庆观记》，由提刑按察司的金事，景泰年间当过云南巡抚的郑颢篆额；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又请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应履平拟定《重修真庆观记》；正统九年（公元

①（明）应履平：《重修真庆观记》。

② 同①。

③（明）金问：《真庆观兴造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57页。



1444年),邵以正又请太常寺少卿金问撰写《真庆观兴造记》。<sup>①</sup>正是因为邵以正的热心,把这三通碑铭镌刻石上,清晰地留存了五百多年前真庆观的兴造历史。

真庆观自明正统以后嘉靖及清代康熙、乾隆朝,都有修葺和扩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除大殿外,皆毁于战火。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逐步恢复重建了部分建筑。真庆观主体建筑布局坐北朝南,呈中轴对称结构。原建筑系沿中轴线由前殿、紫微殿和老君殿三个单体建筑组成,两侧建有厢房,形成一组封闭院落。清代康熙年间和光绪年间,分别在原建筑东侧建起了都雷府和盐隆祠两组建筑。前殿东侧都雷府,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后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重修。都雷府系祭祀雷神的殿堂。雷神又称雷公、雷师,是古神话中司雷之神。雷神被纳入道教神系,尊为“雷声普化天尊”,并认为主天之灾祸,持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都雷府原为一单套建筑,占地面积约720平方米。单檐门楼式大门,四角上翘,都拱承载。都雷府大殿门前为清风亭。1881年,云南盐商在都雷府北边集资建盐隆祠,由戏台、前殿、大殿和左右厢房组成。在这个过程中,真庆观供奉的神仙及各殿宇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原真武殿内供奉的真武大帝改奉“紫微大帝”,因此,殿名也改为紫微殿。中天紫微北极大帝有“万象宗师”之称。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等1938年考察紫微殿时,所摄的照片上“万象宗师”的匾额仍历历在目。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曾下令废止道教的部分活动,真庆观改为全省火柴专卖处第一制造厂厂址,都雷府也成为第六区第九保会场。不过,这批规模宏

<sup>①</sup> 卜保怡:《从明代碑刻解读真庆观》,《云南日报》,2006年5月10日第3版。

大、建构精美的建筑却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1947年，时任昆明市市长的曾恕怀就颁布了保护真庆观的布告，并立碑告示。这是昆明历史上第一块保护古建筑的碑文。

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真庆观仍然被工厂、单位占用，并演变为居民大杂院，但人们没有忘记对真庆观古建筑群的保护，1957年，市人民政府曾组织翻修了紫微殿屋面，拆换了朽损的脊檩，仍保留古建筑原貌。经修复的紫微殿为占地面积约320平方米、面阔五间的土木结构建筑，单檐歇山式屋顶，抬梁式六椽袱带前后廊，檐下斗拱粗大疏朗，内檐斗拱为六铺作重拱计心造，斗拱尾端的菊花头、六分头都具有明代建筑的特征。真庆观建筑的突出特点是屋顶内设覆斗状木构藻井，当心间七架梁，按九宫八卦设计，井顶绘八卦太极图并饰以微型如意拱，繁密华丽，工艺精湛，藻井造型四周绘有花卉图案，在红柱绿梁色彩衬托下，更显典雅华贵。此覆斗状木构藻井在云南省内古建筑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大殿风格，据刘敦桢先生对照，与北京智化寺如来殿、万佛阁类似。疑为刘渊然从京城输来图样，或延请京城师傅设计，亦未可知。”<sup>①</sup>1983年，昆明市政府将“真庆观古建筑群”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对紫微殿进行修缮。199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又将其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再次维修紫微殿。2001年10月至2003年4月，云南省、昆明市和盘龙区三级政府及企业投入一亿一千多万元，对真庆观古建筑群进行了全面的保护性修复，历时两年余建成“真庆文化广场”。公元2005年9月昆明市道教协会在都雷府正式挂牌，都雷

<sup>①</sup> 王海涛著：《昆明文物古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46页。

府成为昆明市第四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活动场所，2006年6月真庆观成为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二）龙泉观

龙泉观位于昆明市北郊15公里处的龙泉山（又名太极山）五老峰脚下，黑龙潭公园内。清朝云贵总督阮元根据《汉书·地理志》载“益州有黑水祠”，认定此道观就是古代的黑水神祠，有“滇中第一古祠”之称。这是由下观黑龙宫和上观龙泉观组成的一片古建筑群。

据明代王景常《龙泉山道院记》<sup>①</sup>载，“自蒙段时，水旱必祷”于此，泉水东南流，溉田数百顷，民赖其利，“元初，尝构祠祭之，中遭兵难，祠毁”，明初，西平侯沐公“以为此邦微是泉，禾稼且槁死，而祠宇弗葺，神灵不栖”，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肇于泉之旁构祠以栖神。”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又择地之高亢构道院一区，以为之镇”。<sup>②</sup>由此建成龙泉道院，“院之东堂曰‘栖真’，宾游之所。西轩曰‘超玄’，休偃之所也。北为重堂，以奉天师像”，并任命道士徐日暹为住持。

明洪武年间，西平侯沐公已将龙泉道院建成“一目丘坂弥漫，数百里碧鸡、玉案诸山罗列几席，东盘西纡，辐辏如束，真世外之桃源”的胜境，而且已是“道家者流”，“襁崇相近之所”<sup>③</sup>。所以，永乐初年，深得明成祖朱棣宠信而升迁左正一的高道刘渊然，因性情耿直，触怒权贵而被谪置江西龙虎山，又谪至昆

①（明）王景常：《龙泉山道院记》，碑现存昆明黑龙潭公园。

②（明）郑顺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8月，第22页。

③（明）王景常：《龙泉山道院记》，碑现存昆明黑龙潭公园。

明后，他便到龙泉道院传道。刘渊然精通道经典，道行高妙，在云南人民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龙泉观）求济，无不得所愿欲”。<sup>①</sup>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刘渊然钦承仁宗诏书回京，得赐号“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长春真人”，诰加“庄静普济”四字，并主“领天下道教事”，给二品印诰，成为显赫一时的全国道教领袖人物。刘渊然奏请仁宗皇帝始更名真武祠为“真庆观”、龙泉道院为“龙泉观”<sup>②</sup>。龙泉观的称谓由此始。

真庆观明清两代曾经几次维修、扩建，现存的建筑规模、结构，就是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增建三清殿后的形式，建筑分为上下两个道观。

下观黑龙宫是始建于明朝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的一进两院式建筑。外院置有一长方形香炉，其正反两面都刻有八卦图，两个侧面是北斗七星图，在里院天井的水池中有一条形态逼真的戏水黑龙雕塑。传说它就是云南掌管着兴云播雨的都龙王。正殿龙神庙正坛上供奉的身穿解袍的龙王和雷神电母、雨师风伯等一些掌管兴云降雨的神灵塑像。殿内两棵中柱上盘绕着黑龙、黄龙各一条。现存的黑龙宫大门两侧巨大的圆窗木格，保留了早期庙宇建筑特征，显示出古朴的厚重。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祷雨济旱是国之大事，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吏都有为国为民祝祷的职责。所以昆明黑龙宫一直盛传着明代西平侯沐公、高道刘渊然，清代云贵总督林则徐来此为民“祈雨有验”的历史佳话。

黑龙宫前面的池潭便是黑龙潭，碧泉若镜，中间

①（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②（明）周叙：《重建真庆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53页。

有石桥为界，将池潭一分为二：北边是浑水潭，面积约2600平方米，水深不足1米，水色浊黄；南边是清水潭，有600平方米，平均水深7米，水色清澈。两池水相连，而水色迥异，泾渭分明，仿佛道家常说的阴阳各半的“太极图”，形成天然的“两池相交鱼不往，一桥横断水色殊”的景致。

上观龙泉观依山面潭，是一组完整的道教古建筑群。整座建筑依山势地形逐次升高，错落有致。它沿中轴线由观门、雷神殿、祖师殿（有的称“北极殿”）、玉皇殿、三清殿共五进组成，两侧配以厢、庑、祠、阁，形成大小13个院落。观门是一座面阔三间的五脊牌楼，基座为青砖砌成，高约1米，立柱深入基座，未用夹杆石。门前筑石砌地坪，山崖边缘有弧形石砌围栏。观门匾额书“紫极玄都”四字。入观门第一院是一通道形院落，中道两侧各有3米见方的天君殿，东面供奉马天君、温天君，西面供奉殷天君、王天君，院内植有几株古柏，迎面即为雷神殿。

雷神殿始建于明朝初年，悬有“汉黑水祠”及“雷神殿”匾额，据说“汉黑水祠”是清朝云贵总督阮元书写。面阔三间，约14米；进深三间，约11米。单檐悬山式屋顶，置团花格扇和窗棂，为一过厅形式，两侧是2003年恢复修葺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神像。

祖师殿是第二进院的主体建筑，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两侧山墙沿檐柱砌筑，使两侧廊子成为两间，于是就变成了通面阔达20米的五间。进深四间，约16米。明间、次间和稍间皆装置一色的团花格扇和窗棂。殿内原有明洪武年间所铸“九天金阙化身北极真武玉虚师相仁威上帝荡魔天尊”铜像，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现供奉的玄天祖师和龟蛇二将军的木雕金身像是20世纪80年代一台湾商人捐制。祖师殿外

游西墙前保存有一口铸造于明朝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的“北级真武灵异祥瑞铜钟”。殿前有方形台基，前、左、右三面砌石护栏，上有“龙腾致水”雕刻。殿前基台附御道，上有青石透雕云龙。御道前有“八卦宝鼎”，高1.58米，鼎身铸阳凸八卦图，沿下一周铸有篆书二十八宿名，为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铸。铜鼎东侧是著名的唐梅、宋柏。加之祖师殿西侧一角的明茶树，构成黑龙潭“三异木”奇景。

祖师殿西侧斗姆阁，面阔、进深各一间，方方正正约5米，屋顶仍是单檐歇山顶，内供奉三目、八臂（两臂在胸前，其余六臂分别执日、月、宝铃、金印、弓、戟）斗姆神像，两边站立的是二女协侍。据当地道士介绍，“文革”扫四旧时，斗姆阁是堆满杂物的库房，这三尊神像是整个道观群保存至今的清代塑像。

祖师殿东侧原为“真人殿”，现为碑亭，旁边是花厅，花厅与碑亭另一出口又组成一院。碑亭内立有《重修龙泉观德牌》、《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龙泉观通姓真人祠堂记》等明代以来有关龙泉观历史、传说的碑刻二十余通，最著名的是刘渊然所画灵道符“道符碑”，俗称“凸字碑”，上面所画的道符为“万物生之”四字构成，本为凹刻，但由于笔画特殊的断面形状，定眼看时，把实际的阴刻凹字体误认为是阳刻凸出来之感，引人迷离。碑的左边刻有“玉虚师相现天上帝受天明命剪魔精镇天宝符万神斩令安镇国祚保世康民锡尔鸿禧其永宝之”；右边刻有“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普济长春刘渊然书，大清嘉庆三年戊午岁仲冬月吉旦追泐”字样。

祖师殿东侧上石阶是玉皇殿。玉皇殿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规制大体与祖师殿相仿，檐下亦用格扇，裙板雕“寿”字云纹。殿内正中塑玉皇大帝，左、右为皇天、后土、大帝，外左、右为北极，南极祖师大

帝。殿两侧各有围墙隔成一院，西侧院内建筑已拆，东侧院内是文昌阁。文昌阁面阔三间约 21 米，进深两间约 15 米，单檐歇山屋顶，殿内供奉文昌帝君和土将神、次将神、贵将神、司禄神、司命神、司寇神七尊神像。从玉皇殿东侧沿石阶再往上走，便进入龙泉观位置最高的院落。主建筑是三清殿，该殿面阔三间约 23 米，进深两间约 16 米，单檐悬山式瓦顶。系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 1819 年）重修。龙泉观于 1993 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被列为云南省第四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 年 6 月 8 日黑龙潭公园上观正式移交云南省道教协会管理和使用。

### （三）太和宫

太和宫位于昆明市东北郊 7 公里的鸣凤山上。因有一明代全铜铸成的“铜瓦殿”，故又称“金殿”。鸣凤山又名鹦鹉山，其山势嵯峨，“远则九龙奔朝，近则双凤连翼”，“左挹华山之秀，金马腾辉；右临昆海之滨，碧鸡焕彩”，是滇中地区著名道教圣地。

据民间传说，明代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崇信道教，一日，梦见仙人吕洞宾邀他翌日在鹦鹉山麓相会。次日，陈用宾便“马踏红尘”，来到山麓等候，只见一个放羊老头用绳子牵着一只山羊，在山边用一口砂锅煨芋，另一口锅作锅盖。待他走近去看，老头忽然不见了，带绳的羊也没有了。陈用宾恍然大悟：两“口”锅垒在一起就是“吕”字，带绳的羊不就是“纯阳”？这个放羊老头就是吕洞宾！陈用宾认为这是吕真人引示他鹦鹉山风光灵异，景物非凡，是洞天福地。

陈用宾于是会同金殿开山始祖徐正元于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仿湖北武当山天柱峰金殿的建筑



形式，在这里创建吕仙祠、太和宫和三元宫。太和宫居中，宫内修筑紫禁城，铸造铜殿北极真武殿，供奉真武祖师（北极玄天）。<sup>①</sup>左建三元宫，右边环翠宫，倍置风水，又有替度道者沈妙章，由江南迎《道藏》一部置于宫中，永镇南滇，历时三年始告工竣。

金殿的建筑布局是利用鸣凤山地势，山脚有陈用宾立“唐高风正节吕真人洞路”沙石碑，俗称“吕祖碑”。从入口“鸣凤胜境”牌坊到三天门，一路松荫石级曲径而上，至一天门途中有72级石阶，暗喻“七十二地煞星”。过了一天门石牌坊，是相对陡直的36级石阶，暗喻“三十六天罡星”，两段石阶的总数是108，意味着神仙境地有星宿、天神守护。攀上三座天门，暗喻经过艰苦攀登，就可以到达道教三清天的境界。进入山门，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斗拱飞檐的“棂星门”牌坊，棂星门两侧原是雷神殿，殿内祀奉雷神、电母、风伯、雨师神像。此殿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倒塌，1979年重建后设为金殿历史塑像绘画馆。

明代万历年间砖筑的紫禁城是太和宫道观建筑群的中心。砖城周长365尺，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西门上面是魁星楼，西门外两侧是钟鼓楼；东门外是老君殿，又称净乐宫，庭院为桂花园；北门外是天师殿，殿内原祀奉张天师；南门外是三丰殿，殿内原祀奉张三丰。太和宫的核心，则是全铜铸的铜殿。明代后期，统治云南的沐氏因屡被朝廷惩治，家运日衰，认为是城东北的金殿系铜铸，“铜乃西方之属，能克木”，家运系铜所致，故令巡抚张凤翮出面，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将陈用宾所铸铜殿迁往西边的宾川鸡足山天柱峰。

① 石玉顺著：《昆明金殿》，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9月，第1页。



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平西王吴三桂又在鸣凤山重铸金殿。新铸的铜殿坐落在两层大理石台基上，金瓦飞甍、飞檐翘角，仿木结构的重檐歇山顶式而造，高6.7米，阔7.8米，深7.8米，两层屋面。铜殿四面有斗拱装饰，屋面正脊通体雕云龙纹，两端饰以龙吻，中间饰以云龙纹火焰宝珠。戗脊饰人、马、鱼等。有16根立柱、四壁为36扇格子门组合，前后各10扇，两壁各8扇，正门铸浮雕云龙、龙凤呈祥等各种图案，后壁及左右壁均铸浮雕“寿”字及几何图案。殿内有八角藻井，由四条龙柱斜撑，整个殿宇为仿穿斗榫结构。铜殿正梁上镌有“大清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大吕月（十月）十有六日之吉平西亲王吴三桂敬筑”楷体字一行。据考证，铜殿及神像、案几、匾联、帏幔等，全部用铜铸制，耗铜约达250余吨，是全国最大的铜殿。殿内正中供奉真武帝君坐像，两旁侍有金童、玉女，左右是龟将、蛇将。真武帝君是中国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又称北极玄天。明朝把真武帝列镇国之神。全国各地皆立庙祭祀。云南奉之为“南滇福神”。铜殿置放的石砌的平台上，铜殿的上层平台、栏杆、阶石、地平等全用云南大理石镶砌；下层平台基石、栏杆、阶石等用墨石、砂石组合，石面有浮雕图案。下层平台两侧，有铜铸水、火二将，供奉在檀木制成的六角重檐小阁内，阁顶用铜板制成，阁基为砂石砌的六角须弥座。传说中的水、火二将，是真武殿的门神。

铜殿平台前，竖有日月七星铜旗。旗杆、旗斗和旗帜全系铜制。铜旗上方，有镂空的日月，旗边镶狼牙边，一周镶二十八宿，中间为北斗七星。日月之间，镂刻“天下太平”四字，旗的飘带上，镂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字。铜旗象征七星所指的北极真武普护着“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至清咸丰

丁巳年（公元1857年）兵燹，三宫被焚为一片瓦砾，铜殿亦毁大半，造成残缺。据昆明金殿《皇清敕授登仕佐郎、云南都纪司、龙门正派第十九世师李元龙碑》载：当时，“兵火日炽，梵宇琳宫，遍遭洗劫”，全省道观烧毁无数，“太和宫罹祸惨巨，劫火烛天，道众罹难者以十数，庙中什物，悉遭窃掠”。变乱平息之后，住持李元龙又“藉会城绅士力，重修真武像”，“起宫楼、后殿若干间，营造七星旗以应北极之象”。光绪年间多次修建，住持李明清多方募化，云南缙绅王炽、余安稟请督办云南矿务巡抚唐炯倡助铜一万斤，又遍约各方捐银三千余两，在光绪十六至三十一年间（公元1890—1905年）重修山门、牌坊、殿宇，新盖雷神、太乙、文昌、土主殿和棂星门坊、山门八字围墙，新塑神像三十尊，新铸铜格门十扇、侍坐六尊、匾对三副及飞仙走马、沟头滴水，新添打铜板瓦连安嵌，<sup>①</sup>当时的金殿金漆彩画，修葺一新。1982年2月23日，昆明太和宫金殿被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四）西山三清阁

三清阁位于昆明城西面约15公里处的罗汉山上。公元1300年左右元代梁王在此建避暑行宫。明代洪熙、宣德年间，佛教无边禅师借助沐氏支持赞助建起了“海涯寺”，后因山名又称“罗汉寺”。由于明朝时期道教的昌盛，逐渐建为道观。当徐霞客明末抵滇时，曾见罗汉山除了一座“三佛殿”之外，其余均成道教殿阁。

明代嘉靖年间，道士赵炼开凿石道。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道士吴来清开始打凿岩洞，经

<sup>①</sup>（清）陈鹄：《重修鸣凤山太和宫碑记》，现存昆明市金殿公园。

过14年时间，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完成了由凤凰崖到云华洞这一段石道，洞内有石雕送子观音。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住持道士朱家阁得到杨际泰的帮助又继续开凿，经过九年的时间，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完成由云华洞到达天阁这一段工程。<sup>①</sup>自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形成现今由灵官殿、三清殿、三丰殿、吕祖殿、元帝殿、真武殿、七真殿、斗姆阁、玉皇阁、飞云阁、抱一宫、张仙殿、老君殿等组成的13座单体建筑组成的道教建筑群。这13座建筑由下而上，缘山壁层檐叠屋，鳞次栉比共9层，从远处看，三清阁在四周一片绿树茂林掩映下，“如蜂房燕窝、累累欲堕者”<sup>②</sup>，层峦耸翠，飞阁流丹。

清末前，上山的道路是从山脚下滇池边龙门村修了一道石阶而上，从山脚至山上灵官殿共有石阶1033级，故此路得名“千步岩”。从三清地界开始，先有72级石阶，暗喻道教崇奉神灵地煞之数。沿石阶而上，是单门石坊一座，坊额正面书有“罗汉崖”，背面则书有“三清境”三字。入坊则是灵官殿。殿重檐歇山顶，通面阔三间6.8米，进深三间6.5米，平面略呈正方形，前后四根通柱直贯屋顶，支撑整座建筑重量。檐下无斗拱，四角起翘采用云南特有的“角大刀”结构，覆黄色琉璃瓦。殿建于明嘉靖间，是西山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殿中彩塑王灵官，铁面赤须，咄咄逼人，高2.3米，旁立水火二将，捧印持册，身长腿短，风格上与清塑迥然不同。<sup>③</sup>灵官殿是登上三清

① 昆明市道教会：《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3年11月，20-1-102。

②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734页。

③ 王海涛著：《昆明文物古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68-69页。

阁的第一座建筑，也是西山建筑群中唯一的明代建筑。灵官是道教神话中的护法神，相传灵官生前姓王名善，宋徽宗时（公元1101—1125年）人，称林灵素的再传弟子，死后封神，专司护法之职，为镇守道观山门之神，故称“王灵官”。王灵官的塑像特征是赤面三目，披甲执鞭，容貌凶恶。孙宗文先生称：灵官殿自南宋以后“在（中国）南方特别盛行。其中比较好的例子有云南省昆明市西山三清阁灵官殿”<sup>①</sup>。

灵官殿右侧沿石阶而上，右边有一院门，院门正额书有“三清阁”，在元代，这是梁王避暑行宫。<sup>②</sup>后建为三清殿，分别由三丰、吕祖、元帝三殿组成，沿山崖呈一字排列，又称三清阁。1928年全市道教寺观组织“昆明道教会”后，三清阁由真庆观直接领导，由道士杨鹤明任住持。新中国成立后杨鹤明离昆回四川，由他的徒弟童中俊、曹信诚、杨兴泉等三人负责，后曹信诚因案被捕，杨光泉还俗，由道士李宗尧负责至1963年前后。<sup>③</sup>“文革”浩劫中三清阁内所塑神像全部被毁。1978年后，三清殿改建为茶室。殿北的飞云阁中一副对联，概括了三清阁景象：“半壁起危楼，岭如屏，海如镜，舟如叶，城廓村落如画，况四时风月，朝暮晴阴，试问古今游人，谁领略万千气象；九秋临绝顶，洞有云，崖有泉，松有涛，花鸟林壑有情，忆八载星霜，关河奔走，难得栖迟故里，来啸傲金碧湖山。”<sup>④</sup>

① 孙宗文著：《中国建筑与哲学》，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3月。第367页。

② 王海涛：《昆明文物古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69页。

③ 昆明市道教会：《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3年11月，20-1-102。

④ 李孝友：《昆明风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9月，第127页。

三清阁向右上行 36 级石阶是真武宫。真武宫建筑为重檐歇山顶，面阔三间。建于清道光年间，殿内原奉真武大帝，现门前尚遗石雕玄武（蛇缠龟）一座。<sup>①</sup>2000 年，真武宫再次修葺，重塑起真武大帝及其两侧分立的龟、蛇二神塑像，门前还塑有一蛇龟相缠的“玄武”石雕造像。真武宫两侧不远分别是斗姆阁和七真殿。从真武大帝向南上行是玉皇阁，这是三清阁建筑群中最华丽的一座殿阁，琉璃瓦，重檐歇山顶，上下檐皆施斗拱，面阔、进深均为三开间。华丽而不失庄重。再往上便是龙门石窟，崖下石洞名达天阁，祀魁星、文昌、关圣，皆就石崖凿成，巧夺天工。

除上述道观外，历史上著名的还有虚凝庵和铁峰庵，近年修复重建后已为佛教寺庙。现据民国史志辑录两观状况。

## （五）铁峰庵

铁峰庵旧属道观，位于昆明北郊约 10 公里的长虫山，原名朝阳庵。山上怪石嶙峋，铁峰庵建在山顶石隙间。庵始建于元代，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 1693 年）云贵总督王继文鸠工庀材，耗时九个多月重新修建真武、准提二阁和浣玉亭，山门上题额：“陞山古刹”，并作《铁峰庵记》称“铁峰庵者，滇陞山第一峰之殿阁也”，“坐铁峰下，仅去天咫尺，回环一碧者，昆明池也。遥补西半壁者，聚仙山、三华山也。稍前而拱卫者，罗汉岩也。舞翠流丹，当其面者，七学士峰也。当面之左，排霄冲汉者，抚仙之梁王山也。由梁山络绎驰骤，东护一壁者，呈之万福象兔，嵩之罗锦等花诸山也。鸣凤葳蕤，太极灵异分若列星，点若置棋也”，王继文在山门外石壁上大书“彩云第一

<sup>①</sup> 王海涛：《昆明文物古迹》，第 69 页。

洞天”。<sup>①</sup> 咸丰七年（公元 1857 年）寺毁，光绪七年（公元 1881 年）孙钜重修。

清朝时，铁峰庵内供铁峰老祖，传说铁峰老祖的诞辰为农历正月初八，于是每年此时便为铁峰庵庙会。参加该庙会的除北郊农民外，还有昆明城内市民以及附近县乡信徒，尤以老年妇女为多。此外，三月十五日为铁峰庵建庵日，也成了铁峰庵盛大的庙会。民国时，殿左有一深泥塘，头门有一联云：“上第一峰头，到处皆当撒手；空大千世界，看来总是忘机。”殿宇层叠，庵共分四层，第一层系道德天尊殿；第二层系观音殿；第三层有沐黔国三烈祠，传说清兵入滇，沐天波的母亲陈太夫人曾避兵于此，城破毁庵自殉。后来王继文就在这里修建三烈祠，除祀陈太夫人外，还附祀沐氏正室焦夫人和副室夏夫人。再上有土地祠。第二层到第四层，名人题咏很多，或以诗而追述前事，或以字而留示后人。塑像金色焕然，殿宇楼阁，雄壮整齐。登庵后最高处，可以西眺湖山，一览无余。

### （六）虚拟庵

虚拟庵位于昆明城北上庄村后，距城约 7 公里，居长虫山腹，在铁峰庵东，相距约两里。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 1365 年），有记刊石，立于庵内。<sup>②</sup> 元梁王时为陈国夫避难修真之所。岩际原有流泉下注成潭，可供庵中人饮濯。传说秤砣真人张霞溪结庐泉畔，清修成道。明洪武年间，沐英为感念秤砣真人降雨救民而兴建。庵分三层，第一层为都雷殿，第二层为玉皇阁，形势雄壮。庵下有仙人洞，不甚深邃，民国时洞

<sup>①</sup>（清）王继文：《铁峰庵记》，见（清）张毓碧修，谢伊纂：康熙《云南府志》卷二十一《艺文六》，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刻本。

<sup>②</sup>（民国）罗养儒：《云南掌故》卷八，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年 3 月，第 295 页。

右有张真人句。据传张真人于明初在此修行七年遂隐。有石台，系张真人拜斗台，杨升庵读书楼在其旁，台下有小池常畜鱼，后因天旱遂送入黑龙潭。<sup>①</sup>庵前眼界空明，心胸爽豁，旷观远瞩，能纵目数十里之外，且盘龙江宛曲如线，横于山前，尤饶意味。<sup>②</sup>

### 三、滇南地区的道教宫观

滇南地区主要指临沧市、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些地区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在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辖区内，大规模经营开发主要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在云南实行募民垦荒的政策。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廷批准云南招民垦种无主荒田，外地移民纷至沓来。清廷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大量招徕外地移民来云南垦种。外地移民移居数量较多的地区，首推昭通、东川、元江、普洱、镇沅、开化和广南诸府，今天的滇南五个地区均在其范围内。

据道光年间的统计，在开化府所属安平、文山等地和广南府所属宝宁、土富等州，外来人口的数量已超过当地居民总量的半数。<sup>③</sup>大量的内地文化和宗教文化迁入这些地区。据文献记载：滇南地区明朝创建的宫观有凤庆玄真阁、玉皇阁、东山宫<sup>④</sup>，建水北极宫、玉皇阁、三清观，石屏崇玄观、九天观，景东龙

① 云南通志馆辑：《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寺观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抄本。

② （民国）罗养儒：《云南掌故》卷八，第295页。

③ （道光）《普洱府志》卷七，（道光）《威远厅志》卷三《云南督抚稽查流民疏》，转引自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745页。

④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张问德修，杨香池纂：民国《顺宁县志初稿》卷二。

泉寺、玄珠观<sup>①</sup>。清代、民国相对更为普遍。其中临沧道教较有特点，“可分龙门、随山二派，信徒多数是坤道，”主要住在“县城的太阳宫、观音阁、康公庙、节妇祠、广佛寺，茂兰的魁阁等处为主，多数系织布交易谋生，终年茹素，不食油荤，很少出外游方募化者”<sup>②</sup>。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滇南地区道教信仰人数约 350 多人。<sup>③</sup> 21 世纪初状况，据 2004 年云南省宗教局年检统计，临沧有教职人员 28 人，信教人数 1.9 万多人，11 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宫观活动场所；<sup>④</sup> 思茅、红河、文山、西双版纳无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宫观活动场所和道教教职人员、信教人数统计。但据我们调查，思茅、红河有正一道道士和信众信仰道教，并进行斋醮活动；文山、红河、西双版纳亦有大量瑶族的道公、师公及大量的瑶族群众信仰道教从未中断，这些未在特定宗教场所活动的道教教职人员和信众，并未在政府的统计之列。

### （一）缘狮洞

缘狮洞位于蒙自县东 38 公里的鸣鹭乡灵鹭村静灵山的悬崖峭壁间，因山岩如狮而得名。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 1758 年）始有庙，光绪五年（公元 1879 年），鸣鹭乡绅曹廷镛倡议集资，“开山凿石，辟石垒基，鬼斧神工，妙造自然”，历时 20 年建成这座道教

①（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明）郑颢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清）江浚源纂修：嘉庆《临安府志》卷十六。

② 李聪：《云县乡土教材》第十六课《宗教信仰》，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第 41 页。

③ 《云南各县道教概况表》，见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1931 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抄本。

④ 萧霁虹：《2004 年云南宗教动态分析》，见《2004—2005 云南宗教情势报告》，第 6 页。



建筑群，主庙“高三十余丈，共九台，建有宫殿楼阁四十余幢，共二千六百多平方米，塑有诸佛众仙一百五十五尊，结构奇巧，布局有致，上下回廊，飞檐斗拱，画栋雕梁，崇楼俊阁，巍峨壮观，所塑神像各具神态，技艺精湛”<sup>①</sup>。整座宫观依山而建，在参天古木、簇簇竹林里。庙宇建筑布局是从山门口的一条叫杨柳河的河流，到半山腰的溶洞按“灵”字展开，点画分明，匠心独具。自山脚至山腰依山势排列，包括山门、灵官殿、灵池、两厢归真祠、衡镜台、玉枢宝殿、两庑三义宫、火神殿，拾级而上为是观堂，依山叠楼建阁为弥勒、三皇、五老等的聚仙阁、三清殿和白玉楼，两旁钟鼓楼、化愚楼、三圣宫，吕祖及地母、三教等殿。从山脚到洞口，有123级石阶，穿屋登楼，曲径通幽直至缘狮洞洞口。洞口有三开间坊式门，左右石狮守护，上悬数匾联。溶洞口高12.5米、宽4米，洞内长17.3米，宽9.9米。洞内钟乳似帐幔垂挂，凹凸不平的洞壁上有观音、十八罗汉、金童玉女等石刻造像，另有瑶池金母木刻造像，共计22尊。神像造型丰腴，和蔼自如。洞口两侧雕龙绘虎。一条悬空长廊在洞外左侧连接居室、厨房，右侧石壁上有卧佛石刻一尊，称卧佛壁。在赞美缘狮洞的众多诗词中，有这样一首被称为“半字连珠诗”的诗，即前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的右半字为下一句诗的起首字，使人读来感到妙趣横生，全诗如下：

此山美景正堪期，月下岩前论古诗。

寺庙巍峨钟鼓便，更深夜静斗星移。

多少灵根培佛地，也曾劳苦费心机。

几时修好观音洞，同与神仙下盘棋。

① 《重修缘狮洞碑记》，碑立于缘狮洞观山门外。

2005 年底笔者调查时无道人，有数位尼姑住观，并在山上新建了佛教大雄宝殿。缘狮洞造像与建筑群均杂糅道、佛、儒三教，颇具地方特色。清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云贵总督岑毓英曾题匾赞为“滇南第一洞天”。

## （二）宝华寺

位于个旧市宝华山西麓老阴山脚，背靠老阴山，面对金水湖，风光秀丽，景色优美，为历代游览胜地。全寺依山势而成，始建于清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相传系云游道人李仁杰以募捐所得凿石开山，创建道观，历经五年建成。后经多次重修、扩建，始成规模，有灵官阁、玉虚宫、观音阁、凌霄阁、三清殿、文昌阁、龙王庙、梁公祠、白猿楼、关圣殿、岳圣殿、彩云寺等寺观庙宇十余座。据《宝华山寺记》记载，宝华山是因“其背雄伟壮丽，光辉发越”，山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锡矿而得名。据传说，宝华山道观初建成时，仅一小庙宇，人称“宝华寺”。古寺路旁常有一衣着朴素、腰系白围巾的农家老妇在摆摊售卖茶水，以供行路之人解渴去乏。开发个旧锡矿的先辈赵天爵，经常上下老厂途经此处饮茶休息，也常与老妇闲谈叙说。在闲谈中老妇多次鼓励赵天爵“贵在坚持，不可灰心”。数年后，赵天爵果然挖到富矿。富起来的赵天爵为报答“矿王”的保佑，在宝华寺大兴土木，建造庙宇。从此，宝华寺香火旺盛。忆及昔日卖茶老妇之劝，追寻老妇却无处可寻。此时民间有人传说卖水老妇常于清晨从老阴山沿崎岖小路而下，傍晚沿山间曲径而上，潜至森林密处即无踪影，实为“白猿大仙”。赵为感其指点之恩，修建了“白猿楼”。

### (三) 大石寺

大石寺在景谷县北 50 多公里的景谷乡文山海孜文笔山顶悬岩之上。无量山余脉南端的文山海孜一带山峦叠翠，文笔山顶有两座高达数十余米的螺蛳形盘旋的紫褐色巨石，在郁郁葱葱的青松翠竹中异峰突起，岩高坡陡，大石寺的庙宇建筑就建在这两座巨石之巅，海拔 2 300 米。寺建于清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建筑包括玉皇阁、三皇宫、天生寺、祖孙殿、杨泗将军庙等五个宫庙殿阁，还有摸子洞、积米洞、一洞天、鹊桥石等天然奇景。有古朴奇特的青龙、白虎、麒麟、凤凰浮雕和石刻楹联。三皇宫又称太阳宫，石门上有楹联：“千山朝此太阳殿，万岭拱贺太阴居。”2003 年云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底笔者调查，据当地人说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是有道士、有神像的，90 年代村民曾集资修复，现在宫殿犹存，已无道士、神像，但春节、“七月七”等节庆当地人要来此祈福纳祥，香火依然旺盛。大石寺建在傣族、彝族聚居区中的汉族村子，又是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为主体的地区的道教宫观，这对研究道教传入傣族地区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和谐共处、傣汉文化交流以及云南历史上的移民问题等都有价值。

### (四) 子孙庙

子孙庙位于临沧西大街章嘎村。属全真龙门派道观，始建于清朝雍正中叶，“乃长官司俸廷征之母罗安人香火院，为土司创修道院之始。劫火频经，巍然独存。”<sup>①</sup> 光绪年间，该庙住持阮一诚与弟子杨阳悟先

① 《观稼楼记碑》，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仲秩庄道人丘区和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春初邓映杨育才德彰书，住持阮来庆立。现存子孙庙。

后募修子孙殿、观音阁，建上中两院。民国十八年（1929年）住持阮来庆于下院建层楼三楹、左右厢房、花园等。经过历代修缮，整体建筑较完整地保持了清初的建筑风格，占地面积近二千平方米，为二进院道观，现有八字台坊式大门和院内的老君殿、观音殿和观稼楼等主要建筑，两侧是道人的居室、历代宗祖牌位房、戒堂等，共有房72间。在观音殿的对面就是著名的“观稼楼”，据《观稼楼记》碑刻记载：观稼楼“高百尺，以两河为襟带，枕汀城之凤蝶，群峰环峙，气象万千，登楼远眺，烟霞吞吐，隐现明灭，更上一层楼，飘然如凌虚御风。且也秧田万顷，映叶左右，春夏之交，平畴绿满，农歌四起，清越可听，远瞻俯瞰，水色山光，稻香花韵”<sup>①</sup>一派赏心悦目之景尽可收入眼底。景致优美的子孙庙创建于缅甸城傣族俸氏土司的封地上，俸姓至今仍是当地傣族的大姓，说明在雍正时的傣族土司府里已经有人信仰道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并不是那时傣族的唯一信仰，所以才会有“土司修创道院之始”的记载。

#### 四、滇西地区的道教宫观

滇西是指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两汉时期，这些地区属于越嵩郡和永昌郡，东汉张陵创五斗米道时，便建立了“二十四治”为管理教民的核心机构，其中的蒙秦治就设在越嵩郡，丽江、永胜大多在其辖区内，这些地区也一直被认为是五斗米道较早传入的地区。

滇西地区是道教自传入至今宗教活动和宫观建造

<sup>①</sup> 《观稼楼记碑》。

一直很兴盛的地区。目前有文献记载最早兴建的道教宫观也在滇西，即巍山城东五里外东山上的玄珠观，建于蒙诏时期<sup>①</sup>。明宣宗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长春真人刘渊然奏请朝廷，“立云南、大理、金齿（辖地相当于今保山市、德宏州和缅甸东北的大部及泰国北部的部分地区）三道纪司以植其教”，云南道教名声大振，在滇西尤为兴盛。明清宫观兴建很多（详见附录《云南道教宫观一览表》），少数民族聚居的迪庆、怒江也有道教传播和宫观兴建，《维西县志》载：“道教者为我国固有之教，以清静虚无为主。邑之人习此道者，先赴鹤庆道纪司处奏职，始能演教。前清道咸间，其教徒颇盛。民国肇兴，破除一切迷信，士大夫与中等社会有知识者罕有讽经做道场者，而道教人数亦寥寥无几。”<sup>②</sup>即使如此，民国时维西也有关帝庙、东岳庙等宫观“诚县属胜地”<sup>③</sup>的记载，怒江六库土司署南山上有老君庙<sup>④</sup>。金齿宣抚司的治所在今盈江县，道教全真龙门派时期、正一道自明朝传入德宏陇川、梁河、盈江、潞西。民国德宏州的道教官观有陇川户撒皇阁寺，盈江油松岭青云寺、卡场道观、新城老君殿、城隍庙、关帝庙。<sup>⑤</sup>“民国大理道教入教人数一百五十人概系道士，以做道场为生活。”<sup>⑥</sup>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滇西地区道教信仰人数约570

①（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清）蒋旭纂修：康熙《蒙化府志》卷二。

②（民国）李炳臣修，李翰湘纂：民国《维西县志》卷三，1932年本，传抄第1页。

③ 同②，卷一，第45页。

④（民国）段承钧纂修：《泸水志》第四章《舆地·十六庙寺观》，1932年石印本，上册第14页。

⑤《德宏州道教基本情况简介》，德宏州民宗局宗教科提供，2007年。

⑥大理县劝学所辑：《云南大理县志资料》，民国十二年（1923年）铃大理县劝学所图记，抄本。

多人。<sup>①</sup>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后,据2004年云南省宗教局年检统计,大理有教职人员36人,信教人数11.9万多人,39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宫观活动场所;保山有教职人员146人,信教人数3万多人,63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宫观活动场所;怒江、迪庆无开放的道教宫观活动场所和道教教职人员、信教人数统计;丽江无开放的道教宫观活动场所和道教教职人员统计,但有信教人数11800多人;德宏有教职人员1人,信教人数360多人,1个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宫观活动场所。<sup>②</sup> 德宏州民宗局宗教科的档案统计是1996年正式登记开放的道教活动场所盈江油松岭青云寺1所,教职人员有坤道1人,信教人数有3852人<sup>③</sup>。

### (一) 巍宝山建筑群

巍宝山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东南约10公里处,为南诏的发祥地,是历史悠久的道教名山,亦是风光绮丽的旅游胜地。

巍宝山的道观殿宇建筑分前山和后山两大部分,根据地方史志记载,历史上先后建有准提阁、甘露亭、报恩殿、巡山殿、文昌宫、主君阁、太子殿、玉皇阁、青霞观、三皇殿、观音殿、魁星阁、斗姆阁、三清殿、碧云宫、云鹤宫、苍夫子殿、朝阳洞、培鹤楼、道源宫、三公主殿、财神殿、含真楼、长春洞、望鹤轩等25座道观殿宇。这些道观殿宇的建筑年代先后不一,早期的始于唐代,其余大多建于明末清初。现存经修葺的25座道观巍峨壮观,布局严谨,格式整齐,重檐

① 《云南各县道教概况表》,见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抄本。

② 萧霁虹:《2004年云南宗教动态分析》,《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第6页。

③ 《德宏州道教基本情况简介》,德宏州民宗局宗教科提供,2000年5月。

高阁，飞檐斗拱，在造型上集中体现了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古建筑的特色和地方特色，给人凝重、稳固而又玲珑精巧的感觉。择其要者介绍于此：

老君殿，亦名青霞观、青微观，《蒙化志稿·祠庙志》说：昔老子降化细奴逻之所。建于巍宝山前山山坡，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湖北武当山道人沈妙章等人募建。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大东厢房毁于战乱，光绪年间由住持道人重建。1988年重修。殿宇依山而建，层层叠深，崇台高阶，宏伟壮观。第一院是准提阁，内奉准提道人和老君的十六弟子。第二院有大厅和南北两厢房，大厅为主殿，高踞于坚固的砖石垛上，出阁架斗，飞檐啄云；横额挂匾，上书“大赤天宫”；门面由十二扇彩色木雕排板门组成，每扇高八尺，宽二尺五寸，规格严整，雕镂精湛，色泽鲜艳，每扇排板门又分上下两截雕镂，上截雕镂着各种形状的花草，下截雕镂着麒麟、龙、凤、兔、牛等各种吉祥动物，大方凝重，古朴文明；大厅内奉太上老君塑像；坐状，左手拿八卦图，右手拿芭蕉扇，腰系青霞玉带，膝前有青牛、白象。

玉皇阁，建于巍宝山前山，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建成，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由姚志德复修。三层三院，层层升高，翘檐重叠，规模宏大，由四帅殿、大师殿、三官殿、玉皇阁、依云阁、吕祖殿、圣父圣母殿组成。玉皇阁内塑玉皇大帝像，清代像用黄铜铸成，重一千多斤；现为泥塑像，金粉镀身，高一丈余。阁内天花板上，尚存清代建殿时绘制的一幅《水火匡廓图》，系道教修炼长生不老的药方示意图。

三皇殿，建于巍宝山前山，始建于清初，咸同年间殿宇毁于兵乱，光绪年间由赵、贺二道姑募修。“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7年修复大殿。内奉天皇、



地皇、人皇三位道教神像。

斗姆阁，建于巍宝山主峰顶。初建于清初，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张遴彦、孙怀仁重建。由北斗殿、南斗殿、过厅和大殿组成。内祀道教星宿神，有斗姆天尊、南斗星神、北斗星神。斗姆阁因居山巅，地势险要清幽，古代文人苏时登有诗云；“帝座真堪呼吸通，法王台上客乘风。登临怪底群山小，人在云霄尺五中。”确为“深山藏古寺”。

三清殿，建于巍宝山后山，又名玄极宫、元极宫。清康熙年间由住山道人赵中和、童真修建。乾隆年间由刘德绪重新募建，光绪年间重修。由前殿、后殿和中院楼亭组成。内祀道教上清灵、玉清、太清三尊神像。三清殿中院原有得句楼、来翠亭诸胜。

培鹤楼，亦名祖师阁，建于巍宝山后山，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由地方绅士把朝阳洞改建两转阁，更名为培鹤楼，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郡人郑名科重建。清同治年间毁于兵乱，光绪年间和民国年间两次重修。1983年重新修葺殿宇。为一巍峨壮观的大殿，内奉吕纯阳祖师，泥像身披绿袍八卦衣，头戴方巾帽，身后塑有两只仙鹤，传说这两只仙鹤是建盖培鹤楼时从地基上飞出。

玄珠观，位于巍宝山东麓，始建于唐代。初为南诏蒙氏宗祠，唐代中期，四川青城山道士来此炼丹，开辟为道教修炼之所。清代进一步扩大规模，前有门，后有水池，由玉皇阁、三官殿、四圣殿、吕祖殿、关圣殿、财神殿组成。

长春洞，建在巍宝山后山山脚。初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由贵州道人李法纪、杨法荫建。1987年进行复修。外观布局呈一规整的八卦图，由前殿、大殿、两厢房、花园、藏头所组成。其建筑格局和雕刻艺术精湛不凡，大殿的门窗全是浮雕，其



中八扇格子门从左至右刻着八仙人物图，雕工精细，形象逼真。殿内两转阁的天花板中央，用木板拼成一八卦图，内雕八角藻井和盘龙，周围的天花板上绘着五十幅彩色图画，有三皇图、三清图、四御图和群仙会宴图等。长春洞内奉玉皇大帝、雷神、武财神、文财神、土地神、王灵官等泥像。殿内有书写着“九光之殿”、“万灵之师”、“万象中函”、“凌云望阙”、“包罗天地”等的浮雕龙凤图匾。有古往今来名人学士书写的楹联，其中一副“仙洞长春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帝德广运与天地万物上下同芳”，系清光绪年间地方进士所书，道出了长春洞源远流长的道教历史和优美的景致风光。<sup>①</sup>

## （二）云峰山

云峰山位于腾冲城西约 50 公里外的瑞滇乡云峰山顶峰上，在海拔 2 445 米高峰上。始建于明朝初年，明末已修建了玉皇殿、三清殿、吕祖殿、老君殿、观音殿、南天门等寺观殿宇。明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四月，徐霞客曾游经此地描述道：

（峰顶）东西长五丈，南北阔之，中盖玉皇阁，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三教圣人，顶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东临前峰之尖，南北夹阁为侧楼，半悬空中。北祠真武，下临北峡，两头悬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临南峡，而中敞为齐堂。皆川僧法界所营构，盖其向上虽有道，而未开辟，算可栖托。<sup>②</sup>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 1808 年）云峰寺因雷电引

<sup>①</sup>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巍宝山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2 月，第 26 页。

<sup>②</sup>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 1088 页。

起火灾被焚毁，次年重建。1914年，云南迤西道教协会会长张成宝（号玄空），主持将云峰寺和山下的万佛寺合为一处香火，有僧侣、道士二十多人。1983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大规模修复工作，现已修建了吕祖殿、斗姆阁、观音殿、老君殿、玉皇殿等寺观殿宇，基本恢复了原有风貌。1984年云峰山道观正式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并为腾冲县道教协会所在地。

## 第二节 云南著名高道

《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太霄经》：“人行大道，谓之道士。”《灵宝出家因缘经》讲得更为具体：“道士者，谓行住坐卧，举心运意，唯道为务，持斋礼拜，奉戒诵经，烧香散花，燃灯忏悔，布施愿念，讲说大乘，教导众生，发大道心，造詣功德，普为一切，后己先人，不杂尘劳，唯行道业。”这些奉守道教经典规戒，并熟悉各种斋醮的道士是道教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从附录《云南道士名录》中我们可知，自相传东汉时的道士杨波远，到今天修斋设醮的道士，有数百人。当然还有许多未见记载或我们未知者，他们的活动传承、述写着云南道教史。以下据志乘记载，介绍几位在云南道教史上有影响的高道，其事迹多具神秘色彩，仅作参考。

### （一）王载元与张明亨

二者均为唐代得仙者。云南楚雄人。雍正《云南通志》、光绪《镇南州志略》载：南诏时二人常栖楚雄五楼山，志在求仙。日载酒峰头，长啸狂吟。一夕

酒酣，有道人乘风而至，神采焕发。二子迎之曰：先生能剧饮耶。道人顾笑。问其姓名，答曰“无心昌”。三人促膝倾觞，狂饮至醉。已而道人起，别曰：“明年秋风起塞上，吾当再来。”及期，二人登眺以俟，须臾，道人携醇酒一瓢而至，命二子饮之。明亨不善饮，惟载元饮之。道人忽曰：“时当行矣。”腾空而上，载元随之，明亨踴跃无措，伏地大呼。道人回顾曰：“子仙骨已成，迟一劫耳！”张子遂化。乡人瘞之。冢上流光，掘视得石如晶。是夜梦张语曰：吾功行尚缺，当以骨救疮痍。试之果效，遂名仙人骨。后人思其胜事，测之曰：“无心昌”乃吕字，载元乃吕洞宾所化。二人是云南史志中记载较早遇仙得道的云南人，元代时，在镇南州（今南华县）城东二十五里五楼山麓，传说二人遇仙的地方建栖仙寺。<sup>①</sup>

## （二）张三丰

《明史·方伎》载：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邈遏。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形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

①（清）李毓兰修，甘孟贤等纂修：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五，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刻本。

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

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朱祥斋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万余人，大营武当官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1216—1274）同师，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英宗赐诰，曾为通微显化真人。经莫测其存亡也。

凡传说之张三丰，其根已尽于此。在正史的记载中，我们并未看到有关张三丰在云南的情况记载，但张三丰在云南的传说很多，如有《张三丰与莲花池村》的故事，说昆明北门外的莲花池由于它的龙泉及在池畔建有龙王庙，自明以来就已成为道士修炼传道之地，其中，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便在莲花池的龙王庙里住过，一般是晚上住，天明则入城乞食，一次能啖升斗，以至数日不食。人借此编造他在莲花池“吐肠出浣”的离奇本领。终而张三丰在一个夜里，至墓“羽化”，按道士的理想离开人间，埋尸在龙王庙侧。莲花池村民为纪念张三丰，在莲花池畔竖立镌有其像的石碑。此碑一直保存到1950年。

张三丰虽是道教徒，却曾采取佛教的形式，依靠和尚乞食方式维持生活。因而他乞食用过的土钵也被神化为金钵，相传张三丰羽化后，其土钵仍留在莲花池里。在村里曾流传过每逢吉日便浮出水面，如有人

去拿又沉下水里的“仙话”。

其实，不仅在莲花池畔立有纪念张三丰的碑，由于张三丰明初曾在湖北武当山传道，永乐间曾为他建有太和宫。明万历年间曾任云南巡抚的陈用宾因对道教虔诚，则在昆明城东鸣凤山仿武当山太和宫建金殿，在金殿特建三丰殿，并竖张三丰石浮雕像。此外，在圆通寺北岩下面也雕有“三丰仙师绣像”。据光绪昆明县志载：张三丰曾在临山虚凝庵仙人洞修行七年，留有张三丰坐卧处、拜斗台，在洞右侧有其遗像。<sup>①</sup>

在云南各地史志中也多有记载，如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五：“天目人，寓郡之文昌宫年余，后去之平越，以只鞋留挂壁间，曰三丰鞋。今平越府有三丰脱影崖、浴仙池、回生树遗迹。”

由云龙的《姚安县志》卷五十五也载：“张三丰，陕西人，寓姚三年，居文昌宫。又于笔架山之峦，结庐烧丹，今遗址尚存。县南二十里，有紫云岩，岩下有石床，三丰时往岩下，静坐累日不归，亦不饮食。去姚时，以只鞋挂文昌宫壁上，长二尺，题曰：三丰鞋。又以墨冲泼壁，望之烟水苍茫云。”

光绪《姚州志》卷七《人物志》载：“张三丰，陕西人，寓姚三年，居文昌宫。又于笔架山之峦结庐烧丹，至今遗址尚在。州南二十里有紫云岩，岩下有石床，三丰时往岩下静坐，累坐不归，亦不饮食。去姚时以只鞋挂文昌宫壁上，长二尺。题曰：三丰鞋，又以墨冲壁，望之烟水苍茫。参旧志兼采访。”

昆明金殿、黑龙潭及三清阁的三丰庵都有他的塑像。另外，还有明代秦淮大渔户沈万三，号“三山道士”，移徙云南，与张三丰炼大丹于昆明滇池的传说

<sup>①</sup> 宋恩常：《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村社会历史调查稿》，见夏本戎主编《五华区文史资料》第17辑，第158页。

(详见附录《云南道士名录》)。

### (三) 刘渊然

刘渊然(1351—1432)为明代著名道士,道教长春派创始人。江西赣县人。万历《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载:刘渊然将诞时,祖母梦紫衣道人入其妇室,寻生子。年十六,师赵元阳,元阳奇之,授以玄秘,呼召风雷,役使鬼物,既而又授以金火返还大<sup>①</sup>丹之诀,栖神炼气,神悟超然。洪武间被召,赐号高道,擢右正一。永乐初,迁左正一,建金篆大斋,有醴泉、甘露、鸾鹤之瑞。无何,谪滇南,凡滇民灾患,皆往求济。洪熙初召还,赐号长春真人。刘渊然因道行高妙而在云南百姓中有着很大影响,“凡滇民有大灾患者,咸往求济,无不得所愿欲”。在云南期间,刘渊然广收门徒,其中以邵以正等最为著名。后来刘渊然得召回京,特向朝廷推荐了邵以正,邵氏因而得任道录司右正一。刘渊然还向朝廷“奏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sup>②</sup>,令云南境内玄风大振。滇人曾于龙泉观内筑有刘渊然的祠堂及衣冠冢,以示对他的怀念。光绪《永昌府志》卷四十八《人物志·仙释》载:“永昌府保山县刘渊然,封长春真人。洪武间祷雨救荒,自以偷泄天河水,请远戍。及抵金齿,神术屡显,凡水旱有祈必应。卒葬于城西北象头山,郡人立庙祀之。”与明史异,故存之。

### (四) 邵以正

邵以正(?—1462),昆明人。《徐霞客游记》又

① 大原作“火”,据上图本及正德《云南志》、《长春刘真人祠堂记》(见明王直《抑庵文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卷五改。

② (明)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载：“晋宁人，其父名仁，由苏州徙此，初名璇。”<sup>①</sup>别号止止道人，又号承康子。天顺初元赐号“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领道教事。雍正《云南通志》、道光《昆明县志》载：“神采秀发，超然物表，师刘真人，尽得其秘。被召，历至灵，演法左正一，赐号洪济真人。越六载，化去，敕葬京城西五华之阳。”《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载：

滇南龙泉山龙泉观乃真人遇刘长春授道之所。观故有长春祠，盖真人所建。而真人祠在三清殿侧，则钦差镇守太监钱公暨总戎黔国沐公所建者也。体玄守道安恬养素冲虚湛默演法翊化善济真人、领道教事喻道纯，实真人高弟子，将附金黄托镇守诸公构亭祠前，立石饒文，用昭弗朽。特具事状，征予以记。真人先世家姑苏，洪武中，父母徙滇南，感梦玉桃之异而生。自幼丰神秀颖，警悟过人。比长，志向卓越，超然物表，遂白二亲，去从高道士王云松。云松一见警异曰：“是子不凡，岂可使处弟子列？”因逊避之。时长春刘渊然倡道于滇，真人更往从之。其居距长春所凡三涉水，日以为常。长春嘉其勤恳，悉以道秘授之。真人研几极微，一一领解。长春喜曰：“吾道有所属矣！”已而长春入京领天下道教。而真人寻亦被召，自道录右至灵，历右演法、左正一，进守玄冲静高士而至今封。凡朝廷有大修建、大禳祈，必命真人主之。真人感激知遇，每斋洁尽诚，肃恭将事，以故胎蠶潜孚，动获灵验。其阐扬宗教，阴翊皇度之功多矣！虽然真人以澹

<sup>①</sup> 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839页。

泊存心，以简静处己，似乎易接物，迹其所为，非有离世绝俗之异，亦惟本子诚焉。诚者，万事万物之本。诚之至，虽金石不可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故诚以修身，则形和而气平；诚以求道，则行成而功倍；诚以事君亲，忠孝无以愧于臣子；诚以奉神祇，感通无间于高卑。此真人所为名冠羽流，而因望降缙绅，而致远迩敬信，无存殆之间者，庸非诚为之本乎？<sup>①</sup>

### （五）蒋日和

蒋日和为明代著名道士。江宁世家，自幼投师朝天宫提点谢无为，后以长春真人刘渊然为师。曾住持昆明真庆观，并主持对真庆观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凡门庑、藏殿之制，一时具举”，日和勤于其教，夙夜不懈，募材鸠工，经营劬劳，历时六年而毕其功。《真庆观兴造记》载：自其住真庆观后，“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洪熙改元后，得加封“明真显道宏教法师”号。

### （六）芮道材

芮道材为明代著名道士，云南大理太和县（今大理市）人。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康熙《大理府志》载：其少业儒学，后从长春真人刘渊然受栖神炼气之术。曾殄峨嵋孽龙，除蒙化妖怪。宣德初年，入觐，得赐道纪司都纪职，驰驿以还。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秋，在巍山创建栖霞观，以道法授徒三十余人。后尸解而化。

<sup>①</sup>（明）谢宇：《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见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第1266页。



## (七) 徐道广

徐道广为明代著名道士。云南昆明人。康熙《楚雄府志》、雍正《云南通志》载：嘉靖时修真于楚雄之元真观，能书符咒水除邪祟，役使鬼神，禳灾祈雨。元真观建灵官殿时，他用符召神示像，倏见水中有形，因而塑之。殿成，阴云蔽空，雷声不绝，他咒曰：“神若不居，请殛之。”忽殛，殿角有鞭形，掘地丈余，得女尸一具。时黔国公府内发生瘟疫，医不能疗，遣使求符。使者在乌龙庙遇道广正食活鳝，即以鳝血书成二符予使者，使者笑之，他起身掷一符于水田中，忽见百余鳝以首捧符，使者乃惊讶。持符入府，每夜俱见符上有火光显现，府内瘟疫遂止。后封为“雷霆都史”。

## (八) 李元龙

《皇清敕授登仕佐郎、云南都纪司、龙门正派第十九世师李元龙碑》载：李元龙（1834—1890）为清末道士，号从云，昆明太和街凉风桥人。曾任鸣凤山太和宫住持，敕授登仕佐郎云南都纪司，为龙门正派第十九代嗣师。自幼聪慧，机敏过人，五岁时拜太和宫第十八嗣师赵永佑道长为师，师傅日授百句经文，熟记不忘，深得师傅感受。长大后，庙中事务由之裁决，办事公正。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变乱骤起，兵火日炽，太和宫罹祸惨巨。1859年，元龙募化省城绅民，重铸太和宫真武像，复住持太和宫，又修宫楼后殿若干间，并铸造七星旗。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移居城隍庙。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募功德银2000两，起建太和宫牌坊、偏殿、钟鼓楼等。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羽化，葬于二天门侧的树林中。

### 第三节 云南道教典籍

#### 一、《道藏》传入云南

道教典籍是道教教义的文字记录，也是道教历史的记录，它本身有一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自汉末，而三国、两晋、南北朝，道书叠出。惟以道士之珍秘其书，当时道士，所藏道书多不甚众。然或则不惮跋涉艰苦，广求异书；或则出资购集；故东晋郑隐集六百七十卷（《抱朴子·遐览篇》）。后魏王道义集万卷余（《仙鉴》三十）。至唐开元中，乃列以为藏。历代出世道书，溯其渊源。或有出于‘三洞四辅’之外者。而唐代修《道藏》，将道书强行统入‘七部’。”<sup>①</sup>在这一历程中，道教典籍演变出独特的分类法，诸多道书经目，形成《道藏》。《道藏》是皇帝御敕下编纂的一种道教典籍。第一部是公元437年刘宋陆修静（406—477）的《三洞经书》。唐以来，历代对道教典籍的传抄、刻印及庋藏日益重视，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编辑有《三洞琼纲》、宋朝有《万寿大藏》、元朝有《玄都宝藏》等多毁于兵燹。

最后一部是明《道藏》，也是昆明著名道士邵以正参与编修的《道藏》。始编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刊印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这是迄今为止唯一流传下来的《道藏》。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02页。

明成祖永乐四年，永乐帝朱棣命第43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张宇初去世后，其弟张宇清继领其事。至明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正式开始雕版付印，并命邵以正督校，次年始告完成，共5305卷，作梵夹装，计480函，以《千字文》编号，始“天”终“英”，是为《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又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续刊《道藏》，始“社”终“纓”，凡23函，是为万历《续道藏》。《正统道藏》编成后，在明清两代曾多次印刷，颁赐各地道教宫观。清光绪庚子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道藏》经板悉遭焚毁。各地宫观所藏的《道藏》也存者甚少，北京白云观所藏的一部是保存完好的明代《道藏》。

云南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关于明代《道藏》传入云南的说法。

250

一是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由于云南东川等地所产的铜，因兵燹阻道，无法按惯例运往湖北城陵矶铸钱。云南巡抚陈用宾和世袭黔国公沐昌祚，便令昆明北郊鹦鹉山道观道长徐正元仿湖北武当山天柱峰金殿形式，冶铸殿宇，历时数年始落成，取名“太和宫”，亦称“金殿”，成为昆明有名的道观。此时恰好万历《续道藏》付梓，朝廷便把《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一起颁赐云南，指令交太和宫道观庋藏。这部《道藏》一直收存到清乾隆年间，完好无缺。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下诏由儒臣纂修《四库全书》，向各省征书进呈，云南巡抚李湖借此机会搜访云南文献图书善本以饱私囊，解任时附带将这部明代《道藏》带走，自此云南庋藏大部头道

教典籍外流无存。<sup>①</sup>

另一种说法，据民国道人载：在“明朝崇祯年间（湖北武当山道士）沈妙章由江南迎请《道藏》一部供奉于昆明鸣凤山太和宫中，以作镇滇之宝。后至清咸丰丁巳（公元1857年）……全部已毁无存。”这是20世纪60年代昆明市道教会编辑的《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所载，并记录当时“祖国只有首都北京总会保存有部《道藏》，昆市近来在各大名山搜集得《道藏辑要》一部，《神仙通鉴》、《纲鉴》各一部，《明道易经》一部，《大成经典玄门诸经》数百本，玄门、符箓、法箓数十本，内丹、外丹、修养、杂录数百本，名目尚成套，现在继续整理。尚有明两朝名人绘画，明时《陈军门画像》一轴，《真武祖师圣迹图》一堂，清朝名人字画二张，文化局赠送的《黑神图》一堂，杨应选、段三丰、胡应祥三人绘画神像数轴，法衣二件，古乐法器二套，宗教仪式陈设的幡彩、宝剑数十件。”<sup>②</sup>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昆明道教经典文献、法器、文物字画尚有一定的收藏。

以上两种关于明代《道藏》流传至昆明金殿的说法，均说明了一点：云南虽然地处边疆，但因为云南道教最兴盛的时期是在明朝，而且那时省外高道进入云南者甚多，道教经典也由此传入。

云南道教的经籍多从外地传来，后也被昆明、昭通、巍山等地道士、信众抄录、翻印，甚至自撰道书，这主要也是始于明代。至今见诸著录及收藏的道教典籍，仅有明刻大字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三卷及该经的小字本三卷两种。此外有鹤庆王氏，隐其名号，

① 李孝友：《云南书林史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10页。

② 昆明市道教会：《昆明道教历史资料草稿》，昆明市档案馆藏，昆明市宗教事务处档案，1963年11月，20-1-102。

自称“洞天上人”，居漏罗川，曾著《洞天秘典注》，专言黄白之术，兼及丹药炼制。此书人称“多前贤未发之旨”，惜未见传本。清代由于道教在云南广为传布，斋醮法事均需唱诵，云南刻印道教典籍比以往增多，现存较早的清天道书是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昆明王氏刻印的《王灵官火德真经》一卷。道光年间刊印的更多，现存有：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云南大理杨高第校刻《太上神威英文雄武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三卷；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昆明刘福昌刻印的《增订丹桂集》十卷（后在云南的江西会馆又刻印过此书）；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滇省书坊又连续刻印过《太上感应篇注释》、《太上感应篇真讲》、《太上感应篇赘言》及《太上感应篇试帖诗》；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云南“多闻堂”刻印《汇辑宝训》三卷、《广化新编》及《因果新编》；道光年间还有写本《文昌大洞经》、《文昌救酬恩玉局心谶》、《庆祝圣诞科仪》等行世。晚清，昆明书坊“务本堂”、“崇文堂”、“四知堂”等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刊印过《明圣真经旁训》、《关帝明圣经》、《太上洞玄灵檀梓本愿真经》、《救劫宝章》等；滇池罗氏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刻印过《太上感应篇直讲》；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昆明“赵裕泰”刻印过《文昌孝经》并附有邱浚之注释。在清代中叶以后，由一些道长出面，组织信众捐资，还刻印过《敬信剥》、《阴骘文图说》、《性天真境》、《金仙证论》、《御虚阶功过格》、《道海源流》、《欲海慈航》、《仙佛真铨》等。辛亥革命以后，有昆明夏光煊刻印的《中天紫微星真宝谶》等。<sup>①</sup>民国时，居住在丽江县城木家院附近的张姓道士地位较高，张

<sup>①</sup> 李孝友：《云南书林史话》，第113页。

家藏有印制《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的木刻版。<sup>①</sup>

除昆明之外，其他地区刻印的有明万历年间，巍山左氏土官曾刊刻印行过《道藏》，蒙自“崇信学社”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刊印的《觉世真经阐微》，1923年古叶榆董氏所刻《大洞仙经真解》等，现散落于巍山、剑川一带民间。散落在云南民间的各种道经，有些未见收在明《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中，也未见收在清《道藏辑要》中，现将这些经籍名目开列如下：《大上洞玄灵宝三清仙经》、《大上雷霆三官北斗延生保命妙经全函》、《太上静斗垂宪宝科》、《太上金光救赦宝忏》、《迎圣送圣科全卷》、《三教同源文仪》、《三教同路迎亡送亡科》、《南斗午朝仪》、《玉容立幡科借地科全部》、《太阳经》、《太阴经》、《灶土三品经》、《大收国》、《诸神仙佛诰本》、《鳌神救劫经》、《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新经全部》、《斗姆金光救赦宝忏》、《岳山报恩全集》、《圣凡合一》、《解冤妙经》、《利幽科范》、《文昌帝君还乡宝卷》、《关圣帝君应验明圣真经》、《暗室灯注解》、《指迷金图》、《地母经》等等。这些经籍中有很多书可能是云南道士造作并在小范围内流传的。此外，还有一些云南地方性的道教文艺类典籍，如《巍宝山遇仙峰的传说》、《长春洞黑衣道人战恶寇》、《王灵官治服小黑龙》、《长春观遇仙记》、《太上老君点化南诏王细奴逻的故事》等等。<sup>②</sup>

云南还流传有部分道书丛编，如《龙王尊经十三种》、《蕙庐全书四种》、《无上妙谛》、《黄老合编》、

①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874页。

② 杨学政、郭武：《道教在云南》，《宗教学研究》（季刊），1993年1-2期，第19页。

《道言三种》、《道书十二种》、《证道秘书十种》、《金丹注七种》、《道书十三经》、《太上诸经注解》、《道统大成》、《三教心法六种》、《群仙要语三种》等。

另外，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自序中谈到：“一九四二年国符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于龙泉镇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始得读《道藏》。自是而后，历年翻阅割录，排比推考，缮为草稿，积成数尺。”<sup>①</sup>讲述了他撰成这部传世名作的缘由和经过，陈先生曾经在昆明龙泉镇披览的这部《道藏》，是留藏于云南，还是随着南迁的北京大学一起北归了，这也是一部见诸史录在云南的《道藏》。

上述是道教经典在云南历史上的流传、庋藏情况。而今云南收藏较早的《道藏》版本是1923年至1926年上海涵芬楼据北京白云观所藏明刻本影印，云南省图书馆及云南大学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有藏。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道藏》、《道藏辑要》除图书馆外，在腾冲云峰山、昭通大龙洞、昆明万寿宫等道观均有珍藏。

## 二、云南少数民族道教经籍

云南道教典籍中还有一部分最具特色，公共图书馆、道观又缺藏，流散民间的少数民族道教经典。

早在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的人类学家杨成志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派遣到云南作民族调查，他根据考察中搜集的彝族宗教资料，在《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文中将搜集到手的130部彝族经典，分为献祭、祈祷、酬愿、做斋、禳祓等16类，杨成志1930年春在云南

<sup>①</sup>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页。

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拜彝族毕摩张正为师，学习翻译彝文经典《太上清静消灾经》，后来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此文对研究彝族宗教与道教关系颇有价值。

云南瑶族民间也珍藏着大量古籍，多是瑶族道教的经典文献，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习惯上称“瑶书”。“瑶书”是在绵纸上写有毛笔字的线装书，其字大都为汉字，只有个别的字为瑶族创造或改造过的汉字——仿汉瑶字<sup>①</sup>。不管汉字或仿汉瑶字，均读瑶语。“瑶书”种类繁多，云南文山大致分为历史、度戒、丧葬、教育、故事、诗歌、科技、医药等16类，多用七字句的韵文表述，瑶族阅读多为诵唱。<sup>②</sup>

国外学者对此关注较早，并有研究专著和文章出版发表，如1975年白鸟芳郎《瑶人文书》在东京讲谈社出版。而专门介绍瑶族经文收藏的是德国东方及东方文化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Lucia Obi, M. A. 和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 Dr. Shing Müller 合撰、德国明斯特大学传播系硕士詹春媚中译《瑶族之宗教文献：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该文详尽叙述了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瑶族经文的收藏状况及其分类整理研究，这是目前世界上较早介绍公共图书馆馆藏瑶族经文的研究文章。《瑶族之宗教文献：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是1995年由慕尼黑瑶族经文研究计划小组撰写，经 Lucia Obi, M. 和 Dr. Shing Müller 修改整理，于1997年发表在《东亚自然与民族研究学刊》<sup>③</sup> 上，从文中何翠萍教授

① 黄贵权：《瑶族的书面语及其文字初探》，《民族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1990年第1期，第54～62页；郭大烈、黄贵权、李清毅编：《瑶文化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3～207页。

② 《瑶族几乎家家都有瑶书珍藏》，网易·景区介绍·云南文山。

③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Vol. 67, 1-2 (no. 161-62) 1997: 39-86.



所作编者注中可知：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收藏的这批瑶族经文是1980年、1990年从英国古董商处购得，出售者又买自曼谷的一位泰国古董商，而非民族学者的收藏和捐赠。从手本的外貌、装帧形式和纸张看，大部分较老的手本来自中国、越南，较新的来自泰国和老挝。这一批馆藏主要是瑶族手本2776件，2005年9月前已编目整理867件，分为宗教性质和非宗教性质手本，可确认的有80%，其中约550份属宗教性，70份为非宗教性，在宗教性文本中有39册“经文”，约100册“密语”，少部分“醮”的经文，300多册“度戒”，无法列入“正统”道教仪式的小型宗教手本约30册，还有一部分是无法归类的；非宗教类是道德教化类书、汉语文教科书及辞典类约有40本，包括盘王歌本的神话史诗及歌本20册，占卜类书籍26册，其中包含《评皇券牒》、家谱、医书等。经文的版本年代三分之二源自于19世纪，多来自云南、广西，其中记录的最早年代是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他们的分类方法是从四个方面进行分类：1. 借助文献资料对手本进行分类。将馆藏文本分别归类不同的瑶族支系中，如：蓝靛瑶的道公文本（云南及印度支那）——授职仪式的标题：《天师戒度科》、《道范科》；斋/醮标题：《三朝科》、《清醮科》等等。2. 据瑶族不同支系的科仪本分类，不同的瑶族支系强调不同的文本传统，相对的也大多有不同的仪式。3. 神话史诗类歌谣与纪录文件。4. 从道公、师公的名号来分类。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德国还展开了对这批收藏的研究和展览活动：1999年11月4日至12月22日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举办“瑶族宗教手本”的小型展览，2004年瑶族经文研究小组整理出版了一本涵盖

850 件手本的目录。<sup>①</sup> 他们的整理研究为语言文献学、宗教学、民族学研究瑶族经文提供了方便。

也由此可知,对于瑶族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我们与国外相比相差还有距离。据了解,广西已发动了 100 多名瑶学会会员、瑶族地区的实地工作者做资料采集员,从各地采集了过山榜、族谱、家先单、祖途、契约、碑刻、歌本、宗教经书等一千余万字资料。<sup>②</sup> 胡起望也重视瑶书收集,期望搜集一套完整的“瑶传道藏”。<sup>③</sup> 而在云南对于瑶族文书的搜集、保护至今还未得到足够重视,瑶族的文书目前在云南省内的公共图书馆都没有相关的收藏。瑶书大多流散民间,究竟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估计有 300 本左右或更多<sup>④</sup>。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献抢救保护的日益重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开始加以搜集,据普学旺主任介绍,他们收藏的瑶族经文有 50 多种,但尚未加以分类整理,更谈不上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瑶族经文进行整理研究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仅有 20 世纪 80 年代赵廷光根据云南省文山等地区蓝靛瑶的调查,搜集的“度戒”时用的瑶经就有 20 多种。<sup>⑤</sup> 1997 年发表的黄贵权著《简述蓝靛瑶道教的经籍和唱经》<sup>⑥</sup> 一文说,蓝靛瑶道教

① 上述资料参见东方及东方文化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Lucia Obi, M. A. 和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 Dr. Shing Müller 合撰,德国明斯特大学传播系硕士詹春媚中译:《瑶族之宗教文献: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中国台湾《民俗曲艺》150,2005 年 12 月,第 227~279 页。

② 徐杰舜:《人类学与瑶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第 26 卷,2004 年第 6 期。

③ 胡起望:《论瑶传道教》,《云南社会科学》,1994 年第 1 期。

④ 黄贵权:《靛村瑶族——那洪村蓝靛瑶文化的调查与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年。

⑤ 赵廷光:《论瑶族传统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 年 12 月,33 页。

⑥ 载《民族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1997 年第 2 期,第 35~39 页。

的经籍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道派经籍即“道书”，这类书大致有 30 多种，但他只列出了 19 种书名；第二类是师派经籍即“师书”，这类书大致有 10 多种，但他也只列出了 7 种书名；第三类是道派和师派共用的经籍，他没有列出书名。随后，2003 年出版的黄贵权著《靛村瑶族——那洪村蓝靛瑶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一书中，罗列了他所见到的云南蓝靛瑶书约 220 种（已把同书异名者进行归并），而且，他本人就收藏有 70 多种宗教、歌谣方面的瑶书原件或复印件，但未能进行整理和研究。此外，在该书中还罗列了他见到的泰国清迈市鲍列特（Jess G. Pourret）博士搜藏的清代、民国时期的蓝靛瑶文献 40 多种的名称。应当说，这是目前云南已发表的少有的瑶族文书目录。<sup>①</sup>

### 三、云南道士、文人与道教文献

从目前已知文献记载，云南历史上的道士和饱学之士也有极富仙风道骨的著述传世。

云南道士邵以正被刘渊然举荐入京后，做了一件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的事，就是受皇帝诏令主持编修《道藏》，他亲率弟子喻道纯等人广搜道经、详加订正，于正统十年（公元 1445 年）最终刊成了《正统道藏》。这一部道教的鸿篇巨制共收道经 5 305 卷，是唯一完整地流传至今的由官方组织编刊的道经丛书。另外他还著有《长春刘真人语录》。

有著述的云南道士还有明代杨向春。杨向春，字野岩，博治经史，好性命之学，得“邵子先天皇极数

<sup>①</sup> 以上内容参见笔者与黄贵权合撰：《云南瑶族社会变迁研究文献评述》，见张洁主编《云南跨界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文献评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

理”，能前知，隐于祥云县之九峰山，李中溪、杨升庵均有诗文涉及。倡修孔仙桥，更号“孔道人”，以数里灵奇行功济人，著有《皇极经》、《心易发微》诸书行世。<sup>①</sup>

道教对明清时期的云南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据《明清滇人著述书目》记载，这一时期云南有《道德经赞颂》及《庄子注》等书的出现，又有《洞天秘典注》问世，“多前贤未发之旨”，<sup>②</sup>还有《大易集解》、《太极图衍义》、《河洛解》、《太极明辩》及《皇极经民心易发微》等易学著述40余部。以上著述表明，在明清时期，云南学术界关于道家、道教的研究和认识已有较大的进步。高翥映便是其众多学者之一。

云南历史上儒、释、道兼修的饱学之士高翥映，字元廓，一字雪君，别号问米居士，又号结璘山叟。清代云南姚州土府同知，他生性警悟，幼嗜读书，过目成诵。博览群书，自性理、经济以至玄释、医术莫不洞晓，诗词歌赋皆能深造。《姚安县志》载平西吴三桂谋反，翥映曾助清军“殄大逆，制溃军”，因得特授参政之职。后辞官，结庐结璘山，日事丹铅并开庭讲学，弟子成进士者28人，登乡荐者47人。平生著书80余种，有诗文集《妙香国草》、史著《鸡足山志》等，于儒释性命、老庄哲理以及医占杂艺“皆能扫前人支离，自辟精义”。有关道教义理的著述有《增订来氏易注》、《太极明辩》等，对云南道教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云南地方性道教文献还有一些是神话传说：《太

①（民国）雷应中：《云南祥云地志资料调查表》，民国十年（1921年）至铃云南县印抄本。

② 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子部》，昆明：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本，1944年，第38页。

《太上老君点化南诏王细奴逻的故事》、《吕祖开辟巍宝山的故事》、《梁医生会吕祖》、《狗咬吕洞宾》、《陪鹤楼的故事》、《朝阳洞的故事》、《巍宝山遇仙峰的传说》、《长春洞黑衣道人战恶寇》、《青霞观的来历》、《王灵官治服小黑龙》、《长春观遇仙记》等，内容丰富，情节生动。<sup>①</sup>

云南流传、皮藏、刻印的道教典籍，以及地方性的道教文献，对研究道教的发生发展、纲领宗旨、科教、养炼、符篆、戒律，对道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发展均有一定的参考值。

#### 第四节 云南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是道教进行斋醮仪式时，为神仙祝诞、祈求上天赐福、降妖驱魔以及超度亡灵等法事活动中使用的音乐，是道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可以烘托、渲染宗教气氛，增强信仰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对神灵的崇敬，追求清静无为的境界。道教音乐远源于巫祝，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同时道教重祈禳祭祀，即所谓坛醮，不断吸取帝王庙堂仪典音乐和民俗祭神音乐以丰富自己的宗教活动内容，遂逐渐形成了以表达神仙信仰为核心内容的道教音乐。几乎凡有醮仪便有音乐，道教音乐成了传统的演教方式之一。道教音乐因其深邃淡泊的旋律、独特的音韵而富有吸引力，成为道教科仪和欢庆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

<sup>①</sup> 杨学政：《云南道教》，《云南宗教研究》（半年刊），1988年1期，第1页。

道教音乐以教门流派大致可分为正一经韵与全真经韵两类，云南道教音乐也大致可分为这两类。由于道教广泛传播于民间，各地方的道教音乐与当地的地方音乐有长期的交融，故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间传统音乐与地方性音乐的特色。云南的道教音乐以正一经韵为多，广泛分布于汉族及白族、瑶族、纳西族、壮族、阿昌族等民族地区，具体为大理、剑川、鹤庆、宾川、邓川、洱源、巍山、河口、文山、金平、丽江、石鼓、华坪、陇川、户撒、梁河、耿马等处；昆明长春观、曲靖紫云洞、巍山朝阳洞以及新平县部分火居道士则使用全真经韵。此外，在昆明、巍山等地曾经流传过道教清微派的经韵音乐。但在云南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还是“洞经音乐”。

清代、民国云南地方志中有关于云南许多地区的洞经记载。如道光《定远县志》卷二《风俗》载：“正月内建太平清醮，祈年保境，禁屠素食，以五日为期。街市洁诚，设坛起醮。次日迎龙舟讽文昌洞经。”宣统《续修蒙自县志》卷十二《杂志·轶事》载：“蒙自习向谈演洞经，不知其所自始，亦近世礼乐之一班。省城、临安大略相同。”宣统《楚雄县志》卷二《地理·风俗》“乐”条载：“古之雅乐无有知者，惟祭饗宫乐无而已。至世俗所尚，以八音成调，谓之钧天广乐、大洞仙乐。”卷五《祠祀·俗祀》载：“龙华会，凡十二年举行一次，以首年十二月择吉迎旨，次年三月择吉延儒释道三教讽经行法，上供戒葷，装神演戏，起止七日。观者如堵，远近若狂。”“玉皇会，每岁正月初九日在西城外皇阁谈经演醮，起止三日。赴会者男女戒葷。”“准提会、眼香会、太阴会，每岁三月十三日谈经。”民国《元江志稿》卷十一《教育志·通俗教育·节序通俗》载：“（二月）初三日为洞经会，因光绪末年瘟疫流行，邑人刀兆瑞等提

倡谈演，以祈时和。凡与会者娴习礼乐，崇尚道德，于社会尚有裨益。会期观者如者。”民国《个旧县志稿》卷十《社交部·社会教育》载：“（二月初三日）县城人士有鸣钲伐鼓、丝竹齐奏讽所谓洞经以庆祝所谓文昌者，据谓是日为文昌之圣诞。今则未举行矣。”卷十一《祠祀部·俗祀》“文昌宫”条载：“每年二、八月初三日。以公产公租为经费。前清时，每届会期，谈演《大洞仙经》三日。官率士绅致祭，行叩首礼，仍行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送神、诸礼，俨然一大祭规模也。祭品豕一、羊一、果品等类。每年春秋两季领费而办。”“观音会”条载：“设备：届期设洞经坛、皇经坛等，迎神日亦有装高台踩高跷者。因设备与太平会仿佛，故亦名小太平会。按：此会自光绪戊申年举行后即已停废。”另外，民国《姚安县志》卷四十九《礼俗志·社会》“文化”条载：“《甘志》：州境自明季以来，士人立有文昌社（又名经社），歌颂《文昌大洞经》及诸佛道经，和之以乐。箏、琶、箫、管、钟、鼓之属，悉具其音节，曲高下长短，他郡异，即境内亦有互异者。（采访）经社，现尚存十余社，旧时社中，岁晚暇时多立乐社，教授后进乐曲谱。夫乐者所以正人心。……苟能改正其词曲，其收效亦大，若经社附设圣谕坛，朔望及会期宣讲圣谕、格言、因果。几于百家以上即有坛一，末流至有降乩敛财之弊，则在淘汰革除之列。迄国体更新，经社渐就式微，宣讲亦多废弛。”卷五十五《礼俗志·宗教》“经会”条亦载：“滇省经会各县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讽《洞经》、《皇经》等，以祈升平。间亦设坛，宣讲圣谕，化导愚蒙，殆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系土人，故每届举行，均礼乐雍容，古代礼乐得籍以保存于不坠焉，爰采摭事实于后。（采访）姚邑经会，创始于东山老会，（原在

白鹤寺)。明末,举人席上珍始于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祚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逮光绪初,马驷良由浙东解组归,精乐谱,就光禄社矫正音律。桂香社亦摹习之,自是姚安经会乐曲,始归雅正。乐器则有箏、琶、箫、管、钟、鼓、铙、钹之属。经费、物品各社多寡不一,统由纠仪保管,每年轮选充任。先入社者曰经长,年髦者曰前辈。入其社,但觉长幼有序,礼陶乐淑,气象雝肃焉。”<sup>①</sup>如此等等。

云南历史上有洞经会活动的地区,洞经与道教有着密切联系,主要是洞经音乐与云南道教斋醮活动有关直接的联系,也就是洞经音乐对云南道教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的剑川、腾冲、巍宝山等地的洞经多称古乐队,多由民间吹鼓手组成,时常为道士的各种道教科仪吹奏道曲,二者配合默契,可谓水乳交融。

云南道教音乐从音乐形式区分,大体上可分为经腔(声乐)和曲牌(器乐)两大部类。“经腔”又称经曲和谈经,特点是配有反映道教教理、教义的唱词,代表性曲目主要有:昆明道教清微派演唱的《六部神咒》套曲(分曲为《步虚》、《提纲》、《净心咒》、《净口咒》、《净身咒》、《安土地咒》、《净天地自然咒》、《金光神咒》),丽江洞经会演唱的《开坛偈》、《八卦》、《五声圣号》、《元始》、《吉祥》、《清河》、《咒章》、《十华》、《十通》、《十供养》等,新平火居道演唱的《大赞》、《散花词》、《仙家乐》、《清玄令》、《澄清韵》、《步虚》、《小赞》、《祝香》等。“曲牌”则有大乐曲牌、细乐曲牌、锣鼓曲牌三种。

大乐曲牌是以唢呐为主奏乐器,配以打击乐器如

<sup>①</sup> 以上内容见侯冲、杨净麟《洞经与儒释道教之关系辨析》,《玉溪师院学报》,2003年第10期。



大堂鼓、大锣、大钹、大镲、铙、钹等进行合奏的音乐。此类曲牌，有的气氛庄严肃穆，有的欢快热烈，多用于开坛、礼请、上香、登台、收经等仪式中；也有的用于到龙潭取水时的游街仪仗。曲目有《山坡羊》、《柳青娘》、《水龙吟》、《大开门》、《满二尺》、《道师令》、《吹腔》、《佛吉子》、《南令》、《将军令》（又称《川令》）、《朝天子》、《扬调二尺》、《杨伴妆》、《苏伴妆》、《伴妆》、《柳摇金》、《洞仙歌》、《万年欢》、《小桃红》、《汉东山》等。

细乐曲牌是以笛子为主奏乐器，配以三弦（大、小）、碗胡、二胡、提琴（一种中音胡琴）、箏、双琴（双清）、云锣、罐锣、小镲、小堂鼓、碰铃、木鱼、面钹、磬等乐器合奏的音乐。此类曲牌，有的节奏舒展、幽雅动听，有的节奏欢快、情绪活泼，主要用于“三献”、“五供”、“燃灯”、“上香”等仪节中作间奏曲。曲目有《朝天清》、《晶令》、《迎仙令》、《甘州歌》、《一江风》、《落地金钱》、《中风韵》、《南正宫》、《浪淘沙》、《满庭芳》、《一枝花》等。

锣鼓曲牌（通称“锣鼓点”）是采用各种打击乐器如大鼓、小鼓、大钹、大锣、小锣、面钹等合奏的音乐。它是科仪音乐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常用于科仪的开始、结束、转换、连接及经腔的起始和收尾。曲目有《三通鼓》、《打点》、《左右班锣鼓经》、《荡秽锣鼓经》、《金光咒锣鼓经》、《跑五方锣鼓》等。

另外，我们在剑川金华镇也调查到正一派道士与民间艺人组成的“古乐队”相配合的道教斋醮法会的白族道教音乐，具有独特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最显著的特点是带有浓郁的剑川方言韵调，道腔带有云南汉族方言和白族语两调，音乐采用“江南丝竹”夹杂剑川民间流传的洞经乐曲，别具一格。

云南道教音乐多是各民族本身固有的音乐艺术与汉族传统音乐交融发展，逐渐形成的云南地方乐种，瑶族、白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 云南云：一永惻 本因蜂蜚恐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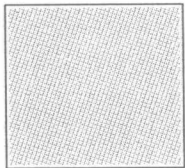


会蜂蜚省南云限地国另：一

265

### 员限国国金蜂蜚市即另（一）

省南云，日一廿（平 2891）平一十二国另，  
出册票进会大员会蜂蜚市全，立取友玉会蜂蜚市即另  
此部一限地国另，安忠胡，柳晋爵，蜂五爵，即蜂取  
即响，员委蜂蜚代荣封李，即蜂蜚，兴蜂蜚，员委计  
，员委蜂蜚代荣封李，又  
市即另，日五廿八（平 0491）平一十二国另，  
大数市局公利全为三限行举同干涉晋面主士市会蜂蜚  
吕事限非常，即蜂取才事限，即事蜚限代荣封李，会  
封，即晋爵事蜚，即爵，蜂五爵事蜚，员委李，青晋  
，为封李，蜂蜚  
日，日六廿一十（平 1491）平二十三国另，  
，为为为四限行限内南雷蜂蜚市即另全会蜂蜚市即



## 附录一：云南省 各级道教团体

### 一、民国时期云南省道教会

#### （一）昆明市道教会历届职员

1.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一日，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正式成立，全市道教会员大会投票选出邓教坤、杨正雄、杨智聪、陆忠安、马坤为第一届执行委员，赵诚兴、廖绍熠、李桂荣为监察委员，陶明义、李增华为候补监察委员。

2.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五日，昆明市道教会在土主庙街老子祠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改选大会，遵章改为理监事制，理事长邓教坤，常务理事吕智青、李松茂，理事杨正雄、杨坤，监事杨智聪、杨教霖、李长庆。

3.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十六日，昆明市道教会在昆明拓东路都雷府内进行第四次改选，

刘理正当选为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第四届职员理事长，常务理事张子乾、王嘉荣，理事杨坤、李松茂、杨正雄，监事吕智青、张性惠、宋锐。

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十三日，昆明市道教会在拓东路真庆观侧都雷府内，举行第五届理监事改选大会，张子乾当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邓教坤，理事杨合明、张性惠、刘理正、尹诚仙、陈性源、李松茂、李兴堂、杨坤，监事杨正雄、吕智贵、宋德信，候补理事王嘉荣，候补监事李锐。

## （二）云南各地道教会组成

1.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一日，云南省昆明市道教总会令饬保山组织成立道教会，刘永诚任会长，石至远任副会长，开辟城内太保山太清宫为会址。制定《保山县道教会宣言》及《保山县道教章程》。

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八日，个旧县道教会于个旧六合巷成立，理事长彭正清，常务理事蒋宗祥、杨至禹，会员43人。

3.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二十五日，宜良县道教会在东岳庙成立，李森任理事长杨春华、张映川任常务理事，会员41人。

4.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保山道教会在太保山老君殿成立，理事长魏廷熙，常务理事为李荫棠，会员61人。

5.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三十一日，云南省道教会缅甸（临沧）分会举行成立大会，理事长阮来庆，常务理事欧教悟、游教缘，乾坤道会员共计132人。

## 二、当代云南省道教协会

### (一) 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名单

(2003年10月14日云南省道教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会长：李明兴

副会长：李宗稳 袁至兑

秘书长：董 允

常务理事(共11人)：李明兴 李宗稳 袁至兑

肖至旻 郑春林 唐信宽 周 霞 肖 遥 汪合耀

丁圆馨 董 允

理事(共25人)：李明兴 李宗稳 袁至兑

肖至旻 郑春林 唐信宽 周 霞 肖 遥 汪合耀

丁圆馨 董 允 夏诚德 程云燕 唐嘉文 蒋仕光

袁家万 金信常 赵诚芳 周宗权 唐岳诚 李怀仁

苏福安 刘园荣 杨合勤 龚菊芬

### (二) 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按地区分布情况(共25人)

昆明市3人：袁至兑 夏诚德 程云燕

昭通市6人：李明兴 肖至旻 郑春林 蒋仕光

唐嘉文 袁家万

保山市6人：李宗稳 金信常 赵诚芳 唐信宽

周宗权 周 霞

大理州5人：肖 遥 唐岳诚 李怀仁 苏福安

刘园荣

临沧市4人：丁圆馨 杨合勤 汪合耀 龚菊芬

省级1人：董 允

### (三) 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代表名单

昆明市 10 人：袁至兑 杨向阳 廖诚明 夏诚德  
程云燕 刘理祥 向志聪 阳平康 乐国华 张 斌

昭通市 30 人：李明兴 肖至旻 陈至乾 郑至和  
蒋至乙 唐嘉文 李明昭 刘至兰 田理明 陈至德  
王至兴 雷至德 谢理英 李至辛 卯至芬 韦至珍  
唐明慈 崔至珍 袁至银 刘诚富 黄至戊 邱至廉  
代宗静 冯理云 韩正英 李明灵 李理道 刘至灵  
耿理灵

保山市 29 人：周诚桃 王宗雁 宋传真 吴诚方  
张诚誉 杨教聪 张信衡 张教明 万理悟 杨上歆  
杨上德 李宗稳 金信常 赵诚芳 唐信宽 周宗权  
岳信富 杨信强 杨诚松 李诚竹 侯宗炳 王崇会  
王崇发 叶诚素 李信洁 胡信衍 谢诚济 丁诚盖  
杨高林

大理州 20 人：江永德 毛信启 官一元 廖来中  
唐圆玄 李玄辛 杨永光 李怀仁 崇 慧 苏复安  
崇 明 谢至典 安善子 李金堂 杨忠礼 熊 泰  
登云子 李陈华 张本泽 张本源

临沧市 25 人：汪合耀 龚教荣 陈教清 吴庆月  
杨丽娟 阳教艳 李荟菊 杨学琴 施灿莲 李开美  
段玉兰 杨玉衡 孙 泽 赵玉娥 丁圆馨 杨合勤  
余国惠 徐文会 徐文英 李兰芳 邹国美 白庭荣  
陈天兰 方长彩

曲靖市 3 人：吴万民 段云富 徐理周

德宏州 1 人：王诚阳

省级 1 人：董 允

## 三、云南省地州市县各级道教协会

昆明市道教协会：2005 年 7 月 22 日成立

现任会长：袁至兑

副会长：程云燕 廖东明

秘书长：何 勇

昭通县道教管理委员会：1981 年成立

主任：张明远

副主任：戴明春 黄宗能

昭通市昭阳区道教协会：2000 年 10 月成立

现任会长：李明兴

副会长：肖至旻 蒋至乙 陈宗富

秘书长：肖至旻

临沧县道教协会：1984 年 5 月成立

相关人员待考

临沧市临翔区道教协会：1993 年 11 月成立

现任会长：赵本良

副会长：欧永慈 丁圆馨

秘书长：丁晓燕

凤庆县道教协会：1985 年 6 月成立

现任会长：汪合耀

副会长：纪合雁 杨永平

秘书长：施灿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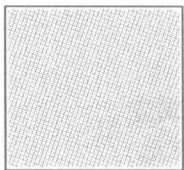
云县道教协会：1989 年 12 月成立

现任会长：杨合勤  
副会长：杨玉衡 段玉兰  
秘书长：孙 泽

腾冲县道教协会：1984 年 8 月 14 成立  
会长：周理厚  
副会长：陈宗培  
现任会长：李宗稳

巍山县道教协会：2001 年 7 月成立  
现任副会长（主持工作）：廖子元  
秘书长：芮泽隆





## 附录二：云南道士名录<sup>①</sup>

### （一）汉 代

杨波远，相传为东汉时道士，人称“神明大士”，明代诸葛元声《滇史》和万历《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清代高爵映撰《鸡足山志》均载：传说常骑三角青牛游滇国、苍洱间，传教布道，替人禳灾祈福。在鸡足山，遇神僧供一石案，长一丈六尺，阔六尺，遂以一手持之而去。后不知所终。今石存焉。

孟优，汉末道士。雍正《云南通志》、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载：云南蒙化（今云南大巍山）人，土帅孟获之兄，居大理巍宝山。其素怀道念，常往来澜沧、泸水间，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

① 采摭古今道士名录，旨在廓清道史脉络。资料来源于历代云南各地地方志、历史文献、档案、碑刻、实地调查采访和各地道观提供资料，以及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闵智亭、李养正主编《道教大辞典》，因资料来源零散，鉴于篇幅，未作一一著录，敬请谅解。

征，军卒有误饮哑泉者，辄手足四禁而不能语，或谓优有良药，亮遂使人往求之，优进仙草，军卒用之立验。诸葛亮惊异之，与语人天运会深有契。后人峨眉山，不知所终。其子孙于元时被赐姓猛。

## （二）晋代

郭志生，晋代方士。字通明，朱提郡（今云南昭通）人。《洞仙传》载其于晋元帝时称已有四百岁，人见之如五十许。有短卷书满篋中，常负之，多止乌场张绩家。每叹曰：“兵荒方至，毒流生民……”后二年，有孙恩作乱，冬夏杀害及饿死者十不遗一。忽谓张绩曰：“应亡。为吾备粗材器殡，不须钉材，亦不须埋，但送山岩中，以石镇材上。”后少日而死，张绩谨依其嘱。数日后，有人自富阳还，见志生骑白鹿于山中行。

## （三）唐代

郑回，唐代儒者，兼通道教之理，对道教在云南的发展有贡献者。相州（今河南安阳）人，举明经，而任唐嵩州西泸（今四川德昌）县令，后被南诏军掳至云南。南诏王阁罗凤曾命王室子弟师事之。其为阁罗凤撰《南诏德化碑》将儒道之理融合言：“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阴阳序而日月不潜，赏罚明而奸邪屏迹。”《南诏野史》载：其后郑买嗣篡南诏蒙氏位，改号“大长和国”而自立为王，后“服丹药躁怒杀人”，卒。

张志诚，唐代对道教在云南发展有重要贡献者，白族。《南诏野史》载：“张志诚，唐太和（今云南大理县）人，入蜀学羲之书，归教滇人。”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又言：“其俊秀者颇能书，

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诚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今云南部分人尤崇王羲之，其源可溯至此。

王载元，唐代得仙者。详见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二节。

张明亨，唐代得仙者。详见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二节。

周溢，唐代得仙者。号寿海。清代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入点苍山。遇异人授以仙草，曰：“此可三百岁。青檀山之石门，乃犹鸡之中距，其崖壁间有草，华在其首，四季不凋萎，采食之，寿书可五百岁。二草合服，则仙可企焉。此草能死汞作白金。”周果从之，服食一茎，必沉沉醉十数日。乃往鸡足觅草，异人已先至矣，指草予之，遂腾空去。周得两草，归叶榆之南天祠，日日酣卧，不食不饮。其后有西竺白胡师，斋戒祷雨，云雨随竿而澍。谓南诏王曰：“汝国有圣人，王欲见耶？”遂与王迹至祠。胡师见寿海，即虔摄礼拜。王惊问，胡师曰：“内观无心，外摄无境，非我所及。”王遂亦礼之，问：“三年何以致旱？”曰：“昔汤旱七年，六事自责，以身代牺，此人君格天之道。王母事咒祷耳。”后采药鸡足山，不知所终。

张建成，唐代得仙者。雍正《云南通志》、清代高翥映《鸡足山志》载：大理喜洲人。於唐贞元癸酉年（公元793年）入觐，过成都大慈寺。适寺钟新成，僧诫曰：“击钟一声者，施金一两。”建成连击八十。僧惊问故，曰：“南诏使也。”僧叹曰：“佛法自此南矣。”及归，崇信佛法，更名成化，屏嗜欲，恒栖僧寺阅经典。嗣思百年有尽，如何得寿命延长，俾得久修佛法。有告青檀山有华在其颠草，终岁不凋萎，服之可以长寿。遂入鸡山寻之，果得草，服之醉死。

其家昇归，具棺殓归陇，停之三月。后启棺自出，携手中珠至其门，挂之遂去，则追之不及矣。

冲举仙，唐代得仙者。雍正《云南通志》载：云南大理人。棲苍山鹤云峰四十余年，常坐一石，或时与人对弈，一日辞众曰：“当以明日行矣。”次日中午登石乘云而去。

王左梨，唐末道士。道光《赵州志》卷三《仙释》载：州人，有功行，能动鬼神。南诏时，高将军建遍知寺，塑佛，三令张子辰书释迦咒，董迦罗书迦叶咒，王左梨书阿难咒。左梨却书天神咒，众嗤其误。梨云：“既云错，我自领去。”遂手挽阿难像行三步。众大惊，恳留之，乃止。

#### （四）五代

董迦罗，五代道士。云南大理赵州（今云南大理凤仪）人。素多戒行，未事辄先知，有禳赤雪致风雨之术。康熙《大理府志》载：其曾对大理政权的建立产生过影响。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兴师讨杨干贞，思平驻军关上，夜感三梦怪异，以为不祥，疑惧不敢进。迦罗为之解梦，皆吉。思平乃决计入关，逐杨氏而有其位，改号大理，迦罗被封为相国。思平死，子思英嗣位，奉思平弟思良废除思英，思良即位，迦罗仍主国政。

#### （五）宋代

杨青膀，宋代得仙者。清代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初青膀不知何许人。昼夜暴露。礼石门，至十年而生慧，遂通经教。讲时天必雨花。迨闭迹青檀山，精熊经鸟伸之小术。一二年又弃之，遂用玉液炼心。忽一日尸解去。《大理志》曰：唐时人也。徐霞客《鸡山旧志》则曰宋人。两存之以待考。万历《云

《南通志》亦载：讲经，天花粉坠。

### （六）元 代

苏忠先，元代道士，人称为真稳先生。云南安宁人。性喜饮，放荡不羁，力学百家，无所不究。雍正《云南通志》载：性喜饮，放达不羁，家贫，力学诸子百家，无所不究。事母极孝，曾负母入岱晟山中，结庐耕食自娱。有异人授以役龙术。一年大旱，农苦无水，其即凿龙泉以求水，泉水清冽异常，能溉山田数十顷。一日，元使者携金帛召之，其应诺，款使者于山中，至夜半，屋宇四周金龙旋绕，作吞噬状，使者骇而逃，遂得不出山。

周哲，元代黄冠。详见第三章第一节。

畔富，元代道士。详见第三章第一节。

张三丰，元明间道士。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 （七）明 代

刘真人，号可成，明代道士。雍正《云南通志》载：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居云南禄丰之南隅，有仙术。禄丰城中苦无水，其掘大井于东街，水清冽而甘，邑人利之。西河有水怪，渡者多遭沉溺，其以符除之，渡者遂安。后奉召入京，祷无不应，被封“降魔真人”。

赵护，明代道士。云南大理太和县人。天启《滇志》、雍正《云南通志》载：其家世传降龙法。洪武年间，其父得召入京，受赏赉甚厚。父还滇时，护迎至昆明，会滇池孽龙作害，百姓求护治之，护坐海口演法，龙去患除。

沈万三，明代道士。号三山道士。本明代秦淮大渔户，后遇张三丰传以黄白术，汞走资罄，百折不回，终至富甲天下。乐善好施，广济贫乏，世人以为其有

聚宝盆。明太祖以与他年命相同而大富，召之曰：“尔家有聚宝盆，亦能聚土筑门乎？”他不敢辩，承命起筑。但筑之而倾，他暗投丹金数片，始获成功。太祖欲犒军，召之贷金百万，他慨然输之。太祖由是益忌，欲除之，马后苦谏，乃得免死而流放至岭南。后移徙云南，与张三丰炼大丹于昆明滇池。全家共服大药，皆得冲举成仙。

沈线阳，明代坤道。沈万三之长女，三岁时失踪。《新纂云南通志》载：她失踪三十余年之后，沈万三移居至云南，一日她忽来曰：“少遇祖师薛真阳（即中条元母），呼儿为玉霞，号线阳，为掌玉匣诸秘法。得授灵通大道，命来就服成药。”沈万三出药与之服用，她声洪体硕，无女子相，慨然有普救生灵之志。曾叹曰：“能忍有裨于道，好杀必丧其元。”后得冲举成仙。

余飞霞，明代坤道。名蕙刚，字建阳。为余十舍之女，西平侯沐春之夫人、张三丰之弟子。《新纂云南通志》载沈万山及其婿余十舍两家至滇时，沐春深慰抚之，见飞霞风致端闲，宛然仙格，因请赘于十舍。飞霞入西平府后，薄其奁资，不以为礼。曾对沐春言：“公所利者，财耳！措之易易。”请备铅汞，熔之，脱金环投入其内，有声如蝉鸣，真汞已干而环如故。又以汞开铜铁，成金宝无数。

王旻，明代道士。号德清，四川华阳人。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康熙《蒙化府志·仙释》载：明永乐初，祖义以安宁判官署蒙化（今大理巍山）州事，没于官，旻寓居此。少有灵异，后遇异人授道术，能役鬼神，召风雨。州境每旱，礼致之祈祷，辄应。邓川孽龙为患，知州阿昭请旻至境，龙遂遁去，一境获安。成化甲午（公元1474年），预知其终，应期不爽，人皆以为尸解去。

于德清、孙仲信俱能克继其术。

杨用广，明代道士。号雷谷。浙江余姚人。雍正《云南通志》载：其曾遇异人，得传五雷法。永乐初，以事谪至宜良，祈祷辄应，四方远近延请者甚多。不问亲疏贫富，唯知济人。年八十多岁容如少年，一日谓弟子曰：“三日后雨雷，吾脱尘凡去矣。”至期果然。

补锅匠，明代道士。雍正《云南通志》载：无姓名，不言，以哑子称。永乐间常憩武定狮山，往来村落间，以补锅为业，有从学者不索谢，但令负担前行。数载人不识也。一日于南门外狮山道上捡树枝作三字云“要南下”。安然而逝，土人异之，收棺木，未葬，越三日尸不见。传哑子又在省城补锅。

杨黼，自号存诚道人，明代白族诗人、经学家、书画家，太和（今云南大理）人。雍正《云南通志》、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永乐年间隐居不仕，为人孝友好施。庭前桂树，扶疏蟠蹙，巢居其上，因别号“桂楼”。一日砚水竭，欲下取之，雇视则水溢矣。自是恍然有所得。遂弃家人鸡足山，栖罗汉壁崖穴中二十余年。其年八十归家。卒之日，家人见公从外人，曰：“杨黼今日大事了也。凡所交游，尽来见别。”又有与人叙论畴昔者，往答之；即其日溘逝矣。即其日，人于安宁道中见之，即其日，人于贵州道上见之，托其家书，寄语诸孙自勗。计其程，是日已逾二千里外矣。经年读书不辍，书工篆籀，兼好释典，读经百遍，引证群书，曾注《孝经》，并著有《桂楼集》、《篆隶宗源》。

刘渊然，明代道士。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邵以正，明代道士。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蒋日和，明代道士。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风摇头，明代道士。姓名、籍贯无考。雍正《云

南通志》、民国《石屏县志》载：弘治间云游至石屏，敝庐垢席，坐卧不常，常佯狂，有问者辄摇头，故称风摇头。一日湖内船倾，乃以手作扶掖状，船果获不覆至彼岸，后州人异而寻之，不知所往。

芮道材，明代道士。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黄甬，明代道士。人称松溪炼士。云南腾越州（今云南腾冲）人。雍正《云南通志》、光绪《永昌府志》载：其曾入佑圣观修行，行持符篆，驱邪治疾皆有验效。弘治间，永昌府大旱，兵备赵炯廷术士能祷雨者，指挥陈仪以甬对。召问，甬对曰：“不必悬幡驱雷，愿竭诚必有感。”炯率僚属斋戒数日。大雨如注。

荀羽士，明代道士。不传其名。乾隆《丽江府志略》载：正德年间至丽江，爱玉龙山景，遂栖焉。日写《黄庭经》数章，混忘身世事，所居室常有紫气缭绕，野鹤成群，鸣食阶前。木土府赠其诗云：“山阴雨雪归来夜，玉杖霞裾引凤凰。”问其年不言几甲子，后飘然他往。

月光道人，明代道士。籍贯待考。康熙《元江府志》、雍正《云南通志》载：正德年间，云游至元江，结庐金鳌山麓，兀坐不言，日啖菜根少许，如是数年，忽不知所在。人往觅之，见壁间书一绝句云：“壶中夜夜种金莲，剑光飞过赤霞天。蓬莱此去无多路，只在山人拄杖前。”始知其已仙去。

存真道人，万历《云南通志》载：又称杨先生。栖鸡足山岩中二十余年，歌咏自得。卒之日，亲邻皆见其来。又有人于贵州道中见之，寄语诸孙，是日已过三千里外矣。

张道裕，明代道士。云南剑川北乡永榜村人，白族。雍正《云南通志》、康熙《剑川州志》载：自幼好道潜修，其遇异人授以符篆术，心悟明通，能致风



雨。俗传能使役鬼神，号称“张天师”。某年，大理旱，众遣使邀道裕祷雨。裕语来使曰：“尔先往，吾次日来。”使者抵大理时，道裕已先一日至矣。祷雨辄应。太史李元阳与之友。据其第12代孙张鹤说：张道裕到北京天师府学道八年，带回经典、器具，把道教带回剑川。其基地在永榜村，墓碑上写着“天仙真人鸿儒仙客享阳七十一寿”。

邓豁渠，明代道士。号太湖，四川内江人。天启《滇志》、雍正《云南通志》载：年二十遇异人授以无为之旨，遂弃诸生，入青城山。其耳边常有报将然之事者语。时有内监邀之供养，夜梦神责云：“汝以劣相，妄希大道。”觉而告之，其遂辞蜀入滇。至大理太史李元阳馆，于三塔寺修行。不久又游至岭南，“宇内名山，无不游览”。后不知所终。

季常在，明代道士。云南大理宾川县人。嘉靖间明经。精吐纳之术。康熙《大理府志》、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其游鸡足山之芭蕉箐，憩谷间，遇二仙，携至瀑布崖，即今之玉龙瀑也。与语，大有所得。年百岁，貌如童颜。建瑞泉寺，于其中尸解去。

相八，明代道士。云南临沧人。万历《云南通志》载：幼好道术，旷达不羁。性嗜酒，遇人辄饮，绝无尔我之界，醉后歌唱，徜徉自适，年近八秩，面如婴儿。一日，忽感异梦，无疾而卒。

赵波庆，明代道士。云南大理人。万历《云南通志》载：嘉靖初，徙居于临沧。为人绝无贪嗔妄想，镇日诵经默坐，人有延之祈禳者，不受资财，颇著灵验。年近百岁，一夕跏趺而化。

高景阳，明代道士。滇海人。万历《云南通志》载：自幼无室，斋疏终身，夏不衣葛，冬不挟纊，饮酒自乐，不知所终。

杨崇六，明代道士。江右人。万历《云南通志》

载：游学至临沧，遂家焉。善《易》卜，颇知吟咏。居万庆寺，造纸为业，得纸价，随即沽饮，饮必至醉，与世无忤。七十余岁，无疾而卒。

杨向春，明代道士。字野岩，《云南祥云地志资料调查表》载：博洽经史，好性命之学，得邵子先天皇极数理能前知，隐于祥云县之九峰山，李中溪、杨升庵均有诗文，倡修孔仙桥，更号“孔道人”，以数里灵奇行功济人，著有《皇极经》、《心易发微》诸书行世。

王合忠，明代道士。康熙《新兴州志》载：嘉靖间遇异人授黄白之术，黔国公召至昆明，不知所终。

布张，明代术士。云南昆明人。雍正《云南通志》载：有异术，尝为一姬作“预修斋”。姬持所写文示之，其一见，尽焚之。姬曰：“书此数日矣，今卒然，何以为此？”布张曰：“具十笔砚，一夜可成。”姬潜窥，见十人皆同貌，五鼓书毕，布张于送神时伏地不起。谛视，唯衣冠在地而已。后又有人数见焉，直指使以为妖，欲收之。乃趋黔国公家，乞白布一丈，坐其上，令两徒掖之走。少顷，抵安宁。黔国公请其术，布张画门于壁，以手扣之，门启，中有宫室，甚丽，黔国公疑而不入，俄而无有，其幻异类如此。尝欲以术传僧铁峰，铁峰不受，遂示蜕于长虫山之虚凝庵。已而，乡人复遇于大理。

陈羽士，明代道士。康熙《元江府志》、雍正《云南通志》载：嘉靖间栖元江东山玉皇阁，神气俊爽，目光如电，嘯命风雷，无延晷刻。元江尝大旱，众人将其迎至城中，甘露随注。居元江二十年蜕化去。

徐道广，明代道士。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周月泉，明代道士。籍贯待考。乾隆《丽江府志略》载：嘉靖年间携一鹤入丽江芝山，自称来自终南山。丰肌美髯，黄冠羽衣，料事多奇中，纵口谈丹术，

笔墨间喜为幻渺之说。居数年，辞去。木公送以诗曰：“仙客频来坐小楼，岭云海鹤共悠悠。醉余说尽延生诀，袖拂苍髯不肯留。”

陶浚，明代道士。澜沧卫（今云南永胜）人。万历《云南通志》、乾隆《永北府志》载：性廉勤，精道术，祈祷辄应，不取资财。其一日忽语人云：“上帝命我为三天门置簿御史。”遂端坐而逝。卒后数年，礼部有文至澜沧卫云：“其人曾与天师会，令修建真人府，免其子孙差徭。”永胜城北习仪真庆观曾塑其像。

提脚道人，明代道士。姓名、籍贯不详。雍正《云南通志》、道光《昆明县志》载：万历初至滇，住昆明北郊外龙王庙。以绳提左足趾而行，佯狂笑谑，人不能测。天明入城乞食，晚归所居。有门卒欲窘之，未哺即欲闭门，然道人已至，遂无奈。常披一衲，终岁不涤亦无尘垢，又时到莲花池，吐肠出浣。一夕，至冢间化去，葬庙侧。后滇人有游武当者，复遇其于南岩宫，衣服颜貌如旧。

王见鬼，明代术士。姓名、籍贯待考。康熙《蒙化府志》载：万历初年游蒙化，言事多隐中，人因呼之为“见鬼”。有科举生遗书于省，其夜登屋作法，剪纸为龙，乘之而去，未及二鼓，持书归来。众惊，以为神，愈敬事之。后不知所终。

载宾，明代道士。镇南人（今云南南华）人。光绪《镇南州志略》载：万历时左所舍军。夙性好道，祈鸾鸟忽降，命往陕西云游，适同乡进士孙学易任陕西布政，其往谒，学易款留署中。一日鼻孔流血数升，遇钟吕二仙点化曰：尔勿惊，此尔幼年奔浊之气，血尽而道成矣。遂隐于陕，不知所终。学易归里，述其事。

贾国瓚，明代云南鹤庆府道纪司道纪，万历九年

(公元1581年)，地方大旱，他祈祷有应，夙有功行。府治精邪为忧，其驱治，是故郡绅连名保授道纪之职，府吏应请授其印信，并命其管辖境内羽流巫师。

云和，明代黄冠。山东人。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久居终南，万历间入鸡足山，住狮子林，与山中名德结百期打七炼魔，后不知所终。

蓬头道者，明代道士。字洞元。姓名、籍贯待考。雍正《云南通志》、方国瑜主编《保山县志稿》载：崇祯年间，云游至永昌（今云南保山），跌坐市中，无所求，人与之钱，随给贫乏者。后归东山宝鼎寺，每于磐石上静坐，山禽翔集其身，人以此异之。

姚成，明代术士。云南石屏人。雍正《云南通志》载：其少孤独，性磊落，不喜章句，慨然慕冲举术。人劝之娶，不应。后遇异人饮以酒，香气馥郁，仰观天表，若有所见，遂能言风雨、阴阳、休咎事，人咸异焉。手拏一芭蕉叶，四时皆有青色。又晨起，戏为人致书燕邸，比暮果持手札归。居无何，失其所在。

周青阳，明代术士。籍贯待考。康熙《蒙化府志》载：其善黄白术。有妇失金，欲自缢，其点金与之。后此事泄，隐去，不知所终。

紫霞，明代道士。籍贯待考。龟形鹤息，衣冠甚伟，炼“九还丹药”成，以内炼火候未至纯阳而未服。杖头挂一葫芦，历览宇内诸名山。光绪《鹤庆府志》载：其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至鹤庆，喜小西湖眠龙洞清奇，遂徜徉于其间。越数年，尸解去，土人葬之眠龙洞左侧。至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有道服来游眠龙洞者，宛然紫霞也。人争迹之，忽失其所在。

段头陀，明代术士。雍正《云南通志》载：晋宁人，朱颜白发，佯狂市中。每食松柏叶，有人叩请时，

出呖语一二，言极微妙，事后多验。

李破罐，明代术士。雍正《云南通志》载：不知其名，居于宜良岩泉山石洞。常携破罐入市，凡有所得，无论盐米蔬果，俱入罐中煨食。若无所得，即拾鹅卵石煨食，人问之，曰：“芋也。”取食果芋。每于龙泉洗罐，翻里向外，洗净仍翻如故。因呼李破罐，后不知所终。

梁道士，明代道士。姓名、籍贯待考。雍正《云南通志》载：居易门，有道术。易门艰于泉，梁以蜡为三龙，置隙地，俄涌三泉其上，泉之龙只一目，令泉中鱼亦一目。又有庙在石澜山，梁檄神，一夜移之。

马志登，明代道士。雍正《云南通志》载：结庵永昌龙泉门外。有盗十二人，夜入寝室，登禅定不动。盗周视左右，见案上蔬食罗列，皆新炊者，盂箸亦如其人数，盗惊骇。其徐云：“昨已知诸君至，故嘱徒预备耳。”劝令饱餐，仍为开说果报因缘诸妙义，群盗悔泣，罗拜而出。

唐风子，明代道士。雍正《云南通志》载：云南泸西人。知书事父孝，朝如佣，暮则歌咏，父死后便入山中。好与儿童戏，人以疯子呼之。严冬大雪，卧石上而蒸汗如雨。衣敝以绳缀牛马骨披之，或食铁及瓷瓦，齿声楚楚。好事者趋谒叩祸福皆不答，有时谩语又切中其隐征。一日取刀刈草，有客乘骑而来，其取草饲马，且曰：“不听吾言，故至此。”马泪忽下。崇祯末年，曾语人曰：“满眼皆沙。”又曰：“水来矣，沙难留矣。”乙酉（公元1645年）以后，人们始悟所谓沙者乃指沙定洲之乱，水者则指清朝军队。丁亥（公元1647年）为寇卒所执，逼令速杀，刃至其颈，白气涌出。

薛继茂，明代道士。别号青羊道人，永昌（今云南保山）人。雍正《云南通志》载：任贵州巡按时有

道人来见，曰：“公宜急告归，明年秋风起，吾当至永昌一晤。”未几茂果归。道人如期至，日与讲修炼法，后引一青羊入茂家，道人与羊忽不见，茂无病而卒。乡人有白大理来者，见其与道人同行，问何之，曰：“苍山一游。”因寄语其子，墙内有丹书、小剑、小印、小旗各一，宜善藏之。乃抵永，其家方治丧。乡人传其言，果有前物，始知其尸解去。

不二头陀，明代道士。雍正《云南通志》、方国瑜主编《保山县志稿》载：姓任，少为永昌郡吏，素好道。尝过一坊下，见字纸数篇，书阴府律，皆其所犯者，遂弃家云游。至应天府，跌坐市中，巡城御史责之，命都纲安置一古寺内。此寺常有妖，白昼伤人，其至寺跌坐，半夜见蛇长数丈，口如盆，自上而下欲吞之。其端坐自若，叱曰：吾在此，尔宜速去，不去将诛汝。顷之，蛇顿入廊下，遂隐不见。人以此感动，捐万金修德普寺居之。尝见其发有五色光，后坐化去。

张景儒，明代道士。雍正《云南通志》载：平生好道，家在楚雄五龙山村，有二子矣。一日于村旁里许，见岩下清泉、修竹、鸣鸟，亲人乐之，遂于岩下结茅。凿大池种荷，环池植桃李。其栖迟其中，日饱黄精。久之，内功充足。忽谓人曰：“九龙山人召我矣，吾其从吾师游乎？”遂舍去往河外九龙山，不知所终。

王盘，明代道士。云南通海人。康熙《通海县志》、雍正《云南通志》载：日与群儿嬉戏，元夜以一竹竿令群儿闭目骑之，风声盈耳，至一大郡，银花火树，骇人心目，夜半归，谓之曰：“适往江南观灯耳。”

郑颠仙，明代道士。云南通海人。康熙《通海县志》：尝以疯癫混俗，一日尸解，人见其往武当山。

施神仙，明代道士。罗次（今云南禄丰）人，不

知其名。光绪《罗次县志》载：其自幼出家于玉龙寺三教殿石壁下，久之能辟谷。及流冠入滇，语人曰：“祸乱至矣。”遂入深山，不知所终。

刘士宽，明代道士。江西人。雍正《云南通志》载：其幼而目盲，年十六遇异人以金镞挑之，遂复明，且得授以养生秘术。年八十余，自蜀入滇，齿发不衰，入夜，篝灯兀坐不睡。其谈长生以养气为主。年九十，一日忽见数人入，称青城山使者，迎之为观主，遂逝。是日，太平寺僧梦其携茗十余斤，且言欲入蜀，僧异而访之，始知已逝。

杨崧，明代道士。自号真觉道人。大理浪穹县（今云南洱源）人。道光《云南通志稿》载：其负异质，读书过目能记。年二十时因慕仙而弃家，其母以爱怜而忧思失明。崧忽归，以舌舐母目，使之复明。其母命家人具食，至则崧已去，不知所向。八十年后，有一道士至其家，题诗二句于壁曰：“名利得来花带露，身躯失却海沉金。”墨迹未干，人倏不见。家人异之，后玩其诗，知乃崧所常吟之句也。

杨洲鹤，明代成仙者。云南武进士，曾官至永胜参将。后得尸解法，忽蝉蜕而去。

杨崇显，明代修仙者。邓川州（今云南洱源邓川）人。咸丰《邓川州志》载：其善静摄。年91岁时，忽召弟子作别书曰：“有何生，有何死，不碍死生是男子。一直守定出迷途，灵台不昧无彼此。”詠后遂逝。

白鹤仙人，明代得仙者。不知何许人。道光《云南通志稿》载：其习静于安宁之月林庵，每出入常有白鹤相随，其言语饮食亦无甚异，居数载，忽乘白鹤飞去。

张异人，明代得道者。不知其名。道光《云南通志稿》载：安宁州（今云南安宁）白塔村人，以渡船

为业，无论昼夜寒暑，有呼即应，力行累年。一夕，有呼渡者，其闻之既往，抵岸侧不见。顷之又呼，又往。如是者三，乃见一人立于岸侧，举止非凡，谓之曰：“汝真诚人也。吾将渡西游，愿从否？”张诺之。遂偕往，至一山，只见火炎腾烈，张甚惊惧，有追悔状，其人曰：“汝既不欲往，吾以所执杖付汝。饥则舐之，渴则掘之，好持去。”言讫不见。张茫然，归而有悟，乃祝发于龙应寺。相传龙应井即是其杖所开成。

施敏，明代术士。云南剑川人。康熙《剑川州志》载：其精通道术，尝夜获红珠一颗，遂能呼召鬼神。曾试其法，令东家雨而西家晴，群人为之骇异。临终前，自塑其像，手捏泥珠，隐真珠子内。村人奉之，所祷辄应。后珠为识者盗去，慈云庵尚存其像，两指犹作钳珠状。

袁仙，明代得仙者。云南景东人。《景东直隶厅志》载：其少服何首乌，常居无量山洞，语言不伦，颇奇中。一日，至家索汤，浴毕，端坐而逝。及举棺，甚轻，人亦不经意。寻复有遇之白家城者，见其戴黄冠，骑黑牛，且寄言索履家中，果于坐室中寻得一履，人始知其仙去。

者干道人，明代道士。不知何处人。《景东直隶厅志》载：其曾在者干洞前种豆为食，服一布袍甚洁，不洗面，人问之则曰：“不能洗心，徒劳洗面。”有人为坠石所压，众皆遑遽，道人上前以指拨之，石如转丸，被压者遂无恙。一日忽告众人：“蓬莱临校散仙名籍缺，吾当去。”遂排石壁入，人随之，壁旋合如故。

王高，明代学仙者。《景东直隶厅志》载：曾居清凉山下讲无为之旨，深契元诠。年七十二，欲赴巍宝山习静，其妻阻之，乃潜逸去。其子觉，追之不及，



唯闻其语：“汝归，敬事汝母，数年后再来寻我。”子泣从之。后数日，有人见之于深岩中，趺坐而坐，面色如常。

彭本源，明代道士。《景东直隶厅志》载：景东厅（今云南景东）之磨外井人。少慕道，入无量山大石房潜修，遇异人指示，洞明内景。创金顶山寺居之，后遍辞道侣，跌坐而逝。后有人曾见其逍遥于金顶山。

周草窠，明代道士。澜沧卫（今云南永胜）人。雍正《云南通志》载：其结庵东山下，精勤道术，且工水墨。卒后数日，有人自省中来，遇之于路，寄回朱履一只，人始知其得仙。

赵道人，明代道士。《云南通志·宗教志》载：云南安宁人，习道于罗岩石隙间，岩路陡绝，每日牵一白牛架桶下山取水，如行坦途。三十年不出山。州绅张碧泉每来看他，二人结缘友善。传说道人趺坐离世当天，张见道人走进门来，方前迎招呼又不见人。过后才知时已羽化。

杨海玄，明代黄冠。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陕西人。初至鸡足山于狮子林礼斗，后入腾越州雪山礼斗。至三十年，斗姆乘鸾降，授以仙术。海玄以驴驮药囊，复至鸡山采异草，谓欲往华山了道耳。终岁后飘然去。

周东华，明代黄冠。河南归德人。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幼通三教，尤精老子《道德经》旨。年二十五，云游方外。崇祯甲申（公元1644年）至鸡山，后游腾越，人皆以神仙呼之。周答诗云：“人人说我是神仙，我是神仙岂偶然？只为南滇无大道，故来此地示真传。”后竟隐去。

傅秉忠，明代方伎。雍正《云南通志》载：江西人，寓居曲靖府。精天文，预知推算来年水旱丰歉，丝毫不差，善祈祷，应验如神。其弟亦精其术，后徙

居武当山。

赵汝隆，明代方伎。雍正《云南通志》载：曲靖人。精太素脉，知人穷，通寿夭，用药随取草木与之，无一不痊。有官病齿衄，日流血数升，诸医束手，隆摘苦蒿令细嚼，立愈。有贵人馈人参，其尽送人合药。年九十六终，有人遇于碧鸡关西，寄语家人勿恻，始知尸解去。

潘烂头，明代方伎。雍正《云南通志》、方国瑜主编《保山县志稿》载：永昌（今云南保山）人。幼随长春真人刘渊然学法，其头常烂，人以烂头呼之。有疾痛往求者，即以头上血书符，无不立愈。水旱祈祷辄应。相传其头因误召神，为天君所击云。

陈洞天，明代方伎。雍正《云南通志》载：鹤庆人。遇异人，授以黄白之术，丹成以济穷困，人多德之，有丹药遇瞽者投少许，光明如平时，远近踵门求济，限为之穿，晚岁以其所得注《洞天秘典》一书，多属前贤未发之旨，人争购之。

铁道士，明末清初道士。《明季滇南遗民录》、雍正《云南通志》载：姓赵，河阳（今云南澄江）人。慕太乙皇极之理，于永历帝入缅时，弃家学道。一日忽癫狂，行歌市中，数日不食，亦不饥。喜佩铁，取铁钏约两臂，铁箍为腰带，铁箸铁匙及刀剑之类，咸系之身，约百余斤，行路锵锵。嗜饮酒，酒醉则枕铁而卧，无所苦。尝与蜀中铜袍道人张闲善遇，辄击掌狂笑，与饮市中，既醉则歌呼，乌大恻而后去。

王褒华，明代道士。字一统，云南玉溪人。康熙《新兴州志》载：州庠生，明乱，弃农巾学道。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李定国平沙定洲回经新兴，褒华挽缰指数欺君，惨毒被杀。后数十年，州人遇于鸡足山云。

## (八) 清 代

庄道人，清代术士。不知何处人。道光《云南通志》载：顺治年间游至浪穹凤羽乡，爱当地山川灵秀，遂寓于玉皇阁，晨则往白石江沐浴，昼夜恒在石室静息，人亦不以为奇。时议移玉皇阁于山顶，众谓自下而上，恐难为力，庄曰：“我能为之”。临期，但合数人，以箴绳牵引柱梁，辄动，未尝费力即至山顶，人以为有仙术。后不知所终。

杨和庭，清初道士。名济舟，不知何处人。雍正《云南通志》、光绪《姚州志》、民国《姚安县志》载：其性至孝，有道行。清顺治乙酉（公元1645年），云南有沙定洲之乱，和庭奉母至姚安，寓玉皇阁。孙可望部将张虎攻陷姚州城，人民纷纷逃避，和庭却仍奉母居阁上，讽诵道经。兵入拔刀砍之，见其人头已落便下阁而去，复闻阁上又有诵经之声，返而视之，惟见木鱼有刀痕而和庭仍在，于是敬之异常，传其事。

赵云峰，清代道士。云南通海东渠大村人。康熙《河西县志》载：幼牧牛于石上礼斗，遇异人，受以奇术，能降龙。

万肃，清代道士。光绪《云南通志》、民国《石屏县志》载：云南石屏人，康熙癸丑（公元1673年）进士。遇异人授以导引之术，遂披剃修行。年七十余，无疾而逝。时其徒自建水归，遇诸途中，抵家后方知其卒，甚异之。石屏乾阳山顶有一茅庵，相传即其精修处。

涂道人，清代道士。不知何处人，光绪《云南通志》载：康熙初年云游至平彝县（今云南富源）之碧云寺。山中苦无水，离河五里远，道人畜一驴，佩以双瓶，人为之注满水则可，任其自来自去。道人每炊

用一小铜罐，却可供十数人饱啖尚且有余。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无疾而逝。时有人从杨林驿来，遇道人于途中，然至寺方知其已坐化数日。

阍廷选，清代术士。云南通海人。嘉庆《临安府志》载：其学长生术，居秀山数年，有所得。康熙辛未（公元1691年），以方士召见，寻归，逍遥溪山，能预知未来事。

王清楚，又名金怀怀，云南阿迷州（今红河开远）人，一说生于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又说为明永乐间人，然事迹主要见于清朝年间。曾助官府平阿迷州民乱。传说因入五老人访异人，迷路而入一洞，出则至金盖山云巢，时已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遂有悟而止云巢师靖庵先生陶浩然，至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方返云南。至阿迷，家已不存，遂上鸡足，无所遇。返之楚，遇管太清而成师弟缘。居武当山真武宫二十九年后转入金盖山，又居三载，复返云南。闻鸡足道者黄守中名，遂往谒见，得传斗法。又出游蜀，得青羊宫李泥丸授以黄白术等。乾隆乙卯（公元1795年），闵一得曾遇之，后不复见。

洪圭，号七仙。自称为叶榆（云南大理）人。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其目陷下，童子戏以指纳入陷中，几深三四寸。帕其首，衣短褌，鹑衣百结。腰束草绳，於系下插一铁烟吸，断竿败甑。盖人之弃馀也。一烟囊蔽甚，以杂片补之。扶一杖，只二尺余。赤其足，而两履缚之杖头。多来往牟尼庵山阜之隐息处，谓人曰：“今结胜会，大难成，胥令会主来，我有要言，当言之以毕其志。”其时余以龙华事剧，未暇往，三邀卒莫至。高翥映曾偕巍岬高子调雪、石钟寺怀中、鹤钟山僧法具俱往，至则起曰：“汝请我设坛，云何不送布施？”调雪曰：请几时矣。曰：“请之久矣？”调雪曰：“相请何事？”曰：“设十方坛耳。但

肯布施便设。否则已耳。”高翥映曰：“随需当应。”乃曰：“要募化乾坤盆二，扇玄八，两牝半斤，玄关一百八十四，纯阳一具。不知道的三十六牴化。化的是石头土块，不化的是烧铅炼汞。”调雪曰：“这些都有。”七仙曰：“难！难！只要真心拿出来，一件便已。此会须我画一符镇之，当掘土三尺，将符焚入瓶中，埋之则善缘成就。”调雪曰：“汝目不见，如何能符？”曰：“人以眼见，我以心见。速将黄纸硃笔来。”有顷，皆取至。其举笔丝飞发动，不移时符就矣。又书符下四句云：“乾坤胚基，震兑垂策。格至一诚，至孝维则。”再书旁四句云：“井中有石，为苦作酸。若言不信，作孝而康。”掷笔云：“我昨方自老君山从蔺公塔来，有七友：刘玉珍、袁真、吕青阳、杨青羊、孙元、陈才专，我名洪圭，是第七个。”即起，坚留莫住，疾行于冈间，若腾空御风焉。遣数人追之，至寂光寺树下。蹴膝坐。黎明时，登金顶。报者至，复以数人追邀七仙。遂由放光寺下鸡茨坪，如飞去。追愈捷，行愈驶，且投杖横两足间，则追者愈莫可及。至大理之上关，则遥望已达喜洲境。数人颓唐归桥舌，告其异，闻者咸相称异累日。七仙书符在高翥映撰《鸡足山志》有记载。

憨仙，不以姓名传。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以憨仙自称，人即以憨仙称之。露顶，方面巨耳，眉间大痣，肉理光润。胖身修长，衣一缁袍，两袖皆蔽。杖头酒一葫芦，兼一瓶，贮米半盎许及生芋子数枚，傍挂鲜猪肉，沸沸有气，似鲜割时淋淋血尚欲滴。其时山中以建龙华胜会，严断屠沽，异其得未曾有。至九品台，指曰：“明明是这条大路，如何人不会行？我且上去，直登顶方下来。”尾之，遂登金顶。至二十八日会初起，即至石钟寺龙华坛。见高翥映，把两手擎定曰：“你切不许动。若动就没有力量。我磕你

十个头，好孝念。”问：“从何处来？”憨仙答曰：“我昨日二十七方自姚安街上化纸钱香烛来。”又大喝云：“人生在世苦捱捱，那似你有事无心应化来。镜上有尘呵转黑，拂尘镜本不沾埃。”又大笑云：“埃字是土字放过矣字。”复迅云：“土能生物，物茂而土性不分。土能养人，人化而归乎黄土。黄土黄土，落在中宫。一中则无，不通无不通，通通好通通。”疾狂舞下阶，出寺去。踪迹之，则卧大土阁路旁石窟下。嗣是每晨至坛，持二烛，缚纸钱于瓣香上，掷之殿中门闌间便去，坛不下四十余处，无一坛不以香烛纸钱献。会毕寻求，则竟失其起向矣。既承志之事竣，旋姚，明经韩章陶以鏐石朝璜王元图咸来告语曰：“去年腊月二十七日，有酒肉憨仙来城募香燭纸钱，状貌修伟，谈论甚异。”继庠廩生任彝初、徐翮亦详言：“二十七日在姚安城募缘，甚异。”举以证憨仙，所言甚符。合计姚安至鸡足山，程须六日，而一日往还其间。又大理、楚雄、蒙化、鹤庆、永昌，皆此一日见憨仙募香烛纸钱于各府之城内。彼分身显现，诚莫测其际矣。

段泰利，清代道士。别号学仙童子。不知何处人。传说其为明末绥远将军蔡羨，因预测天下将乱而隐在江川县一阳宫。光绪《云南通志》载：其风骨潇洒，喜与文士往来吟咏，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坐化。

李道真，明清之际道士。乾隆《东川府志》载：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自临安府至东川，住城隍庙中。自言其全真度牒上载是戊寅年（公元1638年）生人。而貌只如四十许，身长力大，披发跣足，衣单道袍，冬夏不易。常卧雪中，汗出淋漓。医人奇疾，无不立效，东川城中谢氏幼女已死，道真用灰和醋，遍身涂之，幼女遂复活。由是求医者甚众。后不知所终。

黄冠道人，姓名不详。清代道士。光绪《镇雄州志》载：云南镇雄尚未改土归流时，庠生胡同柱家中忽有一黄冠道人至，胡问其行踪，曰：“来处来，去处去。”款之以茶，不饮。辄行，胡追询之，则曰：“此地将开花矣。”次年，镇雄遂改土归流，设参将署于胡国柱家，胡始悟其神异。

那姑仙，清代仙人。乾隆《东川府志》载：改土归流时，那姑无水，忽有一老妇来向一夷妇化斋。答云：“有米无水。”老妇曰：“何难？”遂以拄杖向岩划之，倏见清泉顿涌，遂灌田数千亩。或谓此老妇是观音大士化现，因建观音寺奉之。

庄子诰，清朝黄冠。闽中人。高翥映撰《鸡足山志》载：初采铅于北卫厂，炼丹于鸡足后山之瑞莲精舍。大清拓滇，则炼丹于固山额真杨坤之绿漪堂。余至会城，曾叩秘。又常见其修炼法。盖无中生有，金水交足而已。子诰谓余曰：“鸡山多异草，惜人不及知。于彼修炼，百胜于此。”柰何时遇固山卒，子诰乃辞去。

黄天顺，清代道士。新兴（今云南玉溪）人。雍正《云南通志》载：不婚娶，佯狂行乞，有遗以衣履者，尽著之，旋脱于道上。每出，群儿环绕，捶击无怒色。能吞银铜瓦砾，或戏与巴豆丸者，服数十粒无恙。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按察许弘勋赠以金，不受，拾零星小块咽之，后不知所往。

张自明，清代道人。号研虚，云南昆明人，曾官至提举。《滇系》、道光《昆明县志》载：其晚年好道，得遇人称“黄神仙”之新兴人黄天瑞，与语，契之，遂请黄入其家，从学修炼术，十六七年后遂能辟谷。七十三岁时，先示其子死日，及期，端坐而逝。所著书有《性功》、《命理》、《魔境》数篇，语多微妙。

主 向联第，清代术士。宁州（今云南华宁）人。嘉庆《临安府志》载：少时弃举业，游华盖山遇刘可成，与语，有悟，遂癫狂无状，家人以银铛系之于暗室，数年后遂能言百里外事，如目击般准确。人有病，联第以灰土及茅檐水嘘之即愈。尝言“吾九九飞升”，果于康熙甲午（公元1714年）九月九日一啸而逝。是夜溪水涨发，屋宇尽没，惟遗银铛独存。其后有病疫者，以银铛系之，立起。

金 赵紫霞，清代道士。不知何处人。曾憩于河西县（今云南通海）小街文昌宫。康熙《河西县志》载：其言语清妙，容止脱俗，众争向之。居月余，紫霞用铁器置香炉中，使成银并用之。为肉食以酬众，将行，众送之。及去。众见壁上有诗。墨迹未干，丰句曰：“惟有陈园老树精，方知我是神仙过。”初，陈家园有怪，颇为祟，是后即止。

董天台，清代修仙者。云南大理人。康熙年间至云龙州，好持竿垂钓。光绪《云南通志》载：其曾偶遇吕仙，吕化作常人，相与谈导引之术。天台知其非常人，敬之若师。一日，吕谓之曰：“与子别矣！后将待子于榆城之三塔寺。”逾数年，天台至三塔寺，一童子逐之曰：“吾师待子不值，仅留药以相赠。”天台受归，见其中有诗曰“若问此何所用，点他顽石成金。”取石点之，果获金数千。天台乃博济贫困，广修梵宇仙宫。七十二岁时端坐而逝。

许阳晨，云南宜良人。民国《宜良县志》载：少业儒。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赴江西龙虎山学道，列为龙门正宗第十二代字派，苦修十载。道既成，精符箓，天师授以雷旗、令牌、宝剑各一。归里后，祷雨祈晴，灵应如响，邑中连年迭遭虫蝗伤禾稼，其用法驱之，岁果丰稔。县署有要犯越狱，延阳晨设法缉捕，三日内竟获犯。又邻人有失鸡者，诬阳晨家



属盗之，阳晨作法，令盗者捧烹熟之鸡，跪献于失主前，乡人感颂为神明焉。其灵效类如此。

李金阶，清代道士。字建白，临安府（今云南建水）人。雍正《云南通志》载：其有异质，目光射人，性笃孝，嗜学，精于《易》。其亲既亡，遂有出尘志，避迹深山。一日有道士求济，金阶以盐与之。既去，盐复在原处。追之不及，归而渐狂，或长卧，经月不食，或一餐斗粟不饱，或雪中赤身卧石上。久之，遂能前知，言多奇中。城南有石洞伏蟒伤人，金阶居之，患遂绝。除夕题诗，有“明年辞别旧家乡”之句，隔岁果卒。

刘可成，清代术士。宁州（今云南华宁）人。雍正《云南通志》载：其年三十隐于华盖山，结庐古塚旁，能前知祸福，多隐语，使人自悟。有以不义之物进者，辄呵拒之。晚年辟谷，日饮酒，虽履霜卧雪而无寒色，年七十，须髯复长，齿落更生。一日书偈云：“亥时闭，子时开，七十余年去复来。”遂坐化，历七日，香软如生。

王来豫，清代求仙者。号景云。雍正《云南通志》载：通玄理，曾炼丹禄劝仙台山。后尸解而去。

张紫霞，清代道士。楚人，人呼为老道。乾隆《蒙自县志》载：年七十时来蒙自，见东街文昌宫额有“紫府飞霞”字，遂居之。室无丹灶药瓢，朝夕炊一锡孟，有米则煮食，无则煮菜根瓜藤。终日望云，夜不假寐，且少言动，常言；“灵光一点如黍米，能遮天映地。”人有所遗，即散济贫困。一日示永寂期，至期果端坐而化。

余常清，清代道士。云南大理太和县（今大理市）人。幼从黄冠修导引术，后独栖于中和山之灵官殿。道光、咸丰《邓川州志》载：其每一跌坐蒲团，辄不寝食，不知寒暑。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往

湖广朝山，未归。后灵官殿常遭久雨，满地皆凝苔藓，惟余常清所坐蒲团处干燥如常，世人以为其有真火之验。

毕正宗，清代道士。号云止，昆明人。道光《云南通志》、道光《昆明县志》载：其慕道出家于龙泉观，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曾主持重修该观。尝遇法师授五雷法，遇旱祷雨辄应。

陆常崇，清代道士。云南罗平世家子。民国《昭通志稿》载：龙门第七代传法师。性好道，遨游名山各庙，至昭通为元宝山住持。见其殿宇狭隘，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发宏誓愿扩修庙宇，遂往各厂募化得数千金，有强盗窥其囊，约党途劫之。常崇至，戟指而叱曰“止”，众形痴如木鸡，乃率负担者从容行，回山大兴工作另建正殿、两廊，崇高山门，庙貌岿然矣。以其余资置产业为香火费。卒葬北山。

张贛，清代道士。人称云中鹤道人，字身宝，云南通海人。道光《通海县志》载：其好导引术，乾隆戊子（公元1768），就赴试而遨游不归。后游至武当山，有河西张依仁（贛之族叔兼业师）守楚北之安陆。武当人知其来历，劝其往谒，贛不应，山人即告其叔，叔遣人迎之，有童子云：“云中鹤道人已去矣。”安陆有丽城驿。距城四十里，时驿人至府言事，问之，果有某人过驿。计其到驿时与离山时不差寸晷，其神速如此。自此后，莫知其所之。

云大辩，清代道士。本姓王，派名一诚，自号活死人，云南普洱人。早岁从军，年五十职落而无所依，遂悔思出俗。于昆明太和宫得金怀怀度之，尽得授法诀玄微。年五十二至武定，力行苦行。年余，得管天仙引至鸡足山龙树山房。鸡足道者黄守中见而喜之，授以“恒那印”（斗法名），令司竺。又年余，出游天台、终南三十余载，乃至江南冠山，休于来鹤道院，

潘雪峰曾得其诀。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樵云子曾往冠山访之，未得其授。于院侧自筑“活死人墓”，生入而逝，驻世一百三十岁。

蔡恹，清代术士。字元阳，云南楚雄人。康熙《楚雄府志》载：其通玄理，尤敬儒教，尝以白纸换童子残字回。有人荷薪于东门，遇恹言：“入城颇凶。”不听，果因牵累拘三日乃得还。此人神其术，因拜恹为师。恹后尸解。乾隆间，有郡人徐来任天津卫大使，忽见恹在舆前，徐呼曰：“尔死多年，何以到此？”恹不答，倏忽不见。

吴来清，清乾隆年间道士。云南昆明西山下渔村人。曾发愿修凿西山石道。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起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止，历14年而通三清阁至慈云洞石道，并凿成送子观音石像。嘉庆时诗人那文凤有《赠吴道士》诗言：“万钻千锥显巨才，悬崖陡处辟仙台。何须佛洞天生就，直赛龙门禹凿开。紫气荫书心里出，慈云霭露掌中来，昆池恰似观南海，不负当年梦几回。”

陈守元，清代道士。云南姚安人。民国《昭通志稿》载：龙门派第八代师。素以拳勇名。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效法师傅陆常崇志培修庙，至各厂劝募，有保厂师高刚以神勇称，守元往谒，刚手持金铤曰：“能取过手即予尔。”守元用手帕一挥，金铤已在其手，刚不觉如何失去，乃大服，立畀千金。各厂效之，多厚给。归装充牣，乃建元宝山观音堂，辟灶君殿，庙宇焕然一新矣。

张守志，清代道士，云南罗平人。民国《昭通志稿》载：陈守元师弟，居常谨守规戒，恒在山，不履城市，得清虚元妙之旨能知未来事。士大夫往访者，间授以一笺，或诗或词，中藏玄机，后来俱有应验。

梁朝枕，清代道士。一名妙詮。云南蒙化（今大

理巍山)人。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载:少探《参同契》、《悟真篇》诸书之秘。曾云游至黔,遇白海琼以诗一轴予之。后归,无疾而逝。相传他即武当山的紫石山人。

冯应魁,清代道士。字亦九,道号尚元。云南蒙化(今大理巍山)人。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载:有隐德,安贫乐道,精医药,治人甚多,祈祷辄应。曾得孙思邈《安乐仙方》,并将其刊存于巍宝山朝阳洞,人争重之。

杨汝兰,清代道士。云南昆明人。继吴来清之后,雇工开凿昆明西山慈云洞至达天阁隧道,自道光庚子年(公元1840年)始,历时九年方毕其功。其死后,子杨际泰继续开凿达天阁,雇山下龙王庙村70余名石工,悬身绝壁,用13年工夫开出龙门胜境,石窟内雕有文昌、关圣、魁星诸神像,绝顶凿成南极仙翁。

郑颠仙,清代得仙者。通海人。嘉庆《临安府志》载:常以疯癫混俗。一日尸解,人见其往武当山而去。

王遴宾,清代得仙者。阿迷州(今云南开远)人。嘉庆《临安府志》载:嗜导引术,一日有道人携之去,久不归。其子访至弥勒州绿萝洞,见岩上书“脱窍处”三字,识为遴宾手笔,急入视,乃知其已蜕去。

方秉乾,清代道士。云南大理府人,曾任赵州道正司道正。道光《云南通志》载:其年少读书不成,乃习五雷正诀,能为人治鬼病。性好饮,所得财只以偿酒债。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州境大旱。知州命之祈祷,并以三日为限。前二日,秉乾皆醉肆中。第三日登坛喫水,须臾大雨倾盆而下。知州奇之,锡以匾额曰“道契参同”。

龙清池,清代道士。贵州人。民国《昭通志稿》

载：龙门派第十代师。相传生时所居处祥云涌现，五色盘结不散，望气者曰：“此地当出异人。”曾祖父为武孝廉，见之聪颖，培植读书，冀以科名显达。而清池性好道，熟诵《黄庭》、《道德》诸丹经。忽梦长髯道长谓之曰：“子图南，后身偶乘山川瑞气游，人间非食禄相，乃天上爵也，无失本来足矣。”遂辞双亲，访道名山，得“五龙法”。至昭通住元宝山。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庙遭火灾，清池立召龙行雨，大降滂沱，炎焰顿熄，正殿赖以保存。遂出募化七千余金，兴工复修，庙貌依然。更筑以围墙，树以石坊，并建戏台，栽林木，置产业，一时称盛。是后五属之人每年上巳日咸来瞻礼，实始于此。

张心亭，清代道士。云南昭通人。民国《昭通志稿》载：早年从商，性慈善好道，凡羽流至昭通，罔不结纳。后至峨眉，出家访道，成都遇阿爷，授以丹诀及先天之旨，谓丹经中有“全凭伴侣调水火”句，如纯阳三峰，皆和光混俗，乃返家兼理旧业。其弟子甚众，传道者不乏人也。

陈全生，清代道士。玄名一善。民国《昭通志稿》载：遂宁籍，寄居昭通开设药铺，事母孝。中年出家云游，继返，初服专精《易》学，后遇张师回讲，明先后天法器、药物，时年已古稀，做功百日，通灵筋骨，容颜转如少年。后入山静修，旋即羽化。

周永禄，清代道士。云南昭通人。民国《昭通志稿》载：龙门派弟子。游临安拜师，出家未改服，淡然无欲，身中子午尝如潮涌，每大雪洗澡，其身热气蒸腾，人因呼“二神仙”。从张师，学始讲先后天作用，后住元宝山，以拳勇气功名。

姜道人，清代道士。名海，云南昭通人。民国《昭通志稿》载：移住元宝山，性慈善，好修建。见老鸦滩一带道路崎岖，行人艰难，发愿兴修。唯云台

山尤为险峻。功竣，又修自昭通至东川大道，并修碧鸡关一路，均督工不倦。晚年圃寂于云台山，无余积，人始叹其贤焉。

高太明，清代道士。云南大姚县人。出家于四川青羊宫。光绪《续修顺宁府志》载：道光初年游至顺宁（今云南凤庆），创建雪华观。力行心解，能辟谷不食，静修。处地极险绝，人迹罕至，常有虎来护持。其逝后，有客自蒙化来，曾与其相遇于道中。

张明绪，生卒年代无考，有石墓立于腾冲云峰山后当地称为“四人抬轿”的小山岗上。墓碑刻“清应拟黄冠谥贞静享稀寿恩师明绪张老贞人墓”。立墓时为清道光庚戌岁（公元1850年）初夏。

田道人，清代道士。四川人，逸其名。光绪《云南通志》载：道光初年云游至腾越之天台山，募建玉皇、三清两殿，性耿介，其言论多中，后无疾而逝。

李理阳，道号飘然子，生于清道光庚寅年（公元1830年）三月二十六日，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二月十日羽化。墓志载：“先师原籍腾越州（今云南腾冲）小西练陈家巷人氏。生而廉介，不慕荣利，不谈时事，沉静淡泊，有飘飘然出之度焉。公年五十，遭时不偶，劫绕红羊，公乃淡情尘世，矢志玄门，又思边徼之崇山峻岭，求请绝欲缥缈如仙者，所在罕有，选胜登险，始受戒于云峰仙山，寄情乎危岩峭壁……公住持灵山数有十年，修殿宇，勤功课，无懈可击。”收徒张宗泰等，羽化后，立墓于云峰山后石椿坡上。

雷复泽，号清风。清代道士。云南嵩明人。道光《云南通志稿》载：自幼入道，曾于州之万发山重兴玉皇阁，后住持于昆明相度山之三元宫。常炼丹砂，合药以施济，多神效。年九十余，行步如飞。

李发英，清代道士。云南大理赵州（今大理凤仪）人。道光《赵州志》载：性纵达，得异于石窟

中，为人驱疾辄效。云南县旱，延之祈雨。发英令架棚，将其焚烧，再以其灰划圈于地上，又令祈者跪于圈内。须臾大雨，水泛而圈内独干。众方骇其异，视发英，已不知所往。后三年，有吴道士遇之于武当山下，发英授之以书及烧炼法，令其济世。吴不听，妄用之。一日，忽见发英来，及坐，发英及前所授书倏亡之，惟存纸衣一件。

洪净，又称“泓园鹤山道人”，云南昆明人。道光《重修姚州志》、民国《姚安县志》载：不贪财利，苦行清修，忘食废寝，两迤推崇焉。邑人高翥映尝题其墓碣，曰：“鹤山深处净泓翁，生长昆明氏姓洪。饮露餐霞无凡俗，参玄悟道有仙踪。云游已曾经五岳，陛见何期到九重。熙朝圣主钦赐宴，苍松古柏也恩荣。”

张宗泰，清代道士。云南腾冲人。道号卧云，生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九月初六日，于光绪庚子年（1900）二月十四日羽化。墓志载：“……清河巨族，世居大董，洞坪，生有十五，天性笃诚，不意军需扰乱……见其世道纷纷……遂出家于云峰胜景，侍奉香火，潜心修持……适幸投奉理阳李真人门下为徒……只意心存侍佛，养性修真。”因战乱，“以住持道奔往甸苴避处，嗣后兵燹告竣，真人复归名山，将……秽染殿内者逐一而洒扫除之，接次培修殿宇。真人朝夕拮据，无以休暇。所更嘉者，周遍远方，亲身募化，竭力捐资，不惮苦瘁。俾得以增加其魁阁，新换其舍身，广添其房舍，以及上下之倾覆者，逐细修补，庶几华美周匝，焕然一新……而特有可异者，真人于云峰名山数年来，竭尽心力，建造成功，以为永垂不不朽。无如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二十五日被火焚化。呜呼！将真人半生之功力一旦而湮没者也。然真人生有善根，仍不改其初心，复又

竭心财力，毅然自持捐募重修，使神灵得所安慰，汉夷有所瞻依，于是，就理兴工，经营备至，将来功要告成，岂奈真人在六八，脱化归西，幸门徒可以胜任崇修，接踵兴复。”

李思泰，清代道士。云南昆明人。光绪《云南通志》载：出家于昆明龙泉观。凡地方灾祥，先事知亡。咸丰丁巳年（公元1857年），偶书偈语于丹房云：“来时不带物，去时物不带，脱个光洞洞，这回方自在。”次日，人推门视之，已蜕化矣。

李元龙，清末道士。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赤足仙，清代仙人。不知何处人，亦不详其姓氏。光绪《云南通志》载：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至宜良，袒身赤足，日于城市中呼曰：“好饿，好饿！”人与之食，不受，如此数日，不知所终。次年，米价腾贵，民不聊生。时人以为前事即仙家预言。

合一，清代道士。云南建水人。曾赴昆明考试，不中，遇看相者言其修道可以免灾，回乡后便入云龙山为道士。丁亥（公元1887年）县城被乱军攻破。合一幸免。持戒精修，晚年多与中原道士交游，后事不明。

赵复珍，清代坤道。《巍宝山志》载：清代蒙化直隶厅人，清咸丰年间，丈夫出征，她赡育公婆、子女，后丈夫阵亡，公婆、子女相继病亡，她在巍宝山入道，把全部家产奉献给巍宝山，并集资修葺三皇殿、灵官殿、巡山殿。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羽化。

孙家营庙中道人，清代道士。道人无名，字住庙。民国《石屏县志》载：终身种花最盛。或收字纸，或自发笑，夜有驯虎伴之。刘副榜祖荫志其墓。

一文仙，清代道士。不知何处人。乾隆《丽江府志略》载：游至云南丽江，栖息吴烈里龙王庙中。蓬头赤足，腰系铁环，四时惟一敝袍，严冬大雪而汗流



满面。每晨入市，见人笑而不言。虽暮必归庙中，步履如飞，乘骑者尾之不及。在丽江二十余年，颜常如旧。一日一饮数十巨觥。向人索酒钱只取一文，有多与者辄掷去，因呼之“一文仙”。

活神仙，清代得仙者。不知何处人。光绪《云南通志》载：曾从唐疯子游于陆凉（今陆良）厂地。为人佣工。好谈休咎，恒奇中，后以白帛荡涤如纸而制道衣一件，谓佣伴曰：“余将西归雷音寺，诸君担柴集山前，焚之以送余。”众如其言，但见白云一片浮空而来，俄而柴焰上冲，直与云接，仙乃著道衣而跃入火中，至火尽而仙无迹矣。

陈大仙，清代学仙者。云南陆凉人。光绪《云南通志》载：幼遇异人授以书，归阅之，室中如火。其父知而焚之，火熄而书如故。一日于牌楼遇一丐者，相与拱者曰：“烧得可怜！”人问之，答云：“适火神由南昌来。”后数日，闻南昌果遭火灾。

李一诚，清代道士。居景东三元宫。光绪《云南通志》载：性一而和，尝静坐蒲团，终夜不倦。每诵经文，实心体验，望之真觉色相俱空。

保合，清代得道者。云南安宁麒麟村人。光绪《云南通志》载：生而颖悟，弱冠遇异人，入鸡足山，授以导引术。后归，构一危楼，不假工匠，一夜倏成。年五十，无疾而终。临葬，启棺视之，惟存一履。

王延勳，清代得道者。云南安宁小龙潭人。光绪《云南通志》载：精导引术。事母至孝，其母性喜嗜省城汤饼，每一动念，延勳即将汤饼进呈，热气尚腾。年七十无疾而逝。后里人客归，遇于途，至其家，已物化数日矣。乡里惊詫，因启棺视之，一物无存，始知其仙去。

史元修，清代学道者。自号卧云山人，民国《宜良县志》载：清光绪初入宜良岩泉寺修道。性澹泊，

常赤足不著履。喜画葡萄。朝饔夕餐，惟山肴野蕨。夜卧石洞中，终岁以为常，虽严冬冻雪不设衾褥，能耐寒。遇有投契之客至，辄留与饮酒，款待殷勤，否则白眼视之，掉臂即行。旧俗每岁八月朔，妇女赴寺进香者络绎不绝，元修趋而避之，不知何往，欲覩面卒不得。计居山数十年，足迹不履城市，虽功行未必圆满，然其清心寡欲，不染俗尘，洵为近世所难得者。

王静明，清代学道者。号白石，新兴（今云南玉溪）人。乾隆《新兴州志》载：幼嗜黄老，至老不倦。常静坐守默，或数日一餐。年八十五将终时，口念“元元”而逝。

单道人，清代得道者。云南宣威人，俗呼为“疯子”。《宣威县志》载：本为郡画匠，不修边幅，荷一箱，携一棍，遇人或喜或怒，而人之福祸可由此知，歿后数年，乡人有于临安府（今云南建水）见之者。

李清溪，清代术士。云南澄江人。《宣威州志》载：曾寓宣威，有道术，见人辄拜，缕述其过。虽暧昧不可名言之迹，皆津津举以示之，其人闻之，已切中其隐，不觉毛发悚然，汗流浹背，由是皆敬畏而师事之。随身惟一衲一瓢。一日，忽落发脱衲贻其徒，遂杳不知所在。

唐道人，清代学道者。名济才，云南宣威人。《宣威县志》载：学道有得，披发自适。人问以言，不答，时作狂语，人或谓之“疯子。”年八十余，童颜鹤发，眼光如炬。

道聘，清代术士。字美中，不知何处人，《黑盐井志》载：居真武洞中，书画精绝，世人宝之。又精研壬遁神异之术，众莫测也。曾与客眺望门庑下，视市民梁氏居所有雷电气，骇曰：“彼以道法召雷帅，神至，弗能遣，神怒，将以雷斧毙之，奈何？”亟召数鸽至，以指画符于其背上，令鸽鼓翼至梁氏居所。

俄而雷电毙鸽，客始骇异。后不知所终。

施真顺，清代学道者。号米谷子，云南禄丰人。《墨盐井志》载：仪貌古朴，慧悟独绝，冠豹皮，披羊革，杂佩常有数十件。善绘，能入神品。晚学辟谷术，颇有所得。后不知所终。

唐疯子，清代有道者。蒙化（今云南巍山）人。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载：常背负母亲乞食，有得则先奉母而后食，食毕酣歌笑傲，佯狂于市，见者遂以“疯子”呼之。后负母远去，不知所终。

王尚德，清代术士。字聪明。《新纂云南通志》载：精岐黄医道而有医德，有请其治病者，虽极贫贱而必行，未尝稍延。尤精妇科，且着脉定人贵贱寿夭多奇中。一日外出行医，道经骑鹤街，见一棺横陈，有死妇将殓而葬，尚德曰：“此未死人也，速请入诊。”用药后，妇人果苏醒。其族子王大令幼贫失学且久病不愈，尚德诊之曰：“病固无害，脉有贵征，昌王氏者，必此子也。”五六年后，此子文名藉甚，后虽未大贵，而居官廉洁，任教精勤，蜚声云南政学界。人皆叹其神异。

张景儒，清代好道者。康熙《禄劝州志》载：家在五龙山村，一日于村旁岩下结茅而居，前业大池种荷，环池植桃李。景儒栖于中。日饱黄精，久之内功充足，谓人曰：“九龙山人召我矣。”遂舍茅而去。不知所终。

李明清，清末道士。号山拙人。云南昆明人。曾任太和宫住持，为龙门派第二十代嗣师。李元龙羽化后，道众推之为太和、城隍两大庙宇住持，事事以身作则，认真清理庙产，整肃道规，弘扬教义，由此宗风渐振。又不辞劳苦，募化集资，帮助修复庙宇若干处，重刊经文多种，成绩昭著。羽化，门徒杨智聪率众立寿塔于鸣凤太和宫二天门侧。

吴道人，清末道士。原名李德全，一名孔仙，江西金溪县人。民国《盐丰县志》载：隐居井西之天乙山，裹足不入尘世者三十余年，童颜鹤发。预知羽化之日，先期肃衣冠，告别友朋，次日果应时而去。

耿道人，清末道士。失其名，四川绵竹人。民国《盐丰县志》载：光绪间，侨居盐丰（今云南大姚）北极山之文殊阁，苦志清修，朝夕斧削石壁，可梯而上下。越二年，又寓北关外之齐云阁，蒔花种竹，引清流入池，池满则泻于大寺阁之清香井，以备居人汲饮。清宣统元年，羽化，井人用棺殓之，题曰：耿道人墓。

甘来仙，清末道士。失其名。民国《姚安县志》载：丰颐广颡，虎臂虬髯，少时即有潇洒出鹿之慨。读书未卒业，旋弃去，入碧云庵为黄冠，讲求导引之术。于败箧中得《灵枢铜人图》数卷，朝夕研求，遂精针灸之技。奇病沉痾，应手而愈，人酬以资，贫则辞，富则受。月必三返省亲，以所得与兄嫂，具甘旨奉二人。又微察二人嗜好而力致之，往来乡村间，见新蔬嘉果，曰：“吾亲所未尝也，必市归以献。”居无何，兄嫂及犹子俱以时疫殇，即还家养亲。羽衣执爨，朝出诊疾，昼市薪米以养。暇则拍手唱道情，周旋庭阶间，蹩蹩蹒跚如痴如狂。邻童骑竹马来观者，填门塞巷，堂上人抚掌大笑。亲没，负土成坟，手植松柏，庐墓三年。后仍以医济世，所获一以赖贫乏，寿九十八岁。

清秀，清末道士。不知姓名，居骆驼山。民国《宜良县志》载：数日不食不饥，虽多予以食立罄，竟日无语。后不知所往。

尹清澈，清末道士。号天池道人，宜良北古城人。民国《宜良县志》载：幼业儒，长学道。清初结庐于岩泉山洞，苦心修炼，不染凡尘。性坚忍，终岁蓬头

跣足以为常。冬夏一衲，不尚华丽。日食两餐，唯饭一盂、蔬一碗而已。暇则焚香静坐，恭默思道。其制眼药多奇效，人皆德之。晚年，徒众为之祝嘏于龙泉之南石壁下，凿一穴，倩画师写其真于内，为藏真所，外则覆以亭轩，亭之内环立石碑，刻士大夫赠记于其上，名曰“藏真阁”。道既成，著有《吾真篇》，授其徒。一日于阁中坐化。歿后，其徒尝见其形影衣服如平日，即之旋杳。时邑中名士周泽溥、窦若斗、苗克昌诸君，邑令李煜、高士朗、龙灿、苏诸公，俱有诗歌题赠，载诸贞珉，至今犹存。

赵和沛，清末道士。云南江川人，长春派第十二世都纪司。昆明黑龙潭有其墓，墓碑正面书“重修龙泉观长春正派第十二世都纪赵法师讳和沛”，有联曰：“惟看老子五千字，更在瑶台十二层”，横书“五峰拥翠”、“鹤台”，墓四周镌刻有道教长春派符录和文字，上有“光绪三年岁次丁丑仲秋月七月二十四日（四川）杨濡石公镌造字样。”和沛善书，黑龙潭定风塔有其书《玉皇心印妙经》、对联“壮丽三天接画栋，包罗万象归文笔”及横批“华山伏虎”。

贾神仙，清末道士。世居宜良贾家村。民国《宜良县志》载：生有至性，善事父母，乡里以纯孝称。父母相继物故，俱葬于温泉寺前。葬后庐寝三年，足不履宅，凡衣服饮食，悉命家人送之，服既阙，一日荷树枝于肩，返其宅，谓其妻曰：“我与汝今日永别矣。”言毕飘然而逝，不知所终。相传贾某得仙术，能飞腾变化，率皆荒诞之言，惟孝可格天，一念感通登仙籍，成正果。

陈明远（1841—1922），清末民初道士。四川人。《巍宝山志》载：早年在四川鹤鸣山入道，后到巍宝山玉皇阁修道，收熊至宽等十多人為徒。他精通道经，会道教功夫，巍山民间拜他为师者上百人。

### (九) 民 国

杨智聪（1870—1947），清末至民国道士。号心园，又称铁笛道人，昆明云山村人，曾任太和宫住持，为龙门派第二十一代嗣师。10岁拜李明清为师，稍长，曾随师祖李元龙居城隍庙，元龙羽化后，复归太和宫。师父李明清委他为宫中主持，袭任五品都纪司之职。他四出募化，曾主持兴建了太乙殿、雷神殿及土主殿。因见铜殿残缺，复请矿务大臣唐炯捐铜万斤，新铸阁门10扇，铜瓦43路、楹联4副，及两旁待座圣像。又新筑城墙十余丈，添建三座天门，重修牌坊和钟鼓楼。又开办学堂，集众讲经，清理典册，整肃道规，令道风为之一振。民国政府成立后，任中央道教会云南支部长，1925年改称云南道教会主任。1929年移居千佛寺，居10年，羽化。

熊至宽（1874—1968），清末至当代道士。四川洛邑人。《巍宝山志》载：俗名熊玉林。曾当过清军，会武艺。入道巍宝山后专攻中医药，擅长治跌打等外伤。

刘理正，民国道士。云南昆明人，《云南省志·宗教志》载：太和宫住持，龙门正派第二十二嗣师。事迹不详。

李毓兰，民国道士。字天香，云南建水人。《云南省志·宗教志》载：博学喜读书，尤好老庄道学。精易理，善推断，曾于泸江乡设教。从学者甚多。晚年隐居在建水城东青莲寺。

孙道人，民国道士。《云南省志·宗教志》载：住石屏县城隍庙中。素喜种植花木，庙中名花甚多；又好收集字纸，沉默寡言，偶然自笑。

姚大孃，民国坤道。巍山人。俗名来存。《巍宝山志》载：其夫陈在涵民国初年参加云南讨袁的护国

战争，战死川南。她无儿女，誓不再嫁，在巍宝山报恩殿入道，十方募缘集资，于1923年重修报恩殿、甘露亭。

华来顺，民国坤道。曾任缅宁（今云南临沧）西区完贤村老君殿住持。自幼丧父，随母李阳纯出家。1931年，步行到四川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受戒，习学道经及坐功。后回缅宁宏扬道教道义，深受道众敬仰。1936年，与阮来庆等4名年轻道姑到青羊宫二仙庵受戒，学习拜忏、讽诵、修斋、建醮等法事，取回道经数十种。与阮来庆同为一方道教领袖。1942年、1944年两次共同主持上九会建醮7天，城乡道徒及顺宁、云县道友千余人云集缅宁，全部穿黄色宽袖道袍，分日前往观音寺、三教寺等朝参，两道长穿前后绣太极八卦黄缎道袍。前有4对道童吹箫、执木鱼、捧香炉、端盥巾引导，后有全堂洞经经席乐席紧随，再后为千余道众执笏排双行纵队缓行。盛况空前。她常住完贤老君殿。1948年又在东城外购地新建一老君殿，未及装修，1949年羽化。

阮来庆，民国坤道。曾任缅宁（今云南临沧）城北子孙庙坤道住持。童年从师学道，心坚志纯。1936年与华来顺等到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受戒，学习三坛功课及修斋建醮法事，取回道藏经典多种。1941年，抗日远征军第六军从缅甸撤退过缅宁，士兵患疟疾时疫甚多，她派弟子收购中草药，以大锅煮汤挑到各兵营问疾散发，救活不少伤病员。第六军军长甘莅初，师长杨宝珪，第五行政区专员薛之标，团长梁筠、丘廷皋、何麟瑞等都曾书赠匾额。部队移防时，官兵整队到子孙庙致谢，离缅宁后又寄感谢信数千封，在当地传为佳话。主持过两次盛大的上九会。其逢人言必口称“慈悲”，待人和善。而庙内弟子道规整肃，庭院精致雅洁、纤尘不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选

为政协委员。1958年羽化。

张诚定，民国道士。字静庵，道号玄空，云南省弥勒县竹园街大法车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11月初一日，张宗泰道长之徒，长年于腾冲县修道，民国初年曾任云峰山主持，云南迤西道教协会会长，1949年12月11日在腾冲大西乡乌索屯万佛寺羽化。

陈崇伦（1886—1952），民国道士。道号柏川，云南元谋县马街人。家有弟兄六人，其排行老五。因躲避抓兵大约于1938年到云峰山道观入道，拜张诚定道长为师。因张道长年迈，于1942年托其主持道观。1945年左右，因雷火扫殿引起火灾，山巅主建筑各殿被毁。他积极募化筹资，得南洋侨胞和四方庶民大力支持，能工巧匠之助，于1948年至1949年间，重建云峰山道观主殿观音殿和玉皇阁，正筹备建盖老君殿，时遇新中国成立而搁置。土改时，他被划为“宗教地主”成分而拘押，劳改释放回寺。1952年因病羽化。

董元谭，民国坤道，云南腾冲城关白果巷人氏，享年一百多寿，修缮朝阳观（原名朝阳寺），中年出家入道，参禅司道，称“仙姑”道号，被后代孙称仙祖，道法无边。

合灵，民国道士。《云南省志·宗教志》载：蒙化人，性勇敢，精拳术，因田产为乡里恶绅侵占，控告到官，官受贿不理，他愤杀恶绅，逃至顺宁雪华观为道人。他身轻若猿猴，能攀高岩如走平地。1946年，县城外红龟山文笔塔顶被雷击坏，重修时匠人不敢攀登，合灵一跃而上，修复。

净脉，民国道士。字晓峰，云南石屏人。《云南省志·宗教志》载：童年出家，便知苦行。后游顺宁县，住在玉皇阁，朝夕讽诵道教经典。靠刀耕火种，自食其力。他善观气候变化，村人常请教占雨祈晴，



都能验应。

## (十) 现当代

杨正雄(1885—?),别号守元,云南昆明市人,16岁在青帝宫出家,拜真人派陈传性为师,1932年任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第一届执行委员 1940年至1945年任昆明道教会常务理事、监事,以草药行医,1952年选为昆明道教会副主任委员、昆明市政协委员。

常鸿兴(1889—?),云南省河西县(今通海县)东乡四村人,别号有盖,道号鸿兴,1945年拜殷教壮为师入道教,1955年前在虚凝庵修道。

邓教坤,民国道士。别号育元,云南昆明人。居城隍庙。1932年秋昆明市成立道教会,被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1940年8月10日在土主庙街老子祠被选举为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第三届职员理事长,1946年任第五届常务理事。

陶明义,民国道士。《云南省志·宗教志》载:云南昆明人,城隍庙住持。民国年间常操办城隍出府法事。

李伯华(1891—?),道号教持,云南昆明人。1919年在昆明虚凝庵皈依,研究道学,曾是晋昌隆经理,1955年在道教联合会负责虚凝庵名胜管理。

李宗尧(1897—?),云南呈贡人,1908年出家,1937年在黑龙潭道观修道,1945年到三清阁至新中国成立。

王嘉洪(1900—?),别号静发,云南昆明人,自幼随父念经,熟悉阴阳学。

王延庆,《云南省志·宗教志》载:云南宜良人,观音洞道长,收徒江明道、何智升、唐继真。持戒精勤,道品高尚,躬亲种植,自食其力,很受乡民敬仰。

陈理贵(1906—?),又名鉴柏,云南昆明人,

1911年拜轩辕宫罗智忠为师，1927年至1938年在昆明流动念经和学医，1939年至1941年在嵩明等地募化“功德”，1947年参加草药公会行医，1952年任昆明道教会主任、昆明道教联谊会主任委员、省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理事。1962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彭幼山，云南昆明人。正一道道士。昆明宏文学洞经会会长，精道典，通道乐，善吹唢呐。1953年成立昆明市古乐研究者协会时被推为总干事。年89岁时，还能背诵《皇经》、《雷神经》、《太上玉清无极总真大洞仙经》，口齿清楚，无一字之爽。

张纯斋，云南曲靖人，1910年入全真道，民国时期为膺教公会副会长，1953年任昆明市道教联谊会部副主任。

陈日中（1910—？），别号陈先，云南昆明人，1928年拜土主庙道师邓教坤为师，1944年，因黑龙潭无人负责，随师傅邓教坤到黑龙潭掌管寺产至新中国成立，一直住黑龙潭至羽化。

陈宗培（1913—1985），俗名陈寿渊，道号词聪，云南元谋县马街人。青年时因被国民党拉夫当差，后流落于腾冲，1933年在云峰山入道，1952年任万佛寺住持，时年部分道士已俗归家。十年浩劫中，他只身护寺，留得残屋数间，于1982年先后在原址原样建盖了吕祖殿和老君殿，新塑神像，整修道路，增加设施，使云峰山道观再度燃起香火。

张来盛（1914—1990），俗名张焕珍，云南省剑川县甸南镇狮河官登村人，正一派道士。“文化大革命”后，曾与张河诚、陈真元、杨文轩等重建剑川金华古寺。

刘诚富（1921—），坤道，全真龙门派第二十四代弟子，云南省昭通人。1928年在昭通凤阁庙入

道，幼年入道，悉心参玄，在祖师刘长天、师爷李守清、师傅杨太平的培养下，酷爱道教宗法，对道教教理有较深的理解。1940年到元宝道观清修，直至1985年才转住大龙洞道观，1990年任玉皇阁住持至今，现任昭通市昭阳区道教协会名誉会长。

张明远，四川藻县人，到昭通行医，并任昭通城南门寿福寺住持，收黄宗伦、刘承福、熊成祥道姑为徒。1981年昭通县道教管理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黄宗伦（1920—1986），坤道，云南昭通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三代弟子。1934年，四川藻县道人张明远到昭通行医，并在昭通城南门寿福寺住持，宗伦与道姑刘承福、熊成祥随之修道。1981年，昭通市道教管理委员会成立时任副主任。葬于大龙洞，墓碑刻有“日月星辰万古陪，苍松翠柏千年伴”；“龙泉胜境掩仙骨，凤凰阁中修大道”。

戴宗诚（？—1976），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三代弟子。原籍四川隆昌人，至云南大关云台山出家，拜刘理元为师，云游至昭通大龙洞，并任主持。葬于大龙洞，戴明春、曹至孝、蔡至理为之立碑，墓碑刻有“为国献身出云台，参透玄机定道心”；“云台山下修大道，龙洞坟中掩仙骨”。

旷永曜，道号清虚真人，龙门派第十八代弟子。曾任昭通大龙洞住持。

戴明春（1922—1994），道号精谷道人，云南昭通人。龙门派第二十代弟子。1949年曾瞞母至峨眉山出家，后返回故里，以教书为职。1979年拜曹明先、刘园常为师，在青城山蓄发修道，1983年9月应昭通市长邀请回到昭通，任大龙洞住持，重修庙宇，恢复神像，六年间收三戒弟子数百人。1988年11月任中国道教协会委员。葬于大龙洞，墓碑刻有“脱尘跨云鹤，说法度群生”；“逍遥天外天，既为虚空体”。

李成坤（1922—1993），坤道，道号淑芳子，云南省腾冲县瑞滇乡云峰村大栗园人，1958年童子出家修道，先于固东镇罗坪村玄天宫拜余宗云道长为师，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返家自修。1968年复出云峰山道观苦修。数年来，经手投资修公路4公里，增刻上山石阶一千多级，整修万佛寺，增置了云峰山道观的许多生活设施。1985年任云峰山住持，1989年秋，列席参加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会议，曾任两届腾冲县政协委员，一届乡人大代表，两届县道教协会副会长。

晋嵩宽（1925—？），道号云仙，云南省昆明人，1947年出家到中和宫，1952年由文教局派至西山三清阁。

成宝华（1926—？），坤道，道号成清贞，云南省昆明人，1941年入道门，1951年在道教会学习。

周理厚，坤道，腾冲县龙江上营人，民国年间出家，收徒二十人。平生勤修苦练，坚持教规教仪，道心坚定，“文化大革命”后，任腾冲县一至三届道教协会会长。享年七十寿。

张来谦，云南剑川正一派道士，属张道裕后人，祖上是张一存、张一伦，家传经典在“文化大革命”中毁。

唐明慈（1927—），俗名唐懋盛，云南省鲁甸县人。1983年出家，后拜徐园令、傅园天为师，颂经习科仪，1988年负责重建鲁甸县文屏山玄天观，并主持教务，历任昭通市、鲁甸县政协委员，1993年被中国道教协会授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王道遵（1928—），云南昆明人，长春派第18代道士。4岁在金殿出家，入全真道，道名王宗懋。抗战期间随师傅邓教坤到黑龙潭，为侍者，改入长春派门下，改名“道尊”。新中国成立后到云南砖瓦厂

工作。1999 年至今在昆明万寿宫修道。

张河城（1929— ），云南剑川县人。14 岁学道，是道正师李来泰的徒弟，熟悉道教科仪，擅长书画，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剑川许多道教法事的对联匾额由他撰题。为剑川道教法事主要主持者之一。

江永德（1930—2004），道号岩松道人，俗名治国，字泽民，号润生，云南省巍山县南诏镇上水坝街人。早年行医研道。1990 年拜武当山紫霞宫全真龙门派十七代宗师吴教鹏道长为师，1992 年参加武当山道教中医研究会，被推选为理事会成员。1993 年回巍宝山任青霞宫住持，接待了新加坡金殿殿、台湾慈善宫、宏孝院等朝圣团的参访，培养道士无数。并从事医道 50 余年，先后撰写《癫狂浅识》、《中医辩证施治歌》、《温病见病知方歌》、《伤寒证治提要歌》、《中医提挈》等中医医学论文和专著，他研制的“道家养生茶”、“青霞散”、“胃泰康”等中药疗效显著，慕名求医者甚众。曾任大理州政协委员。羽化后有诗赞：“胸怀五千言，惯看彩云飞。采药披星出，研经趁月归。高风昭信誉，妙论洞幽微。更抱回春术，山深杏亦肥。”

张复鼎（1933—1995），俗名张茂廷，云南省剑川县甸南镇狮河官登村人，张来盛之子。年轻时在洱源粮管所工作，后被父亲叫回。1980 年在剑川金华山老君殿奏职，开始主持仪式，一直是念经大法师，直至去世。

王来续 正一派道士。俗名王昕曜，云南剑川甸头村人，享年 75 岁。

刘来吉（？—1999），正一派道士。云南剑川剑阳南刘村人。拜王来续为师，11 岁开始学道，擅长念经。“文化大革命”时把经书收藏在家中天地牌位的墙壁里，后捐为剑川县玉局会最早的经书。参加重建

金华古寺。

史复生（1930—2004），正一派道士。俗名史宪文，云南剑川县东乡人，曾任弥沙小学教师，1994年在金华古寺老君圣诞会上奏职。是剑川道教法事的主要主持道士之一。

赵宗顺（1932— ），坤道。云南保山湾子村人。自幼随姨在保山玉皇阁长大，1941年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离开道观，在保山针织厂工作，但一直坚持修行，未还俗成家。1986年被推荐为保山市道教管理组组长，并当选为保山市政协委员，1986—1996年任保山湾子村三清殿当家，1997年任玉皇阁主持。

李明兴（1944— ），道号弥坚子，俗名李文兴，云南省昭通市人。1983年在昭通大龙洞道观入道，拜徐元令为师，后在青城山拜付元天为师。1994年任昭通市道管会主任，1998年出席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当选为理事。2000年任昭通市道教协会第一届会长，2001年当选昭通市政协常委。2003年在辽宁省仙山五龙宫受天仙大戒，同年被选为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会长，2005年任中国道教协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云南省政协委员。2007年4月，参加在西安、香港举办的“中国国际道德经论坛”。

周宗权（1945— ），云南腾冲人，1989年出家，在洞山黄阁寺；1992年至今在马站朝云宫任住持。

袁至银（1945— ），俗名袁家万，云南鲁甸人。1980年入道，1990年主持修建鲁甸县文屏山玄天观，并任管委会主任至今，1993年获中国道教协会授予先进个人称号，1995年在四川青城山受戒受三坛大戒。鲁甸县政协委员。

金信常（1947— ），云南腾冲人。1991年出家，1995年至今任腾冲县古永金家寺主持、保山市政

史  
协委员。

苏明隆（1954— ），俗名苏福安，云南大理人。正一派道士。1985年开始修道，专攻科仪。2000年授录都功职，2001年巍宝山道教协会成立后任常务副秘书长，2003年当选为云南省道教协会理事。

李宗稳（1956— ），坤道，俗名李慧春，道号瑶姬子，云南腾冲县瑞滇乡云峰村大栗园人。1981年入道，拜周理厚道长为师。1988年到北京白云观坤道进修班学习半年，1989年在北京白云观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三堂大戒，1995年被中国道协聘请为四川青城山传戒护坛大师。1998年被选为出席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代表，现任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云南省道教协会副会长、腾冲县人大代表、腾冲县道教协会会长、腾冲县云峰山道观住持。2007年4月，参加在西安举办的“中国国际道德经论坛”。

肖至旻（1961— ），俗名肖家吉，云南昭通北闸镇人，1992年在昭通大龙洞出家，1995年在四川青城山受戒，1997年在中国道教学院培训，2000年任昭通大龙洞住持，2003年任云南省道教协会常务理事。

汪合耀（1963— ），坤道。俗名汪翠兰，云南临沧人。1992年入道，1995年到保山腾冲学习经韵，1997年任凤庆东山宫管理组长，2000年当选为县道协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当选为凤庆县道协第四届会长，2003年当选为凤庆县第六届政协委员和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柴信华（1964— ），坤道，俗名柴林芝，云南腾冲人。1987年出家入道，1995年至1997年在中国道教学院学习，后在腾冲县松峰道观修道，任腾冲县道协理事，1998年被选为出席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代表。

崇明（1968—），俗名肖遥、肖志杰，云南宾川人。1990年习道修道，1994年5月投师于陕西西安市户县祖庵镇重阳成道宫。2000年入住巍山巍宝山长春洞，为巍宝山长春洞住持。任巍山县道教协会副秘书长。2003年当选为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2005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

杨合勤（1968—），坤道，俗名杨文会，云南临沧人。1991年在临沧云县圣教寺出家，1995年10月在四川青城山天师洞受戒，现任云县政协委员。

龚教荣（1968—），坤道，俗名龚菊芬，云南临沧人。1986年入凤庆县观音阁为徒，1995年10月到四川青城山受道教大戒，1996年3月任观音阁住持至今。

刘本续（1969—），正一派道士。俗名刘树源，云南剑川剑阳南刘村人。刘来吉之孙。2000年在金华山奏职，传度师史复生，保举师张本泽，引进师张本源。剑川主要主持法事道士之一。

袁至兑（1970—），俗名袁永聪，云南鲁甸人。袁至银之子。1990年在鲁甸县玄天观出家，1994年毕业于中国道教学院，在鲁甸县玄天观从事教务工作，1994—1998年在西安八仙宫挂单任经师知客，后任昆明棋盘山住持，2005年9月任昆明市真庆观住持。现任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云南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昆明市道教协会会长、政协昆明市委员会常委。

张本泽（1970—），正一派道士。俗名张运华，云南剑川县甸南镇狮河官登村人。张复鼎之子，17岁随父学法事，长年在剑川城乡主持法事。1994年在剑川金华山老君圣诞会上奏职，其父为传度师，张河诚为保举师，刘来吉为引进师。平时在家务农、做木雕，大部分时间做法事或写文仪。剑川主持法事的主要道士之一。



周诚桃（1970— ），坤道，俗名周霞，云南保山人。1990年在保山永昌镇三清殿出家，1995年在四川青城山天师洞受三坛大戒，1998年被选为出席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代表，2003年任云南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保山隆阳区第二届政协委员，保山玉皇阁住持。

张本源（1970— ），正一派道士。俗名张盛华，云南剑川县甸南镇狮河官登村人。1998年在金华山南斗胜会上奏职，传度师史复生，保举师张本泽，引进师张河诚。剑川主要主持法事的道士之一。

丁圆馨（1970— ），坤道，俗名丁新红，云南临沧人。1995年在临沧县南塘街三清宫出家，2002年8月23日在辽宁省千山五龙宫受戒。2003年当选为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夏诚德（1972— ），坤道，俗名夏吉运，云南保山汉庄镇人。1991年在保山三清殿出家，1994年任保山太平宫住持，1996年毕业于中国道教学院，1997年任保山玉皇阁住持。擅长古琴演奏，1998年被选为出席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代表，1999年为昆明棋盘山副住持，2005年为昆明真庆观副住持。曾当选为保山市政协常委、保山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赵诚芳（1972— ），坤道，云南腾冲人，1989年1月出家人道，住云峰山道观，1993年至1995年在中国道教学院学习，1999年至今任腾冲县万福宫住持，腾冲县第九届政协委员。

崇慧（1973— ），坤道，俗名刘园荣，河南省洛阳市人。1993—1996年在洛阳市某派出所任职，1998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祖安镇重阳成道宫入道，现任云南巍山巍宝山玉皇阁住持。2003年当选为云南省道教协会第八届理事。

廖诚明（1975— ），俗名廖东明，云南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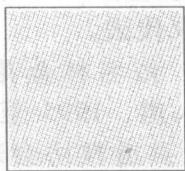
盘龙区蒜村人。昆明市盘龙区万寿宫住持、高功，兼管委会主任。1990 年至今参加恢复修建和管理万宫寿并主持教务，1998 年在湖北武当山紫霄宫拜殿主张宗道为师，2004 年任昆明市道教协会副会长。昆明市政协委员，昆明市盘龙区政协委员。

李教明（1977— ），坤道，俗名李荃珠，云南凤庆人。1990 年在凤庆县东山寺学道。1998 年被选为出席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代表。

林圆伟（1979— ），坤道，俗名林金花，云南临沧人。1986 年在临沧三清宫入道，1995 至 1996 年在中国道教学院学习，后任临沧县道教协会理事、副会长，1998 年被选为出席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代表。

董至光（1981— ），道号光明子，俗名董云龙，云南省昭通人。1993 年在四川省蓬溪县高峰山道观投师朱明清道长门下，成为全真道教龙门派第廿一代玄裔弟子，后在四川青城山蓄发为道，又至青羊宫长住，任主高功，主持斋醮法会，先后前往台湾、澳门参加中国道教文化推广活动。2003 年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毕业，擅长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在四川道教界提出“网络信息化弘道”计划，创办“青羊宫道教文化网”，并搜集整理《广成仪制》常用章表牒词以及符诰，著有《洞真箓》（电子版斋醮疏表集）。当选为成都市道教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云南省道教协会 副秘书长



## 附录三：云南 道观一览表

(云南各地历代史志、档案记载和实地调查的道观情况，依地区及置立年代先后列表)

### 昆明市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龙泉道院，后改龙泉观	昆明黑龙潭	明洪武年间			(明)郑顺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
昭灵观	昆明黔宁王庙下	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			同上
雷祖殿	昆明龙翔街	相传建于元时，前面戏台，因兵燹而毁，于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闾街士庶捐资重建	前后殿宇两层，戏台3间，平耳房5间	1936年前改设昆明市立第十三小学校本校	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长春观	在云南府(今昆明)治南	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	道纪司设此	金都御史郑颢、总兵官沐璘会议创建	(明)郑颢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真庆观	昆明三元正街	自明建筑以后小有修改	面积30方丈,旧式庙房72间	1936年时住持为明喜晋、萧志全	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玉泉观	云南府(今昆明)治北板桥驿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三元宫	云南府(今昆明)治东城外,三元正街	明朝万历之前建成,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重建后因兵燹房屋焚毁,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由棉花行重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又因兵燹被毁,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重建完成	面积35方丈,旧式庙房39间	1936年由住持朱宗玉和棉业公会出租为民房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吕祖庵	昆明南城脚吕祖庵巷旁	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秋众善士绅耆等捐资建盖	前层供吕祖,后层供关帝,故一名曰吕祖庵,一名又曰关帝庙,寺一面名二,庙庵非各一也	民国初年改为宏济医院,后又改为市立医院	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炉神官	昆明公园街	清嘉庆年间蒙白总督及先师捐资建盖后	200余方丈,旧式庙宇	1936年前产属铜活会馆,该官有大殿3大间,有楼厢房14间全部租给川人织布	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西山三清阁	昆明城西罗汉山	始于元明,完成于清中叶至清末			由云龙撰:《高晓志》卷上
龙王庙	昆明西山高晓,正直三清阁石室之麓			原祀梁王女夫段功,后改为龙王祠,为祷雨之地	同上
灵官庙	昆明西山高晓			距龙王庙不远,山泉涌出,与湖水相荡漾,金线鱼时出没其间	同上
地坛	昆明凤翥街尾	清中叶,系供乡人每年春秋祭祀之用	前后殿宇三层	1936年公安局拟作寄枢所	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青帝宫	昆明桃源街	咸同年间由米商、豆腐业中人合资建盖	除已收作校舍的后殿及面房外,该庙全长约12丈3尺(以营造尺计),宽7丈6尺,面积计1亩4分。大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外建平房(陪殿)二间	市道教会设在官内。住持杨正雄,另有张教悟、沈沼裕、刘教贤、袁教志在此修道	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玉皇阁	昆明凤翥村	清咸丰年间由附近村民集资修建,道人乃照管香灯者	面积约 50 平方丈,前后共三院	前殿系道人卖茶处,中殿做纺纱厂工程处,后殿做念经之所,1936 年住持为王松仙,有道人 4 名	同上
鲁班庙	昆明得胜桥东岸	清同治年间由直木、斜木建筑等八行建盖	面积约 70 余方丈,大殿 3 间,东西厢房楼上楼下各 16 间,戏台楼 3 间	1924 年借与市立第十四小学校办学	同上
孚佑宫	昆明玉溪街	明朝创建	面积直长 20 丈,横宽 10 丈,总共 31 间,内供奉吕祖(即孚佑帝君)故有孚佑宫、吕祖庵称,一切修理及业权系由布匹业同业公会管理	清雍正初年及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重修,光绪五年(公元 1879 年)由布行同人捐资购置地基建盖,为布行会馆	同上;《布铺阖行重新增广鼎建孚佑宫碑记》
三皇宫	昆明石桥铺	系远年庙宇,清咸丰七年(公元 1857 年)毁于火,光绪十二年(公元 1886 年)由白米、当行、药材、裁缝、新号、旧号、翠花、绸缎等八行与小东寺(又名常乐寺)调换地基集资建盖,亦称“八行会馆”	面积约计 350 方丈,共 75 间	1936 年暂时拨作二路军后方第一分院。当时住持为陶明玉,有 6 名道人。	昆明市教育局民国档案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轩轅官	昆明南海子边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为帽业公会建筑	面积约90方丈,大殿厢房共计23间	民国时归昆明市帽业公会管业,当时住持为李宗仁	同上
天君殿	昆明文林街天君殿巷	清光绪年间建	面积约20方丈,第一层一间一耳;第二层三间四耳;第三层三间六耳三间厅	1926年提归昆华中学管理作为校舍之用,道人已还俗,出寺另居	同上
老子祠	昆明武成路				同上
文昌宫	昆明龙翔街		前后三层殿宇,厢房西廊平房3间,楼房3间	1936年前改设云南省立昆华第一工业学校及陆山中学	同上
风伯庙	昆明聚奎街沐公祠隔壁		南北约18丈,东西6丈,大殿厢房有24间	1936年已是年久失修,隔为三小院及正殿五间耳房六间,多租赁住户。当时住持沐本元	同上
财神宫	昆明南城脚吕祖庵巷旁	清金银业公会捐资建盖	面积约100余方丈,建寺庙式房屋70余间	1936年前层系军队驻扎,后层租给私人住坐,当时住持是沈教宽	同上
山神庙	昆明凤翥街		大殿3间,平耳房4间	内供土地神像	同上
三丰祠	昆明南大街,为地方公产内		供奉张三丰真人位	设有昆明市第一区公所及本市慈善会施医分处	云南通志馆汇编:《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寺观资料》

续 表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太乙庙	昆明小西门外,殿宇9间已改建为大观小学		供奉太乙真人位,设有施棺会等慈善团体在内		同上
吕祖殿	昆明圆通寺中		相传明陈用宾抚滇,吕洞宾现于滇省,用宾与仙有缘,常欲一见后世,因建此殿以待之,并立一吕仙诗碣于咒蛟台上,字体宛如龙蛇,至今尚存		同上
昊天阁	安宁太极山巅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宣威将军王琮建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州绅士民重修	(清)段昕纂:雍正《安宁州志》卷十二
真武殿	安宁昊天阁下	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守御千户胡徽建		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千户李昇等增修。神宗年间(公元1573—1619年),僧如学重修	同上
斗姆阁	安宁昊天阁左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州绅士民同建			
老君殿	安宁斗姆阁左			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兵燹毁,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士民重建。	《安宁民族宗教志》
玉皇阁	安宁草铺			同上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三元宫	安宁草铺			同上	同上
观音阁	安宁老君殿左	清康熙知州高 鈐建			同上
桂香阁文昌 宫	安宁真武殿左		郡绅朱化孚 建,康熙四十 一年(公元 1702年)知州 高鈐倡州人修		同上
五显殿	安宁桂香阁左				同上
月林庵	安宁州东北八 里许,元时建, 相传白鹤仙人 飞升处				同上
白龙寺	富民县款庄东 部山上		有大殿1座, 内有3道圆 孔门		《云南省志· 宗教志》
玉皇阁	富民城外桥南	明嘉靖年建, 万历年修			(明)陈宏谟 纂:雍正《富民 县志》卷下
玉皇阁	呈贡城南安 江村	清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 年)前建	天然池内突 起,不假人力, 有一坐不染清 光大来之概		(清)朱若功 功:光绪《呈贡 县志》卷四
三元宫	呈贡城南白 云村	同上			同上
真武观	宜良凡二:一 在城北门外, 明永乐间建, 嘉靖间官耿曜 重修,清同治 间重建;一在 中所				(明)李元阳 纂:万历《云南 通志》卷十三; 许实等纂修: 民国《宜良县 志》卷十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真庆观	宜良高古马				(民国)许实等纂修:民国《宜良县志》卷十
玄天阁	宜良瑞鸡村				同上
桂香阁	宜良河头营, 阁下为闸				同上
玉皇阁	宜良凡五:一在岩泉山;一在宝洪山;一在云泉山;一在北右卫营;一在大村,原名翠峰庵				同上
三元宫	宜良凡二:一在北墩子,一在柴家营				同上
桂香宫	宜良凡二:一在城外六十铺,清道光元年邑绅陈丹诰句新等倡建;一在西村,清嘉庆二十四年建				同上
五圣宫	宜良陈所渡				同上
火龙宫	宜良汤池涌金山下				同上
三皇宫	城东门外,清康熙间知县高士朗建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三元宫	晋宁有六：一在城南；一在大西村，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重修；一在石咀，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建，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重修；一在河泊所，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重修；一在三家村，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重修；一在文家河，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重修				（清）朱庆椿纂修：道光《晋宁州志》卷七
三教殿	晋宁有八：一在城北门外，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重建；一在六街，康熙年间士庶公建；一在龙王塘，康熙年间建；一在杨户村，雍正年间建；一在石碑村，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闾村士庶重修；一在左卫，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建，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重修；一在牛恋乡，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重修；一在孙家坝，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建				同上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三清殿	晋宁有三：一在福安村，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建，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重修；一在小陈村，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建；一在金沙村，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重修				同上
玉皇阁	晋宁有三：一在大西村，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建；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重修；一在梁王山，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重修；一在金沙村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玄真观	楚雄府治之东	明洪武同都督袁义所创	内有泉,凡病疫者,饮之即应	刘渊然为其书匾。明朝为道纪司,凡遇庆贺则于此习仪。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指挥施敬之重修,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地震崩废	(明)郑顺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真武观	楚雄府治北关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习仪玄真观	广通县治右	永乐间建			同上
玄帝观	禄丰石宝山右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习仪佑圣殿	禄丰县北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三清殿	禄丰县北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太极观	禄丰县北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玉皇阁	南华城正中	建于元时,明季沙定洲之乱被毁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知州岑鹤重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州人公建	(清)李毓兰修,甘孟贤等纂修: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五
东岳庙	今南华城东南2里	明永乐间,楮子文、施子保建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州众重建五皇官3间,右廊4间,大门3间。光绪宣十六年(公元1890年),州众重建东岳殿前左右廊各7间、大门3间、五雷殿3间、天符殿3间、三仙殿2间、地藏殿3间、曹官殿3间,并建照壁,兼塑神像	明顺天、弘治间,刘道真、王道明重修。清嘉庆间,黄廷佐重修,子肇熙继修。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州人公修。咸丰间毁。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州人李芳梅重建正殿三间	同上
灵官庙	今南华城西5里	明彭载信等捐建	前临苴水,右有平彝桥,为迤西来往大路。行人祈祷者甚众,香火极盛	清咸丰间毁。同治初重建正殿。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提督杨玉科捐资重建东西厢及大门	同上
财神庙	今南华城南门内	州庠生黄肇熙建		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吏目周成德率众重修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仙寺	今南华城东25里五楼山麓	建自元时,明万历年间僧海潮重修		南诏时羽士王载元、张明亨栖止于此。载元仙去,明亨随亦羽化,寺因此得名。	同上
吕祖阁	今南华城西门外2里鸛鹑山巅,后有土主庙	始建不知,咸丰间被毁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州人李芳梅重建后殿。十四年(公元1875年),州人杨景春倡捐重修,并建照壁	同上
斗姆阁	南华有二:一在城北2里,明崇祯年间建,清乾隆年间重修,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重建后殿、魁星阁,同治中里人公捐重建。一在城西,明万历年间建,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知府牛奂、知州岑鹤重修				同上
真武观	今大姚象山巅			象岭蒸云之景即此。生员王伯禹等创建三楹。清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提举白兑增建后殿、前楼、两厢	(民国)郭燮熙纂修:民国《盐丰县志》卷七

续 表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三圣宫	今大姚南关左侧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		例贡张文治捐地一块,监生李绅捐地一节,典吏曾凤举、文生杨灿倡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杨灿、增生张清培重修塑像	同上
龙泉寺	今大姚城西南		左有斗姆殿,右有三清殿	清咸丰年间俱圯,仅存正殿3间。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提举郑永龄等重建两厢及前楼	同上
玉皇阁	雷祖阁右	创建失考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提举刘拜瑞重修	同上 《续井志》
雷祖阁	大姚玉皇阁左		内供雷祖及三十六雷像,有铜铸大香鼎一座		同上
老君庵	大姚乔井行官后		依山建宇,阶级巍峨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文昌宫	姚安南门内	明土同知高梓潼赐建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知府杨颐,土同知高映麟重修。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知府陈家栋,知州翁甲重修。咸丰年间圯坏,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迁神位于德丰寺祀之。	(清)甘雨等纂修:光绪《姚州志》卷四
飞来寺	姚安城西南60里			明万历年,黔国公沐昌祚铸玉皇金像送鸡足山供奉,途次苴里铺,夜忽不见,逾月有樵者见像于大苴村圆鹤山之杪,因建祠奉之,故名	同上
白鹤寺	距姚安城20里许	建于明初	地藏十王,仪像凛然;昊天玉皇,道观巍然。是佛、道共存的寺观	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之冬增修,成于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	同上卷八艺文志
玉皇阁	武定府治西狮子山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续 表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玄虚阁	武定正续寺上				同上
玄真观	武定府治南 1里				同上
三清观	元谋盘龙山				同上

## 曲靖市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玄武观	曲靖西南 45 里中和山	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之冬创建			(明)李元阳 纂:万历《云南 通志》卷十三
福缘寺, 一曰三元 官	宣威上堡	创于清初		另有板桥三元 官,今为南区 两级小学校; 米宾铺三元 官,今为初级 小学校;落水 碛三元官;母 官屯三元官; 务德三元官; 火木札三元官	(民国)缪果章 纂:民国《宣威 县志稿》卷三
北极楼	宣威上堡中街	创于清初		嘉庆中李镜堂 因其故址调 度,改作构造 之工,装置之 巧,为全邑冠	同上
三清官	宣威内城西北隅	创于明季			同上
东岳官	宣威城隍庙左				同上
万寿官, 亦曰江右 会馆	宣威水月殿东	清初江西人 公建			同上

337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三教寺	宣威北关外	建于清初		此项庙宇另有虹桥铺、东屯、歌乐营、旧堡子、迤多乐5处	同上
玉皇阁	宣威东门城上	清康熙中，邑人吴赵氏捐建			同上
三官庙	宣威东门城上			另建有此庙者13处	同上
瑶池殿	宣威斗姆阁后	1919年，邑绅陈晓鳌之母朱太夫人倡建。			同上
旻皇阁	宣威广照寺后	1921年，信善浦钟仪等捐建			同上
关圣宫	宣威河东营	创建颇古，清康熙中修葺		板桥、永安铺、木乃红、鲁雅四村均有关圣宫，虹桥铺、大耿屯、迤多乐三村系关帝庙	同上
祖师殿	富源县治西13里				(清)李恩光纂：光绪《平彝县志》卷七
玄帝庙	富源治南25里				同上

续 表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玉真观	富源城东5里	万历中由白马山移建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云南驿盐道副使赵廷标重修;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绥远将军总督蔡毓荣重修;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知县任中宜重修	同上
三元宫	富源古城寨下	明洪武中,黔国公沐英建			同上
东岳庙	富源县治右				同上
习仪上真观	马龙州治南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玄武观	马龙州西南45里中和山	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冬创建			同上

339

## 昭通市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大龙洞	昭通城北郊大龙洞	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建龙王庙,有道人周永清住庙	龙王大殿塑龙王神一尊,左右为文武魁星,观音殿塑有观音像。农历二月初八赶庙会,城乡居民参会者二三千人	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龙门派第八代法师陈守元、师弟张守志修,光绪年间扩建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玉皇阁	昭通怀远街南	清道光十五年 (公元 1835 年)		街民公建, 属江西会馆	(民国)杨履乾纂: 民国《昭通志稿》卷三

## 大理白族自治州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栖霞观	大理府治之西北	明宣德七年 (公元 1432 年)	道纪司设此	刘渊然之徒芮道材创建	(明)郑颢纂: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
朵弓薄道纪司银相寺	大理府治北 50 里				(明)李元阳纂: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上帝观		祥云县南, 清御史申维岳书匾			黄元治纂: 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七
斗阁	风仪城西南, 象山麓				同上
玉皇阁	风仪城南 15 里, 州民罗士杰建				同上
玉皇阁	洱源县西, 明万历四十三年 (公元 1615 年), 寺副杨嵘等建				同上
玉皇阁	宾川城东 3 里				同上
三元宫	宾川城东门				同上
玉皇阁	云龙放光寺之上, 一在诺邓井				同上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元真观	云龙小雏马山顶				同上
三元阁	云龙砥住桥				同上
保禄阁	云龙县石门镇和平村	建于明万历年间	正殿四角亭内塑有玄天、文昌、观音及太子塑像,正殿下面建有龙王庙,山神和土主有塑像	“文革”期间毁没,1985年重新修复	调查资料
三崇庙	云龙县石门镇和平村	三崇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建筑面积400平方米	毁于“文革”期间,1992年恢复	同上
天华山	祥云县云南驿镇	始建于唐代	有上中下三庵	现状完好	同上
天峰山老君殿	祥云县普洱镇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面积6亩		同上
玄珠观	巍山城东5里	蒙诏时建,明成化年间重修。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清)蒋旭纂修:康熙《蒙化府志》卷二
青微观,一名青霞观	巍宝山之北	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全真沈妙章等募建		传说老子降化细奴逻之所。将祀	同上
玄真观	巍山府城东北隅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玉皇阁	巍山北園内	清嘉庆间,土官知府左柱石建		同上	
龙华寺	巍山东山玄珠观左				
太玄宫	鹤庆府治东1里许	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始建,次年落成	官广若干亩	制屋为正殿者,后祠天帝,前祠三清。依于前殿而祠者,曰统天元圣,曰朱陵度命,曰太乙,曰玉枢。枢翼于殿而祠者,曰文昌、曰真武。殿庭左右二堂,一祠三官,一祠东岳。两庑祠三十六雷,仪门祠四灵: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规制宏巨,藻闾丽密,为南中官观之最。清康熙40年(公元1701年),总兵刘廷杰重修,新添亭台、树木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清)杨金和等纂修:光绪《鹤庆府志》卷十三
真武观	鹤庆城北				(清)杨金和等纂修:光绪《鹤庆府志》卷十三

# 保山市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真武观, 民国时称 玄帝观	保山城太保山 之南麓	明宣德五年 (公元1430 年)间建		保山道观之始 建者。郡人邵 惟中、吴崧、霍 薰重修。清道 光三年(公元 1823年),昆明 人郭贵等重修。 咸丰十一年 (公元1861年) 拆毁,民国年间 士民重修之	方国瑜主编: 《保山县志稿》
保禄阁	保山太保山麓	明万历十年 (公元1582 年),郡人邵惟 中建			同上
老君殿, 即太清宫	保山玉皇阁西	明万历年初年 以后建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士庶修,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重修,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兵燹拆毁,后重修	同上
会真楼	保山玉皇阁左	明时住持道人 常滨州	初起楼三楹, 上塑三官诸真 天师之像	兵燹拆毁。光 绪九年(公元 1883年),阁邑 士庶重建	同上
吕祖楼	保山玉皇阁左			清嘉庆十六年 (公元1811 年),商民张学 海等重修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长春真人祠, 又称刘祖寺	保山城西北仁寿门外	明时建		清康熙间, 总兵周化凤等重修。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焚毁, 土民重修	同上
真武观	保山三清观下				(明)李元阳纂: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三清观	保山法明寺右	明万历前		明道纪司设于此。清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年), 总兵偏图重修,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 郡人捐修。民国年间重修	(明)李元阳纂: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方国瑜主编: 《保山县志稿》
佑圣观	腾冲城西北隅	同上		道正司设于此	同上
玉皇阁	有多处: 太保山上, 永平县东 80 里观音寺之绝顶	同上			同上, (清)刘毓珂纂修: 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十六
魁阁	保山文昌宫外	清道光五年(公元 1825 年)知府陈廷焯倡建, 题额云关联群峰			(清)刘毓珂纂修: 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十六
斗姆阁				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17 年)闰四月据道纪司顾运洪重修	云南省民政厅(1938 年)档案

# 临沧市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玄真阁	顺宁府治后	明景泰七年 (公元 1456 年),知府猛朋 创建			(明)李元阳 纂:万历《云南 通志》卷十三
玉皇阁	顺宁县(今凤 庆)北城	明万历四十四 年(公元 1616 年)建,清宣统 二年(公元 1910 年)改设 小学		清光绪五年 (公元 1879 年),知县邓瑶 修建万寿亭朝 房。二十一年 (公元 1895 年)绅士修建 三世佛殿及 两虎	张问德修,杨 香池纂:民国 《顺宁县志初 稿》卷二
栖霞观	顺宁县城西南 15 里翁箐村	清光绪三年 (公元 1877 年)建			同上
太阳宫	顺宁城南 3 里许	清光绪元年 (公元 1875 年)改建			同上
太阴宫, 旧名三 清观	顺宁城西 10 里			咸丰七年(公 元 1857 年)兵 燹毁,光绪十 八年(公元 1892 年)重建。 1933 年里人添 修面楼	同上
莲贞观	顺宁城内文昌 官左侧	清道光二十年 (公元 1840 年)		坤道郭来洁、朱 正同建	同上
三清观	在旧城	1924 年,坤道 杨教荣、蔡馨 募化建两虎		1946 年建大殿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极乐观	顺宁城南60里文华村灵应山	清乾隆间,坤道杨清淡、施清玉创建		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兵燹毁。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坤道吕阳申重建大殿、两庑。1925年坤道陈来忠添建龙华香亭及地母殿	同上
清华观	在顺宁玄真观之前	光绪初年		坤道王一和率徒苏阳久、李阳才,由玄真观析分出来,建造大殿与左庑	同上
子孙庙	缅宁县城(今临沧临翔)北	清雍正年间	有殿堂、观稼楼、筹庙房61间	傣族土司俸延证之母的香火院,为土司创修道院之始	《观稼楼记》
三清宫	临沧县城南塘街	1924年,坤道杨教荣、蔡馨募化建两庑。1936年建大殿	占地面积1508平方米		调查资料
东山宫	凤庆县城东	明嘉靖年间		1985年6月15日凤庆县道教协会于此成立	同上
三教寺	临沧县城南塘街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坤道张合融创修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丁教全重修	(民国)丘廷和撰:民国《缅宁县志·坛庙寺观》

# 丽江市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玄天阁	丽江有三：一在城内北门，毁于兵，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武管重建；一在府城西北，白沙街石岩脚村，明土司木氏建；一在大具，里人建寺于山谷中				（光绪）陈宗海修，李福宝等纂：光绪《丽江府志》卷四
玉皇阁， 旧名光碧阁	丽江木土司通判署右	明万历年间土司木氏建，清乾隆年间郡民改建，咸丰年间毁，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郡民募化重修			同上
财神殿， 旧名培风寺	丽江府城南门外观音阁东	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郡民公建，毁于兵。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商民重修			同上
三圣宫	丽江城西东河				同上
真武祠	丽江府西80里石鼓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里民重建			同上
真庆观	永胜城北	明万历前建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三真观	永胜南城外	同上			同上
灵官庙	永胜有五：一在府署内，一在分府署西，一在北门内三司街，一在城内北街巷内，一在城内西街巷内				(清)陈奇典修，刘懋纂：乾隆《永北府志》卷十五
雷尊阁	永胜城北门外				同上
玉皇阁	永胜有二：一在城北门外五里，一在马伍				同上
斗姆阁	永胜有二：一在府城西门外，一在中洲				同上
老君殿	永胜梁官				同上
三官寺	永胜有三：一在中洲街，一在梁官，一在远顿满官				同上
三清寺	永胜中洲街北				同上
三皇阁	金官街				同上
真武阁	永胜清水驿				同上

##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老君庙	六库土司署南山	民国			(民国)段承钧纂修：《泸水志》上册第四章《舆地·十六庙寺观》

#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北极宫	临安府治东			千户刘昭、刘 玘重修	(明)李元阳 纂:万历《云南 通志》卷十三
三清观	临安府曲江沙 坝,河 西 县 亦有			乡人祝袞建	同上
玉皇阁	建水城东门内	明嘉靖年间建		明万历间郡人 包见捷修	(清)江浚源纂 修:嘉庆《临安 府志》卷十六
东岳庙	建水城内东			清总兵王洪仁 重修	(清)祝宏修, 赵节等纂:雍 正《建水州志》 卷九
崇玄观	石屏西2里许				(明)郑颢纂: 景泰《云南图 经志书》卷三
九天观	石屏州治西 (通海亦有)				(明)李元阳 纂:万历《云南 通志》卷十三
三元宫	石屏有二:一 州后厢,一 宝秀				(民国)袁嘉谷 纂修:民国《石 屏县志》卷五
斗母阁	石屏州后厢			清康熙九年 (公元1670 年)刘维世 重修	同上
大魁阁	石屏小水城			清康熙十二年 (公元1673 年)知州程封 重建	同上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凌霄殿	石屏宝秀前所				同上
玉皇阁	石屏有二：一在老卫寨，一在乾阳山				同上
真武殿 雷公殿	俱在石屏乾阳山				同上
九天观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重建	同上
南极宫	石屏红土坡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建	同上
老君庙	石屏白家寨后山岭				同上
三元宫	石屏有四：一在桥头，庙宇三间六耳，下三间，乾隆间州牧王光鼎重建。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地震倾倒，合县绅耆于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又重建。一在大水，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重修。一在蔡官，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建。一在高家冲，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建				同上

# 玉溪市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永丰寺，俗名虫螳寺	新兴(今玉溪)州东北白塔山	元时建		祀先农八蜡之神	(清)任中宜纂修：乾隆《新兴州志》卷四
玉皇阁	新兴州治东	唐时建		元至正年间修，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知州邓骏重修	同上
清虚观	澄江旸溇山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玄天观	澄江有二：一在吴官营，一在大河口				同上
玉虚宫	激江府城西街				同上
玄圣观	云岩山顶				同上
真庆观	澄江县治北2里				同上
三元宫	澄江县治东				同上
三元宫	峨山县治西2里				同上
三元宫	通海秀山	始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重建	(清)阎禎兆等纂修：康熙《通海县志》
玉皇阁，原名灏穹宫	同上	始建于明初		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南京户部司务、县人陈其力扩建。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士绅民众捐资重建，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募资重建	同上



续表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孤山寺	江川抚仙湖中		有殿八阁、五亭、三堂、一庵、一塔，佛、道共存，有三清殿、玉皇阁。	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澄江府知府王贞宇重建	（清）李熙龄等纂修：道光《澄江府志》卷五
太和宫，又名慈云阁	元江老乌山				（（民国）黄元直修：民国《元江州稿》卷三十
真武庙明	元江礼社渡东15里之奇山			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土知府那直齐重修，府教授李相有记	同上
玉皇阁	元江有二：一在北泽村，一在安定村，明万历时建				同上

## 普洱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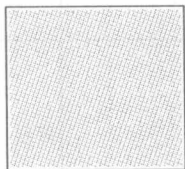
观名	地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龙泉寺	景东府治西南3里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玄珠观	景东府治北2里				同上

# 迪庆藏族自治州

观 名	地 点	置立年代	面积及建筑	置立情况	资料来源
关岳庙	维西城北圆龙山头		有松、柏各一株，古木参天，桂树数株，秋香馥郁，牡丹、紫荆花色相映，诚县属胜地		(民国)李炳臣修，李翰湘纂：民国《维西县志》卷一
文昌宫	维西城东2里许白鹤山顶		有赤银桂各数株，古香古色，窗外松柏丛绿，青翠逼人，文明木坊直耸空际		同上
东岳庙	维西城东北星坡山麓		有牡丹、丹桂各二株，附李添植碑记		同上

注：由于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发展，表中街道名称已更迭或街巷不复存在，暂未作与今相对应的考证。各地著名官观详细内容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西汉时期	东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	隋唐时期	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西汉时期 道教传入云南	东汉时期 五斗米道传入云南	魏晋南北朝 道教在云南传播	隋唐时期 道教在云南传播	宋元时期 道教在云南传播	明清时期 道教在云南传播



## 附录四：云南道教大事记

汉

(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

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传入云南。

东汉桓帝时 (公元 147—167 年)，牂柯郡 (今云南东部、贵州西南等地) 人尹珍 “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

唐

(公元 618—907 年)

唐德宗贞元十年 (公元 794 年)，南诏国王异牟寻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在大理苍山盟誓，祈请天、地、水三宫等诸神灵降临为证。

唐文宗太和元年 (公元 827 年)，南诏王劝丰祐废除道教。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南诏王世隆于诸葛武侯立铁柱之地白崖铸造“天尊柱”。

### 五代十国、宋

（公元907—1279年）

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篡夺了南诏王位的大长和国王郑昶因服道家“丹药”而致狂暴杀人。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兴师讨伐杨干贞，因得道士董迦罗言助取胜，建大理国，并封董迦罗为相国。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大理国王段素英敕《传灯录》，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

### 元

（公元1206—1368年）

元武宗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道教长春观在昆明建成。

### 明

（公元1368—1644年）

明太祖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道教长春派始祖刘渊然，在昆明弘扬道教，在昆明创建长春观（今昆明市文庙所在地）。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张三丰弟子入滇弘道，全真道传入云南。

洪武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公元1394—1395年），黔宁王沐英在昆明龙泉山建龙泉道院，道士徐日暹任住持。

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昆明黔宁王庙

建昭灵观，有道士主之，并奉王庙事。

明成祖永乐初年，长春真人刘渊然居昆明黑龙潭龙泉道院传教，并扩建龙泉道院。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蒋日和主持扩建昆明真武祠，增建老君殿、都雷府及辅助配殿、方丈、斋庖等建筑。

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昆明真武祠增扩完工。同年，刘渊然钦承仁宗诏书回京，奏请仁宗皇帝始更名真武祠为“真庆观”、龙泉道院为龙泉观。

明宣宗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长春真人刘渊然奏请朝廷，“立云南、大理、金齿三道纪司，以植其教”，云南道教名声大振。

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保山城内太保山之南麓建真武观，为保山道观之始建者。

明英宗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云南道士通妙真人邵以正受皇朝敕令，主持编修刊成道经丛书《正统道藏》，共录道经5305卷。

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右佥都御史郑颺、总兵官沐璘合议，在云南府（今昆明）治南修建长春观。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道士徐正元呈请云南巡抚陈用宾仿湖北武当山制，修筑紫禁城，冶铜为殿，铸供真武祖师全身，称为“太和”。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仿武当山制，在昆明北郊鸣凤山建成太和宫，俗称“金殿”。

明思宗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云南巡抚张凤翮将昆明鸣凤山铜殿移至宾川鸡足山。

崇祯年间，沐府萧茂芳在昆明黑龙潭创建玉皇殿。

## 清

(公元1616—1919年)

清圣祖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吴三桂重修昆明鸣凤山铜殿。

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龙门派第七代法师陆常崇为昭通元宝山庙宇住持,扩修庙宇。

乾隆四十六年至六十年(公元1781—1795年),吴来清开凿由三清阁至慈云洞石室通道。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龙门派第八代法师陈守元、师弟张守志到昭通传教。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至清文宗咸丰三年(公元1840—1853年),杨汝兰、杨际泰先后主持打通云华洞,开辟达天阁、龙门,历时13年。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道教传入云县,先后有全真道、正一道两派,属龙门正宗派。

## 民国

(公元1912—1949年)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令巡警局将城隍庙正殿改名于忠肃庙,并将两廊之神像销毁后改为市场。

云南省道教会在昆明市大东门外卖米巷青帝宫成立,会长为昆明金殿住持杨智聪。

民国七年(1918年),宜良县道教会成立,会址在东岳庙,王缘仁为会长。

民国十三年(1924年)前,中国道教总会云南支部,在商埠一区二段三元上街三元宫成立,以阐扬道教为宗旨,附设道教研究所。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神祠废存

标准，道教一大批神祠宫观及画符念咒活动被废止，云南道教也因此进一步削弱。

民国二十年（1931年），云南省道教会改组为昆明市道教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召集全市道教会员大会投票选出邓教坤、杨正雄、杨智聪、陆忠安、马坤为第一届执行委员，赵诚兴、廖绍熠、李桂荣为监察委员，陶明义、李增华为候补监察委员。

9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正式成立，被选委员举行宣誓就职典礼，会址在市大东门外桃园街卖米巷青帝宫。制定《昆明市道教会宣言》《昆明市道教章程》。

10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道教总会令饬保山组织成立道教会，刘永诚任会长、石至远任副会长，开辟城内太保山太清宫为会址。制定《保山县道教会宣言》《保山县道教章程》。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1日，昆明市道教会会址迁至拓东路都雷府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8日，个旧县道教会于个旧六合巷成立，理事长彭正清，常务理事蒋宗祥、杨至禹，会员43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顺宁（凤庆）始成立道教会分部，统顺、云、缅三属，会址设于顺宁城内廉贞观。

昆明市道教会常务委员邓教坤、杨正雄、陈忠安，在昆明南海子边的轩辕宫创办育英小学。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5日，昆明市道教会在土主庙街老子祠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员改选大会，遵章改为理监事制，邓教坤任理事长，吕智贵、李权茂任常务理事，会员共计107人。

民国三十至三十二年（1941—1943年），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本会会址设在本市土主庙街老子祠内。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25日，宜良县道教会在东岳庙成立，李森任理事长，杨春华、张映川任常务理事，会员41人。其工作重点是团结教徒研究道义，协助政府从事抗建工作。

11月16日，昆明市道教会在昆明拓东路都雷府内进行第四次改选，刘理正为云南省昆明市道教会第四届职员理事长，常务理事张子乾、王嘉荣，理事杨坤、李松茂、杨正雄，监事吕智青、张性惠、宋锐。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顺宁道教会分部改组为常务委员会，推选乾道四川人朱至安为会长。

11月保山道教会在太保山老君殿成立，理事长为魏廷熙，常务理事为李荫棠，主要工作是推进道教文化事业。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由“昆明市道教会”发起“五教提度大会”，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人士共同超度抗日英烈。

2月，保山县道教会换届改选，李荫棠任理事长，魏廷熙为常务理事，参会会员61人。其工作重点是筹组旺八乡分会，并清理太清宫庙产，以作道教会基金。

3月21日，宜良县道教会在县城内观音阁举行改选，理事长为吴朝铭，常务理事杨春华、王家骅，会员56人。本届重要工作是奉行三民主义，恢复固有道德，实行新生活节约建国，并随时研究本会教理，力谋本会福利。

12月13日，在拓东路真庆观侧都雷府内举行第五届理监事改选大会，张子乾当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邓教坤，理事杨合明、张性惠、刘理正、尹诚仙、陈信圆、李松茂、李兴堂、杨坤，监事杨正雄、吕智贵、宋德信，候补理事王嘉荣，候补监事李锐。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8月31日，云南省道教协会（临沧）道教分会举行成立大会，理事长阮来庆，常务理事欧教悟、游教缘，乾坤道会员共计132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元1949年10月1日成立）

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道教宫观庙产被废除，监院执事制被民主管理委员会（或小组）所取代。

3月，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接管了圆通、大观、翠湖、古幢、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筇竹寺、龙泉公园、金殿、妙高寺、海源寺、正觉寺、永丰寺、涌泉寺、归化寺、虚凝庵、铁峰庵等十八个公园名胜及宗教寺观。

5月12日，经省政府同意，在市文教局设公园管理科，编制3人。

12月，军事接管后，各公园名胜及寺观第一批负责人员为龙泉公园邓教坤，三清阁董宗敬，金殿刘正理，虚凝庵陈宏文。

1952年2月昆明市道教会重新成立。

10月，昆明市道教会会址由八行会馆迁至拓东路真庆观都雷府，陈理贵为主任，张纯斋和杨正雄为副主任，有会务人员16名，赵秋月为秘书，会员123人。

1953年2月，昆明市道教会改组为“昆明市道教联谊会”，由全体会员大会选出陈理贵为主任委员，张纯斋为副主委。

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成立，领导道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云南道教界积极响应。

1960年5月6日，经昆明市委批准成立园林管理局总支委员会。5月24日，经市委批准成立园林管理

局党组。

7月，黑龙潭公园移交昆明植物研究所管理。

1961年，陈毅到西山森林公园游览。同年，朱德、陈毅游览黑龙潭公园。

昆明市道教协会陈理贵代表云南省，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5月30日，黑龙潭公园又交回园林局管理。

1964年1月，周恩来、陈毅游览大观公园、金殿、黑龙潭公园。

1965年1月13日，周恩来、范文同到大观公园、西山、金殿游览。同年，刘少奇到黑龙潭公园游览。

1966~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云南道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严重冲击，道士被遣返迫害，碑像经籍被砸碎焚毁。

1969年，李先念到黑龙潭公园游览。

1970年5月24日，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办公会议决定：黑龙潭公园划归昆明市抗菌素厂筹建处，金殿公园划归昆明市轮胎厂筹建处，金殿、黑龙潭仍保留部分游览区。

1972年6月2日，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金殿、黑龙潭公园收回由市城建局管理。

1973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游览西山森林公园。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到西山、金殿游览。

1975年7月14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到西山公园游览。

1977年5月，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同意把黑龙潭名胜区改为“黑龙潭公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落实，道教活动逐步恢复。

1979年11月22日，李先念到西山、大观、金殿名胜区游览。

1980年10月26日，胡耀邦到西山、大观公园游览。

11月4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西山公园。

1981年，华国锋游览西山公园。

昭通县道教管理委员会成立，主任张明远，副主任戴明春、黄宗伦。

1982年，陈慕华到黑龙潭公园游览。

金殿新建钟楼，悬挂重达14吨的永乐大钟。

2月23日，昆明太和宫金殿被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月24日，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到西山游览。

1983年，腾冲云峰山道观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腾冲县道教协会成立，周理厚任会长，陈宗培任副会长。云峰山道观正式开放。

1985年6月，凤庆县道教协会成立。

9月12日，云县道教小组成立，指定圣教寺为道教活动场所。至同年12月止，全县参加道教组织的有坤道11人，居士86人，其中皈依“道、经、师”三宝，受老君戒者13人。

1988年11月，昭通大龙洞道观住持戴明春任中国道教协会委员。

1989年12月，云县道教协会成立。

1992年，李宗稳、戴明春和李慧春代表云南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李宗稳被推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会的常务理事，戴明春和李慧春也被推选为理事，参与中国道协管理全国的道教事务。

1993年6月，在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的“首届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上，昭通鲁

甸县玄天观、临沧凤庆、保山腾冲道教协会及李宗稳、赵宗顺等9人受到表彰。

11月，临沧市临翔区道教协会成立。

1995年，鲁甸县文屏山玄天观举行真武殿开光典礼。

1997年，腾冲县道教协会召开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发证会。

1998年8月，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云南省有林圆伟、李教明、李明兴、柴信华、李宗稳、夏诚德、周诚桃、金信常8名代表出席会议。

1999年10月，安宁紫霞道观正式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

2000年1月，晋宁月山玉皇阁批准开放。

9月，昭通市昭阳区道教协会成立，李明兴任会长，肖至旻、蒋至乙、陈宗富任副会长，肖至旻为秘书长。

2001年7月，巍山县道教协会成立，廖子元任副会长并主持工作，芮泽隆任秘书长。

12月，云南省道教协会筹备组成立，由郭滇明任组长，董允、李明兴、李宗稳、林圆伟任组员，并举办“云南道教首期法规培训班”。

2002年，鲁甸县文屏山玄天观灵祖殿举行开光仪式。

2003年3月，昆明市茨坝蒜村万寿宫正式开放为道教活动场所。

4月，真庆观古建筑群全面保护性修复工程竣工。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及企业斥资一亿一千多万元，历时两年余。

10月13日，云南省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云南省道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119位全真派、正一派道士和道教信徒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议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云南省道教协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云南省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25人、常务理事11人、会长1人、副会长2人、秘书长1人，李明兴当选为省道教协会会长。

2004年7月22日，昆明市道教协会成立，袁至兑任第一届道教协会会长，廖东明、程云燕任副会长，和永为秘书长。

2005年，中国道教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云南省道教协会推荐了8名代表参加会议，李明兴、李宗稳2人当选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袁至兑等4人当选为理事。

5月24日至6月3日，昆明市道教协会理事蒋理全道长应邀随中国道教协会赴马来西亚沙巴州莲花山三清观，参加“乙酉全真传授初真法会”。

6月10日，昆明市道教协会袁至兑会长倡导，由蒋理全道长等主讲的“居士经韵学习班”在真庆观开班，首批有居士信众三十余人参加，每月初一、十五开课。

9月8日，昆明市道教协会在拓东路真庆观都雷府正式挂牌并举行开放仪式及祈福法会，省市相关领导、五大宗教代表及居士信众三百多人出席开放仪式。

9月29日，楚雄州黑井真武山道观举行开光庆典法会。

12月8日，腾冲云峰山王母宫举行开光庆典法会。

12月16日，东川三元宫举行开光庆典法会。

12月22日，昭通大龙洞道观三清殿举行“三清道祖神像开光法会”，由成都青羊宫经乐团主持仪式。

2006年2月，云南省道教协会李明兴会长借驻黑龙潭文昌阁，省道协机关充实工作人员，配备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

6月,昆明市真庆观被列为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月,云南省道教协会组织部分道众参加中国道教学院入学招生考试,有7人分别被中国道教学院乾道班和坤道班录取。

8月,云南省道教协会与昆明市园林局签订了黑龙潭龙泉观移交协议,计划于2007年6月正式交还云南省道教协会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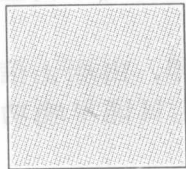
由昆明市道教协会发起倡印,由居士信众共同参编的《道德经》注释本、《居士日诵早晚功课经》正式付印,计6000册。

11月,曲靖市富源县正一派道士刘罗东参加在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举行的授箓法会并授箓。

2007年2月6日至7日,云南省道教协会一届二次理事会议在昆明召开。到会常务理事7人,理事14人,会议有四项内容:李明兴会长作工作报告,省宗教局熊胜祥局长讲话,省宗教局一处付志上副处长讲授《宗教事务条例》。举行常务理事会议并研究布置2007年省道教协会工作。

4月22日至27日,中国(西安·香港)国际道德经论坛在西安、香港举办,云南省道教协会李明兴会长、李宗稳副会长代表出席。

6月8日,在昆明黑龙潭上观茶室举行“黑龙潭公园上观移交仪式”。仪式由昆明市政府副秘书长主持,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宗教局、昆明市委统战部、昆明市政府办公厅、昆明市国资委、昆明市宗教局、昆明市园林局、昆明市绿化局、云南省道教协会、黑龙潭公园等单位领导出席仪式,黑龙潭公园和云南省道教协会双方代表在《移交黑龙潭公园上观协议》和《移交黑龙潭公园上观清册》上签字盖章,黑龙潭公园上观正式移交云南省道教协会管理和使用。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文献（以写作朝代先后为序编目）

1. 云南省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大理州档案馆、剑川县档案馆、昭通市档案馆、昭通昭阳区档案馆、思茅市档案馆等馆藏的清末、民国、现当代的教育、民政、宗教等相关部门的档案。

#### 2. 史志文献

书中所引用《二十四史》史料，均为中华书局标点本。

清嘉庆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五百六十卷，1934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元）李京撰：《云南志略》，抄本，一册。

（明）诸葛元声撰：《滇史》十四卷，刘亚朝点

校，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

（明）郑颢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刻本，五册。

（明）周季风纂修：正德《云南志》四十四卷，传抄范氏天一阁藏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刻本，十册。

（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十七卷，1934年龙氏灵源别墅重印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刻本，八册。

（明）刘文征纂修：天启《滇志》三十三卷，传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天启五年（公元1652年）抄本，二十八册。

（清）师范辑：《滇系》（不分卷），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云南官书局重刊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刻本，四十册。

（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李埏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

（清）鄂尔泰修：雍正《云南通志》三十卷首一卷，清乾隆元年（公元1737年）刻本，三十册。

（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稿》二百十六卷首一卷，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刻本，一百一十二册。

（清）岑毓英等修：光绪《云南通志稿》二百四十二卷首四卷附录四十一卷，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刻本，二百二十册。

龙云、周钟岳等纂修：《新纂云南通志》二百六十六卷，1948年铅印本，一百四十册。

云南通志馆编：《新纂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草稿》，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抄本，八册。



云南通志馆辑：《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寺观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抄本，五册。

（清）张毓碧修、谢俨纂：康熙《云南府志》二十六卷，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刻本，二十册。

颜思久主编：《云南省志·宗教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清）戴纲孙：道光《昆明县志》十卷，张维桢主持标点：《昆明历史资料》第13卷，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1年编印。

《昆明县地志资料表解》，民国十年（1921年）抄本二册。

（民国）张维翰、童振藻等纂辑：《昆明市志》，1924年铅印本，一册。

（民国）由云龙撰：《高峣志》二卷《幻缘记传奇》二卷，1939年铅印本，一册。

（清）杨若椿修，段昕纂：雍正《安宁州志》二十卷，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刻本，四册。

（清）杨体乾修，陈宏谟纂：《富民县志》二卷，传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刻本，二册。

（清）朱若功原修，李明塾续纂修：光绪《呈贡县志》八卷，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刻本，八册。

（清）朱庆椿纂修：道光《晋宁州志》十二卷，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8年）刻本，1926年铅字重印，十二册。

（民国）王树槐修，许实等纂修：民国《宜良县志》十卷首一卷，1921年铅印本，十二册。

（民国）李景泰等修，杨思诚纂：《嵩明县志》三

十八卷，1945 年铅印本，五册。

（清）李廷宰修：康熙《禄劝州志》二卷，传抄北京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八年（公元 1719 年）刻本，二册。

（清）方桂修：乾隆《东川府志》二十卷首一卷，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刻本，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印，一册。

（民国）王均国修，缪果章纂：民国《宣威县志稿》十二卷首一卷，1934 年铅印本。

（清）韩再兰修，李恩光纂：光绪《平彝县志》十卷，传抄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刻本，五册。

（民国）符廷铨等修，杨履乾纂：民国《昭通志稿》十二卷，1924 年铅印本，十册。

（民国）李文林等修，杨履乾纂：民国《昭通县志稿》九卷，1937 年铅印本，九册。

（民国）陆崇仁修，汤祚等纂：民国《巧家县志稿》十卷首一卷，1942 年铅印本，六册。

（清）吴光汉修：光绪《镇雄州志》六卷，清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刻本，八册。

（清）任中宜等纂修：康熙《新兴州志》十卷，梁耀武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清）任中宜纂修：乾隆《新兴州志》十卷，1920 年铅印本，六册。

（清）阚祯兆等纂修：康熙《通海县志》八卷，李孝友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1 月。

（清）赵处中纂修：康熙《通海县志》四卷，1920 年康熙、道光、光绪汇集石印本，十册。

（清）王芷纂修：康熙《河西县志》六卷，梁耀武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清）章履成纂修：康熙《元江府志》二卷，梁耀武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民国）黄元直修：民国《元江州稿》三十卷首一卷末一卷，1922年铅印本，十二册。

（清）李熙龄等纂修：道光《澄江府志》十六卷首一卷，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刻本，十一册。

（清）高翥映撰：《鸡足山志》十三卷首一卷，侯冲、段晓林点校，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

（清）傅天祥等修，黄元治等纂：康熙《大理府志》三十卷首一卷，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刻本，1940年铅字重印，四册。

（民国）张培爵等修，周宗麟等纂：民国《大理县志稿》二十三卷首一卷，1917年铅印本，十七册。

（清）李世保修，张圣功等纂：乾隆《云南县志》四卷，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刻本，四册。

（民国）雷应中等辑：《云南祥云地志资料调查表》，民国十年（1921年）钤云南县印抄本，一册。

（清）蒋旭纂修：康熙《蒙化府志》六卷首一卷，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刻本，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重刻，四册。

（清）刘埏等修：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六卷首一卷，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刻本，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重刻，四册。

（清）王世贵修：康熙《剑川州志》二十卷，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刻本，五册。

（清）杨金和等纂修：光绪《鹤庆府志》三十二卷首一卷，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刻本，十二册。

（清）钮方图修，杨柄铨、侯允钦纂：咸丰《邓

《川州志》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刻本，八册。

（清）陈钊镗修，李其馨等纂：道光《赵州志》六卷，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刻本，1914年补刊，1937年石印，六册。

（清）管学宣修，万学燕纂：乾隆《丽江府志略》二卷，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刻本，四册。

（清）陈宗海修，李福宝等纂：光绪《丽江府志》（不分卷），传抄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稿本，三册。

（清）陈奇典修，刘慥纂：乾隆《永北府志》二十八卷，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刻本，八册。

（民国）李炳臣修，李翰湘纂：民国《维西县志》四卷，传抄1932年稿本，四册。

（民国）段承钧纂修：《泸水志》（不分卷），1932年石印本，二册。

（清）张嘉颖等纂修：康熙《楚雄府志》十卷首一卷，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刻本，十册。

（清）沈宗舜纂修：宣统《楚雄县志》十二卷，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楚雄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957～1322页。

（清）李毓兰修，甘孟贤等纂修：光绪《镇南州志略》十一卷，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刻本，十册。

（清）郭怀礼修，孙泽春纂：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六卷，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刻本，六册。

（清）王埏等纂修：道光《重修姚州志》四卷，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刻本，二册。

（清）甘雨等纂修：光绪《姚州志》十一卷首一卷，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刻本，十二册。

由云龙等纂：民国《姚安县志》六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1949年铅印本，1951年校正，八册。

（民国）郭燮熙纂修：民国《盐丰县志》十二卷首一卷，1924年铅印本，十一册。

《黑盐井志》（著作者、著作年代不详）

（清）刘毓珂等纂修：光绪《永昌府志》六十六卷首一卷，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刻本，八册。

（民国）李根源撰：民国《永平县志稿》十卷，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抄本，三册。

方国瑜主编，沙必璐点校主编：民国《保山县志稿》，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

（民国）袁嘉谷纂修：民国《石屏县志》四十卷首一卷，1938年铅印本，十四册。

（清）江浚源纂修：嘉庆《临安府志》二十卷，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刻本，十四册。

（清）祝宏修，赵节等纂：雍正《建水州志》十六卷，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二十卷刻本，乾隆年间增订，1933年铅字重印，十册。

（民国）丁国梁修，梁家荣纂：民国《续修建水县志稿》十八卷，1920年铅印本，十八册。

（民国）丘廷和撰：民国《缅甸县志》二十四卷，传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稿本，十二册。

周汝剑等辑：《云南省缅甸地志资料细目附表》，民国十一年（1922年）钤缅甸县印抄本，一册。

（民国）张问德修，杨香池纂：民国《顺宁县志初稿》十四卷首一卷，1947年石印本，十五册。

李聪撰：《云县乡土教材》，收入《缅云师范辅导丛书》之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排印本，一册。

（民国）张自明纂：（民国）《马关县志》十卷，

1933 年石印本，十册。

段文遹辑：《云南勐卯行政区地志资料》，民国十二年（1923 年）铃猛防行政委员关防抄本，一册。

## 二、近现代著作（以作者姓氏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目）

### C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12 月。

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 D

丁培仁著：《道教典籍百问》，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年 9 月。

段玉明著：《西南寺庙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8 月。

### F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 9 月。

〔日〕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监修，朱越利译：《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6 月。收入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3 月。

### G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 月。

### H

何显耀著：《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揭秘》，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 4 月。

何光沪主编：《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侯冲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5月。

## L

李养正著：《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版。

李养正著：《当代中国道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月。

李养正著：《道教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12月。收入“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李远国著：《道教气功养生学》，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

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卢国龙著：《道教知识百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12月。收入王志远主编“宗教文化丛书”。

罗宁，高志宏著：《巍山文化之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

## J

《景谷县傣族彝族自治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11月。

## M

马书田著：《中国道教诸神》，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收入“中国神祇丛书”。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

## N

南怀谨著：《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 P

潘雨廷著:《道教史发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 6 月。

# Q

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

# R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6 月。

任宗权著:《道教科仪概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 S

宋恩常主编:《云南地方志道教和民族民间宗教资料琐编》,收入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 T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年 6 月。

汤一介著:《早期道教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年 3 月。

田青主编:《中国宗教音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 5 月。

# W

[日] 窪德忠著:《道教史》,萧坤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 7 月。

王光德、杨立志著:《武当道教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 年 9 月。

王丽珠、薛琳著:《巍山揽胜》,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 8 月。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巍山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 X

（明）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

徐祖祥著：《瑶传道教与社会：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许地山编：《道教史》，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2月。收入“民国丛书”选印本。

薛琳编：《巍山碑刻楹联资料辑》，1987年9月内部印行。

薛琳辑注：《巍山风景名胜碑刻匾联辑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

薛琳著：《巍山史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薛琳编纂：《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Y

余海波、余嘉华著：《木氏土司与丽江》，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

〔美〕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刘宗岳等译，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4月。

游建西著：《道家道教史略论稿》，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8月。

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杨学政、刘婷著：《云南道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7月。

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编：《巍山文化谷：

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未来发展的建议》，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 Z

[日] 早岛正雄著；郑言译：《道教观相导引术与健康》，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9月

詹石窗著：《道教文化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张桥贵著：《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张桥贵、陈麟书著：《宗教人类学：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

张兴荣著：《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

赵亮、俞信赏、张风林著：《苏州道教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年1月。

张宗奇著：《宁夏道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月。

朱越利著：《道教答问》，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10月。

朱越利主编：《中国道教宫观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

## 三、论文（以作者姓氏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目）

### G

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 H

侯冲、杨净麟：《洞经与儒、释、道教之关系辨

析》，《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0期，总第19卷。

## M

梅莉：《明代云南的真武信仰——以武当山金殿铜栏杆铭文为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 W

王建：《从南诏以前的文物中看道教文化的传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南宗教研究》（半年刊）（内部资料），1993年1期。

## Y

杨学政：《云南道教》，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云南宗教研究》（半年刊）（内部资料），1988年1期。

杨学政、郭武：《道教在云南》，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季刊），1993年1-2期。

余海波：《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与道教、佛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

杨福泉：《佛、道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 Z

张泽洪：《杜光庭与云南道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0期，总第26卷。

张泽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明代云南道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2007年第4期。

陈志文：《清代石刻档案进档案馆》，云南省档案局《云南档案》（双月刊），2003年第1期，总第144期。

周建华：《刘渊然与赣南客家道教》，《中国道教》，2006年第1期。

## 后 记

《云南道教史》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云南宗教系列专史丛书”之一。本套系列专史从立项编写到出版，都得到省社科院领导、科研处和院内外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书由杨学政研究员拟定编写提纲，修订文稿。

查阅、调查资料过程中，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云南省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普洱市档案馆、昭通市档案馆、大理州档案馆、云南省宗教局、普洱市民宗局、昭通市民宗局、剑川县民宗局等有关单位，提供了诸多方便。

田野调查中得到了云南省道教协会李明兴会长，云南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海平居士（陆明），腾冲云峰山李宗稳道长，昆明万寿宫廖诚明道长和长春派岳国华道长，昆明真庆观袁至兑、夏诚德道长，昭通大龙洞肖至旻、蒋仕光、郑春林道长和老君殿陈至德道长，剑川张本泽、张河诚、张旭东、刘本续、张本源

道长，保山玉皇阁周诚桃道长，巍山肖遥、苏明隆道长，凤庆汪合耀道长等的积极支持，提供资料。

撰稿期间得到了游建西、侯冲、郭武、方铁、张政、李惠铨、宋恩常、张宽寿、许儒慧、刘鼎寅、罗万金、罗丽萍、周桂鹏、肖志海、李树萍、陈希、李扬、张亚生、李朝春、王志强、马敏荣等诸多师友的提携和激励。

出版过程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郑晓云研究员、云南省宗教局郭滇明副局长、云南大学出版社本书责任编辑周元晖老师均伸出了真诚的援助之手，给予鼎力帮助！

在此谨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具体撰写分工如下：

萧霁虹撰写第一章至第六章第一、二、三节，第七章，附录《云南道士名录》、《云南道观一览表》、《云南道教大事记》。

董允撰写第六章第四节和附录《云南省各级道教团体概况》。

此外，本书的撰写，还广泛地参考了诸多文献资料，因其繁多，难以列举，借此机会，向这些文献资料的作者谨表谢忱！

由于时间仓促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疏失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7年8月